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

王小盾◎主编



人民出版社

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


ISBN 978-7-01-009500-4

9 787010 095004 >

定价：40.00元



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

王小盾◎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俊智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王小盾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01-009500-4

Ⅰ.①古…　Ⅱ.①王…　Ⅲ.①文学史-中国-古代-文集　Ⅳ.①I2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9016 号

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
GUDAI HANWEN XUE DE SHENGCUN YU CHUANBO YANJIU LUNJI

王小盾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90 千字

ISBN 978-7-01-009500-4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王小盾

一

2009 年 11 月下旬,四川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几所省属高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聚在成都狮子山下,围绕"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这一主题,进行了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本书是对这次讨论的总结。它意味着有一些居住在偏远省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按一条新的研究思路相约迈开了脚步。这些人或许会使一个尚处于边缘的文学研究思潮,渐渐成为新世纪的学术主流。

以上信心源于对这条新思路的理解。它包含以下四个关键词:

(一)古代。汉文学的"古代"是一个全球视野下的文化概念。它指的是东部亚洲汉字文化区的时代。它起于汉字初成之时,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改变了全世界的文化格局,汉文学随华侨的扩散而进入它的"现代",即全球时代。

(二)汉文学。它指的是使用汉语言文字的文学。除中国的汉文学以外,既包括使用汉字而未必使用汉语的文学,例如古代越南、日本、琉球、朝鲜半岛的文学,也包括使用汉语而未必使用汉字的文学,例如分散在中亚地区的东干文学。

(三)生存。文学是依靠一定条件而生存的。只有揭示了这些条件,才

能揭示文学种种样态的原理。从人类学角度看，文学有作为仪式的生存；从历史学角度看，文学有作为文人聚会活动、民众聚会活动的生存；从宗教学角度看，文学有作为宣传手段、作为广场艺术的生存；而从经济学角度看，文学的每一种生存，都须依赖一定的"恩主"。文学的功能很丰富，有几种功能就有几种生存；文学的生存也很奢侈，有几种生存方式就要求有几方面物质基础。

（四）传播。完整的文学活动包括三个环节：制作、传播、接受。传播是这一活动的中心环节，也是使文学得以获得其存在形式的关键。从语言角度看，这一环节采用了吟诵、歌唱、说唱等手段；从文字角度看，这一环节采用了铭刻、书写、印刷等手段。而在传播和制作相交叉的领域，有种种编纂手段；在传播和接受相交叉的领域，有种种著录手段。

以上四个关键词，代表了"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也就是说，在这一主题之下，我们将以古代汉文学为对象，考察它的种种生存状态，包括作为仪式、作为聚会活动、作为宣传手段、作为广场艺术的生存，也包括这些生存所依赖的条件；同样，我们将考察古代汉文学的种种传播方式，包括它用于传播手段的吟诵、歌唱、说唱、铭刻、书写、印刷，也包括它的编纂和著录。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学术思路，是因为和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相比，它有以下四个优点：

第一，它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它所研究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而是包括日本、越南、韩国、朝鲜在内的东方古典文学整体。在过去几千年里，上述诸区域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实体，理应成为同一学科的对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过去的研究应当是有所提升的。过去的研究主要以中国大陆的汉语作家文学为对象，对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的关联有所忽视，也对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汉文学的关联有所忽视。我们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第二，它有比较宏大的目标。它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艺术珍品，而是要去探讨文学的真相。如上所说，文学在社会中的真实存在，至少包括创作、传播、接受三个环节。在这三者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传播，因为文学活动是通过它而得以实现的，文学创作的样式也是由它规定的。从研究的角度看，

传播是文学活动中最具规律性的因素。如果说作家、作品代表了文学史上的一次性事件，那么，传播就是重复出现的文学现象，具备“长时段”的质量。因此，它是最容易把握、最值得探究的事物。就此而言，我们的工作既具有披沙拣金的意义，也具有拾遗补弊的意义。因为过去人所关注的作家和作品，只属于“创作”这一环节；所关注的文学批评，也只是“接受”的组成部分。

第三，它有比较科学的路线。传统的文学研究重视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学，侧重考虑它同审美风尚的关联。这种研究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说明事物的“当然”；但它却不太容易说明事物的“所以然”，因为它是从精神到精神的平面研究。我们的工作与此不同。我们不排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但我们更注意富于层次的比较研究，注意通过物质去考察精神、通过行为去理解思想、通过社会存在去认识社会意识。我们的意图是探知事物和事件的本质，理解事情的原因和原理。

第四，它有比较深刻的追求。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什么？通常的看法是娱情、陶冶、审美，我们则认为是表达思想、交流文化、征服人心。我们认为，汉文学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便是通过表达思想、交流文化、征服人心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我们注意到，在历史上，汉文化向四周的扩大，总是以汉文学为先驱的；汉文学的边界，总是略大于“中国”的边界。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汉文学，那么现在的“中国”便只是河南省中部的一个小小的地区。但历史却走上了另一条路：造就了不断发展的汉文学；随着汉文学的传播，汉文化逐渐覆盖了自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域。同这一历史事实相对比，过去的工作便不免显得有些狭隘了。为此，我们主张扩大视野，考察在更大范围内持续发生影响的问题，重新认识文学，认识文学的功能，认识实现文学之功能的方式。

总之，我们认为，人类的视野是随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变革的时代已向文学研究提出变革的要求。精神是由物质决定的，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我们应该依据这一事实来建立新的研究方向。文学研究主要是创造知识的工作，而不是创造价值的工作，它势必走上科学的道路。正是这一切，规定了我们的学术路线。我们所进行的“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其在思想方法上的特点就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面对汉文学整

体,主要用探讨规律的方式,而不只是描写表面形貌的方式,来研究文学现象的原因和原理。

二

不过,以上认识并不仅仅属于某一群人,它是在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最近几十年,各国研究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与这些认识相接近的一些要点。比如法国远东博物院联合中国台湾、中国大陆、韩国等地的研究者进行了东方各国小说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这项工作,乃把古代的汉字覆盖区看作一个文化实体。又如南京大学等许多高等院校,已注意发展域外汉文古籍研究和域外汉学研究。这些工作在上述意义之上,进一步强调了全面考察基本史料的研究路线。另外,在敦煌文学研究、中国俗文学研究、印刷术和文学关系研究、汉文学文体研究等领域,研究者的注意力已经转变了,已经从作家作品研究转变到对文学的长时段现象进行研究。这种种情况,势必促成一个系统的、关于“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的研究思路。

正是在认识上述学术形势的同时,我们认识了自己。可以说,我们以往工作的意义,同样在于促成“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这一系统认识。比如, 1982 年,扬州师范学院建立起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围绕博士点的培养,它建立了对文学与文化作综合研究的特色。这包括任半塘教授的唐代文艺研究,其代表作有《唐声诗》、《唐戏弄》、《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教坊记笺订》、《优语集》;也包括徐沁君教授的戏曲文化研究、李廷先教授的扬州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谭佛雏教授的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谢伯阳教授的明清散曲研究,其代表作分别有《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唐代扬州史考》、《王国维诗学研究》、《全明散曲》和《全清散曲》。前辈学者所建立的传统,在新一代扬州学人中得到了发扬。当前扬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工作,因此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重视在较宽阔的视野中建立汉文学研究的文献基础。例如董国炎、许建中、陈文和、陆永峰等人编写了《全辽金文》、《文献研究》、《全元曲校

注》、《钱大昕全集》、《王鸣盛全集》、《禅月集校注》等文献考据著作；又如黄强的科举文学和文体研究、汪俊的宋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研究、顾农的建安文学和文学集团研究，皆重视史料辨析。

（二）重视多学科比较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史和文学史的比较研究，二是学术史和文学史的比较研究。前一方面有王永平的汉魏六朝社会史与文学史的比较研究。在这个领域，他著有《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等书。后一方面有田汉云的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他著有《六朝经学与玄学》等书。

（三）重视考察长时段现象和文学史规律，重视研究文体、文学集团、文学思潮等重要的中观事物，以实现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结合。这方面例证有：董国炎著《明清小说思潮》、黄强著《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许建中著《明清传奇结构研究》、王永平著《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这些著作分别从思想史、文体史、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论述了文学发展的规律，也论述了历代文学在艺术精神和创作体制方面的继承与革新。除此之外，扬州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还承担了"唐宋八大家与时文"、"唐代僧诗研究"、"晋江宝卷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中地域文化和文人分布问题"等课题。其中"平民文学两次兴起：评话小说研究"、"文学的雅俗流变与整合：从民间戏文到文人传奇的文化研究"、"秦文化视野下的东周秦文学"、"中国古代诗歌在越南的移植研究"、"道情及其源流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四川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有较深厚的历史积累。这里是楚辞学的重镇。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教授，从文字音韵之学进入辞赋之学，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等著作。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在整体研究中揭示事实真相的特点。他所提出的"相互渗透，果中求因"、注重会通的学术思想，也在新一代学者那里得到了贯彻。例如万光治著《汉赋通论》、李大明著《九歌论笺》、《汉楚辞学史》，便是整体研究与具体考证相结合的著作。四川师范大学也是文学文献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和巴蜀文化研究的重镇。屈守元教授著《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韩诗外传笺疏》、《韩愈全集校注》等，分别是《文选》学的重要专著

和以校注之法研究《韩诗外传》、韩愈诗文的集大成著作。另外，在唐代文学、巴蜀文化研究方面，除屈守元教授著有《刘禹锡研究》外，王仲镛教授所著《唐诗纪事校笺》，是以文献考据之法研究唐代文学的范例；王文才教授关于杨慎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的系列著作，则具有鲜明的蜀学个性。这几方面学术传统都得到了延续。例如现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吴明贤关于唐代诗人入蜀的系列考证，便可看作文学文献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巴蜀文化研究的综合。

2008 年，为促进人才培养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建立了“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科研创新团队。这个团队依托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由以下八人组成：

王小盾，57 岁(当时年龄，下同)，文学博士。主要进行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研究、早期文化研究、域外汉籍研究。著有《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唐代酒令艺术》、《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等著作。曾经主持和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传播方式与中国诗体的变迁”、“《乐府诗集》研究”、“《高丽史乐志》研究”。

李诚，55 岁，曾在汤炳正先生指导下取得硕士学位。专长《楚辞》和中国早期俗信仰研究。著有《巴蜀神话传说刍论》、《楚辞论稿》等著作。正在进行“口头形态和写本形态的中国早期叙事研究”。

熊良智，54 岁，曾在汤炳正先生指导下取得硕士学位。专长《诗经》、《楚辞》的考据学研究。著有《楚辞文化研究》等著作。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辞的传播形成与作家文学的诞生”。

哈磊，40 岁，文学博士。专长佛教原理和中国佛教史研究，著有《四念处研究》等著作。

汤珺，35 岁，文学博士。著有《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等著作，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金汉文典籍在西夏的流传及影响研究”。

赵俊波，35 岁，文学博士。著有《中晚唐赋分体研究》等著作，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律赋研究”。

汪燕岗，34 岁，文学博士。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雕版印刷与明

清通俗小说的出版”研究。

庄逸云，33岁，文学博士。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研究”。

概括说来，这个团队有两个特点：其一，它的研究方向是依托一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的学术活力；其二，它的主体是一批年轻的文学博士，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事实上，这也是扬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特点。扬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有8名40岁以下的年轻博士；他们的研究专长，同样覆盖了包括先秦地域文学研究、越南诗学研究、明清两代佛教活动与文学关系研究在内的较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三

唐代有一句成语，叫“扬一益二”，意思是天下物产之盛，在于扬州和成都。这成语仿佛是为今天预备的。我对这句成语的理解是：来自扬州和成都的这两个中国古代文学学术集体，既然有相近的风格，有共同的志向，那么，它们就应该携起手来，为中国学术作出自己的贡献。

按照计划，我们将于来年春天、烟花三月之时，在扬州再次聚首，讨论未来两三年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结晶为以下研究成果：

一、关于早期汉文学和汉文学专题史研究

1.《汉文学的早期形态》（王小盾）
2.《周秦方国和东周秦文学》（倪晋波）
3.《楚辞的传播形成与作家文学的诞生》（熊良智）
4.《口头形态和写本形态的中国早期叙事研究》（李诚）
5.《先秦传体研究》（柳宏）
6.《游侠文学的形成及其早期传播》（贾立国）
7.《文学文献编纂与著录论考》（李大明）

二、关于中古汉文学研究
8.《唐代诗人入蜀考》(吴明贤)
9.《古代童蒙教育与文学》(戴健)
10.《宋代李白接受研究》(王红霞)
11.《宋金汉文典籍在西夏的流传及影响》(汤珺)
12.《科举文体和中古社会》(赵俊波)
13.《中古诗歌的音乐传播研究》(王立增)
14.《宋代对宋前文学的接受》(汪俊)
15.《宋明学官与俗文学的传播》(葛传彬)
16.《金代俗词的生存状态与传播方式》(王定勇)

三、关于近世汉文学和汉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
17.《中国口述史小说研究》(董国炎)
18.《南方宝卷研究》(陆永峰)
19.《明清通俗小说和雕版印刷的关系》(汪燕岗)
20.《清代两淮盐商的文学活动研究》(明光)
21.《宋词在清代的生存》(曹明升)
22.《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研究》(庄逸云)
23.《宋以后的科举文体及其域外传播》(黄强)
24.《中国古代诗歌在越南的移植》(何仟年)
25.《汉语叙事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朱旭强)

对以上这个由25部著作组成的计划,我们尚不敢乐观。古人有云:“方其搦管,气倍于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现在只是“搦管”之时,等到“篇成”,也许逃不掉“半折”的命运。不过,我们却愿意和各位读者共享这一计划。因为我们希望用它来求取同行读者的批评和督促;或许,它也可以成为有更多人参与的事业。

目 录

第三部分　近世汉文学研究

第四部分　汉文学的传播研究

第一部分

早期汉文学和汉文学专题史研究

拟骚作品的接受与传播

熊良智

屈原是楚辞文学的开创者,楚辞的文学传统也是以屈原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可是,屈原这个历史地位却一直遭到质疑。虽然,屈原是否有其人的说法近年已经渐渐地消失了,但他与楚辞文学的关系,是否楚辞学家仍然有人持否定态度。日本学者冈村繁"对赋予屈原以楚辞文学伟大作家的身份终究想持怀疑的态度"[①],他认为这是"把屈原这样一位楚辞文学的主人公偷换成楚辞文学作者","汉初以前的楚辞作品不是把屈原当成作家,而是仅仅当作忠臣来对待"[②],今天更有学者宣称:"'楚辞',并不包括先秦之屈原、宋玉等人的诗赋。"[③]因为他们的理由是:"'楚辞'的名称未见先秦文献,始出汉代。"[④]"从战国末年到汉代,凡是这时期中的文献里面,既没有关于'楚辞'的传说,也没有提到《离骚》或《九歌》等篇的记载。"[⑤]对汉代的相关文献,包

① 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一卷《周汉文学史考》,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② 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一卷《周汉文学史考》,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9页。

③ 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辩》,《复旦学报》,2008年第3期,第3页。

④ 同上。

⑤ 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8页。

括司马迁《史记》、王逸《楚辞章句》等也多否定。笔者以为，先秦存留后世文献本就有限，迄今也的确未见有关屈原、楚辞的相关记载。但是我们认为，作品是作家的标志，而作品的流传，不仅证明它的选择与接受，更证明了它的历史存在。楚辞有鲜明的拟骚传统，大量的诗句因袭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观察视角和途径。

一、关于屈原与楚辞的流传

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作了一篇《瓠落的文学史》的文章，就从具体的书写方式中提出问题。他说：

>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屈原在自沉以前写了《怀沙》？他确实把它书写在竹简上了吗？
>
> 到底有没有证据向我们证明《怀沙》是"书面"创作的？有一个可能是《怀沙》最初只是口头创作，在口头流传，后来才被写下来的。在"写"一个文本和"写下来"一个口头流传的文本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差别。如果《怀沙》是屈原的口头创作，那么是谁把它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带回文明世界的呢？[①]

这其实已经涉及了传播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创作的问题。宇文所安提出的疑问，早在上世纪60年代，蒋天枢先生《楚辞新注导论》就有了思考，他说：

> 其（屈原）沈江前有无亲属相随亦无考。当屈原南行时，随同前往者至少应有三五人。屈原至江南后亦可能有继至者，其人殆皆屈原平日揽取为佩之"芳草"，皆所谓无名义士也。屈原死前，当有所嘱托：得间北归，以己死事报王。《怀沙》、《思美人》、《惜往日》、

①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 《悲回风》各篇中所有殷切致望于顷襄之语，亦必有此种情况为其凭籍。屈原死前所著各篇当皆由此辈义士为之挈归。而相传书于壁上之《天问》，殆亦由此辈辑录，传其事于北方，后人因著其语于序文中也。[①]

蒋天枢先生的说法倒是符合人情的一种推测，因为屈原沈江前后的作品，总会有人搜集、留存、传播，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楚辞》作品。

我们知道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辞文献，对《楚辞》中的各篇作品，他都注意总结作者身世，交代作品的创作，而且对于楚辞作品的流传，他一再说明楚人“以相教传”，而且还有史官记录的传统，所谓“史官录第，遂列于篇”[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证明。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官，不仅具体记述了屈原创作《离骚》、《怀沙》、《渔父》的背景遭遇，而且记录了《天问》、《哀郢》、《招魂》，特别是还告诉了楚人教传的情况：“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著称。然皆祖屈原之从辞令，终莫敢直谏。”[③]屈原的作品有宋玉、唐勒等人爱好、诵习。这在今存的宋玉的《九辨》因袭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篇目。同时，我们的确看到，屈原的作品是和他的事迹并行流传的。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作《吊屈原赋》，叙述屈原事迹，“侧闻屈原自沉汨罗”，并化用《离骚》诗句：“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又司马迁叙述游历江淮，“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皆为贾谊、司马迁亲历所得传闻。又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所出汉简，已有《离骚》、《涉江》残句，据考证时限不得晚于文帝十六年（前165年）。与贾谊在文帝十五年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相印证。这样大量记载和确凿的事实，屈原楚辞的否定论者不加理会，却只注意到《史记》记载中的“疏略，或有抵牾”[④]，认为《史记·屈原列传》不可靠，还在于资料的贫乏，他们认为：“如果进一步通览《屈原传》全篇，还可以发现，

---

① 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9页。
③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9页。
④ 裴骃：《史记集解序》，《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23页。

除以指出的占全篇四分之一的是《楚世家》借用文字以外，相当于这篇传记三分之一的结尾部分的长篇文字，如众所周知，也只是全部照搬《楚辞·渔父》和《怀沙》。这两处和在一起已占去了文章的六成左右。"[①]我们当然承认《史记》也有疏略和抵牾，也不排除先秦史料的有限和缺失，但是，仅从今本内容篇幅的比例安排上去否定，未必就是《屈原列传》的失误和应被否定的理由，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指出："司马迁《史记》说作诸子列传，大抵为读其书有所感而发。"《管晏传》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载其言之也。既见其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此不啻为以后老、庄、申、韩、司马、孙、吴、商君、孟、荀、虞卿、鲁连、邹阳、屈、贾诸传之凡例。故传中必叙其所著书，又言余读其书某篇，皆所谓见其所著书观其行事之意也。"[②]则冈村繁先生的质疑是未明《屈原列传》著书之例，正是因文而观其事，而传其事迹。又刘向奉诏校书中秘，观天下图书编成十六卷《楚辞》，所作《九叹》，言："览屈氏之《离骚》兮"，"犹未殚于《九章》"，也有不少因袭屈原作品的诗句，特别是淮南王刘安奉诏作《离骚传》，辑成《楚辞》一书。（别详《〈楚辞〉作品早期传本》。）大量的事实都在证明着屈原作为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形成楚辞文学开创者，也足以回答宇文所安的质疑。我们看《汉书·地理志》叙述"楚辞"的流传，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对"楚辞"的解说都包含了这样的看法。总是从屈原、宋玉创作说起，再经过汉代流传，并且加上了汉代作家的作品，才由汉人界定形成了"楚辞"。

二、从拟骚作品看楚辞

"楚辞"其语虽不见于先秦文献，但是楚辞作品却客观存在，而且一直是围绕着屈原"以相教传"，才有了"世传楚辞"。《汉书·地理志》就明确记述：

>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刘）濞于吴招

① 《冈村繁全集》第一卷《周汉文学史考》，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7 页。
②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1 页。

> 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显贵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①]

楚辞在汉文帝早年就已经成为经典，为帝王宫廷重视，阜阳汉简中的楚辞残句可以证明它已经作为诸侯王墓葬的珍品，汉武帝初即位就诏刘安作《离骚传》，都充分显示楚辞在先秦到汉流传的广泛和影响。更能证明在战国时代流传的信息，则是直接从楚人宋玉的《九辩》中可以获得。我们看《九辩》中因袭屈原作品的诗句：

《九辩》	《离骚》
聊逍遥以相佯。	聊逍遥以相羊。
何时俗之工巧兮。	固时俗之工巧兮，
	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
世雷同而炫曜兮。	世幽昧以昡曜兮。
载云旗之委蛇。	载云旗之委蛇。
	《哀郢》
去家离乡兮来远客。	去故乡而就远兮。
超逍遥兮今焉薄。	忽翱翔之焉薄。
忠昭昭而愿见兮。	忠湛湛而愿进兮。
尧舜之抗行兮。	彼尧舜之抗行兮。
瞭冥冥而薄天。	瞭杳杳而薄天。
被以不慈之伪名。	被以不慈之伪名。
憎愠惀之修美兮。	憎愠惀之修美兮。
好夫人之慷慨。	好夫人之慷慨。
众踥蹀而日进兮，	众踥蹀而日进兮，

① 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3页。

美超远而逾迈。	美超远而逾迈。
	《惜诵》
专思君兮不可化。	专惟君而无他兮。
中瞀乱兮迷惑。	中闷瞀之忳忳。
	《涉江》
霰雪糅其增加兮。	霰雪纷其无垠兮。
岁忽忽而遒尽兮。	岁曶曶其若颓兮。
	《悲回风》
老冉冉而愈弛	时亦冉冉而将至。
虽重介之何益。	任重石之何益。
	《思美人》
愿寄言于流黔。	愿寄言于浮云兮。
羌儵忽而难当。	羌宿高而难当，
	卒壅蔽此浮云兮。

上面对照《九辩》中因袭屈原诗句的作品有《离骚》、《哀郢》、《惜诵》、《涉江》、《悲回风》、《思美人》。宋玉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因此，他的《九辩》中，涉及到的《楚辞》这些篇目，标志着战国时代已经客观存在。而且这种因袭，在汉初流传中也成为风气。我们看兴于文景之际的严忌，有《哀时命》，建元初年入朝的东方朔有《七谏》中相关内容：

《哀时命》	《离骚》
老冉冉而逮之。	老冉冉其将至兮。
世并举而好朋兮。	世并举而好朋兮。
虽体解其不变兮，	岁体解其犹未变兮，
岂忠信之可化。	岂余心之可惩。
履绳墨而不颇。	循绳墨而不颇。
时暧暧其将罢兮。	时暧暧其将罢兮。
俗嫉妒而蔽贤兮。	好蔽美而嫉妒。

《惜诵》

焉发愤而抒情。	发愤以抒情。
外迫协于机臂兮，	矰弋机而在上兮。

上牵联于矰雉。(洪兴祖《楚辞考异》：雉，一作弋。《补注》：雉，与弋同。)

《涉江》

冠崔嵬而切云兮。	举长铗之陆离兮。
剑淋离而纵横。	冠切云之崔嵬。
固将愁若而终穷。	固将愁苦而终穷。
云依斐而承宇。	云霏霏而承宇。

《怀沙》

孰知余之从容。	孰知余之从容。
为凤凰作鹑笼兮。	凤凰在笯兮。
一斗斛而相量。	一概而相量。

《抽思》

心郁郁而无告兮。	心郁郁之忧思兮。

《思美人》

志沈抑而不扬。	志沈菀而莫达。

《远游》

往者不可扳援兮。	往者余弗及兮。
徕者不可与期。	来者吾不闻。
夜炯炯而不寐兮。	夜耿耿而不寐兮。
谁可与玩此遗芳。	谁可与玩斯遗芳兮。

《九辩》

道壅塞而不通。	路壅绝而不通兮。
廓落寂而无友兮。	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

白日晼晚其将入兮。	白日晼晚其将入兮。
哀余寿之弗将。	恐余寿之弗将。
心纡轸而增伤。	中结轸而增伤。
愿一见阳春之白日兮，	恐溘死不得见于阳春。
恐不终乎永年。	
东方朔《七谏》	《离骚》
怨灵修之浩荡兮。(《谬谏》)	怨灵修之浩荡兮。
固时俗之工巧兮。	固时俗之工巧兮。
灭规矩而改错。	偭规矩而改错。
不量凿而正枘兮。	不量凿而正枘兮。
恐矩矱之不同。	求矩矱之所同。
念女嬃之婵媛兮。(《哀命》)	念女嬃之婵媛兮。
背绳墨之正方。(《沉江》)	背绳墨以追曲兮。
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怨世》)	吕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舒志。	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饭牛而商歌兮。	宁戚之讴歌兮。
桓公闻而弗置。	齐桓闻以该辅。
	《惜诵》
苦众口之铄金。(《自悲》)	故众口其铄金兮。
欲高飞而远集兮。(《怨世》)	欲高飞而远集兮，
恐离罔而灭败。	恐重患而离尤。
	《涉江》
鸾皇孔凤，日以远兮。(《乱》)	鸾鸟凤凰，日以远兮。
畜凫驾鹅，鸡鹜满堂坛兮。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自古而固然兮。	与前世而皆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哀郢》
皇天既不纯命兮。(《怨世》)	皇天既不纯命兮。
超慌忽其焉如。(《自悲》)	荒忽其焉极。

狐死必首丘兮。	狐死必首丘。
	《抽思》
愿承闲而效志兮,(《谬谏》)	愿承闲而自察兮,
恐犯忌而干讳。	心震悼而不敢。
孰能施于无报。(《自悲》)	孰能无施而有报兮
	《惜往日》
正臣端其操行兮。(《沉江》)	何贞臣之无罪兮。
反离谤而见攘。	被离谤而见尤。
秋草荣其将实兮。	何芳草之早殀兮。
微霜下而夜降,	微霜降而下戒,
明法令而修理兮。	明法度之嫌疑。
	《悲回风》
心沸热其若汤。(《自悲》)	心踊跃其若汤。
登峦山而远望兮。	登石峦以远望兮。
兰芷幽而有芳。(《沉江》)	兰芷幽而独芳。
岁忽忽其若颓。(《自悲》)	岁忽忽其若颓兮。
	《远游》
往者不可及兮。(《初放》)	往者余弗及兮。
来者不可待。	来者吾不闻。
怀琬琰以为心。(《自悲》)	怀琬琰之华英。
好桂树之冬荣。	丽桂树之冬荣。
	《九辩》
固时俗之工巧兮,(《谬谏》)	固时俗之工巧兮,
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而改错。
却骐骥而不乘兮。	却骐骥而不乘兮。
策驽骀而取路。	策驽骀而取路。
当世岂无骐骥兮。	当世岂无骐骥兮。
诚无王良之善驭。	诚莫之能善御。
见执辔者非其人兮。	见执辔者非其人兮。

故驹跳而远去。	故驹跳而远去。
众鸟皆有行列兮 。	众鸟皆有登栖兮。
凤独翔翔而无所薄。	凤独惶惶而无所集。
欲阖口而无言兮。	愿衔枚而无言兮。
尝被君之厚德。	尝被君之渥洽。
	《惜誓》
比干忠而剖心。(《怨思》)	比干忠谏而剖心兮 。
箕子寐而佯狂。(《沉江》)	箕子被发而佯狂。
枭鸮并进而俱鸣兮。(《怨思》)	鸱枭群而制之。
凤皇飞而高翔。	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
含沆瀣以长生。(《自悲》)	吸沆瀣以充虚。
	《哀时命》
伯夷饿于首阳。(《沉江》)	伯夷死于首阳。
菎蕗杂于黀蒸兮。(《谬谏》)	菎蕗杂于黀蒸兮。
机蓬矢以射革。	机蓬矢以射革。

严忌《哀时命》因袭屈、宋作品诗句的篇目有《离骚》、《惜诵》、《涉江》、《怀沙》、《抽思》、《思美人》、《远游》和《九辩》,东方朔《七谏》又增加了《哀郢》、《惜往日》、《悲回风》、《惜誓》和《哀时命》。《七谏》多次用到"橘柚"的意象,作为美善坚贞君子的象征,同门李诚教授认为:"汉人拟楚辞中出现的对橘树的颂扬,毫无疑问当出自屈骚《橘颂》。"[①]他举出的例子,分别是《七谏·初放》、《自悲》、《谬谏》中描述:

斥逐鸿鹄兮,近习鸱枭,斩伐橘柚兮,列树若桃。

杂橘柚以为囿兮,列新事与椒桢。

拔搴玄芝兮,列数芋荷。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

① 李诚:《楚辞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0 页。

王逸《章句》就说："言君乃拔去玄芝，贱弃橘柚，种植芋荷，养鱼苦李，爱重小人，斥逐君子也。"[1]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则东方朔接受屈原《橘颂》的意象，也意味着《橘颂》在武帝时期也已流行了。

从上面作品的比照之中，我们看到从战国到西汉初年楚辞作品流传的篇目的信息，包括《离骚》、《九章》、《远游》、《九辩》、《天问》、《渔父》、《招魂》(见于《史记》)。另外是汉人拟骚的作品：《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只不见《大招》、《卜居》二篇。尤其是这些反复、大量因袭的诗句，只能充分证明他们是真正把屈原当成作家，才可能对其作品诗句大量因袭。虽然这与楚辞本身带有乐歌音乐的特点有关，与其诵读的方式有关，所以在屈原本人的作品，甚至是同一篇作品中，这种相同类似的句子都会重复出现。贾谊凭吊屈原，引用《离骚》的诗句，双古堆汉墓中汉简也有楚辞的残句，尤其是刘安奉诏作《离骚传》，不可能设想刘安去冒欺君之罪，无中生有虚构"屈原之作《离骚》"。

三、楚辞流传的指向

从前面清理楚辞作品的流传，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以屈原为中心，随屈原的事迹一起流传的。从《九辩》开始，《楚辞章句》的序就称为"闵惜其师"，其他汉人拟骚作品也多是如此。或言《招隐士》、《七谏》、《九怀》"追悯屈原"，《哀时命》又是"哀屈原受性忠贞"，《九叹》则是"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九思》则是"读《楚辞》而伤愍屈原"。在这些作品中，有的叙述了屈原早年的出生："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言语讷涩兮，又无强辅。浅智褊能兮，闻见又寡。"[2]有的又叙其沉江的最后结局，"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3]或言其创作，"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4]这些内容有的早于《史记》，或《史记》皆有不载。特别是在《九辩》中，咏叹的"有

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57 页。
② 东方朔：《七谏》，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36 页。
③ 严忌：《哀时命》，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65 页。
④ 刘向：《九叹》，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00 页。

美一人”，虽未言屈原之名，却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代言，直接袭用屈原作品中的诗句，以屈原的身份在诉说，表达心中的迷惑：“专思君兮不可化”，直斥“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感叹老之将至：“老冉冉而愈驰”，“虽重介之何益？”可以见于《惜诵》、《离骚》、《悲回风》。尤其是下面的诗句，更是集中地借用了《哀郢》一诗：“尧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这正可以弥补屈原及其作品在战国流传的史书记载之不足。

再从汉初拟骚作品的内容来看，的确它们都传述了屈原作为一个忠臣的身世遭遇，但是，我发现他们叙述屈原忠臣的遭遇的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以屈原的身份说话，而且常常都因袭屈原的诗句。他们认同的这个抒情主人公敢于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弊端：是非颠倒，贤愚不分，蔽贤妬能，违背法度。《九辩》有：“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七谏》则有：“固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之正方”；《哀时命》则作“世并举而好朋兮”，“时暧暧其将罢兮”，“俗嫉妒而蔽贤”。抒情主人公有着对国君的忠诚，但又因为不为君知而含怨，《九辩》中感叹：“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之心兮与余异”，《哀时命》则赞美：“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但又有哀怨：“灵皇其不寤知兮，焉陈词而效忠？”《七谏》则直接引述：“怨灵修之浩荡兮”，尽管也是不忘“尝被君之厚德”，与《九辩》所诉：“尝被君之渥洽”一样。从而慨叹时之不遇，《九辩》言：“悼余生之不时兮”，《哀时命》一开始也直抒胸臆：“夫何予之不遘时”，《七谏》中《哀命》又是开章明义：“哀时命之不合兮”，《九叹·愍命》也有：“哀余生之不当兮”，这不正是《离骚》中的感叹：“哀朕时之不当”。于是有一种强烈的现实紧迫感，屈原在《远游》言其“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哀时命》就咏叹“往者不可扳援兮，来者不可期”，《七谏》也说：“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于是岁月荏苒，老之将至，而时不我待。《离骚》说：“老冉冉其将至兮”，《九辩》、《哀时命》、《七谏》中的抒情主人公都有同样的情怀：“老冉冉而愈驰”、“老冉冉而逮之”、“岁忽忽其若颓”，于是孤独无依，逍遥彷徨，《离骚》诉说“聊逍遥以相羊”，《哀郢》有“忽翱翔之焉薄”，《九辩》则有“超逍遥兮今焉薄”，《七谏》则有了“超慌忽其焉薄”的共鸣。可见，他们对抒情主人公的身世情怀都有普通的认同，对抒情主人

公的诗歌作品也都是非常熟悉，所以传诵甚广。

由此，我们可以更加相信，屈原不仅是作为一个品质高尚的忠臣为人们赞颂，也是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流传在人们口中，记忆在人们心中。否则，屈原自己没有诗歌作品，人们怎么可能大量地因袭他的诗句述说他的故事呢？并且足以证明战国以来，直到汉初，屈原和他的作品正是以口传、诵习的方式“以相教传”。至于日本学者所持怀疑，“把屈原这样一位楚辞文学的主人公偷换成楚辞文学作者”，这表明冈村繁先生看到了拟骚作品中作者与抒情主人公的关系，即作者以第一人称方式进入了诗歌，并转换成了作品中的人物，借助作品中人物的视角，诉说人生的遭遇和情怀。这就使得抒情主人公和作者交叉、重合。比如《九辩》中的“有美一人”，朱熹不同意王逸的说法，认为“有美一人谓屈原也”[①]。因而其下“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特别是在“余萎约而悲愁”下，朱熹就说：“余，宋玉为屈原之自余也。凡言余及我者，皆放此。”[②]此即是《九辩》的作者宋玉以“余”的第一人称方式，转换成了作品中的人物屈原的身份。

《七谏》自叙其身世，“平生于国”，而又言“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复东。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③]，这谁都能明白是叙写的屈原，可《七谏·沉江》仍然是以第一人称方式表达的：“苦众人之妒予兮”。刘向《九叹·思古》叙说：“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壹悟。还余车于南郢兮，复往轨于初古。”[④]这里的“余”当然是屈原，则此抒情主人公乃是《九叹》作者选择的叙述视角，似乎在叙说抒情主人公的身世情怀。使得这些悯伤屈原的作品，以屈原的身份、语气，甚至就直接因袭了屈原自己的诗句来诉说。这样，会使抒情主人公的遭遇和情感具有更加真切的生活经验性，也就使隐含在抒情主人公身后的作者情同身受的情结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性，结果让抒情主人公成了作者的代言人。（另详《楚辞拟骚作品的视角话语》）的确，这些作品中都存在抒情主人公与作者的角色交叉、重合，甚至转换的问题。不

①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0 页。
② 同上，第 121 页。
③ 东方朔：《七谏》，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42 页。
④ 刘向：《九叹》，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07 页。

过，我们认为，如果抒情主人公屈原自身不是诗人，没有作品流传，则作品人物也就没有诗句可以袭用，他也不可能转换成“楚辞文学”的作者。更重要的是，拟骚作品的作者心中抒情主人公就是一个诗人，我们看《哀时命》，在以第一人称述说：“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往者不可扳援兮，来者不可与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①刘向《九叹·惜贤》就直接发表评述：“览屈氏之《离骚》兮，心哀哀而怫郁。”②抒情主人公本身就有着诗歌创作，怎么是转换成为了楚辞文学的作者呢？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新序·节士》的记载，这个抒情主人公屈原的楚辞伟大作家的地位就是历史的客观真实存在，楚辞文学的传统，也正是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作家奠定的，没有屈原，也就没有楚辞，而汉世的楚辞也正是在屈、宋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的，而不可能与屈、宋无关。

提　要：本文清理了《九辩》以及汉代拟骚作品中有关屈原及其楚辞作品的流传，说明了战国至西汉初期楚辞作品流传的具体篇目和屈原的遭遇事迹，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屈原为中心的楚辞文学的传统，可以弥补先秦、汉初文献记载的缺失。特别是通过其中大量的诗句因袭，揭示出作者的精心构思，这并不是所谓的简单模拟。它是采用第一人称，以屈原身份说话的艺术表现方式。

关键词：屈原　拟骚作品　接受　传播

---

① 严忌：《哀时命》，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59 页。
② 刘向：《九叹》，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95 页。

文化接触、民族认同与春秋秦文学的发生

倪晋波

一、引言

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至少有两种最为常见的路向。一种是“史”的观照，即以文学作品、作家、文学思潮等为核心，对文学的发展变化作历史性的考察；另一种就是“美”的审视，即以文学作品为核心，对其篇章结构、艺术技巧、审美风貌等进行细致的分析。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是以固有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作描述性的阐释与解读。显然，就文学研究的使命而言，“描述的历史”和“精细的剖析”并不能完全满足我们对文学的好奇与想象；也许只有当我们开始追问“它何以发生”时，才进入了一个更为深邃的时空，接近文学的本原。换言之，就是不仅要分析现有文学文本怎么样，还要追溯这个文学文本怎么来的。那么，文学究竟何以发生？严绍璗先生在讨论日本古代文学时曾指出认为：“‘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是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①]的确，文学文本作为审美意识的一种物化形态，它无论如何是

① 严绍璗：《“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第1—14页。

脱离不了由特定时空和创作主体等构成的文化背景。不过，这个“文化语境”到底怎样，显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拟以春秋秦文学为例，从文化接触的角度对先秦文学的发生问题作一粗浅探索。这个选择是基于以下考虑：相对于以周为中心的“中国”而言，嬴秦民族地处西部“边缘”，其文化、文学发展较“中心”不仅迟缓，而且在总体水平上落后很多，甚至至今还给人以“秦世不文”的印象。这就为我们留下了空间，可以从其文学“一无所有”之时开始观察，探讨其文学的发生。

二、《无衣》：秦周文化接触与秦文学的萌芽

就目前的史料而言，要考察秦文化的渊源及其早期面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要厘清早期嬴族对关陇秦人的文化及文学的影响更是渺茫无绪。依据本文的目标，我们对秦文化的观察将从学界公认的可信的考古遗存，即甘肃甘谷县毛家坪秦文化墓葬开始。据毛家坪地区秦文化墓葬考古报告，12 座西周中晚期墓葬在葬式上体现了独特的秦文化特色，而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上又具有周文化因素。[①]据《史记·秦本纪》，秦人自成王以来就与西周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孟增幸于周成王”；其孙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非子被周孝王“分土为附庸”。[②]这些都表明，至少自西周中期开始，秦人就在吸收周文化了。

关中地区是周民族的崛起之域，也是周文化的渊源所在。至西周中期，周王朝的政治势力已经东抵淮上，西达川陕。1973 年前后，甘肃灵台县出土了一批两周墓葬，其中姚家河西周墓和洞山墓属于西周康王时期，西岭墓葬的年代在西周中期甚至更早。[③]灵台县位于陇东黄土高原南缘，与礼县和清水县相距不远。这就是说，至迟在西周早期，周文化的触角已经伸入秦族聚居地，二者的文化接触自是不可避免。在文化人类学的观察当中，两个或以

①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3 期,第 359—396 页。

② [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版,第 175—177 页。下引《史记》原文及三家注均出该本,只记篇名,不再详注。

③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 1976 年第 2 期,第 38、39—48 页。

上的社群的持久接触，必然会引起对方的文化变化。[①]当然，就当时周秦双方的文化状况而言，他们的文化接触和影响主要是周文化的介入引起秦文化的变化，而秦对周文化的触动则微乎其微。据《秦本纪》的记载，秦之先祖大多能调驯鸟兽，孟戏、中衍、造父善御，非子本人也因长于养马而为孝王赏识，这些都暗示秦人在早期是一个畜牧业方面比较发达的游牧部族，直到非子受封为附庸，并"邑之秦"，他们才正式成为周王朝分封体制下的一级，有了属于自己的统治区域，迈出构建国家政权的第一步；而此时的西周则是个具有成熟的政治架构、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广阔的疆域宗主国，其文化自然也不是初生的秦文化可与之同日而语的。而且，在政治上，此时的秦人实际上奉周王室为宗，接受其分封和支配。所以，西周中期秦国吸收先进而强势的周文化是很自然的选择。

从毛家坪墓葬出土的器具看，当时秦族对周文化的吸收主要表现在物质文明的层面上，直到西周后期，这种情况还没有明显改观。秦庄公时代的不其簋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秦国青铜器，它在器形和纹饰上与西周晚期的师酉簋非常相似，铭文风格也异常接近。20 世纪 90 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区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的青铜簋与不其簋在形制上非常相似，所用纹饰及其配合规律，如窃曲纹配瓦棱纹等亦颇类周器[②]；而且，其铭文极其简略，只有"秦公作宝簋"寥寥数字。[③]大堡子山陵区目前探明的只有两座大墓。据《史记》，秦国君死后葬西垂的有秦庄公、襄公及文公，鼎、簋铭文既称"秦公"，而"庄公"又是死后追谥，所以其墓主很可能是秦襄公和文公。彼时的作器、刻铭水平尚且如此粗糙，以庄公时代的文化水准而言，秦人自然更不可能自行撰写、镂刻长达百余字的铭文了。这就意味着，不其簋事实上是周文化的产物。

不其簋铭所镌乃秦人奉周王讨伐猃狁之事：不其随伯氏讨伐猃狁，获胜后，伯氏回朝向周王献俘；不其率军追击残寇，多有斩获，因以受赐；不其作

① ［日］祖父江孝南等著，乔继堂等译：《文化人类学事典》，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3 月版，第 96 页。

② 祝中熹：《大堡子山秦陵出土器物信息梳理》，《陇右文博》，2004 年第 1 期，第 20—27 页。

③ 李朝远：《新出秦公器铭文与籀文》，《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5 期，第 82—83 页。

铸器刻铭颂扬公伯和孟姬。这与史实完全契合。据《秦本纪》,周宣王封秦仲、庄公为西垂大夫,令其抗击西戎。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国早期的文学作品《秦风·无衣》诞生了。[①]这首诗歌的背景是秦人首领秦仲死于伐戎的战斗,周宣王发兵七千,由庄公率领,讨伐西戎,与不其簋铭文的内容相契合。该诗内容浅白,情绪直露,在文学方面并没有多少令人欣喜的地方。格罗塞指出:"大多数的原始诗歌,它的内容都是非常浅薄和粗野的。但是,这种诗歌还是值得我们深刻注意,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原始民族的情绪生活有一种直接的洞察"。[②]就当时的周秦关系而言,这首诗歌与其说是秦人勇武豪迈情怀的体现,不如说是向西周王室表达忠心的宣言,是特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产物,而非有意识的文学创作。

三、《秦记》:秦文化的自立与秦国文学的肇始

襄公立国时,周室已衰,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政治控制,但对新生的秦国而言,它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秦人追寻周文化的步伐并没有停止。秦人大规模吸收周文化是在秦文公时代。《秦本纪》云:"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秦文公卜居营邑与周公卜居洛邑颇为相类。《史记》和《尚书·洛诰》对此均有记载。所谓"用三牢"亦是周礼。不过,秦人吸收周文化最具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在秦文公十三年。是年秦国"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礼乐文化是西周的核心文化,而史官文化和乐官文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秦自文公十三年始,以史官担负起记录国家大事、教化国民

---

① 《无衣》一诗的年代素有争议。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七:"《序》云:'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朱子以为序意与诗情不协,良是。然谓是秦俗强悍乐于战斗之诗,则胥失之矣。子贡传、申培说皆云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赋。此较为近之。然襄公之世周西之地已为秦有,宜不复知有王;而此诗尚谆谆以'王于兴师'为言,则固周人诗也。考《史记》称宣王以兵七千与秦庄公使伐西戎,正与王'于兴师之言'合。故仁山金氏编次此诗属之庄公,不为无见也。"按:何氏所说的"仁山金氏"指宋人金履祥。他在《资治通鉴前编》卷九将《无衣》系于秦庄公之时。本文据《史记·秦本纪》等认为认为,《无衣》制作于周宣王命秦族征伐西戎期间,其具体时间或在宣王令秦仲诛西戎(公元前 827 年)之后,或在宣王令庄公伐西戎(公元前 821 年)之后,是《秦风》中作年较早的一篇。

② [德]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10 月版,第 184 页。

的职责，是秦文化由宗教而人文的标志，也可谓是秦文化自立的标志。它的直接成果就是司马迁据以撰秦史的《秦记》。

《史记·六国年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结合其佚文看，《秦记》在文体与《春秋》相似而又有不同。第一，它们都以时间为序作提纲式的记录，但《秦记》仅纪年而后者具体到月、日。第二，它们都言简意赅，但《春秋》遣词更为严格，用语也较丰富。比如，对战事的记录，《春秋》会因战争性质等方面的不同而用专门词汇进行描述，表现战争性质的有伐、侵、袭；表现战场状态的有战、围、还、追等；表现战事结果的有克、取、灭等。[①] 而《秦记》则显得简单，它表现战事最常用的两个词是"击"和"取"，分别表示战争状态和结果，感情色彩简捷而又强悍，显示了秦人质朴、勇武的民族性格。总之，从文学的角度看，《秦记》表现了秦人明确的叙事时间意识、初步的叙事能力和文字表达技巧。

秦人虽然在非子时代就已经迈出了建立政权的第一步，但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制度建设诸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他们始终面临戎狄争地的威胁。据《史记》，自秦侯至襄公，秦、戎战事频仍，而秦总体上处于下风。在生存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文化、制度建设当然也就无从谈起。直到秦文公向东迁居，避其锋芒，秦族才稍得安定，其文化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秦文公借鉴周制设立史官记述国史，是秦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表明秦国对周文化的吸收由单纯的器物模仿向物质和精神并重层面转变。《秦记》作为国史，建立国君传承谱系，记录国家进程中的重要事件，有利于促进民族归属感，激发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与热爱。作于秦武公时的太公庙钟镈铭云："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以虩事蛮方。"对先君谱系的追叙，是国史意识的显证。这种意识在春秋中期时的秦公簋铭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丕显朕皇祖，受天命，肇有下国。十又二公，不坠于上，严龚夤天命，保业厥

① 褚斌杰等编：《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版，第 186 页。

秦，虢事蛮夏”。从三公到十二公，表明秦祚代代相续不绝；而由其带来的民族精神的变化，则使得《秦记》的历史意义获得深化。

《秦本纪》记载，《秦记》创设之后，“民多化者”。“化”者，变也，暗示秦人已摆脱游牧部族的某些落后习性而具备世俗国家的文明气象。据介绍，大堡子山秦西垂墓区的文物中，包括数十件金饰片、金虎、青铜鼎、青铜簋、青铜盘、青铜壶、青铜钟镈、车马器、玉器、漆匣、石磬和编钟等等，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多数质地优良，品味高雅。[①] 陈平指出：“如将礼县秦公器与关中地区其他春秋秦墓铜器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最先具有春秋秦青铜器文化特色的是秦器铭文的书体，随后是性质，最后才是纹饰。……秦式铭文书体，出现于春秋早期的秦文公时。”[②] 就是说，在秦文公统治期间，秦人不但对周文化的吸收达到了一个新层次，而且其文化本身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文化体系。如果说秦文公十三年以史记事是秦文化自立的标志的话，那么与之相应，《秦记》可以被视作秦国文学的开端。

四、《秦风》等：秦人的“诸夏”意识、礼乐修养及其文学经典的诞生

文公之后，秦人周化的步伐并没有停止。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云：

>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
>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③]

离开秦国，就是离开华夏；只要母亲是秦国人，哪怕其父是秦境内的少

① 祝中熹：《大堡子山秦陵出土器物信息梳理》，《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第20—27页。
② 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283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数民族,小孩都是华夏的后代。可见,秦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蛮夷之民,而是诸夏一族。睡虎地竹简虽然是战国末期的产物,但它所记录的秦人的"诸夏"意识却由来已久。据《秦本纪》,在秦人的祖先神话系统中,他们自认是颛顼的苗裔孙女修之后,而且早已与少昊后裔通婚,其先祖大费(伯益、柏翳)曾辅助禹治水,帮助舜驯化鸟兽,功勋卓著,地位显赫。这种"诸夏"意识在秦人的青铜礼器铭文中也屡见不鲜。

> 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邵合皇天,以虩事蛮方……盗百蛮,具即其服。(太公庙秦公钟镈铭)
>
> 高阳有灵,四方以鼏平。(秦公一号大墓残磬铭)
>
> 肇敷蛮夏,亟事于秦,即服。(秦公一号大墓残磬铭)
>
> 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严龚夤天命,乂厥秦,虩事蛮夏。(秦公簋铭)

高阳即颛顼。按照《史记》的古代帝王谱系,夏与秦都是颛顼之后,殷与周同为帝喾之后,而颛顼与帝喾又同出黄帝一脉。如此,则夏、商、周、秦俱是夏族。日人泷川资言曰:"古重氏族,托名圣贤,以华其所自出者,不独秦嬴。"① 可见,秦人自称是颛顼之后,主要目的在于证明自己也是华夏族,而不是时人鄙薄的戎狄民族。既然秦人自认为"诸夏"一族,那么他们对作为天下政治、文化核心的周王室自然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春秋初年,秦襄公将兵勤王;春秋中叶,秦穆公也屡次出兵保卫周室。据《左传》记载,秦穆公十一年,"秦、晋伐戎以救周";秦穆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勤王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行为,但其间应该也包含了文化认同的意味。对秦人来说,来自周王室的封赏和认可是其立国的政治基础,而在秦民族由弱小而壮大的过程中,周文化一直是其最丰富的营养。因此,立国以后,秦人努力维护与周王室的良好关系,同时保持着对周文化的兴趣,而这种认同和追求在穆公时代达到了一个顶峰。

① [汉]司马迁著,[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5,北岳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9年1月版,第3页。

秦穆公曾向西戎使臣由余展示其宫殿等建筑，其宏富精致令由余赞叹不已。从考古遗存看，秦人在宫室布局上多方吸收了周人的特色。上个世纪在秦之故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发掘了几处穆公时代的建筑遗址。其中，马家庄一号宗庙建筑遗存是迄今发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礼制性高级建筑遗存，由祖庙、昭庙、穆庙、门塾、中庭等部分组成，其布局特点与凤雏西周甲组建筑遗址一脉相承，除在宗庙的数目上与史籍记载略有差异外，其用太牢、少牢等祭祖的礼仪制度等与周礼契合。①在这座建筑的西侧，还有一座大型的同期朝寝建筑遗址，呈南北向长条状，由五进院落和五座门庭组成，它不仅与《周礼·秋官》所记载的“五门三朝”的礼制相契，也符合周礼“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原则。②秦穆公不仅在建筑方面借鉴周制，在生活中也践行周礼。以“客礼”待戎使由余，以礼对待流亡至秦的晋公子重耳，就是其证。不仅穆公本人，秦公室也普遍知“礼”。

《国语·晋语二》载大夫子明称赞秦国贵族公子絷之语云：“絷敏且知礼，敬以知微。敏能窜谋，知礼可使；敬不坠命，微知可否。”③后来他受穆公之命安抚重耳、夷吾，果然知礼善言，进退自如，不辱使命。又，《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

> 晋太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遂逃归。

太子圉即后来的晋怀公，嬴氏即怀嬴。《礼记·曲礼下》：“自世妇以下自称婢子。”④嬴氏以“婢子”自称，可见她对周礼很了解。怀嬴后来又嫁给重耳，称辰嬴。《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

---

① 陕西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第1—29页；尚志儒、赵丛苍：《〈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补正》，《文博》，1986年第1期，第11—13页。

② 韩伟：《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考古与文物》，1985第2期，第30—38页。

③ [清]韦昭注：《国语》，影印商务印书馆1934年本，上海书店1987年1月版，第109页。

④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67页。

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杨伯俊注曰："《礼记·内则》云：'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奉水即奉匜，以水盛匜中也。此怀嬴奉匜以注水，注水曰沃，而重耳盥之。……挥之者，重耳挥去手中余水使干。本待授巾使拭干，《内则》'盥卒，授巾'是也。重耳不待巾干而挥去余水，非礼，故怀嬴怒。"从这两则故事看，怀嬴熟悉家庭生活之礼，显然受过较系统的礼之教育。

另外，《左传·文公九年》记载："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礼也。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也，以无忘旧好。"鲁文公九年即秦康公三年。康公是穆公之子。秦国向鲁国致送赙仪，并被当作外交中的友好事件记载下来。可见，康公是知晓周礼的。又，《左传·文公十二年》：

>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客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贿之。

杨伯峻注云："玉乃使者所赍之国宝，若圭、璋之属以为聘礼者。据《仪礼·聘礼》'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之文，则使者至于所聘国庙门内之中庭，必舒其上服之衽以掩其中衣(即所谓袭)，执圭；上摈乃入以告其君，然后出，辞不受圭。则辞玉为聘礼中应有之仪节。"西乞术显然是对这套礼仪了然于胸，因此才能应对自如，并获得尽得周礼的鲁人的高度赞扬。"国无陋矣"既是对秦国君臣娴熟周礼的赞扬，也是对其时秦国上层阶级的总体文化面貌的一种概括。

除了娴习周礼外，秦穆公时代的音乐应该也很发达。据《史记》，穆公接受内史廖的建议，"以女乐二八遗戎王"以夺其志。"戎王而说之，终年不还"。可见秦乐之魅力。《吕氏春秋·音初》云："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

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穆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①]这个记述或有附会，但任何传说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太公庙秦公钟，与西周中期的克钟很相似，形制均为兽纽阔腔式，且在腔外都饰有四透雕交龙形脊；其铭文中的表示乐声的“雍雍”语亦见于西周晚期厉王钟铭。可见，周乐对秦乐的影响。怀后磬铭有“其音铊铊”之语，秦公一号大墓残磬铭文有“百乐咸奏”之语，这说明春秋中后期的秦国音乐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

礼乐文化是周文化的核心。以秦穆公时代为顶点，秦人在秦武公至秦景公时代对周礼乐文化的汲取直接导致了太公庙秦公钟镈铭文、怀后磬铭文、秦公簋铭文、秦公大墓石磬铭文等具有文学质素的作品的产生。为了谐和动听，这些铭文多数有韵，表现了一定的美学追求。另一方面，“乐之用广，则诗之用广”[②]，与周代礼、乐紧密关联的诗歌也因之在秦国获得了空间。《秦风·车邻》：“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云云，很明显是秦代礼乐在诗歌中的再现。传世已久的秦国《石鼓文》，共有十篇诗歌，与《秦风》等篇章相类，所颂扬的畋猎宴乐之事也颇似《诗经》，具有鲜明的礼乐文化特色。总之，伴随着西周礼乐文化由单纯的器物层面而渗入秦人的精神层面，以及秦人民族精神的张扬，以《秦风》十诗、秦景公大墓残磬铭文以及石鼓十诗为标志，秦国的文学在春秋中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五、结语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44 年），吴公子季札使鲁观周乐，乐师为之歌《秦风》。季札闻后，叹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秦人据有岐周故地，近水楼台更兼主动汲取，虽不能尽得周文化之精髓，但也却能于本民族粗砺质朴的固有气质中融入礼乐文明，从而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春秋秦文学。换言之，春秋秦文学发生的一个直接动因是西周礼乐文化。从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不同族群的文化接触，将会导致文化变化，尤其是当两种文化水平有巨大差异的时候，处于劣势的民族很容易接受对

---

① ［战国］吕不韦辑：《吕氏春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165 页。
② ［清］魏源：《诗古微》，岳麓书社 1989 年 12 月版，第 28 页。

方的文化,其文学也于其间生成,而伴随着文化接受的深入,其文学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只是一个个案,它对于先秦文学的发生是否具有普遍性,尚待进一步考察。比如,秦楚同为边缘大国,距离西周文化中心较远,西周文化对楚国亦有影响,但是与《秦风》等秦文学作品不同的是,《离骚》之类的楚文学作品显示出了强烈的本国/族文化特色,其文学发生情况显然要更复杂些。另外,本文讨论的是文化在文学发生进程中的作用、文学发生的其他因素,比如文体本身的演进未及考量。这些问题都须作更深入的研究。

提　要:春秋时代的秦文化具有鲜明的礼乐文化特质,它是嬴秦民族在与西周文化的接触、认同、吸收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秦文学也获得契机,得以发生、发展;伴随着文化接受的深入,其文学水平也逐步提高。这表明,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文化认同和持久的文化接触是文学发生和变化的动因之一。

关键词:文化接触　春秋秦文学　发生

早期咏侠歌谣俗谚的生存与传播
——以两汉作品为例

贾立国

早期咏侠歌谣俗谚曾经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真朴自然的艺术风格广泛地传播于都市与乡曲。流传至今的两汉咏侠歌谣与俗谚散见于史籍中，在侠文化的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但是这些关于两汉游侠的歌谣俗谚却有着极高的史学和文学研究价值，它们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游侠发展的真实状况及其社会评价，而且成为中国古代咏侠诗的源头，后代文人咏侠诗即由此孕育和发展。所以，考察两汉咏侠歌谣俗谚的生存状态与传播情况是非常必要的。

一、产生原因：侠风盛行的土壤与采诗观风的客观刺激

作为中国古代侠文学滥觞期的作品，留存下来的早期咏侠歌谣俗谚，先秦时期只有一首《荆轲歌》，两汉时期作品要多些，有《曹邱生引楚人谚》、《颍川儿歌》、《长安为谷永楼护号》、《闾里为楼护歌》、《临淮吏人为朱晖歌》、《时人为戴遵语》、《长安为尹赏歌》、《关东为宁成号》等作品传世，所以两汉咏侠歌谣俗谚是我们研究的主体。

两汉咏侠歌谣俗谚的产生与传播首先得益于游侠风行的现实基础,是两汉时期侠风盛行的现实土壤孕育出了咏侠歌谣与俗谚。汉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游侠的又一个异常活跃时期,据班固《汉书》载:

> 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稀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①

汉代游侠身份复杂,既有卿相之侠,又有布衣之侠,还有暴豪之侠。他们或藏亡纳死、赈穷救急、借躯报仇,或劫掠剽攻、掘冢铸钱、横行一方。这些游侠一方面树立声名,以自己的影响力吸引了远近的其他游侠及好事少年、市井奸猾,另一方面又与达官显贵或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俨然是官府之外民间社会的另一主宰,甚至有成为影响政局的一股力量的趋势。有些游侠年少行侠,年长后折节为官,亦官亦侠。当任侠之风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的时候,百姓自然对游侠行事及其命运的盛衰也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于是游侠也就成为了民间歌谣俗谚咏叹的对象。

其次,传统的采诗观风制度客观上也促成了包含咏侠内容的两汉歌谣俗谚的大量产生。歌谣、俗谚是普通百姓传达心声、传播信息的重要途径,流传于闾巷的歌谣、俗谚是百姓生活情感的一种直接反映,从中体察社会民风及政策得失,可以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所以自周代开始就有采诗观风的做法。如《礼记·王制》记天子巡守时即有:"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②之说。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所述更为细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③到了汉代武帝为大规模采集民间歌谣,设立了乐府机关。"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

① 班固:《汉书》卷九二《游侠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698 页。
②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一二《王制第五之一》,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28 页。
③ 班固:《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123 页。

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颜师古注“采诗”为：“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①

两汉的歌谣俗谚可以说是在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的一种特殊的舆论表达方式。民间歌谣俗谚之所以被重视就是因其有舆论监督之用，它满足了人们表达的载体需要而成为民间话语的主要形式。因此，两汉政府在对官员的考绩和监察的时候就经常派人到各地采风观俗，搜集歌谣俗谚，作为对官员进行奖惩升降的重要依据，也以此来评估各郡国的吏治和管治。如东汉时期的“举谣言”制度，就是一种考核官员的方式。关于“举谣言”，《汉官仪》记载：

> 三公听采长史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顷者举谣言，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尔衔枚。②

纵观东汉一代，“举谣言”与吏政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朝廷会经常派遣使者到民间去收集有关地方官吏治绩优劣的歌谣和俗谚，以此作为考察官吏的依据。如范滂以举谣言的方式一次就举劾了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

正因为被统治者所重视，民间的歌谣俗谚有些时候还能够为封建官员的政治倾轧、争权夺利服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些官员会有选择地搜集对政敌不利的歌谣来击倒对方。如灌夫为人刚直，好任侠，已然诺，平素所交皆豪杰大滑，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当地有歌谣云：“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③，魏其侯窦婴与灌夫交厚，武安侯田蚡在与魏其侯的争斗中，抓住灌夫任侠养客横恣颍川侵凌百姓之事上报朝廷欲除去灌夫打击魏其侯势力，多次称“灌夫家在

① 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45 页。
② 范晔：《后汉书》卷六七《范滂传》注引《汉官仪》，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204 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847 页。

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①“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谓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②利用舆论力量,使灌夫遭到了灭族的厄运。可见,包括咏侠内容在内的歌谣俗谚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确实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就两汉咏侠歌谣与俗谚来说,采诗观风与举谣言只是在客观上刺激了它的创作,其最初的传播与留存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自它产生后,只是以从个体传播到群体传播的口耳相传的方式流布于街头巷陌,有些作品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它们大都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相关而被史家接受,载入史籍之中。

二、生存状态:与史相依对侠风做真实反映与客观评价

早期咏侠歌谣与俗谚谣谚大多是不入乐的,它与乐歌的传播与留存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被乐府采集入乐的歌谣与曲调一起流传,而徒歌则主要借助于史官、依附于史事才得以传播。民间的歌谣俗谚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涵盖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曾对旧俗风谣多有采用。顾颉刚先生说:“春秋时代的徒歌,以及其他时代的徒歌,只为与政治人物发生关系,故得流传下来;这原是重在政治人物的事故,并不重在歌谣的本身。其余和政治人物没有关系的徒歌,早已完全失传,再不能寻见了。”③不只春秋时代,两汉时期的咏侠歌谣俗谚的生存状态也大体如此,留存下来的大都与某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相关联。两汉时期有关游侠的歌谣俗谚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但是这些作品却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正是这些作品,与史书的记录互为补充互为印证,真实地反映了两汉游侠的生存发展状况及其悲剧性命运,为我们展现了鲜活生动的游侠活动的场景,同时反映出了民间社会对游侠这一特殊群体的评价,抒发了普通百姓对游侠的爱憎褒贬之情。

---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849 页。
② 同上,第 2851 页。
③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39 页。

汉代游侠大都继承发扬了古游侠重然诺、轻生死、铲强除恶、赈穷救急等方面的优秀品质，他们仗剑行侠，施惠于一方百姓，也得到了百姓的热情赞扬。司马迁对游侠的精神品质大加赞赏，并提升到与圣贤君子仁义品德等同的地位。他引用民间百姓的话作为佐证："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①]。"确实，民间社会对仁义标准的判定非常简单，能直接施惠于民，乃至为他人利益而不爱其躯锐身赴难，这才是仁义。而游侠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能够让处于困厄中的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所受到的无私帮助，了解到游侠的重诺守信、赈穷救急的品格。汉代游侠的高贵品质自然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赞誉，人们用自己的语言来歌唱这种侠义精神。如《曹邱生引楚人谚》：

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②]

这则俗谚出自于《史记》，当时流传于梁、楚之间，是赞扬季布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的侠义品格的。司马迁称："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③]季布为楚亡将，亦是有名的仗义任侠之士，乐于助人，信守然诺，在楚地颇有威望。季布在项羽手下为楚将时骁勇善战，曾多次追击刘邦，刘邦得天下后悬赏千金缉拿季布。当时大侠朱家欣赏其侠行将其藏匿，并前往洛阳找到汝阴侯滕公说服刘邦，使刘邦捐弃前嫌并重用了季布，这其中恐怕也有重其节义和侠名的原因。可见，游侠的可贵品质是可以得到汉代社会上下阶层的普遍认可的。

此外，民间歌谣中亦有对游侠借躯报怨复仇等行为的反映。如《时人为杨阿若号》：

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④]

---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182 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〇〇《季布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731 页。
③ 同上，第 2729 页。
④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24 页。

杨阿若年少时好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其传记虽在魏史当中，但其少年任侠行为及时人的口号歌谣当为汉代无疑。就如《魏略·勇侠传》中另一勇侠孙宾硕虽是汉人，编入魏书，“盖以其人接魏事，义相类故也。”[①]杨阿若专趋人之急，乐于为人报仇解怨，此首作品就是表现他少年任侠借躯报怨复仇之事的。

再如另外一首赞誉西汉末年侠义之士朱晖[②]的歌谣《临淮吏人为朱晖歌》：

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人怀其惠。[③]

朱晖是一个颇有侠气的人，入仕为官后亦是“好节概，有所拔用，皆厉行士。其诸报怨，以义犯率，皆为求其理，多得生济。其不义之囚，即时僵仆”[④]。更多了几许行侠仗义的游侠风范，也因此而遭忌被劾去官。即使重为布衣时，仍不忘赈穷救急，当南阳闹饥荒的时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还有两件事同样表现了朱晖重信守诺、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侠义品质：“晖同县张堪素有名称，尝于太学见晖，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晖以堪先达，举手未敢对。自后不复相见。堪卒，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赈赡之。晖少子颉怪而问曰：‘大人不与堪为友，平生未曾相闻，子孙窃怪之。’晖曰：‘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晖又与同郡陈揖交善，揖早卒，有遗腹子友，晖常哀之。及司徒桓虞为南阳太守，召晖子骈为吏，晖辞骈而荐友”。[⑤]前一件事朱晖感激于张堪对自己有知己之言，虽因对方是“先达”未敢出言答应其以妻子相托之事，但已“信于心也”，而且最终履行了诺言。这样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侠义伦理中守信重诺原则，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和延陵季子挂剑于徐君墓的那种虽未言之而心已许之那种无人要求无法监督的对自己内心的承诺也要极力

---

① 陈寿：《三国志》卷一八《魏书·阎温传》引《魏略·勇侠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51 页。
②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汉诗卷八为“宋晖”。据《后汉书·朱晖传》当为“朱晖”。
③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07—208 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458—1459 页。
⑤ 同上，第 1459 页。

地去实践的行为何其相像！后一件事甚至在没有什么形式的承诺的情况下照顾友人的遗腹子，而且超过了对自己子女的关心程度。具备这样的侠骨仁心的人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所以这首歌谣才会广泛地流传于民间，甚至被《后汉书》所载录下来。它表现出了地方百姓对一位具有侠义心肠的官员的拥戴之情，也反映了西汉后期游侠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亦官亦侠的现象。

除了对汉代游侠的优秀品质进行颂扬外，许多歌谣俗谚对汉代游侠发展中出现的新的变化也多有反映。前引《临淮吏人为朱晖歌》反映的游侠折节为官、亦官亦侠现象即是汉代游侠新变之一。此外，汉代游侠凭借其侠义品质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往往“权行州域，力折公侯”[①]，这在民间歌谣中就有反映，如汉成帝时的侠魁楼护势力影响就非常大，民间流传下来的汉咏侠歌谣俗谚中就有两则是关于楼护的：

> 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喉舌。[②]
>
> ——《长安为谷永楼护号》
>
> 五侯治丧楼君卿。[③]
>
> ——《闾里为楼护歌》

这两则作品表现了游侠楼护的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据《汉书》载，当时王氏五侯争名，诸宾客大都仅入其一门以显忠诚，而楼护却能左右逢源尽入五侯之门，且与当时著名文士谷永一起成为其座上宾，甚至其母死亦能使五侯为其治丧，“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④]，可见其影响之大。

汉代游侠集团化、豪暴侵凌等新趋势，在民间歌谣中也多有反映。当时很多地区出现了以个别侠魁为中心，集合宗族血亲、游侠少年、地方豪强等势力形成的豪侠集团，他们甚至与朝廷官员相勾连，从而雄霸一方。于是民间百姓就有通过歌谣来曲折地表现出对他们的畏惧与不满之情。如前引之

① 班固：《汉书》卷九二《游侠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707 页。
②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24 页。
③ 同上，第 139 页。
④ 班固：《汉书》卷九二《游侠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708 页。

《颍川儿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武安侯田蚡搜集了这首对灌夫不利的歌谣,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客观地讲,田蚡所言确为事实,灌夫好为任侠,交通豪杰广蓄宾客,又常纵酒使气,难免要侵害地方百姓,因此颍川民间乃有此歌谣流传。人们通过歌谣这种形式来表现灌氏豪侠集团在颍川的威势,作品用三字句式,节奏短促明快,传达出人们对灌氏集团的不满及因其遭灭族而从内心产生的拍手称快的心情。班固《汉书》中也有表现此类内容的作品,如:

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①

汉宣帝时,在涿郡一带有游侠集团西高氏、东高氏独霸一方,“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②这些游侠末流聚合在一起,豪暴欺凌,作威作福,鱼肉乡里,严重违背了侠义道德而沦为豪强恶霸盗贼之流。他们对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连地方官府都不敢干涉,以致到了百姓人人自危的地步,甚至长久以来形成的民畏官的心理也被彻底改变了。从人们在歌谣中表现出的宁愿得罪高官也千万不要得罪豪侠的极度恐惧的心理来看,这些游侠末流确实已经走到了为社会主持正义的侠的反面,对民间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当然,出现于汉代的豪侠集团并不都像上面所反映的那样成为鱼肉乡里的盗贼与恶霸,其中还有一些是能够保持侠义伦理中赈穷救急等优秀品质的豪侠,如《时人为戴遵语》:

关东大豪戴子高。③

戴良曾祖父戴遵字子高。汉平帝时为侍御史,王莽篡位后,称病归乡里。

① 班固:《汉书》卷九〇《酷吏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668 页。
② 同上。
③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42 页。

家境富裕，好赈穷救急，其为人崇尚侠义，广蓄宾客，门下食客曾有三四百人。戴遵称得上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地方豪强，而他被排在第一位的品质是“好给施”，喜欢赈穷救急以解他人之困厄，所以在地方上颇有美名，人们热情地称之为“关东大豪戴子高”[①]。

汉代游侠连党结群，“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②]，形成了封建王权之外对民间社会的另一主宰，连地方州郡的官员也奈何不得，诸如“二千石莫能制”[③]、“威重于太守”[④]、“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⑤]之类情形频频出现于史书的记载之中，他们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央政府和法制的威严，因而遭到了打击和压制。其中最突出的手段是任用酷吏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大规模的屠戮，这种情形在民间歌谣俗谚中亦有反映，如《关东为宁成号》：

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⑥]

宁成是汉代有名的酷吏，亦是汉王朝以侠治侠的工具，《史记》、《汉书》皆有传。其为人阴险狠毒，居官治民“如狼牧羊”。其时游侠风行，长安的宗室豪侠多为以武犯禁、触犯法网之事，汉景帝为之头痛，于是召宁成为中尉整治长安秩序。宁成效法郅都族灭济南豪侠集团瞯氏的残酷手法镇压长安豪侠，其后宗室豪杰人人惴恐。及武帝即位，宁成免职归家，“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⑦]。从以上记载来看，宁成残暴好杀，虽号为任侠，却是做着豪暴欺凌为害乡里的勾当，乃至于被朝廷利用大肆屠杀其他游侠，当属游侠末流，违背了侠义伦理，自然为人所不齿。这则在民间社会流传的歌谣反映的正是宁成这样的游侠末流在当时的威势，至于人们对其避之惟恐不及，宁愿

① 范晔：《后汉书》卷八三《戴良传》，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2773 页。
② 班固：《汉书》卷九二《游侠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699 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133 页。
④ 同上，第 3135 页。
⑤ 班固：《汉书》卷九〇《酷吏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668 页。
⑥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36 页。
⑦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650 页。

面对凶猛的老虎，也不愿遇到发怒的宁成，作品以人们最常用的方式表达了对宁成的痛恨和恐惧的心理。

再如《长安为尹赏歌》，是写汉王朝任用酷吏尹赏对长安游侠进行残忍屠杀的作品：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①]

这首歌谣载录于《汉书》，永始、元延间，长安侠风盛行，贵戚骄恣，交通豪侠；豪侠报怨杀人，往来长安；闾里少年探丸杀吏，受赇报仇，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尹赏被选为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之命。“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吏，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两，分行收捕，皆效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壹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楬著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②]尹赏对长安游侠少年的这次镇压屠戮可谓相当惨烈，令人发指，人们亦以复杂的心情为这些游侠少年唱出了一曲悲凉的挽歌。从形式上看，《长安为尹赏歌》已经发展为五言四句，其抒情效果也更为明显，迂徐委婉地表达了人们对游侠少年的痛惜之情，其中也掺杂着对酷吏以恶为治的不满与痛恨以及对其他慕侠少年的警诫之意。

三、文人接受：对古代咏侠诗产生积极影响

早期咏侠歌谣俗谚的被接受，除了和与其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起被史家采集收录外，同样被文人所重视，在侠文学的产生、发展与传承过

---

①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
② 班固：《汉书》卷九〇《酷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73—3674页。

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大多数文学形式都经历了一个由民间到文人的发展过程，追溯咏侠诗的发展历史，我们同样不能忽略最初在民间社会流传着的关于游侠的歌谣与俗谚，它们是社会现实最直接、最尖锐、最迅速的反映，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作品。两汉咏侠歌谣与俗谚内容丰富，感情真挚，同先秦游侠歌谣一起形成了中国古代咏侠诗的发展源头，是咏侠诗发展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后代文人咏侠诗即由此孕育和发展。作为咏侠诗的萌芽期的作品，它们与此后文人创作以抒情言志的优秀作品还有很大的差距，从严格意义上讲似乎称不上真正的或者成熟的咏侠诗，但是它们的意义和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两汉咏侠歌谣俗谚在咏侠诗的发展历程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代咏侠诗的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两汉咏侠歌谣俗谚对后代文人咏侠诗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咏唱的内容上。萧涤非先生称两汉民间乐府“足为论世之资”①，这一评价不仅适用于汉乐府民歌，也同样适用于未经乐府采集的那一部分咏侠歌谣与俗谚。这些咏侠歌谣俗谚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两汉游侠生存发展的复杂状况，也比较全面地表现出了汉代民间社会对游侠的爱憎褒贬之情。从作品中展示出的游侠形象来看，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可以说是实存侠在歌谣俗谚中客观真实的再现，此后文人咏侠诗中的游侠形象则开始逐渐地远离了生活中真实的存在状况，不断地被理想化、艺术化而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载体。从歌谣俗谚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来看，则是较为全面的，不像文人咏侠诗那样主要侧重于颂扬赞美，其中既有对游侠及其优秀品质的热情颂扬，也有对变质了的游侠末流豪暴侵凌行为的痛恨与批判。这对后世文人咏侠诗的创作是有积极的影响的，此后颂扬赈穷救急、重诺守信等侠义精神成为古代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同时这些早期似乎不够成熟的咏侠作品表露出的批判意识也启发了后代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文人对现实中游侠流弊的认识，从而在一味颂侠扬侠的风气中也能写出一部分具有批判意义的作品来。

①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8 页。

其次，从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绝大多数文学形式都是来源于民间的艺术形式，而后才有了文人的创作，作为古代诗歌的一个分支的咏侠诗也不例外。在文人手中成熟起来，并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重要手段之一的咏侠诗，就是来自于早期民间咏叹游侠的歌谣与俗谚。在两汉咏侠歌谣俗谚中，已经形成了文人咏侠诗最为常见的基本母题，而且其中有些被乐府采集，并逐渐成为文人咏侠诗中最常用的形式。如《结客少年场行》、《游侠篇》是诗人们咏侠时惯用的两个题目，而这两个题目则是由汉代民间歌谣中的作品发展衍变而来的。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结客少年场》的解题称：

> 《后汉书》曰："祭遵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人。"曹植《结客篇》曰："结客少年场，抱怨洛北邙。"《乐府解题》曰："《结客少年场》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广题》曰："汉长安少年杀吏，受财报仇，相与探丸为弹，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杀文吏。尹赏为长安令，尽捕之。长安中为之歌曰：'何处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复何葬'。按结客少年场，言少年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①]

郭茂倩认为《结客少年场》一题乃是对游侠少年结客报怨等行为的咏唱，他首先引用《后汉书》事例证明史有游侠结客杀人之事，如祭遵在汉光武帝刘秀时期为征虏将军封颍阳侯，少年时期好为任侠，其结客杀部吏之事曾见于《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继而引曹植《结客篇》为例，这是较早的关于此题的文人咏侠诗作品，然后再向上追溯到了此题的最初源头——汉代咏侠歌谣。《广题》中叙述汉长安少年结客报仇、探丸杀吏而遭到屠戮的事，本文前已引述见于《汉书·酷吏传》，尹赏以令人发指的手段大肆屠杀游侠少年，引起长安百姓的恐惧怨愤，民间流传的歌谣是对游侠少年的命运发为叹惋的哀歌，这也是文人咏侠诗《结客少年场》题目的来源。后世文人在以《结客少年场》对游侠少年及侠义精神进行咏唱的同时，又不断演化创作

①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六《杂曲歌辞六》，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948 页。

出很多新的诗题如《少年行》、《长安少年行》、《邯郸少年行》、《渭城少年行》、《少年子》、《少年乐》等等。《游侠篇》同样来源于民间咏侠歌谣，对此郭茂倩亦已指出：

> 《魏志》曰："杨阿若后名丰，字伯阳，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后世遂有《游侠曲》。魏陈琳、晋张华又有《博陵王宫侠曲》。"[①]

从民间咏侠歌谣发端，到文人咏侠诗《游侠曲》或《游侠篇》的出现，再到又陆续演化出来的《侠客篇》、《侠客行》、《侠客》等题的产生，可以看到其清晰的衍变轨迹。可见，两汉咏侠歌谣俗谚不仅在对游侠的咏唱内容上对文人咏侠诗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选题体式上也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提　要：以两汉为代表的早期咏侠歌谣与俗谚是中国古代咏侠诗的源头。它们产生于侠风盛行的现实土壤中，最初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于街头巷陌，因其与史事相依附的特性而被史家纳入史籍之中，和史书的记录互为补充互为印证，真实地反映了游侠的生存发展状况以及民间社会对游侠这一特殊群体的评价。它在后来被文人接受，对文人咏侠诗的产生与发展发生了积极影响，不仅对我们全面认识历史上的游侠，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咏侠诗的起源与发展流变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咏侠　歌谣俗谚　生存　传播

① 《乐府诗集》卷六七《杂曲歌辞七》，第 966 页。

浅谈中土佛寺与世俗民众的关系

陆永峰

佛寺是佛教生存、发展的基地。佛教自两汉之交传入中土以来，对世俗民众的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其重要的活动空间即是佛寺。本文拟通过对佛寺在世俗民众生活中的角色、地位的变化，来探讨其于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力。

一

佛教初传中土，因为其属于异质文化并出家之习，中土崇信者并不为多。世俗有身入佛寺者，应当大多属于个人行为，未能形成云奔雾集、大众涌入的群体效应。故西晋王谧《答桓玄难》云：

> 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不之接。[①]

① 《全晋文》卷二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 册，第 1569 页。

此时佛教仍主要流传于入华之外族间，中土之人少有信仰者。对于中土大部分地区而言，在魏晋之前，佛教仍未获广泛流传，而佛寺自然也建树不多，一般民众无由进入其中。因而，世俗成规模的进入佛寺的情形应当并未成为习见的情形。

魏晋以后，汉土信佛者渐多。唐沙门释法琳撰《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篇》中言，西晋武帝"大弘佛事，广树伽蓝"[1]。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一百《传记篇·兴福部第五》亦称"右西晋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右东晋一百四载。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译经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二万四千人"[2]。佛寺日见增多，世俗遂获广泛接触的机会。中土民众开始成规模地进入佛寺，聆受佛义。梁释僧祐撰《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云：

> 汰下都止瓦官寺。晋太宗简文皇帝深相敬，重请讲《放光经》。开题大会，帝亲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汰形解过人，流名四远。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女成群。[3]

竺法汰深受晋简文帝敬重，于寺开讲《放光般若经》，得御驾亲临。而王侯公卿以至于市井庶民等俗众之所以涌入寺中，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信从尊贵者上行下效的结果。简文帝在位只二年，年号咸安。这应当是公元371年至372年间的情形。佛教史传中，早期佛寺与世俗关系的记录中，多可见贵族高官者的身影。同书卷五《释昙徽传》又云：

> 释昙徽。河内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后随安在襄阳。符丕寇境。乃东下荆州止上明寺。每法轮一转，则黑白奔波。[4]

昙徽为道安之徒。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卒。春秋七十三。以

---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二卷，第502页。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三卷，第1025页。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第355页。
④ 同上，第356页。

上俗众蜂拥入佛寺听讲的情形,应该与其时讲经的逐渐世俗化相关。讲经既然是"黑白观听",座中之人自然要出疑求解;而法师需要根据对象、问难的不同,作出解说。其中遂不乏随俗就便,偏离宣佛之正道,而以临场的机智巧答见长,逐渐具有了娱乐的趣味。

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六《慧开传》云,齐梁间僧人慧开讲经能"解名析理,应变无穷",至于"讲席棋连,学人影赴"①。《续高僧传》卷六《真玉传》言北齐时的僧人真玉在未出家时,随母赴会听斋讲,感慨"若恒预听,终作法师,不忧匮馁矣",后乃"弃其家务,专将赴讲"②。讲经被视为谋生职业,只有在它与世俗趣味充分接近,为百姓欣闻的情况下,才能操之"不忧匮馁"。

至于魏晋时兴起的唱导一事,于讲经之外,斋集疲倦时发起,"或杂序因缘,傍引譬喻",所贵在于"声辩才博"③。与讲经不同,唱导是要联系当前当地的人与事,以因缘、譬喻等故事性的内容和灵活多变的方式,诉诸听众的情感,引人动心动情,以取得使其向善崇佛德效果。唱导之用,能使听者颤栗恐慌,凄怆泣涕;又能使之畅悦欣情,敬慕神往。对于一般听众来说,显然更能受到他们的欢迎,更能诱使其进入佛寺听受。如《高僧传》卷十三《慧重传》中言,宋齐间金陵新安寺僧慧重擅唱导,"凡预闻者,皆留连信宿,增其恳诣"④。

佛寺中此类讲经、唱导活动比之前,应当能吸引大量的世俗听众涌入佛寺听受佛理,所以能"黑白观听,士女成群"、"留连信宿"。讲经、唱导的日趋世俗化、娱乐化,使得其寄存的佛寺在世俗心目中的庄严神圣性逐渐淡薄,与讲经、唱导一样体现出世俗化的趋向来。

至北魏,佛寺除了供大众礼佛、法会、听讲之外,又具有了娱乐消闲的功能,俨然成为世俗游宴之地。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监记》颇记此类情事:

---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第473页。
② 同上,第475页。
③ 《高僧传》卷十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第417页。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第416页。

> （景乐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嘹亮，谐妙入神。
>
> 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及文献王薨，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
>
> （景明寺）至（四月）八日节……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蟠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
> （宝光寺）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月，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荫。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①]

寺院成为游宴之地，与其本身环境的优美、闲静有很大关系。而如景乐寺的女乐、景明寺的"百戏腾骧"则使之更具吸引力。女乐、百戏在佛寺中的存在，则使得民间戏乐与佛寺直接关联了起来。四月八日为佛教之浴佛节，"百戏腾骧，所在骈比"，显示了佛教节日开始了民俗化的进程。佛寺中颇具世俗趣味的讲经、唱导的举行，又加强了其对世俗民众的吸引力。诸因素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土佛寺的世俗化进程，使其与中土社会的接触日益紧密，最终至唐代成为世俗日常生活空间的一区。

二

佛教发展至唐代，进入其极盛时期，是为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佛寺在此时在满足传播佛义、进行宗教实践的同时，也更多的成为世俗民众的娱乐消闲之地，成为后者日常的重要活动场所。

于宗教功能外，唐代佛寺发展了多种社会功能。比之前，也有更多阶层的人士纷至沓来，进入佛寺。在国忌日[②]、君主诞日[③]，两京寺观有例行的斋

---

① 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卷一、卷三、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卷，第1003、1010、1015页。

② 张九龄等撰，李林甫等著：《唐六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册，第50页。

③ 王溥撰：《唐会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7页。

会，佛寺在此成为君主追悼先人、臣僚表献忠心的舞台。有的寺院还被用于举行外交活动。代宗永泰元年(765)二月，“庚戌，吐蕃遣使请和，诏元载、杜鸿渐与盟于兴唐寺”[①]，佛寺又成为结盟之所。

佛寺功能的多样化必然冲淡其宗教意味，而加深其世俗气息。唐代世人于佛寺中游宴的风气更盛。著名的如京城慈恩、寺雁塔题名、崇福寺的进士樱桃宴[②]。入佛寺赏花更为当时百姓的习俗。《剧谈录》卷下“慈恩寺牡丹”条云：

> 京国花卉之盛，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罕不经历。[③]

《幻戏志》卷七记其时有浙西鹤林寺杜鹃花“繁盛异于常花”，花放日，“节使宾僚官属，继日赏玩。其后一城士女，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乐游。连春入夏，自旦及昏，闾里之间，殆于废业”[④]，其奢游不逊于长安。

唐代各地多有表演杂伎百戏的公共娱乐场所，即戏场，而很多戏场即设立于佛寺中。《南部新书》卷五言：

>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⑤]

则长安诸寺多有设戏场者。长安之外的佛寺也有设戏场者。《太平广记》卷三十四《崔炜》(出《传奇》)记贞元中崔炜居南海，“时中元寺，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⑥]。同书卷三百九十四《徐智通》，言唐楚州医人徐智通闻二雷神相约斗技，其一有“寺前(龙兴寺)素为郡之戏场，每日

①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三十九》，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5 册，第 7174 页。

② 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5 册。

③ 康骈撰：《剧谈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42 册，第 681 页。

④ 蒋防撰：《幻戏志》，莲塘居士辑《唐人说荟》，道光二十三年(1843)序刊本，六集，第 32 页。

⑤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36 册，第 210 页。

⑥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45 册，第 177 页。

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千人”之语[①]。可见唐时佛寺中设戏场，演出百戏至为寻常。

百戏杂陈的戏场在佛寺中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消退了佛寺的庄严神圣的气息，使得后者与世俗的关系更为接近，乃至于亲切起来。戏场之外，佛寺中面向俗众的讲经活动——俗讲，其所具有的世俗性、娱乐性也进一步促进着这种转变。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入唐的日本求法僧圆珍所撰《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记》卷上《重阁讲堂》，第一次对僧讲、俗讲作了详细记述。[②]由其记述知，僧讲、俗讲的区别，一则在于其宣讲对象的不同，一为僧徒，一为俗众；一则在于其目的各有所侧重，僧讲在于传法，俗讲则诱导世俗，“劝之输物充造寺资”。俗讲在内容上自然要比僧讲更世俗化，更具趣味性。乃至于被时人指斥，“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③]。

俗讲大行于世在盛唐之后。时长安佛寺多有举行俗讲的。唐孙棨《北里志》“泛论三曲中事”条云：

> 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故保唐寺三月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④]

保唐寺为长安尼寺，故诸妓乐游，而俗讲乃对之有巨大的吸引力，其听众还有闻风而来的士子。这里的僧讲、尼讲专就其表演者而言，其实质还是俗讲。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所云，武宗会昌(841)初，长安俗讲乃盛极一时，时间之长、参与寺院之多，都远胜于前。如会昌元年正月，曾“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⑤]。俗讲在中晚唐的盛行，与君主的扶持是不可分的。上行下效，君主是如此，臣僚世俗自然也对俗讲表现出十分的兴趣来，并进入佛寺听讲。

---

①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5册，第774页。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六卷，第227页。
③ 赵璘撰：《因话录》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第487页。
④ 《笔记小说大观》五编，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0年，第3册，第1482页。
⑤ 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152、156页。

唐代士子文人因为俗讲而涌入佛寺多见于记载。前引《北里志》是一例。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诗述及年轻时与胡灵之等十数辈"为昼夜游",有"尽日听僧讲,通宵咏明月"句①。此处僧讲也是就其主持人而言。一批青春少年整日沉湎于俗讲之中,可以想象当时俗讲的流行和受欢迎。士子以下,世俗民众对俗讲更为热衷,因而也更多地进入佛寺听讲。韩愈《华山女》诗描绘了长安佛家俗讲听众盛多的情形:

>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福罪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②

从宫廷到市井,从君臣到庶民,俗讲受到了普遍欢迎。唐代最为著名的俗讲僧文溆,经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诸朝,以事俗讲而闻名。距文溆在世不远的赵璘《因话录》卷四云:

> 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以为歌曲。③

文溆的俗讲在当时受到了俗众近乎狂热的欢迎,至于"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对之尊崇有加。这是讲说深奥、枯涩的义理的正统讲经(包括僧讲)所不能达到的,而只有以因缘譬喻、奇异神变为内容的俗讲,才可能获得这样强烈的反响。

俗讲在唐代实在是及于天下的。前引圆珍《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记》中,已经揭示了唐土俗讲的普遍性。各地的民众因为喜好俗讲,而多有入佛寺听讲者。刘禹锡《送慧则法师上都,因呈广宣上人》诗:

---

① 元稹著:《元氏长庆集》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79 册,第 406 页。
② 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93 页。
③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35 册,第 487 页。

昨日东林看讲时，都人乘马踏琉璃。雪山童子应前世，金粟如来是本师。[①]

则庐山东林寺也行俗讲。姚合(781—846)有两首诗提及俗讲在地方受欢迎的情形。其《赠常州院僧》诗云：

一住毗陵寺，师应祇信缘。院贫人施食，宿静今窥禅。古磬声难尽，秋灯色更鲜。

但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②]

"湖上少鱼船"，乃言开讲日百姓争赴听讲的情形。地方上对于俗讲的热情并不减于京城。《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述晚唐僧人知玄开讲：

丞相杜公元颍作镇西蜀，闻玄名，命升堂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③]

唐末入蜀的僧人贯休有《蜀王入大慈寺听讲》诗述及天复三年(903)，百姓随蜀主王建入成都大慈寺听俗讲的情形，有云"百千民拥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④]。《宋高僧传》卷七《释可周传》五代后梁乾化二年(912)于杭州龙兴寺讲经，"黑白众恒有半千"[⑤]。

时至唐代，佛寺俨然已成为世俗的游戏、娱乐和消闲之地，直接地加深了寺院与世俗社会的联系。在以其宗教氛围影响世人的同时，寺院的娱乐功能得到加强。大量世俗之人涌入寺院，为佛教界争取信徒、扩大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之同时的是，红尘俗世的事物也由此进入佛寺，发生作用。大众入寺游玩，多与佛教活动、节日无关涉，而是直接与世俗节日或喜

① 《全唐诗》卷三五九，第11册，第4048页。
② 《全唐诗》卷四九七，第15册，第5650页。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第743页。
④ 《全唐诗》卷八三五，第23册，第9408页。
⑤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第747页。

好相关。世俗之人对寺院游宴功能的注重，使得在此影响下的佛教界其相关的言事也具有了更多的世俗的意味。

三

宋元之时，佛寺与世俗的关系基本上是对唐代的延续，并无多大的变化。随着俗讲的淡出，世俗进入佛寺的目的在实践其宗教信仰之外，主要还是在于赏景、游乐，佛寺与世俗生活、世俗节日的关系更为密切。俗众的大规模入寺进一步脱离其宗教需要，而与其世俗需求结合得更为紧密。其突出的标志便是佛教节日世俗化，以及世俗节日的关联佛寺。

佛教节日在宋元时期，宗教意味越发淡薄，往往成为世俗集体进入佛寺游玩的契机。很大程度上，相关节日与其说是佛教节日，不如说是世俗的节庆，乃至狂欢节。文献中对此多有述及。如宋人方信孺《西竺山广果寺》诗序中说，"故江西提刑谭惟寅所建，盖观音道场，每岁二月十九游人最盛"[①]。农历二月十九日为观音生日，各地多建观音会，赴寺进香。即称其时"游人最盛"，显然游玩也占了很大的内容。《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聚众·禁治聚众作会》记载了陕西安西路（路治今陕西西安）开元寺举办水陆资戒大会七昼夜的情形：

> 安西路僧人了恩、文行等，自至大四年二月以来，于本路开元寺以修建万僧水陆资戒大会为名，聚集山东、河南、冀宁、晋宁、河中并凤翔迤西等处僧众万人，及扇惑远近俗人男子妇人前来受戒，观者车马充塞街衢，数亦非少，僧俗混淆，男女忙乱，深为未便。[②]

此等佛教节日或法会，聚集大量民众，连夜达旦，法事之余，自然不免有娱乐、经商之事存在，以满足俗众需要，甚至于世俗的戏乐形式也直接夹杂

①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编：《全宋诗》卷二九一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册，第34744页。

② 《元典章》卷五七，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817页。

于其中。元熊梦祥撰《析津志辑佚·岁纪》中云：

(四月)八日，平则门外三里许，即西镇国寺，寺之两廊买卖富甚太平，皆南北川广精粗之祸，最为饶盛。于内商贾开张如锦，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与城外，极甚华丽。多是江南官商，海内珍奇莫不凑集。此亦年例故事。开酒食肆与江南无异，是亦游皇城之亚者也。[①]

下文还言及庆寿寺情形更过之。四月八日本属浴佛节，但元大都京城西镇国寺、庆寿寺中的情形则俨然已为世俗的娱乐中心。寺中此时商贾云集，百戏杂陈，引得游人如织，百姓喧腾。

与佛教节日的世俗化同时进行的是，世俗节日对佛寺的渗透。佛寺迎合世俗节庆，或举办相关宗教活动，或直接开放、提供场所与世俗以游玩、商贸。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卷六《十六日》述北宋末年京城汴梁正月元宵节时情形：

于是贵家车马，自内前鳞切，悉南去游相国寺。寺之大殿，前设乐棚，诸军作乐……资圣阁前安顿佛牙，设以水灯，皆系宰执、戚里、贵近占设看位。最要闹：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惠林、智海、宝梵，竞陈灯烛，光彩争华，直至达旦。其余宫观寺院，皆放百姓烧香。如开宝、景德、大佛寺等处，皆有乐棚，作乐燃灯。[②]

元宵节并非佛教节日，而京城佛寺之中多燃灯作乐，以供世俗娱乐。其卷八《重阳》云：

诸禅寺各有斋会，惟开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

① 熊梦祥撰，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4—215 页。

② 孟元老等撰，周峰点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 页。

上，作法事讲说，游人最盛。[①]

重阳节本为世俗登高赏秋之节，而佛寺居然也安排法事与讲说。“游人最省”者，自然宗教活动在其次，入寺游玩是其主。同书卷九《天宁节》中又记载了天宁节，即徽宗生日时的佛寺活动：

> 初十日天宁节。前一月，教坊集诸妓阅乐。初八日，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并诣相国寺罢散祝圣斋筵，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②]

天宁节者已非民间传统节日，而百官于此时入佛寺中设祝圣斋筵，进一步说明了佛教与世俗生活的相互渗透已经到了融洽的地步。这是北宋时候的情形。

南宋时期，世俗节日与佛寺的关联更为密切。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也载苏州市民“岁首即会于佛寺，谓岁忏。士女阗咽，殆无行路”[③]。士女元旦即入佛寺，主要在于迎新、踏春。此种风俗在南宋至为寻常。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一《正月》亦言：

> 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谓之首……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④]

元旦以外，其他世俗节日，民众也多入佛寺赏玩。如《梦粱录》卷一《二月望》言：

> 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

①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56页。
② 同上，第58页。
③ 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④ 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123页。

时，最堪赏游……崇新门外长明寺及诸教院僧尼，建佛涅槃胜会，罗列幡幢，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竟日不绝。[①]

这是花朝节的情形。同书卷三《皇帝初九日圣节》言，“四月初九日，度宗生日，尚书省、枢密院官僚，诣明庆寺如前开建满散”[②]。宋赵升撰《朝野类要》卷一《满散》言：

满散者，终徹也。每遇圣节生辰，宰执赴明庆寺，预前开启祝寿道场。至期满散毕，赐宴。[③]

则君主诞辰佛寺中的法事业已成为常例。皇太后诞辰也有类似的情形，《梦粱录》卷三《皇太后圣节》载之[④]。这一情形到元代，仍旧持续着。《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朝贺·庆贺圣节拈香》记天寿节，即君主诞辰时情形：

庆贺圣节拈香，前期一月，内外文武百官躬诣寺观，启建祝延圣寿万安道场，至期满散。其日质明，朝臣诣阙称贺。外路官员则率僚儒生阜老僧道军公人等，结彩香案，呈舞百戏，央道只迎就寺观。望阙至香案下投，官属按位班立，先再拜。班首前跪上香，舞蹈叩头，三呼万岁……[⑤]

京城朝臣入寺启建道场一如宋朝，而地方官民的活动中“呈舞百戏”，则多了些娱乐性、观赏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宋元时期佛寺与世俗民众的生活结合得更加紧

① 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129页。
② 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140页。
③ 赵升撰，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页。
④ 收入孟元老等撰、周峰点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⑤ 《元典章》卷二八，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442页。

密。一方面是佛教节日的世俗化色彩越来越强烈，进一步容纳了世俗的内容；另一方面则是世俗在法事、宗教节日外，大量涌入佛寺之中，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娱乐更多地与佛寺关联起来。由此，佛寺与民间文艺、娱乐的关系更为直接地密切了起来。它可以视为一个过渡时期，承前启后。

四

明清两代，世俗于入佛寺的热衷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延续着宋元时期的趋势，而更见世俗化。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强化管理，洪武二十四年、二十七年曾两下申明佛教榜册，整饬僧界[①]。明代也有禁止世俗随意入寺观的律令，至于言：

> 若有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妇。其寺观神庙住持及守门之人不为禁止者，与同罪。[②]

但代宗景泰二年（1451）朝廷开卖牒救灾之举，原来的拘束渐驰，佛教又开始迅速发展。有学者据《明会典》统计，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观已多至639所[③]。晚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八中言及万历时期东南佛教兴盛：

> 今日释教殆遍天下，琳宫梵宇，盛于黉舍，唪诵咒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④]

由此可见有明佛教之兴盛，以及世俗于佛教之热衷。清朝对于佛教的

---

① 释幻轮著：《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四十九卷，第936—938页。
② 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一六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47页。
③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④ 谢肇淛：《五杂组》，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7页。

管理与明代相似。初也曾严加，在京设立僧录司，各州府县亦设僧官，对于寺庙僧尼之数亦作限制。据《大清会典则例》卷九二《礼部·方伎》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佛家寺庙共79622处，僧尼合118907人。[①]但自乾隆十九年(1754)起，朝廷取消了官给度牒制度，佛教的发展又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至清末时，全国僧尼约有80万人。[②]

明清两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强大和乡野文化的成熟，除烧香礼佛之外，民众更为频繁和大量地涌入佛寺游乐消闲，佛寺的世俗娱乐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其时，佛寺中仍然有面向俗众的宣佛讲经活动。明张应俞著《江湖奇闻杜骗新书》卷四《僧道骗·信僧哄惑几染祸》中言：

> 此处有一寺，内有名僧号无二者，年近三十余，相貌俊雅。会讲经典，善谈因果，风动多少良家子弟，往寺参拜。[③]

此类宣佛讲经活动虽然延续不觉，但已非吸引世俗集体入寺的关键。此时佛寺能够聚拢世俗民众的主要关键是在于以佛寺为活动中心之一的庙会的大量举行，这也是明清两代佛寺继续作为世俗娱乐中心之一的突出标志。

明清时期佛寺庙会亦分两类，一则与佛教节日相关，一则无关佛教节日。前者最主要的是浴佛节、二月十九日观音诞辰与盂兰盆节。但此类从宗教节日随着庙会的举行，其时已经演变成民俗节日，其内容则主要为民间聚会、娱乐和买卖，原有的宗教活动反而降为次要。明王穉登撰《吴社编·会》中言及苏州一地风俗：

> 凡神所栖舍，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优伶伎乐、粉墨绮缟、角觝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香风花霭，迤逦日夕，翱翔去

① 《大清会典则例》，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版。

② 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收入印永清编《太虚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③ 张应俞著，廖东校注：《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来,云屯雾散,此则会之大略。会有松花会、猛将会、关王会、观音会。[①]

王穉登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卒于万历四十年(1586)。此中的观音可谓百戏俱陈,群情欢娱。清裴显忠修、刘硕辅纂,道光十七年刻《德阳县新志》卷一《地里志·风俗》记载了四川德阳地区观音会的情形:

二月十九日为"观音会",在县北之仙女洞。先是洞中多宿流丐,僧因塞之,邑令黄河清以古迹不可湮没,复令重开,僧于土中获观音石像,以为灵异,于是远近闻风争来膜拜。至日,进香者联络数十里,游人杂沓,喧华鼎沸。凡饮食之物、戏玩之具,填溢衢路,虽锦城蚕市未之过也。

其热闹、欢乐程度不输于姑苏。清潘荣陛撰《帝京岁时纪胜》之"四月·结缘"条载京城四月浴佛会情状云:

八日为浴沸会。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盐豆,以黄布帛为悬旌,书曰普结良缘。禁屠割。都人多于悯忠寺游玩,施斋饭僧,讲经于讲堂,听讲者甚伙。[②]

是为浴佛会世俗也多入寺庙游玩。清袁景澜《观支硎山香市记》一文所言观音生日,苏州支硎山世俗进香情形,将民众于其时游玩欢乐的情景描绘到了极致:

吴县支硎山去郡城二十五里,晋高士支遁所游憩。石室苔斑,寒泉清冽,厥迹犹存。山麓报恩寺奉观世音尊像。每春时,吴中士女焚香顶礼,群焉投最。……则有红袴稚儿、青裙游女,肩负花枝,

---

① 收入王稼句点校、编纂:《苏州文献丛钞初编》(上册),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② 清潘荣陛撰,富察敦崇撰:《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第16页。

随风弱步。富豪侠少，宝骑珊鞭，结队闲行，翱翔容与……

复有货郎地摊，童孺戏具，筠篮木盏、泥孩竹马、地铃丝鸥、蚕帘廉柳棬诸物。男妇争买，论价聒杂，声如潮沸。路侧杂厕茶篷、酒肆、饼炉、香铺，赶趁春场，蜂屯蚁聚。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列，行者摩肩，遗簪堕珥，睹不暇拾。……臻臻簇簇，联络十里，笑语盈路，众情熙熙，无不各遂其乐，亦不自知其何以乐也。[①]

观音诞辰之时，男女老少，络绎出游。寺内庙外，货物铺陈。说因果、评书，听者熙攘。佛寺内外已成了世俗尽情游乐之所。

佛教节日以外，世俗也多入佛寺游观。此类游观或成于传统节庆，或系于神灵（佛教以外）诞辰，或缘于世俗生活商贸之需要，并逐渐形成相关的庙会。明张时彻纂修，周希哲订正，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本《宁波府志》卷四《志一·风俗》云，"三伏，寺庙皆设醮，妇女走礼神佛"。这是在平常的三伏天，佛寺设醮，而世俗妇女入观。清顾禄（嘉庆、道光年间人）《清嘉录》卷一《正月·新年》云：

诸丛林各建岁醮，士女游玩琳宫梵宇，或烧香答愿。自此翩翩征逐，无论远近，随意所至。

同条引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到处庆新年。北寺笙歌声似沸，元都士女拥如烟，衣服尽鲜妍"[②]。这是苏州民众在新年之季蜂拥入佛寺道观游玩的记录。北方的北京亦有类似情形。清富察敦崇撰《燕京岁时记》"大钟寺"条云：

大钟寺本名觉生寺，以大钟得名，盖岁时求雨处也。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日。十日之内，游人坌集，士女如云。长安少

① 袁景澜撰，甘兰经、吴琴校点：《吴郡岁华纪丽》卷二《二月·观音山香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1页。

② 收入《苏州文献丛钞初编》（上册），第362、364页。

年多驰骤车马以为乐，超尘逐电，劳瘁不辞。[①]

这是新年正月之时男女入寺游赏的情形。清吴汝纶撰，光绪二十六年(1900)文瑞书院刻本《深州风土记》卷二十一《物产》言及河北衡水地区民间于正月“十六日，男妇郊游，散百病(注：焚香，缕结羊肠，卜一岁休咎，游寺庙)”。《帝京岁时纪胜》的“二月·花朝”条载，清京师民间，每年二月“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幽人韵士，赋诗唱和春早时赏牡丹，惟天坛南北廊、永定门内张园及房山僧舍者最胜”[②]。花朝节也成为世俗游览寺院的契机。《燕京岁时记》之“东西庙”条道：

> 西庙曰护国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东庙曰隆福寺，在东四牌楼西马市正北。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九、十日开东庙。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乃都城内之一大市会也。[③]

佛寺之中开张市会，交易百货，而其举办的时间已然固定，并与节庆无关。佛寺在此处犹如集市场，其于世俗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满足其日常生活方便之需要。

明清两代佛寺庙会值得关注的事项是，其实无论是以佛教节日、法会名义，还是以世俗名义，举办的庙会，大多有戏曲、曲艺演出。明正德十二年(1517)夏良胜纂修《建昌府志》卷三《风俗》中言及江西抚州：

> (四月)八日，浮屠作“浴佛会”，有乌桐饭、香水，先时妇女往观之。人家用百果作日和菜，亲邻传送，岁以为常。是月，坊保多敛钱建醮，谓之禳灾，又谓之禳火。先时装演剧戏，竞奇夸富，谓之迎

① 潘荣陛撰、富察敦崇撰：《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第48页。
② 《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第13页。
③ 同上，第51页。

神，今则省矣。

是则明时佛寺建会，已有戏剧演出。明赵彦复纂修《沃史》卷十三《风俗考》也记载了山西临汾地区民间之习俗：

> 凡城市乡村有寺观庙宇，元旦、元宵、清明等日，出所醵金，铺筵祀神，或聚众讲经，设坛修醮，建祠塑像，随会进香；又里社，有春秋祈报，自是古雅。惟多聚倡优，扮演杂剧，连日累夜，甚非美俗，且易启事端，多耗财货，所宜戒止。

赵彦复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可见至明代末叶，民间佛寺多有世俗演变之举，且多有在佛节以外举行者。此事至清代极为寻常，已成惯例。清同治十二年（1873）文棨等修《直隶绵州志》卷十九《风俗志》述及四川绵阳地区的风俗：

> （二月）初二、十九两日，为“观音会”，四乡男女，远近沓至。初二南乡报恩寺，十九则白云洞、碧水岩两处同日具举为尤盛。香侣云集，履舄交错，饮食之物、戏玩之具，镇衢溢路。又，碧水岩、西山观亦各有戏会，距城密迩，士女如云。

这是观音会时的情形。清陈培桂等纂修初刻于同治十年（1871）的《淡水厅志》卷十一《考一·风俗》述及台湾淡水地区盂兰会之风俗，有言：

> （七月）十五日，城庄陈金鼓旗帜，迎神进香，或搬人物，男妇有祈祷者着纸枷随之。凡一月之间，家家普度，即“盂兰会”，也不独中元一日耳。俗传七月初一日为开地狱，三十日为闭地狱，延僧登坛施食以祭无祀之魂。寺庙亦各建醮，两三日不等，惟先一夜燃放水灯。各结小灯，编姓为队，弦歌喧填，烛光如昼，陈设相耀，演剧殆无虚夕。

“演剧殆无虚夕”，自可见民间对寺庙演出戏剧的喜闻乐见。清陈梦林纂，康熙五十六年(1717)序刊本《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中言台湾诸罗地区：

> 神诞，必演戏庆祝。二月二日、八月中秋，庆土地尤盛。秋成，设醮赛神，醮毕演戏，谓压醮尾。比日中元盂兰会，亦盛饭僧，陈设竟为华美，每会费至百余缗。事毕，亦以戏继之。

清嘉庆十八年(1813)王钟钫纂《彭县志》卷三十九《风俗》中言，四川彭县“每值各神诞，民间集钱致祭，亦有演剧者。至中元节，各寺观中设盂兰会，忏度甚虔”云云；清陈济学修、叶芳模等撰，道光九年(1829)刻《新津县志》卷十五《风俗》乃言四川新津地区“邑中每逢神会，必演戏庆祝”，说的也都是清时各地民间逢佛节神诞，于佛寺内外演出戏曲的情形。

除此以外，日常之庙会，也有在佛寺演出戏剧者。清荫禄修、程夔奎纂，光绪二年(1876)刻《怀安县志》卷三《食货志·风俗》言河北怀安风俗：

> 邑有庙会，向例起于十月初旬，在西大街昭化寺内，名曰皮袄会，嘉庆十余年改设城隍庙街，自五月二十六日，起至六月朔止。会毕至柴沟堡，与城略同。凡会日，开场列货，士女如云，山门外，昼夜演戏。二十七日，男女杂沓入庙，名曰“拜香”。

这是民间举行皮袄会，在寺庙中演戏的情形。姚家望修、黄荫楠纂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封丘县续志》卷二《地理志·风俗》中也言河南封丘：

> 清时，城乡凡有佛宇道观之所，多敛谷劝捐，每年按期设宴或献戏，名曰坐棚会。两三村庄结社定约，保护农业，轮流演剧，名曰庄稼会。此外，吏胥有萧曹会，士子有文昌会，商人有五圣会，工人有鲁班、灶君等会。举县若狂，糜费不赀。

这是修志者对当地前朝风俗的回溯。此种风俗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王维梁修、廖立元等纂，民国三十二年(1943)铅印本《明溪县志》卷十一《礼俗志》载福建明溪地区相关情形，也云“逢佳节及神会期，寺庙每有演剧，亦娱乐而兼社会教育者也”。所谓佳节当指民间传统节日。此书虽撰于民国，但所言情形应该由来已久。石秀峰修、王郁云纂，1930年铅印本《盖平县志》卷十《礼俗志》言及辽宁盖平四月十八日庙会则更为详备：

> 四月十八日，邑北六十里耀州庙会，即《盛京通志》所载耀州也。山上旧有娘娘庙，香火极盛；山下禅院名海云寺，每庙会期，演戏五日。先时，贩卖物类者云集于兹，凡人民日用应需之物，无不备具，行行分列，供人采购。四方来游观者，毂击肩摩，夜以继日。有周铁沟、桥台堡、乡乐庄、铁岭屯、百家塞诸村会办演秧歌、抬歌杂剧，群集山庙祝神，以祈丰年。

此庙会不关佛教，但举行于佛寺。佛寺此时又成为俗众观戏、买卖、游乐之所，佛寺的宗教意味已不为人所重，它更多地是作为娱乐生活中心存在于世俗的日常生活之中。

佛寺在世俗民众生活中的日趋重要首先源于其本身的物质条件。佛寺大多建在乡市中心，或风景秀丽之地，又有空旷之地，便于游玩或开展大型活动。而僧徒对世俗的此类活动大多持欢迎或宽容的态度。佛寺在中土世俗的生活中，最初是庄严的宗教场所，民众主要是作为个体进入其中，完成其宗教实践；集体性地进入佛寺的情形较少发生。而随着佛教的发展，更多的世俗民众进入佛寺。同时佛教的中土化、世俗化，也拉近了其与世俗的关系。世俗在其宗教实践以外，也更多的集体进入佛寺，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世俗民众游乐的需要。直至明清时期，佛寺已然成为世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它以庙会为标志，在满足世俗的宗教需求的同时，更多的是作为世俗集体社交、贸易、游玩、观戏的舞台，出现在后者的日常生活之中，为其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余正东修、黎锦熙纂，民国三十三年

(1944)铅印本《宜川县志》卷廿三《风俗志》言,“平时除赛会演戏外,极乏经常之正当娱乐”;陈伯嘉修、李成均等纂,民国二十七年(1938)石印本《重修汝南县志》卷十一《社会考·礼俗》中言庙会之用,谓“俗人借会以为娱乐,农工商借会以为交易物品”。所论虽为民国时期物事,但置于明清佛寺庙会之上,也可谓切中肯綮,道出了世俗热衷入寺与庙会的关键所在。

佛寺由单纯的宗教场所逐步发展成为世俗民众的娱乐中心,此过程,一方面说明了以佛寺为标志的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越来越世俗化,最终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融洽无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古代文艺对民间社会发生影响的途径、方式的多样化,佛寺以及其他各式的庙观在民间的娱乐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民众的集体性需求又往往促使其关联的对象主动或被动地发生着改变,以更好地迎合前者。它满足了世俗需求,丰富其生活的同时,也使得佛教在民间维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取得了延续发展。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提　要:佛寺作为佛教生存、发展的基地,在中土民众生活中,从开始的单纯的宗教场所,逐渐演变成其重要的生活、娱乐场所。这既是佛教世俗化的结果,也是民众生活需求的自然推动。就佛教发展和民众生活而言,这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佛寺　佛教　世俗　娱乐**

第二部分

中古汉文学及其文献研究

唐代试赋的命题研究
——以试赋题目与九经的关系为中心

赵俊波

本文所说的唐代“试赋“，指科举考试中的赋作，不包括私下的习作即所谓的“私试”之作。试赋从参加考试的不同级别而言，包括省试和州府试等；从科目类型来说，有进士科、博学宏词科等。由于是正式考试，所以其命题便不能率意。如贞元十三年，吕渭以《西掖瑞柳赋》为题，引起唐德宗的反感[①]；乾符五年，崔澹以《以至仁伐至不仁赋》为题，差点给自己招来不测[②]。所以，试赋题目，绝非主司率意所拟，而是其仔细斟酌的产物，这使得对命题的研究成为可能。

所谓“九经”，指唐代用于科举考试的九部儒家经典，见于《唐六典》：“凡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③]

唐代试赋的命题，多数取材于前代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但这种取材也

① 王溥：《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84页。《旧唐书》卷一三七作“上闻而嘉之”，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四所辨，应以《唐会要》为是。

②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无名子谤议”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3页。

③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9页。

不是随意的，它反映了各部典籍在唐代的地位。本文探讨试赋的命题机制，主要关注试赋题目与九经的关系。

一、题源概况

现存的试赋题目中，省试类的最多，另外还有州府试、制试类的题目。

（一）省试题

据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所收，省试题一共有80个，包括进士试、博学宏词试等科目。仔细查阅文献，笔者发现这80个题目中，出自经、史、子、集等前代典籍者60个，其中出自唐人所谓“九经”的最多，达到33个，详见下表：

年 代	赋 题	出 处
开元十九年	仲冬时令赋	《礼记·月令》
开元二十二年	梓材赋	《尚书·梓材》
天宝十载	豹舄赋	《左传·昭公十二年》
大历二年	射隼高墉赋	《周易·解》及《系辞下》
大历九年	蜡日祈天宗赋	《礼记·月令》
大历十四年	寅宾出日赋	《尚书·尧典》
贞元五年	南风之薰赋	《礼记·乐记》疏引《孔子家语》
贞元八年	明水赋	《礼记·郊特牲》
贞元九年	平权衡赋	《礼记·月令》
贞元十五年	乐理心赋	《礼记·乐记》
贞元十七年	乐德教胄子赋	《周礼·春官宗伯》
元和五年	洪钟待撞赋	《礼记·学记》
元和十年	乡老献贤能书赋	《周礼·地官司徒》
元和十三年	修礼耕情田赋	《礼记·礼运》
元和十五年	大羹赋	《礼记·乐记》
长庆元年	孤竹管赋	《周礼·春官宗伯》
长庆三年	丽龟赋	《左传·宣公十二年》
长庆四年	金用砺赋	《尚书·说命上》
太和元年	观民风赋	《礼记·王制》
太和六年	君子之听音赋	《礼记·乐记》
咸通二年	盛德日修赋	《周易·系辞上》
咸通三年	倒载干戈赋	《礼记·乐记》
咸通四年	谦光赋	《周易·谦》

年 代	赋 题	出 处
咸通七年	被衮以象天赋	《礼记·郊特牲》
咸通九年	天下为家赋	《礼记·礼运》
咸通十五年	禹拜昌言赋	《尚书·大禹谟》
乾宁元年	止戈为武赋	《左传·宣公十二年》
乾宁二年	人文化天下赋	《周易·贲》及《周易·离》等
	曲直不相入赋	《礼记·乐记》及《礼记·经解》等
乾宁四年	未明求衣赋	《诗经·东方未明》
同光三年	君从谏则圣赋	《尚书·说命上》
长兴二年	铸鼎象物赋	《左传·宣公三年》
显德六年	元后作民父母赋	《尚书·泰誓上》

以上共33个题目。同时出于多种典籍的,以形成较早或记载详细的为准,如贞元八年进士试《明水赋》,"明水"见于《周礼》、《礼记》等,但以《周礼·秋官司寇·司烜氏》所记较早且最为详细,并为他书所转载,其云:"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烛,共明水。"以下详细解释明水的来历及其用途,注:"鉴,镜属,取水者,世谓之方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阴阳之洁气也。明烛以照馔,陈明水以为玄酒。郑司农云:'夫,发声。明齍,谓以明水滫涤粢盛黍稷。'"疏:"明者,洁也,日月水火为明水明火,是取日月阴阳之洁气也……云'明水以为玄酒'者,郁鬯五齐,以明水配……先郑云'明水滫涤粢盛黍稷'者,滫谓滫瀡,涤谓荡涤,俱谓释米者也。"[①]

而《礼记》所言"明水",其义多取于此,如《郊特牲》:"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注:"明水,司烜以阴鉴所取于月之水也。"正义明确指出:"云'明水,司烜以阴鉴所取于月之水也'者,《周礼·秋官·司烜氏》文也。"《郊特牲》又说:"祭黍稷加肺,祭齐加明水,报阴也。"注解所据,也是《周礼》:"明水,司烜所取于月之水也。"[②]

两相比较,我们发现《周礼》对"明水"的记载较早且最为详细,并为《礼记》所转载,所以认为贞元八年的试题"明水"源于《周礼》而非《礼记》。诸如

①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五,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885页。

②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六,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455、1457页。

此类，在统计时均以形成较早、记载详细的文献为准。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这 33 个出自九经的题目中，出自《礼记》的最多，达到 14 个。另外，出自《尚书》的有 6 个，《周易》与《左传》各 4 个，《周礼》3 个，《诗经》 2 个，没有出自《仪礼》、《公羊传》和《谷梁传》的题目。

（二）其他

包括州府试、制试等类别的题目。综合《唐摭言》等笔记以及《文苑英华》等文集所载，此类题目共 16 个。除高郢卫州府试《沙洲独鸟赋》、乔彝府试《幽兰赋》与《渥洼马赋》、吕镈与王起《万年县试金马式赋》、严维《中书试黄人守日赋》、刘义方东府解试《貂禅冠赋》、梅权衡府试《青玉案赋》、王棨《三箭定天山赋》、元和中华州试《登山采珠赋》等 9 篇外，试题出自九经者一共 7 个，分别是：刘子玄《京兆试慎所好》（《尚书·君陈》注）、李子卿与张何《府试授衣赋》（《诗经·七月》）、白居易《宣州试射中正鹄赋》（《礼记·射义》）、徐寅《京兆府试入国知教赋》（《礼记》）、《京兆府试火中寒暑退赋》（《左传·昭公三年》）、王棨《玉不去身赋》（《礼记·曲礼下》、《礼记·玉藻》等）、元稹《奉制试乐为御赋》（《礼记·礼运》）。

可见，这和省试中的情况一样：其一，在所有前代文献中，出自九经的题目最多，达到 7 个；其二，在这七个题目中，出自《礼记》的又最多，共 4 个。此外，出自《尚书》、《左传》、《诗经》的各一个，没有出自《易》、《周礼》的题目。

总体来看，现存的试赋题目一共 96 个，其中多数出自前代文献，而出自唐代所谓“九经”的最多，达到了 40 个，超过半数。

在这 40 个出自九经的题目中，出自《礼记》的最多，有 18 个，几乎占到一半。另外，出自《尚书》的 7 个，《左传》 5 个，《周易》 4 个，《周礼》和《诗经》各 3 个。没有出自《公羊传》、《谷梁传》和《仪礼》的题目。

二、试赋命题与九经

以上通过列表，分析了唐代试赋的题源概况：出自《礼记》的题目最多，出自《公羊传》、《谷梁传》和《仪礼》的最少，处于中间的是《尚书》、《左传》、

《周易》、《诗经》和《周礼》。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九经在唐代的冷热不均有关。

（一）对经典的认识：《礼记》在命题中最受重视

九经之中，唐人对《礼记》最为重视。反映在教育中，他们认为《礼记》在诸种儒经中非常重要，所以在学习的次序上，《礼记》居于各种典籍的前列，如欧阳詹《太学张博士讲〈礼记〉记》："我国庠春享先师后，更日命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礼记》，成儒术也……礼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讲之。"杜牧《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记载墓主幼年多病，所以仅读过寥寥几种书，而《礼记》赫然处于其中："君幼孤多疾，目视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学。年十七，读《尚书》十三篇，《礼记》七篇，《汉书》止《贾谊传》不复执卷。"可见唐人对《礼记》的重视。

这与《礼记》的内容有关。《礼记》虽然内容庞杂，不如《仪礼》、《周礼》有系统，但涉及儒家的人生哲学、教育理论、音乐理论、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设想、各种具体的礼节等，不仅记叙了一些礼节仪式，而且详细阐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思想，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通过它可以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体系。正如孔颖达《春秋正义序》中所说："若夫五始之目，彰于帝轩；六经之道，光于《礼记》。"①所以在郑玄作注以后，《礼记》越来越被重视，到了唐代，被尊为经典，列为"大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

《礼记》的被重视，反映在试赋上，便是出现了大量与之相关的题目，而且一枝独秀，远远地与其他经书拉开了距离。

（二）是否实用：三礼在命题中的不同遭遇

这主要表现在《礼记》、《周礼》、《仪礼》的不同遭遇方面。试赋中，出自《礼记》的题目最多，而其余二礼则很少。特别是《仪礼》，从现存文献看，没有出自《仪礼》的题目。

学习《仪礼》者非常少。《仪礼》记载了一大堆礼节单子，包括礼仪程序、礼器等，枯燥难读。韩愈就曾为此苦恼，其《读仪礼》中说："余尝苦《仪礼》难

---

① 孔颖达：《春秋正义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698页。

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

《仪礼》在当时并不实用，见上引韩愈之言，又如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

>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允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怪孙子……

冠礼的具体程序，见于《仪礼·士冠礼》。可见《仪礼》的某些礼节，在唐代已不实行。

《周礼》同样不实用。关于这一点，马端临《文献通考》曾有过详细分析，读者可以参考。其结论是：“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而后，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愎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1]

而《礼记》叙述的礼治之义，却是任何时候都实用的。皮锡瑞《经学通论》中有“《礼记》所说之意，古今可以通行”条，作者引《抱朴子》说明古礼不可行于今；又引朱熹等人之言，谓《礼记》阐述礼之义，所以，“节文时有变通，而义理古今不易。十七篇虽圣人所定，后世不尽可行，得其义而通之，酌古准今，期不失乎礼意，则古礼犹可以稍复。”[2]

所以，习《礼记》者非常多，而习其余二礼者却很少，以致从初唐开始，就对《周礼》、《仪礼》实行保护政策，《册府元龟》中记载：“（贞观）九年五月二日敕：自今已后，明经兼习《周礼》若《仪礼》者，于本色内量减一选。”[3]可见习此二经者甚少。

这种现象反映在试赋的命题上，便是出自《礼记》的题目很多，而《周礼》特别是《仪礼》的题目就少得可怜了。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〇《经籍考七》，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第 1554—1555 页。
②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70—71 页。
③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贡举部·条制第一》，中华书局1960 年影印本，第7669 页。

值得注意的是,“三礼”之中,出自《周礼》的试赋题目,虽然比《礼记》要少得多,但也有一些。不过,现实生活中,研习《周礼》的人并不多,所以,虽然有时从中出题,但士子们不一定都能理解题意。如长庆元年复试《孤竹管赋》,郑郎等十人落下,诏书说:“郑朗等昨令重试,意在精覆艺能,不于异书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贵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郑朗等十人并落下。”[①] 按郑郎落榜后,即被赴任襄阳的柳公绰聘为幕僚,后来官至御史大夫、礼部尚书直至宰相[②],说明他并非才疏学浅之人,但在这次复试之中,竟茫然不知题目出处。这说明《周礼》的学习在当时并不被重视。

(三)科举制度的影响:举子们习经时的趋易避难与九经在命题中的冷热不均

科举制度是名副其实的“指挥棒”,对举子的学习及各部典籍的地位等起着重要的作用。以《礼记》而言,其书虽然在唐代地位崇高,但在宋代,也曾有过不得不依靠国家政策予以照顾的经历:“(建炎)二十二年,以士习《周礼》、《礼记》,较他经十无一二,恐其学浸废,遂命州郡招延明于二礼者,俾立讲说以表学校,及令考官优加诱进。”[③]从唐宋两代《礼记》地位的沉浮,可见科举制度的巨大影响。

试赋题目所表现出的状况,与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1. 进士科中的帖经情况

进士科试诗赋,但在唐代大部分的时期内,进士科也要试经,即帖经。不过,在不同时期,进士科与各部经书的关系也有所不同。

唐初进士科仅试策而已,与经书无关,《唐会要》:“贞观八年三月三日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但这并非帖经,徐松认为:“按进士初惟试时务策五道,至是加读经史。仍试以策,非帖经也。”[④]

---

① 刘昫:《旧唐书》卷一六八《钱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84页。
② 刘昫:《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卷一六五《柳公绰传》,第637、4305页。
③ 脱脱:《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30页。
④ 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页。

因考功员外郎刘思立所请，神龙三年，进士考试开始实行帖经、试杂文、试策的三场试，如《唐摭言》所说："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①]此时的帖经，是帖一小经，参下引《通典》开元二十五年的制书及天宝十一载"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条下的注解。所以，从神龙元年开始，进士试帖一小经。

帖小经的规定实行了二十余年。此后的开元二十五年，因礼部侍郎姚奕的上奏，朝廷规定进士改帖大经。据《通典》记载，姚上奏之后："二十五年二月，制：……其进士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又天宝十一载"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句下注："旧制，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经，其尔雅亦并帖注。"[②]从开元二十五年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进士试的帖经都指帖大经。

太和七年，进士的帖经变为同时帖一大经和一小经。《唐会要》："太和七年八月，礼部奏：进士举人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与及第。其所试诗赋并停者。伏请帖大、小经各十帖，通五通六为及格……敕旨依奏。"[③]但据徐松的意见，这条规定只实行了一年就废止了[④]；试诗赋并没有停止，帖大经依然照旧。

总而言之，进士试中的"帖经"，多指帖大经；另外，短期内曾规定帖小经，或者大、小经同帖。

至于大、中、小各类的名目，见于本文开头所引《唐六典》，即《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

既然多数时间帖大经，那么在试赋中，作为大经的《礼记》就成为试官最青睐的试题薮泽，从中命题的几率也就大一些。当然，同为大经的《左传》在命题中没有被格外重视，那是由于其他原因，详见下文。

2. 举子趋易避难，导致各经遭遇不同

以上说明，进士科考试除了试诗赋外，还要帖经，所以大家必须学习九

①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试杂文"条，第 9 页。
② 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356 页。
③ 王溥：《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第 1381 页。
④ 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卷二一，第 757 页。

经。但是，九经有难有易，加上科举中某些规定的影响，使得大家在学习时，趋易避难，往往厚此薄彼，对九经用力不均。这在明经科中，表现尤为明显，所以我们可以以明经中的情况来说明进士科。

国子司业李元瓘的上奏，概括了当时唐人对整个九经的态度："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各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策，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①]可见，九经之中，作为中经的《周礼》、《仪礼》和作为小经的《公羊》、《谷梁》这四部经书，几乎没有人去学习，所以要出台特殊政策进行"训诱"。同时，因为"大经"之中，《礼记》篇幅少于《左传》，所以大家都学习《礼记》，而习《左传》者则很少；对《诗》、《易》、《书》三经，李没有提及，说明这三经的情况比较正常，研习者虽然不如《礼记》多，但也不至于过少，所以尚不足以出台政策予以照顾。

时隔数年，《公羊传》等"四经殆绝"以及习《左传》者较少的情况并没有改观，开元年间，杨玚旧话重提："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且今习《春秋》三家、《仪礼》者才十二，恐诸家废无日，请帖平文以存学家，其能通者稍加优宦，奖孤学。"[②]总之，"三传"及《周礼》、《仪礼》在士人中并不流行，所以一些人时时呼吁出台政策对这几部经书加以扶持。

趋易避难，人同此心，进士科中举人对各经的态度，与明经科一致。上文说过，大部分时间里，进士试是帖大经的。这样，举子们在学习大经时，就选择《礼记》而避免《左传》，主司命题，也多从《礼记》中选择，因此出自《礼记》的题目占了绝大多数。

同时，由于大部分的时间是帖大经，而且进士的帖大经，其内容同时覆

① 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第 355 页。
②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三《杨玚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4496 页。

盖了《礼记》、《左传》，并没有像明经科一样规定可以从中任选一部[①]，所以虽然《左传》题较少，但也有寥寥几篇，不至于一个题目都没有。

如上所述，唐代一度还规定进士试中的"帖经"为帖小经，虽然实行时间较短，但可以看出，小经并没有被进士科所忘怀，所以应进士举者并没有放弃小经的学习。小经中，《周易》、《尚书》与现实、政治关系紧密，所以学者比较多，出自这两部经书的题目也不少；而学《公羊》、《谷梁》二传者较少，所以出自这两类经书的题目甚至连一个都没有。

至于中经，虽然没有被纳入考试范围，但不等于放弃不学或不考。中经含《毛诗》、《周礼》和《仪礼》。相形之下，《仪礼》枯燥难懂，所以没有出自《仪礼》的题目，而有出自《周礼》和《毛诗》的。当然这并不等于举子们就精通这两部经书，例如韩愈以《明水赋》进士及第，但此赋却被指为有背经典[②]。赋题出自《周礼》，可见他对《周礼》并不熟悉。

综上所述，唐人试赋，多从前代典籍特别是九经中命题。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唐人对九经的认识不同等原因，使得九经在唐代冷热不均，由此形成了试赋命题中这种值得深思的现象：出自《礼记》者最多，其次为《尚书》、《左传》、《周易》、《周礼》、《诗经》，而没有出自《公羊传》、《谷梁传》和《仪礼》的题目。

提　要：唐代试赋有从前代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中命题的习惯，本文围绕试赋题目与九经的关系问题考察唐代试赋的命题机制。从现存文献看，出自《礼记》的题目最多，其次为《尚书》、《左传》、《周易》、《周礼》、《诗经》，没有出自《公羊传》、《谷梁传》和《仪礼》的题目。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唐人对九经的认识不同等原因，九经在唐代冷热不均，由此也形成了试赋命题中的这种现象。

关键词：试赋　九经　科举　命题

① 明经考试，并不要求同时精通全部经典，而是可以从中选择几部。明经科目有"通二经"、"通三经"等，据《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记载："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以"通二经"为例，规定只考一大一小两部经典，所以考生只需在大经类中选一部，小经类中再选一部即可。其他"通三经"、"通五经"中的情况与此类似。

② 朗瑛：《七修类稿》卷二四："韩文《明水赋》曰：'明为君德，因所以名焉。'予尝读《周礼》曰：'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则是因取日月，故曰明。非取义于君德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4页。

试析《书言故事》之流变与传播

——兼论书商对童蒙读物之影响

戴 健

明代以启蒙教育为指向、书名标有“故事”字样的类书数量较多①，如《书言故事》、《日记故事》、《金璧故事》、《君臣故事》、《故事雕龙》、《劝惩故事》、《艺林伐山故事》、《分门故事》、《启蒙故事》、《锦囊诗对故事》、《黄眉故事》、《白眉故事》、《七宝故事大全》等，约有30种。由于它们多数是童蒙教育中的辅助性教材，受到的关注较少，也鲜有专门研究，故而知晓度不高。但以上文献除具备一般类书的特点外，还有童蒙读物的特点，是继《初学记》之后，童蒙类书重要的演变本，值得关注。同时，这类书籍都是用散文体编撰而成的，相较于韵文体的蒙书，意义不同。它们刊刻丰富、购销两旺的事实，客观反映了明代学童在叙事能力培养上的偏重，这既与当时科举的要求相适应，也与明清两代叙事文学蓬勃发展的事实相一致。综上所述，对童蒙类书加以关注与研究，是很有学术意义的。

《书言故事》是明代故事类书中影响最大的。但除了张志公先生在《传

① 此处的“故事”，作“旧事”、“典故”、“掌故”解。

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一书中有约500字的介绍、引述之外[1]，学界鲜有关注，更无专门研究，这种冷落与此书当年的社会影响、实际文化功效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解读该书的发展流变，以期引起重视。

一、《书言故事》概述

《书言故事》的编撰者是宋人胡继宗，但他的生平资料留存极少，本文所见，仅宋人欧阳守道在《题重刊〈四书〉后》一文中曾提及：

> 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揆之于今，士不见朱子《四书》，殆不名士，何遗言显晦，久远相辽绝。朱子在时，以所学进讲，明天子继作，益尊其书，以惠万世。其视阙里之教，存不达于时王，没重厄于战国，秦者所遇故殊矣。抑余曾谓：东汉太学门之石经，后周国子监之九经板，虽事出衰季，而有功于斯文甚大。使前世早有之，何至编残简断，而诸儒传授如彼其劳也。《四书》摹本富矣，今吾庐陵胡继宗又手自校正而刻之，字画甚精。呜呼，安得此于秦汉间乎！[2]

文中提及的胡继宗是江西庐陵人，曾校订出版过朱熹所编的《四书》，其籍贯、所事都与《书言故事》的编者吻合，故可以确定：上文中提到的胡继宗即是编辑《书言故事》的胡继宗。欧阳守道，《宋史》中有传，江西吉州人，嘉佑元年(1056)进士。据此推测，胡氏亦应是北宋人。其著述，据《百川书志》与《宋史艺文志补》，尚有《诗韵大成二卷》，亦是小学类著述。

《书言故事》一书，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文献中皆不见载，仅清人编撰的《宋史艺文志补》中有著录，标为“十卷”。大约此书虽成于北宋，但在宋元两代影响不大，故未能进入当世目录家之视野。此书尚有另外的名称——《训解书

---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②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二一，《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3册，第679页。

言》，见载于《正德建昌府志》卷八中，但并不知著，唯《书言故事》一名流传最广。最早著录此书者，是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5）的高儒的《百川书志》。该书的卷十一“类书”中有“《书言故事十卷》，宋庐陵胡继宗编”。成书时间与之相仿佛的周弘祖的《古今书刻》亦有记载。但这些记录都晚于此书最早的刊刻时间——天顺八年（1464）。就在这一年，经过校订、注释完成的《书言故事》出版，陈玩直的《书言故事序》一文记述详细：

> 宋之季庐陵胡继宗先生，极博学之君子也。编集此书，号曰《书言故事》，靡类不载，靡物不备，靡事不周，靡书不引，所谓汗牛充栋者也。诚为初学之便，得以广其见闻。惜乎断章取义，况历年之久，而字讹阙然，非涉猎者对此书如夜行之无烛，几于废坠，良可叹哉。于是清江宋应祥先生间为之释文，京兆刘先生间标之为题。余皆集之，遍加搜抉诸家之注，悉置之本句之下，使人就之则易见，读之不难晓。至如音义、训释，考诸《玉篇》、《广韵》而不谬。订正其文，即据释文及所引诸书而无疑。正欲备其辞，而文之于著述之间，则成繁乱而厌视矣。但逐节姑完全体，以致脉络贯通。而今而后，学者不须师授而自明矣。①

由上文可知，校订一部新的《书言故事》，是集众人智慧的产物，文中提及的清江宋应祥、京兆刘先生、安成陈玩直三人，生平皆不可考，极有可能是不知名的文人。值得注意的是，江西、北京、广西三处相隔遥远，为什么他们三人会聚在一处、做同一件事？最合理的解释是缘于书商的邀请：书商得到一本年代久远的蒙书，但由于错漏很多，无法直接出版，于是邀请几个不知名的平民文人，请他们做校订工作。而且，从现存刊本的实际情况来看，注释的文字量远远超过了胡继宗的原文，上述三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此，《书言故事》在明代被“发掘”而大放异彩，是书商与平民文人的共同努力。

《书言故事》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试以当世人的评价为答。陈玩直

① ［日］长泽规矩也编辑：《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 页。

形容它“靡类不载，靡物不备，靡事不周，靡书不引”；高儒在《百川书志》中也说：“《书言故事》十卷，宋庐陵胡继宗编。靡类不载，靡物不备，靡事不周，靡书不引，足充学者之胸襟”，所以，它是一本收罗全面的类书。福建书商郑世豪说得更为详细：

> 所谓书言者何也？书以记事，言以录事，万世之不磨者也。坊间故事广多，而《书言》亦出其右，万理悉备，众义兼该，词清而畅丽，理明而温润。小学者赖之以开聪，大学者资之以助词。①

这段话从内容、特点、受众等三个方面评述了《书言故事》，虽出于广告宣传的目的，难免溢美，但也确能切中肯綮，故有采信的价值。从内容而言，《书言故事》是以词条的形式，将古代典籍中的典故、成语等汇编成集，先举出典，再注音、释义，再注解引文，或更有详细说明，以便理解。以十二卷本为例，将人事、身体、动植物、历史、地理、时令、饮食、器物等方面的知识分为252类，共收录词条计1979个。其分布如下表所示：

卷次	类数	词条数	卷次	类数	词条数
卷一	11	158	卷七	17	139
卷二	16	154	卷八	17	164
卷三	17	174	卷九	28	126
卷四	24	183	卷十	36	207
卷五	18	194	卷十一	21	192
卷六	12	146	卷十二	35	142

由此可见，《书言故事》无论是知识面的宽广度，还是知识点的数量，都相当丰富。一册在手，确实可以提高学童的素养，使他们更加博洽多闻。

二、明刊本

《书言故事》在明代的影响很大，是最为畅销的蒙书。出于逐利的目的，

---

① ［日］长泽规矩也编辑：《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书商的刊刻积极性很高，形成了此书的众多版本。福建书商郑世豪即有多个本子传世，其云："是书所刻亦云既多"，是当时的实际状况。为便考察，本文现将此书的主要明刻本罗列如下：

1.《书言故事大全十二卷》，宋胡继宗编辑、明陈玩直解，万历十七年安徽宣城县书林吴伯仁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2.《书言故事大全十二卷》，宋胡继宗编辑、明陈玩直解，万历十七年安徽歙县吴怀保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国家图书馆)

3.《书言故事大全十二卷》，宋胡继宗编辑、明陈玩直解，万历十七年安徽歙县程涓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4.《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十二卷》，宋胡继宗编辑、明陈玩直解，万历十九年福建建阳书林郑世豪宗文书舍刊本。(国家图书馆)

5.《新锲清讹训解标类书言故事十卷》，宋胡继宗编辑、明陈玩直解，万历二十四年刘龙田刊本。(和刻本类书集成)

6.《屠王二先生参补注解书言故事一览抄六卷》，胡继宗编辑，万历二十五年书林叶顺檀香馆刊本。(国家图书馆)

7.《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十二卷》，宋胡继宗编辑、明陈玩直解，万历二十八年福建建阳书林郑氏宗文堂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国家图书馆)

8.《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十二卷》，宋胡继宗编辑、明陈玩直解，万历二十八年福建建阳书林郑世豪宗文书舍刊本。(国家图书馆)

9.《鼎锲全补音注书言故事类编十二卷》，宋胡继宗编辑，万历二十九年福建建阳书林陈耀吾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10.《新刊训解直音书言故事大全六卷》，胡继宗编辑，万历三十四年江苏金陵三山街书林唐氏世德堂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11.《屠王二先生参补注解书言故事一览抄六卷》，胡继宗编辑，万历三十五年江苏苏州叶顺檀香馆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12.《新镌类编明解正音京版书言故事十卷》，万历三十六年福建建阳书林郑云林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13.《新锲类编明解正音京板书言故事十卷》，万历三十六年书林刊本。

(浙江图书馆)

14.《新镌名公释义全备墨庄书言故事六卷》,明呰窳子撰,万历江苏吴县书林陈长卿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15.《新隽京版校正绘像标题分类释注书言故事八卷》,宋胡继宗编辑、明许獬注,万历福建建阳书林詹氏进贤堂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16.《新锲正伪训解标类书言故事大全十卷》,宋胡继宗编辑、明李廷机释,万历福建建阳书林余云波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17.《鼎锲全补音注书言故事类编十二卷》,明胡继宗、朱之蕃编辑,万历福建建阳书林陈德宗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18.《锲注释增补书言鱼仓故事十卷》,明赵师圣撰,万历福建建阳书林陈云岫积善堂刊本。(日本东京文化研究所藏)(《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

19.《新隽名公释义全备墨庄书言故事六卷》,明呰窳子辑,万历福建建阳书林黄灿宇刊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国家图书馆)

20.《新刻名公释义全备墨庄书言故事六卷》,明呰窳子撰,明刻本。(国家图书馆)

21.《书言故事大全十二卷》,宋胡继宗编辑,明刻本。(国家图书馆)

22.《新锲类解官样书言故事八卷》,庐陵胡继宗辑、温陵张瑞图校,万历福建建阳刘龙田刊本。(和刻本类书集成)

23.《新锲京板正绘像标题分解释注书言故事八卷》,宋胡继宗编辑,明许獬注,明书林进贤堂刻本。(华东师大图书馆)

24.《新锓增补万锦书言故事八卷》,庐陵胡继宗编辑、临川饶正卿汇正、金溪徐心鲁精录,明刻本。(和刻本类书集成)

25.《新锲正讹训解标类书言故事十卷》,宋胡继宗编辑、明陈玩直解,明余云波刊本。(和刻本类书集成)

以上所得共25本,但相较于此书在明代流传的真实状况,本文揭示的仅为冰山之一角。何者?原因之一是该书历来不被重视:阅读者以其为启蒙读物,读完即“弃去”,并未要好好珍藏,众多的版本与屈指可数的文献著录之矛盾即是证据;研究者以其为“小儿科”,故往往抹杀,很少提及,更谈不上专门研究,甚至直到今天,这种轻视也未彻底改变。原因之二是此书多

为福建建阳坊刻，建阳刻本质量不高，甚为明清两代藏书家所诟病，福建长乐人谢肇淛即曾批评道："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①]故因版本质量之原因而遭舍弃，刊本散佚程度严重。况且，即便是流传至当世，但基于各种原因的散佚也很严重，姑举一例。1958年，李一氓先生在北京收购到三本《书言故事》，分别是六卷、十卷、十二卷本[②]，但其中的天启本《新锲校正训释题类书言故事十卷》，不见于国内的文献记载。有鉴于斯，《书言故事》的明刊本应远远多于上文所列。

尚需说明者有二。一是以上所列仅限于大陆文献。此书的海外流传本不在少数，仅长泽规矩也先生在《和刻本类书集成序》中所及即有五个本子，而这应该只是日本流传本中的一部分。由于能力所限，尚不能及于此书的其他海外流传本。二是由于不能遍观该书的所有版本，故所列存在重复的可能。如第六与第十一、第十二与十三、第十五与二十二等即有可能为重复。但出于尽可能全面记录的考虑，姑且放宽收录标准，所得即如上所示。

三、流变

《书言故事》的版本，约略而言，有十二卷本、十卷本、八卷本、六卷本等四种，大致可以概括此书在明代传播流变的风貌。

十二卷本是明刻本中最多见的，但极有可能不是此书的原始样貌，相比较而言，十卷本更有可能是最早版本，依据乃其见于目录记载的卷数皆为十卷本，高儒《百川书志》、《宋史艺文志补》皆作是言。二者的差异，据长泽规矩也先生所见，十卷本只在编次上与十二卷本略有出入，而没有整个分类的缺漏。长泽先生据此就得出的结论："明末的十卷本，是据此十二卷本编成的"[③]，事实上是难以成立的。事情的真相乃十二卷本是在十卷本的基础上拆分而成的。八卷本在内容上比十二卷本要少，是后者的"缩略版"。六卷

① 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67页。

② 所记见于国家图书馆所藏《新刻名公释义全备墨庄书言故事六卷》书末，李一氓先生的批注中。

③ [日]长泽规矩也编辑：《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三册，第2页。

本的情形分两种，一是十二卷本的全本，只不过将后者的两卷合为一卷，如《新刊训解直音书言故事大全六卷》；二是对十二卷本的重新修订与编排，如《屠王二先生参补注解书言故事一览抄六卷》、呰窳子撰《新镌名公释义全备墨庄书言故事六卷》两种，乃《书言故事》传播中极重要的“变相”，值得特别关注。

《屠王二先生参补注解书言故事一览抄六卷》（以下简称“参补本”）一书，标题中的“屠王”，指的是屠隆与王稚登，因为该书卷一末尾有“东海屠隆参补，太原王稚登参订”的记述。但这并不代表屠、王二人曾与事其中，倒更有可能是书商“以相号召”的幌子。这本书的真正编撰者，是题为“云庄光宇父”的人，据卷末所署“莆阳云庄黄光宇校”，则黄光宇即“云庄光宇父”。黄光宇，生平不详，由“莆阳”二字，可知其应是福建人。明代福建建阳黄姓的书商很多，如黄秀宇、黄灿宇、黄耀宇等，从姓氏和排行来看，黄光宇极有可能与他们是同宗、甚至是兄弟关系。

黄光宇在《题参补书言华句引》一文中曾略述成书原因：

> 甚哉，词命之难也！非有博洽之才则难以实，非有瑰玮之才则难以华。唯是《书言》一书，出于庐陵胡君所纂，安成陈君注之，上下凡数十载。不佞为博士弟子时，每有渔经猎史之趣，窃恨此一书，典故虽具，挂一漏万，编次浩繁，艰于批阅，致观者皓首没齿作老蠹鱼，竟未睹其恢恢也。是年春，余稍暇，始参补为二十门，门各类，条分缕析，柄若日星。又加以华句，如晬盘示儿，何所不有为观者采焉？因付之剞劂氏。[①]

从上文所述可知，在传播过程中，《书言故事》内容庞杂，不便观览的缺点越来越显著，迫切需要一本“精选版”来应对市场需求，此为“参补本”出现的一个原因。而所谓的“又加以华句”，则是应对市场的另一个需求：指导运用。对读者而言，知道典故、成语的意思与出处，虽然可以提高学养，但并不

① 《屠王二先生参补注解书言故事一览抄六卷》卷首，万历二十五年书林叶顺檀香馆刊本。

等于可以灵活运用。因此，更有指导性和示范性，教导读者将词语活用起来的书，成为市场的新需求。综合以上两点，对《书言故事》的"改版"势在必行。而这些也是"参补本"的特色所在。

"参补本"没有黄光宇所宣称的二十门，实际是一卷一门，只有六种：通讯门、交情门、庆贺门、仕宦门、人品门、儒学门。每门中又将《书言故事》原书的相关内容作归类合并，条理更清晰，查找更方便。如"庆贺门"分贺寿、贺第、贺婚、贺生子四种，"贺寿"中又有圣寿、寿诞、寿考三种。

加入与所列词语相关的"华句"，即名人名言，是"参补本"区别于原书的重要标志。本文所见《屠王二先生参补注解书言故事一览抄六卷》一书中，"华句"以眉批的方式出现于词条的上方。如：

"芝兰玉树"的上方有："王百谷语：兰芽玉树，日渐青葱"；

"通家"的上方有："王百谷语：以羔雁藉而踵门下，称李膺通家子，何幸何幸"；

"间阔类"上方有："王百谷语：别足下已易腊矣；屠赤水语：不面足下，五易星历；汪南溟语：海云嗟我，不胜搔首"。

标为王百谷、屠赤水、汪南溟的言辞，同样也不是一定出自王穉登、屠隆、汪道昆之手，更有可能是编撰者黄光宇的"代劳"，提这些人的名号，目的是增加书籍的号召力，为提高销量服务。从"华句"的内容来看，所指导的是表达，既有书面表达——文章写作，也有口头表达——接洽谈吐。这样一来，无疑扩大了《书言故事》的受众面，使之不仅针对接受正规教育的"小学者"、"大学者"，而且还针对粗通文墨、有应酬交际需求的普通市民。

寇子所辑《新刻名公释义全备墨庄书言故事六卷》（以下简称"墨庄本"）、《新隽名公释义全备墨庄书言故事六卷》两书，实为同一本书的不同刊本。"墨庄本"在内容上也是《书言故事》的"精选"，而且经过重新编排，这一点与"参补本"的情形相同。

"墨庄"一词，《书言故事》卷三有释义："多文为富号墨庄"，即形容学识丰富；而用于书名中，则专指名人书信。如《新隽名公释义全备墨庄书言故事六卷》卷首有"采辑名公交际捷柬"、"显宦飞鸿名公表启"、"彩翰佳音"、"名公锦笺"、"芝兰翰墨"、"献酢珍札"等溢美之辞，目的仍在广告宣传，为扩

大销售服务。从“参补本”到“墨庄本”，编撰者的取舍一目了然，逐步强化的是表述、尤其是书信写作的指导性。这正是受到了晚明出版风气影响的结果——书信汇编类书籍的刊刻蔚然成风。

“墨庄本”在版式上分上下两栏，下栏为词条解释，上栏为名人书信。总体来说，选择的书信与词条的关联性较弱，或基本无关。而信柬内容，亦多为编撰者所杜撰，并非真正出自名人之手，但文采上略有可观，兹举两例：

> 令郎继坤固卓荦丈夫子，将来应作萧相国后身。过庭时须烦加督率，使淬砺全锋，以成大捷，则翁家殊有龙凤哉。——王凤洲
>
> 足下去楚遂如黄鹤，游子不悲故乡，如深闺思妇何？昔唐人赋《闺怨》云：“深闺少妇不曾愁，镇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谨录以呈足下。足下览之，得不惨然动归心，而使乐昌镜合耶？望之，望之。——钱谦益

上引两封书信，除文字通顺、言辞恳求外，文学色彩也较强。“萧相国”、“过庭”、“黄鹤”、“《闺怨》”、“乐昌镜合”等事，或引经据典，或征引诗词，都适当地卖弄了一下学识和修养，让写信人显得很有面子。须知，这种浅薄的做法，往往是那些实际文化水平不高、但需要附庸风雅的市民所为，真正有学识的人是不屑如此的。如明末拟话本小说中就曾有类似的记述，一位不通文墨的土财主，在儿子中举后为社会交际而烦恼：“只是我若做了封君，少不得要常去拜府县，不知帖子上该写什么。”[①]一个连名帖都不会写的人，于书信更是一窍不通了。而这些分门别类的书信，正可解除此类市民的交往苦恼，如王世贞的信，只需改换一下“令郎”的名字，即可转用，适用范围是塾师；钱谦益的信，更换一下远游之地、落款，即可用来问候远行的朋友。晚明此类实用性的文学作品需求量很大，也有名家真正染指其中的，如冯梦龙就曾编写过《折梅笺》一书，专门教人写信。而《折梅笺》的编撰目的、服务对象，与“墨庄本”上栏的功能指向基本一致。

---

① 天然痴叟：《石点头》第二回《卢梦仙江上寻妻》，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四、消亡与被替代

在《书言故事》的传播中，有两个时间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刊刻的兴盛期——明代的万历年间，由前文所述可知，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该书的不少"变相本"——目前所见至少有"参补本"和"墨庄本"两种；二是刊刻的消亡期——明崇祯以后，今见文献中，最晚明确的刊刻时间是李一氓先生所见的天启本。而且，在存世的刊本中，没有见到清代的本子；清人的著述中，也少见对《书言故事》的记载与评述。亦即，《书言故事》的传播主要集中于明代中后期的二百年左右。

事物的出现、兴盛与消亡都有其内在的原由，《书言故事》的传播亦是如此。从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其繁荣之时就埋下了衰败的因子。

"参补本"和"墨庄本"的出现，乃书商逐利的结果。市面上流行"华句"了，书商就将《书言故事》精简、拼凑出一本"参补本"；等到流行"名人翰墨"了，又将《书言故事》削枝减叶，出一本"墨庄本"。如此做法，一时的兴盛是实现了，销售也旺盛了，但对《书言故事》传播的遗害却是巨大的。这也反映出明代书商对童蒙出版物处置的随意性，以及经营过程中的短视与急功近利。因为对市场的"适应"，是以消弭自身特色为代价的。结果，《书言故事》的内容越刻越薄、越来越少，而所谓的流行的"华句"和"名人翰墨"等装饰物却越来越多，篇幅越占越大。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做法妨碍了《书言故事》长久而完整地传播。后来该书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直至消逝，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书言故事》刊刻和传播的兴盛，对明代蒙书市场的刺激巨大。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很多书商都染指该书的刊刻，以此来瓜分利益，从苏皖的苏州、吴县、金陵、歙县、宣城，到福建建阳的众多书坊，都竞相出版。但是，就在绝大多数人以刊刻的方式来分得蒙书市场的一杯羹的时候，有人却另辟蹊径，以编撰、出版类似新书的方式，投入到市场竞争之中。这其中虽有不得已之原因（将详于下文），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不失为更加高明的手段，如萃庆堂出版邓志谟所编的《白眉故事》与《黄眉故事》。

邓志谟，江西饶安府人士，字景南，号竹溪散人、百拙生，曾长期游食于

福建建阳,“为建阳余氏塾师,故所著书多为余氏刊行”[1]。邓志谟在建阳余彰德、余泗泉家中教授子弟,与父子俩关系都很密切。坐馆之余,应主人之请,编辑书稿供其刊刻牟利,是很自然的事。有意思的是,为了增加《白眉故事》的权威性与神秘性,邓志谟极力隐瞒自己是该书的编撰者,而是伪托于苏州人许以忠[2];倒是署名董其昌的文章一语道破:“先是百拙生有《白眉故事》一集,烨烨然为世珍”[3],这种遮掩、躲避的行为方式,正说明《白眉故事》的编辑问世,不是出于邓志谟扬名显姓的主观诉求。

《白眉故事》、《黄眉故事》二书,从内容的选择到编撰的方式,都与《书言故事》极相似,即将典故、成语以词条的方式分类编辑,引述原文、解释涵义、阐明使用。但具体而微,又略有不同:词条更多,如《白眉故事》有 280 类、2522 条,超过了《书言故事》的 1979 条;词条收录更符合时代要求,如对金银珠宝词条的编辑,《书言故事》之第十二卷有“金宝类”,词目为 10 个,《白眉故事》之卷十有《珍宝部》,分金、银、珠、玉、钱、锦 6 类,计 31 个词条,更能满足富裕社会里的民众对此类知识的需求。

《白眉故事》现存最早的刊本是万历二十七年余彰德萃庆堂的《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十卷》[4],这正是《书言故事》刊刻火热的时期。但令人称奇的是,《白眉故事》很快被市场接受,甚至销售红火,以至于萃庆堂多次出版,现存有该书坊万历三十五年、万历四十三年等多个本子。该书的试验成功,有力地鼓励了编撰者与出版者的合作热情,趁热打铁地推出了类似的书籍——《黄眉故事》。此书现存的较早刊本有万历四十二年、万历四十四年的本子,亦皆由萃庆堂出版。

建阳余氏萃庆堂在蒙书刊刻方面一直都很积极,除上述两部书以外,尚有音韵、《汉书》、秦汉六朝文选等方面的书籍,但却没有热销书籍《书言故事》的刊刻记录。按照常理,余彰德不可能不知道《书言故事》,也不可能不对其中的巨大利益动心,但为什么没有分一杯羹?更合理的解释是,建阳的

① 孙楷第编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5 页。
② 邓志谟:《故事白眉弁言》,《精选白眉故事》,台湾天一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③ 董其昌:《序故事黄眉首》,《邓百拙先生汇编黄眉故事》,经济堂梓行,光绪丁丑重刻本,第 1 页。
④ 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9 页。

郑氏是此地蒙书刊刻的最大集团,其在万历前期对《书言故事》在建阳的刊刻形成垄断,所言的依据乃郑氏的版权意识。以万历十九年郑世豪的刊本为例,这本书的"目录"之后有"识语",说道:

> 兹集也,本堂恳请翰林九我李公再四考证、辨注,分类明白,庶无一句之差、一字之讹……收书君子当于未序,认之以"鳌头独占",庶知玉石之有辨也。[①]

即提醒买书者认清"宗文书舍"的版本,告诉读者只此一家是"正版",才有质量保证。这样的"宣告"在明代坊本书籍中并不少见,但运用在《书言故事》的刊刻出版中,只此一家。引文中提到的"鳌头独占",乃郑氏特殊的长方形出版徽记,中绘鳌龙之图案,两旁有联:"头角峥嵘神化升腾鳌龙上"、"笔花绚彩光芒直射斗牛间",顶部有记:"买者请认鳌龙为记"。它在实际销售中起到了一定的防伪和打假作用,可以在区域范围内形成排他性,从而取得竞争的优势。正是因为有实际效果,所以这一徽记被郑世豪一用再用,在他的众多刊本都可见到。也正是缘于这样的竞争背景,萃庆堂的余彰德不得不另寻出路,为自己在蒙书刊刻的竞争中争取真正的主动,于是就有了《白眉故事》和《黄眉故事》的问世。

从长远来看,余彰德是这场竞争的胜利者,因为明代以后,《书言故事》几乎不为人所知,"故事类书"的翘秀乃《白眉故事》;而且清人对此书的推崇态度,也远胜明人对《书言故事》的重视不足。如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1618—1683)即认为,此书在启蒙教育中作用显著:"且日授掌故,如《白眉故事》之类,散金碎玉,后来都可资博雅。一失此时便不能强记,我辈今时所引用,半是童子时父师所授,炯炯不忘耳。"[②]清人还认为,此书对科举亦有帮助,魏学诚在勉励落第的侄儿时,有"五经、八大家、《通鉴》、《白眉故事》,皆所当意矣"[③]之语,足见文人之重视。

---

① [日]长泽规矩也编辑:《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三册,第8页。

② 施闰章:《寄沈元珮》,《学余堂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第1313册,第358页。

③ 《国朝魏文毅公手札》,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2册,第253页。

综上所述,《书言故事》从注释出版到刊刻、“变相”,以至于被取代,每一步的发展变化都与书商的参与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书商决定了此书的生存面貌、流传方式以及传播时长。这在明代童蒙书籍的传播中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普遍现象的缩影。它提醒研究者,作为市民文人的书商,在蒙书刊刻与传播中有积极作用,这是不该无视的;但其基于牟利目的之立场,是难以真正维护典籍的文化价值,使其流传不衰的。同时,由于童蒙书籍权威性的不足,故而明代书商随意处置典籍的历史特性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辨明这些,对厘清蒙书发展演变的脉络、客观评述书商在文化传播史上的贡献等都有一定帮助。

提　要:《书言故事》是成书于宋代的故事类童蒙书籍,但却在明代中后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此书的点校出版、“变相本”的出现,以及最终被取代,都与出版商的价值取向有关。本文考察的重点即是:书商如何决定了《书言故事》的生存面貌、流传方式和传播时长。

关键词:《书言故事》 童蒙 书商 明代

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

常思春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1161)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下称“陈八郎本”),上世纪80年代初曾影印三百部行世,为学界研读此书提供了便利。或许是受前贤鄙薄五臣注的影响,学界留意此本者尚少,探究之文寥寥,其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尚为迷雾笼罩。笔者近年校读《文选》传本,于陈八郎本略有所得,这里谈点管窥之见,供研治《文选》者参考。

一、陈八郎本抄配来历

影印陈八郎本书首有王同愈民国八年(1919)三月手书收藏“跋”文,书尾有郑骞1981年10月为影印本所作“跋”文。王同愈“跋”云:

> 宋刻单行五臣注《文选》三十卷,叶二十四行,行二十三字。前有开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吕延祚所上表及高力士所宣口敕,又“绍兴辛巳龟山江琪咨闻”及“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家善本”两

木记。字体清朗阅目,洵为宋椠上驷。宋讳如玄、敬、殷、桓、让、徵(见目录)、朗、构、鷩(西都赋)、贞、匡、謍(西京)、桢、赪(吴都)、祯、檠、恒(魏都)、构(笛赋)皆阙笔。……原为汲古阁物,有毛奏叔收藏印,后归传是楼,有徐健菴诸印。……光绪癸卯(1903),得诸蒋香生家。……书内红笔狼藉,亦出宋人之手,凡宋讳嫌名如悬(序)、树、署(西都)、完(东都)、贞、郭(西京)、构、彀、勖、慎(东京)、莞(南都)、旭、赪、纨(吴都)、丸、锥(魏都)、爣(甘泉)、炯(藉田)、敦、句(鲁灵光)等字皆有红圈,当为宁宗时人读本。……宋刻宋印而又宋读,真人间奇书也。

郑骞"跋"云:

右五臣单注本《文选》三十卷,宋绍兴辛巳建阳刊。竹纸,纸色暗黄。卷一至卷四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注文小字双行、行二十八字;自卷四以下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五字,注文行二十八至三十字不等。版心白口,双黑鱼尾;上象鼻有大小字数,偶或无之;无刻工姓名。今本分十六册,金镶玉装。卷二十一至二十五抄配,其余各卷零星抄配约三十页。书前有戳记二,其文如下:

凡物久则弊,弊则新。《文选》之行尚矣,转相摹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多,所谓久则弊也。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致证的无舛错,其亦弊则新与!收书君子,请将见行板本比对,便可概见。绍兴辛巳,龟山江琪咨闻。

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善本。

江、陈事迹无可考,观其文字,皆坊肆书贾也。书中避宋讳及嫌名,至高宗之构字为止,孝宗以下不避,可知确为绍兴刊本。……全书字体挺秀,清朗阅目,乃建刻之佳者。抄配字迹亦精整可观,版式行款与其他各卷一致。此书不见藏书家著录,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有之,今此本无钱氏印章及题识,知非也是园故物。书中收藏印,最早为明末汲古阁之毛表奏叔、清初传是楼之徐乾学健菴,

最晚为近人元和王同愈胜之、吴县吴清湖帆、及乌程蒋祖诒穀孙。书前有胜之手书长跋,湖帆题记两行,二君皆近代苏州名士。……此书今归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穀孙何时转让,已不可考,当在渡海来台之前。此书不仅为宋刊宋印宋读之佳槧,且为全帙具存之孤本,洵鸿宝也。……

二家"跋"文对陈八郎本版式、木记、缺笔讳字、抄配、收藏变迁及木记、讳字提供的校者、刊者、刊印时地介绍详悉。但二家仅着意于宋刻可贵,对陈八郎本的特殊之处及木记中校者江琪交待此刻底本之"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考正"一语则无考论,未能揭示出陈八郎本的真正价值,又对抄配的来历未明而谬谓"全帙具存"。

陈八郎本中抄配分量不小: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共五全卷为抄配;卷三十原刻仅存三叶又四半叶,馀为抄配;卷六末叶、卷十二末叶、卷十八末叶上半叶、卷十九首六叶、卷二十七第十四叶为抄配;尚有原刻叶中填补断烂之局部抄配。书中最早收藏印为清康熙时收藏家汲古阁毛表、传是楼徐乾学,其抄配之五全卷及卷首卷尾为抄配者,仅有清末蒋凤藻及民国王同愈、蒋祖诒收藏印,而无汲古阁毛表、传是楼徐乾学收藏印,则其抄配当是蒋凤藻收藏时所为。王同愈收藏时已是抄配本,然其"跋"称"宋刻单行五臣注《文选》三十卷",只字不提书有抄配。郑骞"跋"介绍了抄配卷叶,而仍称"为全帙具存之孤本"、"五臣全帙"。傅刚《文选版本研究》谈影印陈八郎本大抵是信从王、郑二家"跋"文的"全帙具存"说,不提书有抄配,而谓"该本为三十卷完帙"、"为现存唯一宋刊五臣注全本"[①]。三家皆以抄配卷叶与原刻等观,或是以抄配卷叶"版式行款与其他各卷一致"(郑骞"跋")及有避宋讳字而视为据原刻同板印本影抄(卷三十抄配叶中弘、敬、竟、殷、贞、桓等宋讳字缺笔)。笔者校读影印陈八郎本,发现原刻卷叶加注之处及各条注文内容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分藏南宋建炎三年前杭州开牋纸马铺锺家刻五臣注《文选》卷二十九、卷三十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明正德四年朝鲜刻

① 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70、253页。

五臣注《文选》基本一致(注文字句略有相异)[1],而抄配卷叶加注之处及注文内容则与二本颇多歧异,抄配之注文不乏遗漏(二本有)且杂有大量李善注。考其抄配卷叶实为据六臣注赣州本系统之本(似为明翻元陈仁子本)抄录:抄配卷叶加注之处与六臣注赣州本全相一致[2];六臣注赣州本删五臣注标"某同善注"、"五臣注同"之条,抄配即直采李善注充五臣某注;六臣注赣州本删五臣注条中一节标"馀同善注"之条,抄配即并李善注入五臣某注或佚其所删之节;六臣注赣州本删五臣注而未标"某同善注"、"五臣注同"、"馀同善注"之条,抄配即无其所删之条之节。下举陈八郎本抄配之卷二十一、卷二十二中注文较简短的几条与六臣注赣州本同条作一比较,以明所见不虚。

例 1　魏文帝《与吴质书》题下注

陈八郎本抄配　济曰:《典略》曰:初徐干、刘桢、应旸、阮瑀、陈琳、王粲等与质并见友于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故太子与质书。

六臣注赣州本　善曰:《典略》曰:初徐干、刘桢、应旸、阮瑀、陈琳、王粲等与质并见友于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故太子与质书。济同善注。

陈八郎本抄配此条,显然是以六臣注赣州本标"济同善注"即采李善注充五臣济注。六臣注明州本(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宋本。下同)、六臣注朝鲜活字本(韩国奎章阁影印本。下同)存济注此条及朝鲜刻五臣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全文影像资料库"影像本。下同)此条作:

济曰:是时魏都疫病,诸友多死,故与质此书叙情也。

---

① 明正德四年朝鲜刻五臣注《文选》,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影像本。

② 六臣注赣州本,南宋绍兴年间赣州州学编刻,国家图书馆藏两部。《四部丛刊》影印宋建州刻本为翻赣州本,2002 年,第 1082 册,第 253 页。

例 2　魏文帝《与锺大理书》题下注

陈八郎本抄配　　铣曰：颍川长社人也。《魏志》曰：锺繇字元常。魏国初建，为大理。《魏略》曰：后太祖征汉中，太子在盟津闻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索，使临淄侯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太子与繇书。

六臣注赣州本　　善曰：《魏志》曰：锺繇字元常。魏国初建，为大理。《魏略》曰：后太祖征汉中，太子在盟津闻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索，使临淄侯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太子与繇书。铣曰：颍川长社人也。馀同善注。

陈八郎本抄配此条，显然是以六臣注赣州本标"馀同善注"即合并李善注入五臣铣注。六臣注明州本、六臣注朝鲜活字本存铣注此条及朝鲜刻五臣本此条作：

铣曰：锺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为大理时，文帝为太子，在盟津闻繇有玉玦，愿得而难公索，使弟子建因人说之，繇即送玦，太子作书与之尔。[①]

例 3　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题下注

陈八郎本抄配　　曰：臧荣绪《晋书》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辅政，都督扬州诸军事，进位征东大将军。又曰：太祖遣徐劭、孙郁至吴，将军石苞令孙楚作书与孙皓。劭至吴，不敢为通。

六臣注赣州本　　善曰：臧荣绪《晋书》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辅政，都督扬州诸军事，进位征东大将军。又曰：太祖遣徐劭、孙郁至吴，将军石苞令孙楚作书与孙皓。劭至吴，不敢为通。五臣注同。

---

① 明州本六臣注《文选》，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宋本，昭和五十年(1957)。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韩国奎章阁影印本，1996 年。

陈八郎本抄配此条，显然是以六臣注赣州本标“五臣注同”即采李善注充五臣注；又显然是六臣注赣州本标“五臣注同”，未出五臣注者之名，故抄配缺注者名而只称“曰”。六臣注明州本、朝鲜活字本存五臣注此条及朝鲜刻五臣本此条作：

济曰：太祖辅政，石苞领都督扬州诸军事。太祖使徐劭至吴，苞令参军孙楚作书与皓也。

陈八郎本抄配卷叶注文与六臣注明州本、朝鲜活字本及朝鲜刻五臣本所载五臣注歧异及杂入李善注之条之节，皆如上举三例，与六臣注赣州本标“某同善注”、“五臣注同”、“馀同善注”（或失标）全相对应。陈八郎本抄配卷叶实未可与原刻等观。学界谈陈八郎本者皆称“全帙具存”，以抄配与原刻混为一谈，使陈八郎本的版本价值光辉被抄配卷叶掩盖，故这里揭其事实，以澄清是非。

二、陈八郎本木记所云“监本”、“古本”考

陈八郎本书前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后载有二木记，前引郑骞“跋”已具二木记全文。王同愈“跋”及郑骞“跋”皆仅留意于二木记提供的校者、刊者及刊印时地信息，于木记中校者江琪交代此刻底本之“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考正”一语则皆避而不论。木记“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一语提供了陈八郎本至为珍贵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信息，陈八郎本的诸问题及特征皆由此语能得到合理解释。学界谈陈八郎本者，唯傅刚《文选版本研究》论及木记“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一语：

陈八郎本属建刻，在它之前杭州马铺钟家亦刻有五臣注本，今存二十九、三十两卷，然两相对校，歧异甚多，可见不是一种出处。陈八郎本前所载江琪木记说他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考正，所以与“见行版本”不同。江琪所说“见行版本”或即杭州本。惟宋国子监仅

> 刻印过李善注本,江琪称他以监本与古本参校,当即以李善本与古写本参校,因此陈八郎本多与李善本同,而与六臣本不同。今见明州本、建州本校记所称"五臣作某"往往与陈八郎本不合,而与杭州本合。明州本早于陈八郎本,自当不合;建州本具体年代不详,若如张元济所说刻于庆元时,其与陈本不合,则说明刻书者所见五臣本非陈八郎本。陈八郎本之前已有杭州本,但刻书者不遵杭州本,却以李善本与古写本参校而定新五臣本,当是一种商业行为。[①]

傅刚以陈八郎本木记中江琪所云"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之"监本"指为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校刻之李善本,谓陈八郎本是"以李善本与古写本参校而定新五臣本"。此解殊谬,且否定了陈八郎本的版本价值。检其所云"陈八郎本多李善本同,而与六臣本不同"处,实则多是李善本、五臣本原同而为六臣本所据五臣本之讹误,此恰是陈八郎本的版本价值所在(陈八郎本亦有递修采李善本处)。陈八郎本木记所云"监本"指五臣本监本,乃北宋国子监就所藏五代西蜀毋昭裔刻五臣注《文选》板修板印者。下文略作考索。

《宋史·西蜀孟氏世家·毋守素传》载:

> 父昭裔,伪蜀宰相……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补三班奉职。[②]

由这条文献得知,毋昭裔仕王蜀、孟蜀时于成都家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三书(其刻《文选》当如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引陶岳《五代史补》所记在王蜀时,其刻《初学记》、《白氏六帖》或在孟蜀时),其子毋守素入宋,徙家宋京汴梁(毋守素为孟蜀重臣,孟氏降宋,守素以蜀中庄产茶园献出,宋太祖赐第京城),以三书板带到汴梁印行;大中祥符九年(1016),守素子克勤以三书板上献朝廷(《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著录钱惟演《玉堂逢辰

① 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70、253页。
② 《宋史》卷四七九《世家三·西蜀孟氏》,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

录》云："其载祥符八年四月荣王宫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余间，左藏、内藏、香药诸库及秘阁史馆，香闻数十里，三馆书籍一时俱尽。"母克勤于大中祥符九年献三书板于朝，当是祥符八年四月京城火灾，"三馆书籍一时俱尽"，朝廷征集图书以重实三馆，应诏所献）。这条文献是谈《文选》早期刻本皆要引述的，但于所载"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后的《文选》板着落则无探讨，笔者这里引述所留意者即在于其"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之载提供了陈八郎本木记所云"监本"的来历信息。

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七十五册《职官二十八之二》辑有一个文件：

> 天禧五年七月，内殿丞兼管勾国子监刘崇超言：本监管经书六十六件印板，内《孝经》、《论语》、《尔雅》、《礼记》、《春秋》、《文选》、《初学记》、《六帖》、《韵对》、《尔雅释文》等十件，年深讹阙，字体不全，有妨印造。昨礼部贡院取到《孝经》、《论语》、《尔雅》、《礼记》、《春秋》，皆李鄂所书旧本，乞差直讲官重看榻本雕造。内《文选》只是五臣注本，切见李善所注该博，乞令直讲官校本，别雕李善注本。其《初学记》、《六帖》、《韵对》、《尔雅释文》等四件，须重写雕印。並从之。

又《职官二十八之三》辑有一个文件：

> 天圣三年二月，国子监言：准中书劄子，《文选》、《六帖》、《初学记》、《韵对》、《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印板（书），令本监出卖。[1]

天禧五年（1021）七月刘崇超奏一个文件包含两项内容：一是奏请修补或重刻国子监管六十六件印板内"年深讹阙，字体不全，有妨印造"的十件印板；一是"内《文选》只是五臣注本"而奏请校刻李善注本。所奏请修补或重

① 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七十五册《职官二十八》，中华书局影印民国二十五年北平图书馆影印本，1987年，第2972、2973页。

刻的十件印板中之《文选》、《初学记》、《六帖》印板，无疑即是《宋史·西蜀孟氏世家·毋守素传》所载毋昭裔孙克勤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上进者；其云"内《文选》只是五臣注本"，是毋昭裔所刻《文选》为五臣注本。奏中于所举十件印板之《文选》板外的九件或言"重看榻本雕造"，或言"须重写雕板"，而于《文选》板未言处理意见，当是《文选》板破损未甚，修板即可重印。天圣三年(1025)二月国子监奏一个文件，当是国子监上报已成之书板，中书省下文令国子监印卖，列有《文选》，即五臣注《文选》修板成于其时(李善注本刻成于天圣七年，天圣九年始印行)。天圣九年(1031)国子监印行之李善注《文选》前有"国子监准敕"识语(见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书前)，则五臣注监本前亦当有"国子监准敕"识语。是北宋天圣年后，五臣注监本与李善注监本并行于世(自天圣末年至北宋亡，历九十馀年，二印板当递修刷印多次，今存李善注监本残卷即是一递修本。二印板当毁于北宋末兵火)。毫无疑问，陈八郎本木记江琪所云"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之"监本"，即是国子监修板印行之毋昭裔刻五臣注本《文选》。这个"监本"，对毋昭裔刻五臣注本《文选》板修板大抵做了三项工作，一是修补或重刻其"字体不全，有妨印造"之板叶，一是处理讳字，一是增刻总目(《文选》原无总目而分卷列目，日本古抄无注本、朝鲜刻五臣本即无总目。毋昭裔本当无总目，陈八郎本有总目，为承"监本")。

陈八本木记所云"古本"，指毋昭裔刻五臣本板归北宋国子监前印本(即毋昭裔刻五臣本板原板印本)。

明宣德三年(1428)朝鲜活字翻北宋元祐年间秀州州学编刻六臣注《文选》末载天圣四年(1026)沈严所作《五臣本后序》，此《后序》较详悉地记载了五臣本的三个早期刻本：

> 二川、两浙先有印本，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本粗而舛脱夥……今平昌孟氏，好事者也，访精当之本，命博洽之士极加考核，弥用刊正。旧本或遗一联，或差一句，若成公绥《啸赋》云"走胡马之长嘶，迴寒风乎北朔"，又屈原《渔父》云"新沐者必弹冠"，如此之类，及文注中或脱误一二字者不可备举，咸较史传以续之。字有讹错不协

今用者，皆考五经宋韵以正之。小字楷书，深镂浓印……時天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前进士沈严序。[1]

"二川"本无疑即指毋昭裔成都刻本；"两浙"本刻印　间及刻印者莫明，推其或是宋初江南钱氏刻，抑或是宋初杭州明教寺刻（方崧卿《韩集举正》记有杭州明教寺祥符二年刻本《昌黎先生集》，疑其刻韩集前曾如唐时佛寺以传抄《文选》为功德事而刻《文选》）；"平昌孟氏"本（平昌在今山东西北）为校正"二川"、"两浙"本"舛脱"之本，刊成于天圣四年九月，六臣注本所采五臣本即此本，建炎三年前杭州开牋纸马铺锺家刻五臣本（今存卷二十九、卷三十）、明正德四年朝鲜刻五臣本为此本递翻本。《后序》以"二川"本、"两浙"本合称"旧本"举其"舛脱"，所举成公绥《啸赋》差"走胡马之长嘶，迴寒风乎北朔"一联、屈原《渔父》差"新沐者必弹冠"一句，依其行文相承逻辑，成公绥《啸赋》例当承"二川"本言，屈原《渔父》例当承"两浙"本言。陈八郎本卷九成公绥《啸赋》即差"走胡马之长嘶，迴寒风乎北朔"一联，是非出偶脱而有所承。陈八郎本木记称"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考正"，是其成公绥《啸赋》差二句为承所据"监本"、"古本"来，即所据"监本"、"古本"皆差此二句，上文已考得其"监本"为仁宗时国子监修板印行之毋昭裔刻五臣注本，则其"古本"即是毋昭裔刻五臣注本的原板印本，此亦可证沈严《后序》所举"旧本"成公绥《啸赋》脱二句者为"二川"本即毋昭裔刻本。此例与上文所考"监本"来历恰相印证，足以揭示陈八郎本与毋昭裔本相承关系。

陈八郎本卷二张衡《南都赋》"圣皇之所保绥"一句，他本《文选》作"圣皇之所逍遥，灵祚之所保绥"二句，是陈八郎本脱"逍遥灵祚之所"六字，当与成公绥《啸赋》脱二句例同，亦为其所据"监本"、"古本"同脱，为承其所据"监本"、"古本"。以二脱例合观，可见出陈八郎本一尊其所据"监本"、"古本"，不以他本校补"监本"、"古本"脱遗。

陈八郎本卷一班孟坚《两都赋》末所载《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诸分题皆在各首文后；又卷十七屈平《九歌》六首、《九

---

① 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韩国奎章阁影印本，1996年，第1461页。

章》一首诸分题亦皆在各首文后，与杨守敬从日本带回古抄无注本《文选》同（见国家图书馆藏傅增湘校本），此乃古书旧式（如《毛诗》、《吕氏春秋》），亦无疑是萧编《文选》原式，而宋刻他本《文选》（明州本、赣州本、尤刻本）诸分题皆移于各首文前。又陈八郎本重语叠字下字多以小二表示（或连笔两点），如："明明"作"明二"、"光光"作"光二"、"琅琅"作"琅二"、"悠悠"作"悠二"、"巍巍"作"巍〈"、"翼翼"作"翼〈"、"炎炎"作"炎〈"等（注文中尤普遍），敦煌出土唐写本《文选》残卷、日本古抄本《文选》残卷、《文选集注》本残卷亦如此，此亦古书旧式，而宋刻他本《文选》（监刻李善本、尤刻本、明州本、赣州本等）则小二形式几绝迹。又陈八郎本颇多简笔俗体字，如：无、万、与、礼、乱、声、虽、蛮、变、宝、国、迁、尽等（注文中尤普遍），敦煌出土唐写本《文选》残卷、日本古抄本《文选》残卷、《文选集注》本残卷亦如此，而宋刻他本《文选》（监刻李善本、尤刻李善本、明州本、赣州本等）则罕见简笔俗体字。陈八郎本这些在宋刻他本《文选》已基本消失而见于唐写本及日本古抄本的特征，自是承袭其所据"监本"、"古本"即毋昭裔本来。

今存陈八郎本当是递修本。其卷二左思《蜀都赋》"经三峡之峥嵘，蹑五砺（山部）之蹇浐。戟食铁之兽，射噬毒之鹿。皛貙氓於蕶草，弹言鸟於森木。拔象齿，戾犀角。鸟铩翮，兽废足"，六臣本所出五臣本、朝鲜刻五臣本"浐"作"产"、"皛"作"拍"，"噬"、"貙"、"蕶"、"戾"、"铩"下有注音，"蹇产"下有一条 43 字注文，显然此处为递修取李善本所致；又其卷二十九潘安仁《马汧督诔》"我岳典宥，歇墓旌善"，朝鲜刻五臣本、六臣本所出五臣本作"我虽末学，闻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此处亦显然是递修之讹。

三、陈八郎本的文献价值

上文考明，陈八郎本是以北宋国子监就五代毋昭裔刻五臣本板修板印本之"监本"与毋昭裔刻五臣本原板印本之"古本"参校而来，所存 25 卷（卷一至卷二十、卷二六至三十），具有不见于宋刻他本《文选》而见于敦煌出土唐写白文本《文选》残卷及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残卷的一些特征，保存了毋昭裔本及《文选》原编的一些原始面貌（虽存有递修之讹，不过是文中足部

小节而已，皆可由《文选集注》本及今存他五臣本得以校正）。其版本价值至高，是至为珍贵的一个本子。《文选》原编三十卷，李善注本析为六十卷（非是以三十卷逐卷一分为二），五臣注本仍萧统原编三十卷。萧统原编三十卷本及五臣注本皆无完本存世，陈八郎本书前总目保存了毋昭裔本三十卷的完整卷目及宋刻李善本、六臣本遗失的“临终”、“难”、“移”三个类目（朝鲜刻五臣本存此三个类目），为复原萧统原编三十卷本及五臣注本缺卷提供了可靠的卷目及类目依据。陈八郎本不乏可校正今存五臣注本别本正文注文的讹误处。如：陈八郎本卷五潘安仁《射雉赋》“若夫多疑少决，胆裂心狷古县反”及注“翰曰：狷，怯也。復有此雉也”，六臣本所出五臣本、朝鲜刻五臣本即脱此一节正文注文。六臣本所出五臣本、朝鲜刻五臣本班固《两都赋序》“抑國家之遺美亦雅颂之亚也”句，其“國家之遺美”五字与下文“先臣之旧式，國家之遺美”句重复，陈八郎本无五字，知有五字者乃由下文衍入。以六臣注本所出李善本、五臣本异文校语核之陈八郎本，颇有李善本、五臣本原同而为六臣本所据五臣本讹误者。此举二例：六臣本王仲宝《褚淵碑文》“万物不能害其身”（杭州钟家本、朝鲜本同），校语云“善本‘身’作‘贞’”，引五臣注云“万物不能害其贞正之心”，由注文已可知作“身”乃讹，陈八郎本作“贞”为正。六臣本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缞粗非降杀之要”（杭州钟家本、朝鲜本同），校语云“善本‘降’作‘隆’”，引五臣注云“降，升。杀，降也”，由注文已可知正文注文作“降”乃讹，陈八郎本正文注文作“隆”为正。

陈八郎本正文与敦煌出土的唐写本《文选》残卷、日本古抄本《文选》残卷多同，与《文选集注》本所出五臣本亦多同[①]，不乏可校正宋刻李善本之讹误处。下举两篇校记以见之。

---

① 《敦煌吐鲁番本文选》，饶宗颐编，影印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文选集注》，周勋初辑《唐抄文选集注彙存》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左思《三都赋序》、《蜀都赋》校记

序号	尤刻李善本[1]（卷四）	日本古抄白文本[2]（冷泉家本）（卷二）	《文选集注》本（卷六一、卷六二）	陈八郎本（卷二）
1	赞事者宜本其实	“本”作“准”	“本”作“准”	“本”作“准”
2	郭灵关以为门	“以”作“而”	“以”作“而”	“以”作“而”
3	常晔晔以猗猗	“以”作“而”	“以”作“而”	“以”作“而”
4	其间则有虎珀	“珀”作“魄”	“珀”作“魄”	“珀”作“魄”
5	羲和假道於峻歧	“歧”作“岐”	“歧”作“岐”	“歧”作“岐”
6	卢跗是料	“跗”作“附”	“跗”作“附”	“跗”作“附”
7	原隰墳衍	“墳”作“填”	“墳”作“填”	“墳”作“填”
8	朱樱春熟	朱樱春熟	“熟”作“就”	“熟”作“就”
9	芬芬酷烈	“芬芬”作“芬芳”	“芬芬”作“芬芳”	“芬芬”作“芬芳”
10	其园则有蒟蒻茱萸	“园”作“圃”	“园”作“圃”	“园”作“圃”
11	觞以清醥	“清醥”作“醥清”	“清醥”作“醥清”	“清醥”作“醥清”
12	翩跹跹	“跹跹”作“仙仙”	“跹跹”作“仙仙”	“跹跹”作“仙仙”
13	珠贝氾浮	“氾”作“汎”	“氾”作“汎”	“氾”作“汎”
14	酌清酤	“清”作“醪”	“清”作“醪”	“清”作“醪”
15	景福肸饗而兴作	“饗”作“蠁”	“饗”作“蠁”	“饗”作“蠁”

上表所列15条是尤刻李善本与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集注》本的主要异文而陈八郎本同于二古抄本者。所出《文选集注》本为李善本、五臣本同者，陈八郎本全同。其中1、7、9、10、11、14六条当以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集注》本、陈八郎本为正。他条虽二作皆可，然多以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集注》本、陈八郎本为胜。

① 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影印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1974年。

② 日本古抄本《文选》卷二，《冷泉家時雨亭丛书》第七期第八十三回配本影印，朝日新闻社，2008年。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校记

序号	尤刻李善本（卷三一）	日本古抄白文本（卷十六，傅增湘、向宗鲁校记）	文选集注本（卷六一、卷六二）	陈八郎本（卷十六）
1	君在天一涯	君行在天涯	君行在天涯	君行在天涯
2	渥手泪如霰	“渥”作“握”	“渥”作“握”	“渥”作“握”
3	渊鱼犹伏浦	“浦”作“涌”	“浦”作“涌”	“浦”作“涌”
4	苍苍山中桂 团圆霜露色	“中山”作“山中”、“团圆”作“团团”	“中山”作“山中”、“团圆”作“团团”	“中山”作“山中”、“团圆”作“团团”
5	严风吹若茎	“若”作“枯”	“若”作“苦”	“若”作“枯”
6	去乡三十载		“三十”作“廿”	“三十”作“二十”
7	秋月照簾笼	“照”作“映”	“照”作“映”	“照”作“映”
8	潘黄门悼亡	“悼亡”作“述哀”	“悼亡”作“述哀”	“悼亡”作“述哀”
9	撫襟悼寂寞	“襟”作“衿”	“襟”作“衿”	“襟”作“衿”
10	永怀宁梦寐	“宁”作“寄”	“宁”作“寄”	“宁”作“寄”
11	驰马遵淮泗	“驰”作“驱”	“驰”作“驱”	“驰”作“驱”
12	青苔日夜黄	“苔”作“苕”		“苔”作“苕”
13	天下横雰雾	“雰”作“氛”	“雰”作“氛”（原讹“氣”，注作“氛”）	“雰”作“氛”
14	投袂既愤懑	“懑”作“满”	“懑”作“满”	“懑”作“满”
15	时或苟有会		“或”作“哉”	“或”作“哉”
16	感遇喻琴瑟	“喻”作“踰”	“喻”作“踰”	“喻”作“踰”
17	张廷尉杂述绰	“张”作“孙”	“张”作“孙”	“张”作“孙”
18	忧襟未能整	“襟”作“衿”	“襟”作“衿”	“襟”作“衿”
19	图史终磨灭	“磨”作“摩”		“磨”作“摩”
20	测恩跻踰逸	“踰”作“愉”		“踰”作“愉”
21	荣重餽兼金	承荣重兼金		承荣重兼金
22	涔泪犹在袂	“涔”作“零”		“涔”作“零”
23	岧亭南楼栖	“岧”作“苕”		“岧”作“苕”
24	王征君养疾 微	“微”作“徽”		“微”作“徽”
25	徙乐逗江阴	“乐”作“药”		“乐”作“药”
26	静默镜绵野	“默”作“然”		“默”作“然”

上表所列26条为尤刻李善本与日本古抄本、《文选集注》本主要异文。所出《文选集注》本诸条为李善本、五臣本同者（《文选集注》本此篇不全），陈

八郎本即全同。6、15两条,傅、向校日本古抄白文本未出校记,或二条日本古抄白文本与尤刻李善本同,而二条则以陈八郎本同《文选集注》本为是。此26条中4、6、16、18、21、22、24、26八条则尤刻本误而日本古抄本、《文选集注》本、陈八郎本为是。第6条《文选集注》本作"苦",当是"枯"字之讹,日本古抄本、陈八郎本为是。

由上举二篇校记见出,陈八郎本于《文选》的校勘价值、版本价值几可与《文选》古抄本比胜。

柳词与道教

王定勇

近读全真道士词，见王重阳“爱看柳词遂成”《解佩令》一阕，词云：

平生颠傻，心猿轻忽，《乐章集》，看无休歇。逸性摅灵，返认过，修行超越。仙格调，自然开发。四旬七上，慧光崇兀。词中味、与道相谒。一句分明，便悟彻、耆卿言曲。杨柳岸、晓风残月。[①]

王重阳于金朝大定年间创立全真派，“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虚无为内，以九还七返为实，以千变万化为权”[②]。柳词古来被视为“词语尘下”[③]、“浅近卑俗”[④]、“长于纤艳之词”[⑤]、“为风月所使”[⑥]，即使赞许他的人也不过

① 唐珪璋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8页。本文所引王词皆出此书，不另注。

②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344页。

③ 胡仔著、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54页。

④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唐珪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4页。

⑤ 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花庵词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3页。

⑥ 张源：《词源》卷下，《词话丛编》，第267页。

说他“声律谐美”[①]、“善于铺叙”[②]、工于长调。一个是浪子才人，一个是全真教主，似乎判若云泥，那么王重阳缘何“爱看柳词”甚至到了“看无休歇”的地步？王重阳词中已有解释，原因是“逸性摅灵”。而柳永《乐章集》“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③]，又是如何达到“逸性摅灵”的效果？王重阳对柳永的偏爱是独具慧眼，看出柳词个中真味，还是他对柳词的曲解、误读？经过仔细阅读了柳永的《乐章集》，发现柳词的确包含了不少“与道相谒”的内容。

一、柳永的游仙道情词与道教在北宋的传播

柳永先祖因宦游徙居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县）。五代战乱之时，柳永的祖父柳崇隐居于福建崇安五夫里的金鹅峰下。金鹅峰为道教名胜，“绝顶有仙坛及仙井、棋盘、插剑迹，又有石室，深广中有仙蜕”[④]。柳永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家乡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地处武夷山下。武夷山，道书称为升真化玄洞天，武夷君、皇太姥、王子骞十三仙人在此修道；“今之登山者，矫首于云际天半、悬崖断岩、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仙函、仙蜕、仙机、药瓶、丹鼎、钓竿之类，历千劫而不坏，皆确凿可据。”[⑤]柳永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道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居近武夷洞天，故其为人有仙风道骨”[⑥]。《乐章集》有《巫山一段云》五首联章咏道情，多用道家事典，寄寓游仙之意，具有浓厚的传统游仙诗的特色。引述一首：

清旦朝金母，斜阳醉玉龟。天风摇曳六铢衣。鹤背觉孤危。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相将何处寄良宵。还去访三茅。（五

① 胡仔著、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54 页。

②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 3783 页。

③ 胡仔著、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第 319 页。

④ 夏玉麟等：《嘉靖建宁府志》卷三。

⑤ 董天工：《武夷山志》。

⑥ 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0 页。

之三)[1]

去朝王母,居然醉于白玉龟台,醉游九天,竟觉在鹤背之上有些胆战心惊。天上人间,任尔驰骋。海蟾乃五代道士,俗姓刘名操,遇吕洞宾授以金液还丹之要修真成仙,全真道奉其为北五祖之一。民间传说将刘海蟾分开,称为刘海戏金蟾。这神仙世界的瑰丽奇诡、迷离惝恍,都离不开作者的想象,也离不开作者对道教故事的谙熟。

北宋自宋太宗以后,道教一直备受尊崇,"特别是神秘莫测的斋醮符箓,令人迷醉的星灯烟雾,令人神思的嘹亮仙乐,令人充满希望的丹鼎炉火,还有叫人顶礼膜拜的神签仙旨,更是能让人忘却心中那隐隐作痛的忧患。总之,尽管它粗俗鄙陋,但它以虚幻的力量支撑了更加虚弱的人的心理,给了他们以虚假的力量与自信。因此,上起皇帝,下至百姓,再一次掀起了崇道的高潮。"[2]尤其是真宗、徽宗两朝,道教更是风靡上下。《宋史·真宗纪二》载:"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守门卒涂荣告,有司以闻。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丁卯,紫云见,如龙凤覆宫殿。……六月乙未,天书再降于泰山醴泉北。……壬寅,迎泰山天书于含芳园,云五色见,俄黄气如凤驻殿上。"柳永《巫山一段云》则反映了这一事件:

> 琪树罗三殿,金龙抱九关。上清真籍总群仙。朝拜五云间。
> 昨夜紫微诏下。急唤天书使者。令赍瑶检降彤霞。重到汉皇家。(五之二)

此词明写汉武帝西王母事,实则写宋真宗"天书封祀"事。"重到汉皇家"即"天书再降"。词中"金龙抱九关"、"朝拜五云间"、"令赍瑶检降彤霞"等语,亦与史料相吻合。《巫山一段云》其五有"一曲云谣为寿。倒尽金壶碧酒。醺

① 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9页。本文所引柳词皆出此书,不另注。

②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

酣争撼白榆花。踏碎九光霞”之句,为“不食烟火语”[①]。

宋真宗好神仙,广延道士、方士之徒。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②];四月,“天书再降内中功德阁”;六月,“天书再降于泰山醴泉北”。此后屡设道场,两祭泰山,一祭华山。每逢祥瑞或灾异,即设道场祈祷祓禊。至天禧三年(1019)的十余年间,祈祷不绝。上行下效,致使“一国君臣如病狂然”[③]。《宋史·礼志十五》云:大中祥符元年,“以七月一日圣祖降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为降圣节,休假、宴乐并如天庆节。中书、亲王、节度、枢密、三司以下至驸马都尉,诣长春殿进金缕延寿带、金丝续命缕,上保生寿酒”。《宋史·真宗纪二》载,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真宗往泰山礼神,“命群臣享五方帝诸神于山下封祀坛,上下传呼万岁,震动山谷”。柳永有词纪之:

> 凤楼郁郁呈嘉瑞。降圣覃恩延四裔。醮台清夜洞天严,公宴凌晨箫鼓沸。保生酒劝椒香腻,延寿带垂金缕细。几行鹓鹭望尧云,齐共南山呼万岁。(《玉楼春》五之二)

柳词中所述“保生酒”“延寿带”“呼万岁”皆与史实相符,为时事实录。另一首《玉楼春》词曰:

> 昭华夜醮连清曙。金殿霓旌笼瑞雾。九枝擎烛灿繁星,百和焚香抽翠缕。香罗荐地延真驭。万乘凝旒听秘语。卜年无用考灵龟,从此乾坤齐历数。(《玉楼春》五之一)

此作实是“天尊降临”之实录。《宋史·礼志七》载,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述梦曰:

---

① 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1391页。
② 《宋史》卷七《真宗纪二》。
③ 《宋史》卷八《真宗纪三》。

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先闻异香，顷之，黄光满殿，蔽灯烛，睹灵仙仪卫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黄雾起，须臾雾散，由西陛升，见侍从在东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后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①]

对照史志，柳词所谓"夜醮"皆有所本。有学者以为"观此词所写谀神盛典与《宋史》记载无二，非亲历亲睹者莫能为"[②]，其实不然。真宗制造的"天书下降"、"天尊降临"，不仅当时大张旗鼓地进行封祀设醮，事后又"布告天下"[③]，不必亲历亲睹。而且柳永此时为布衣之身，又非道流，恐怕也没有条件亲历亲睹。毋庸置疑的是，柳永的游仙词、步虚词，跟宋真宗崇道有莫大关系。

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游仙词"条："诗有游仙，词亦有游仙。人皆谓柳三变《乐章集》工于闱帐淫媟之语、羁旅悲怨之辞。然集中有《巫山一段云》词，工于游仙，又飘飘有凌云之意，人所未知。"游仙题材，在诗早已司空见惯，在词却前代乏人，柳永有开创之功。《乐章集》中《巫山一段云》五首，始开词中游仙之例，其后却鲜有作者。

二、柳永的都市冶游词与道教享乐主义

如唐圭璋先生推测，柳永生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或雍熙四年(987)[④]，假设其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京师应举，至仁宗景祐元年(1034)登第时已

---

① 《宋史》卷一百四《礼志七》。
② 柳永著、薛瑞生：《乐章集校注》，第50页。
③ 《宋史》卷八《真宗纪三》。
④ 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与《论柳永的词》(《唐宋词学论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

48岁或50岁，“及第已老”[1]。可以大概推断，柳永考中之前一直滞留汴京，在失意无聊中度过了至少26年光景。

（一）夸饰都会与道教仙境描写

柳永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宋真宗天禧至仁宗皇祐的三十五年间（1017—1051），这个时代正是北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时期。东京久已成为“华夷辐辏，水陆会通”[2]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宋都城宏富繁丽的景象在柳永词里留下了华美的定格。

> 月华边。万年芳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透碧霄》）
>
>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破阵乐》）
>
> 皇都今夕如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玉楼春》五之三）

在柳永的眼里，富丽堂皇的帝京，跟琼楼玉宇的仙境毫无二致。神仙世界里的一切美好事物，在这个人间天堂应有尽有。钧天歌吹、祥烟灵沼、蓬莱阆苑、凤楼珠履令人眼花缭乱，直至分不清人间天上。在步入仕途、天涯羁旅之时，柳永无限向往地追忆那段梦幻般的生活，屡屡在词里把帝京称作“玉城”“神京”“瑶京”。

道教仙境源于古代神仙故事，形成“十洲三岛”之说。由于道教修炼多在名山大泽，预计把名山胜境演化为道教的“洞天福地”。道教所谓仙境，有在海上，有在陆上，有在天上，皆光怪陆离，匪夷所思。魏晋以降，仙境多世

① 宋翔凤：《乐府余论》，《词话丛编》，第2499页。
②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17页。

俗气息，不外乎宫阙崇丽，金碧辉煌，龙飞凤舞，仙乐悠扬。人间的帝京与天上的仙境有诸多相似之处，道教的仙境描写给了柳永很大的启迪。柳永在汴京生活最久，因此，对这个城市的岁时节令如元旦、上巳、清明、七夕、中秋、重阳等都有歌咏。《倾杯乐》咏帝京上元节：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茜。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羽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抃。顾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星汉银蟾、嘉气瑞烟、阆苑神仙，这些神仙意象的组合，使整个词的意境仿佛不是人寰是天上。柳永的足迹曾经涉及苏州、杭州等都会，均有题咏。咏杭州词云：

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二之二）

瑶台绛阙，皆仙人所居之府，此处谓杭人居处之华丽。歌咏都会，竟以神仙世界目之，这是柳永都会词的一个显著特征。道教神仙意象的穿插，使得词作瑞雾缭绕，仙音袅袅。宋人范镇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①]柳永把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夸饰如同仙境，自然不容他人置喙。

（二）冶游放荡与道教乐生主义

《文献通考·选举五》之《宋登科记总目》记载，1008—1033年间共开科十

① 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97页。

次。柳永或许并没有每次都应举，但是可以想见的是，他遭遇的科场失利远非一次两次。在应举不第的漫长时间，柳永是在秦楼楚馆中消磨度过的，“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柳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柳词中留下了冶游生活的真实写照：

太平世。少年时，忍把韶光轻弃。况有红妆，楚腰越艳，一笑千金可啻。向尊前、舞袖飘雪，歌响行云止。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长寿乐》）

向名园深处，争泥画轮，竞羁宝马。取次罗列杯盘，就芳树、绿阴红影下。舞婆娑，歌宛转，仿佛莺娇燕姹。寸珠片玉，争似此、浓欢无价。任他美酒，十千一斗，饮竭仍解金貂贳。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须信艳阳天，看未足、已觉莺花谢。对绿蚁翠蛾，怎忍轻舍。（《抛球乐》）

《宋史·石守信传》记载宋太祖之言：“人生驹过隙尔，不如不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至乾德五年，又诏示天下：“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屡丰，宜士民之纵乐。”[①]王莹《群书类编故事》卷九记载真宗“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乐”，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和怂恿之下，“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②]。高官显宦有官妓、家妓取乐，下层文人、举子、市民只有到歌楼妓馆去逐欢买笑。《东京梦华录》序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该书卷二对汴京的声色娱乐记录详明，此地妓馆林立，烟花如云。少年柳永来到遍布歌楼妓馆、勾栏瓦肆的繁华都市中，自然不免为其吸引而沉醉其中。其词云：

恋帝里，金谷园林，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日疏狂，未尝轻负，寸心双眼。（《凤归云》）

---

① 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五七，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1605 页。

②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89 页。

帝京的繁华给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了极佳的游乐环境,“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①]。柳永终日流连于烟花巷陌,狂歌痛饮,倚红偎翠,既出自心理失衡的背景,更源于一个充满诱惑的环境。

仙道贵生,道教将长生成仙作为最高目标和根本宗旨。《太平经》卷四十:“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②]道教不是把希望寄托于死后的天国或是佛、上帝的拯救,而充分肯定了今世的存在,承认现实享受和世俗欲望。在道教神仙境界里,人所渴望得到的一切:锦衣玉食的富足生活、生命的永恒都可以得到最彻底的满足。从这种意义上讲,道教的仙境正是永恒人间的投影。东晋葛洪《抱朴子·对俗篇》写得仙道后,“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葛兆光提出:“道教是‘主生’‘主乐’的门径,会让你乐不可支,乐不思蜀,根本不想去死,享受人间快乐,要钱它能点石成金、化铜成金,要女人他能教你房中御女合气之术。这种宗教的教旨就是让人享乐,而且永远地享乐着。对于世俗人们来说,它既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又是实际生活中应付日常困难的具体工具。因此,它有着颇大诱惑力。”[③]如果说,北宋的城市繁华与烟花茂盛为柳永的纸醉金迷提供了物质条件,那么道教的享乐主义才是其纵逸放荡的心理动因。

(三)看破名利与道教超脱思想

柳永对世俗享乐的热衷和向往,又是与对名利的漠视和厌倦联系在一起的。吴熊和认为,“柳永的生平,大抵分为两个阶段,其间可以中进士作为分界。”[④]柳永登第前,蹭蹬偃蹇,却可以恣意纵情,追欢买笑。登第后,宦海浮沉,不由自主。在一首《戚氏》中,柳永前后心境的转变昭然若揭——未入仕时,“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入仕以后,“念利名、憔悴长萦

① 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七,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78 页。
②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80 页。
③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第 167 页。
④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92 页。

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早年困于场屋，屡屡受挫，登第已老，入仕后则宦途奔波，羁旅漂泊。在他经历了长时间的期待与追求，却换来如此结果的时候，一种对功名利禄的厌倦情绪慢慢滋生起来。

> 屈指劳生百岁期。荣瘁相随。利牵名惹逡巡过，奈两轮、玉走金飞。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看花回》)
>
> 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抛掷云泉，狎玩尘土，壮节等闲消。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凤归云》)

周曾锦《卧庐词话》云：“大率前遍铺叙景物，或写羁旅行役，后遍则追忆旧欢，伤离惜别，几于千篇一律，绝少变换，不能自脱窠臼。词格之卑，正不徒杂以鄙俚已也。”[①]柳永厌倦仕途、鄙薄名利的同时，牵肠挂肚的是软玉温香、红粉佳人。

> 似此光阴催逼。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尾犯》)
>
> 念劳生，惜芳年壮岁，离多欢少。叹断梗难停，暮云渐杳。但黯黯魂消，寸肠凭谁表。恁驱驱、何时是了。又争似、却返瑶京，重买千金笑。(《轮台子》)
>
> 干名利禄终无益。念岁岁间阻，迢迢紫陌。翠蛾娇艳，从别后经今，花开柳拆伤魂魄。利名牵役。又争忍、把光景抛掷。(《轮台子》)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老子》第四十四章云：“名与身，孰亲？身为货，孰多？”强调生命最值珍重，财富和名誉等身外之物皆不足倚。《庄

---

① 周曾锦：《卧庐词话》，《词话丛编》，第 4648 页。

子·养生主》云:"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轻,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保全人的生命成为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和人生理想。这种"远祸全身"的人生观衍生出道教"出世主义"宗教观念。唐代道士吴筠《神仙可学论》云:"以轩冕为得意,功名为不朽,悦声耽色,丰衣厚味,自谓封殖为长策,贻后昆为远图。焉知盛必衰,高必危,得必丧,盈必亏。守此用为深固,置清虚于度外,肯以恬智交养中和,率性通真为意乎?"在道教世界里,建功立业是和修仙入道背道而驰的。柳永"为人有仙风道骨,倜傥不羁,傲睨王侯,意尚豪放"[①],大概渊源于此。

后世全真道劝化世人,全以摆脱名利为说辞。"爱看柳词"的王重阳有《叹世》诗曰:

> 堪叹世间名与利,朝贪暮爱没休时。悟来恰似观棋者,迷后浑如败者棋。急急修行急急修,我今题写此骷髅。从来世上争名利,不到而今未肯休。[②]

全真道自王重阳起,善以诗词布道。其词中亦有劝人跳出名利者:

> 叹嗟浮世。被荣华、驱策名和利。人人斗作机心起。百般奸计。嫉妒愈增侥巧重,生俱相效皆贪爱。何曾停住常若是。(《解红》)
>
> 水中沤起,来往相随走。旋旋被风吹,便生灭暂无还有。忽亡忽聚,遄速没人知。如浮世,不坚牢,名利难长久。(《蓦山溪》)

由其"爱看柳词"来看,王重阳的超脱思想也难免受到柳永的影响。

三、柳永艳情词的仙道意蕴

柳永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浪子色彩,柳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艳情词,古

① 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第30页。
② 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56页。

今犹然。描写妓女，柳永不是第一个。如此露骨的描写，柳永也许也不是第一个。但是像这样大量地、集中地描写妓女，柳永是开风气之先的。一部《乐章集》，咏妓、狎妓、恋妓之作俯拾皆是，更有甚者，直接写男女交媾之词亦不止一见。梁丽芳认为，"柳永的艳情词，占了他全部词作的三分之一。传统的所谓艳情词，是指那些专门描写香艳、冶荡之情的词篇。"[①]杜若鸿认为，"《乐章集》中关于吟咏佳人或歌妓的作品约有103首之多，几乎占全部词作的一半。"[②]曾大兴认为，"歌妓词，是指那些以歌妓的形象和心态以及词人同歌妓的关系为内容的歌词。在柳永现存的二百一十二首歌词中，这样的作品近三分之二。"[③]上述数据不尽一致，但都趋于保守。赵谦认为："柳永存词约212首，情词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④]庶几近之。

（一）以仙喻妓女

在柳永大量的艳情词中，道教意象比比皆是，显示了与道教的紧密联系。自唐五代以来，在诗词中形成一个传统，即以"神仙"称歌妓。柳永延续并进一步放大这个传统。

或以"神仙"称呼妓女：

《洞仙歌》（中吕调）：同心绾。算国艳仙材，翻恨相逢晚。
《倾杯乐》（仙吕宫）：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
《曲玉管》：杳杳神京，盈盈仙子，别来锦字终难偶。
《引驾行》：仿凤城仙子，别来千里重行行。
《昼夜乐》二之二：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

或以仙人所居之府代指妓女所居之地：

---

① 梁丽芳：《柳永及其词之研究》，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43页。
② 杜若鸿：《柳永及其词之论衡》，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③ 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④ 赵谦：《柳永歌妓词三题》，《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第60页。

《笛家弄》：空遗恨，望仙乡，一晌消凝，泪沾襟袖。

《临江仙引》三之三：想媚魂杳信，算密锁瑶宫。

《留客住》：盈盈泪眼，望仙乡，隐隐断霞残照。

《轮台子》（中吕调）：又争似、却返瑶京，重买千金笑。

《迷神引》（中吕调）：洞房闲掩，小屏空、无心觑。指归云，仙乡杳、在何处。

《倾杯》（大石调）：最苦碧云信断，仙乡路杳，归鸿难倩。

《秋蕊香引》：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

《透碧霄》：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

《宣清》：命舞燕翩翻，歌珠贯串，向玳筵前，尽是神仙流品。

或径以道教女仙指歌妓：

《西施》三之二：柳街灯市好花多。尽让美琼娥。

《玉女摇仙佩》：飞琼伴侣，偶别珠宫，未返神仙行缀。

《临江仙引》三之三：罗袜凌波成旧恨，有谁更赋惊鸿。

除此而外，柳词中尚有部分与道教文化有关的意象：妓女的衣着是霞衣、霞襟、霞袖，妓女的用具是琼瓯、鸾辂、玉炉，妓女的乐器是金丝、玉管、玉箫，妓女的住所是玉楼、凤楼、琼楼。它们与上述那些代表性的常用意象一起，营造出柳词绰约飘渺的意象世界。

（二）男女性事的仙道化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云："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所指"淫冶"，并非苛责。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曰："柳永淫词莫逾于《菊花新》。"其实，柳永的淫亵之作有甚于此者。试看下面两首词：

意中有个人，芳颜二八。天然俏、自来奸黠。最奇绝。是笑时、媚靥深深，百态千娇，再三偎著，再三香滑。（《小镇西》）

绸缪凤枕鸳被。深深处、琼枝玉树相倚。困极欢余，芙蓉帐暖，别是恼人情味。风流事、难逢双美。况已断、香云为盟誓。且相将、共乐平生，未肯轻分连理。(《尉迟杯》)

然而，如此赤裸裸地表现男女性事，在柳词中并不多见，大概只有五六首。对男女之事的描写，柳永常常用隐语道出。一个主要方式就是用典，其中最常见的是运用楚王巫山神女的故事。宋玉《高唐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巫山神女"在唐末道士杜光庭编撰的《墉城集仙录》中已进入了道教神谱，名为"云华夫人"，被附会进道教故事。指男女之事的"云雨"无疑便具有了道教文化意蕴，这在柳永艳情词中屡见不鲜。

《雪梅香》：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
《斗百花》：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
《西江月》：不成雨暮与云朝。又是韶光过了。
《曲玉管》：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
《玉楼春》五之三：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
《迷仙引》：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婆罗门令》：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攲枕难继。
《法曲献仙音》：每恨临歧处，正携手、翻成云雨离拆。
《浪淘沙》：殢云尤雨，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
《阳台路》：又岂知、前欢云雨分散。
《锦堂春》：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
《集贤宾》：近来云雨忽西东。诮恼损情悰。
《洞仙歌》(中吕调)：愿人间天上，暮云朝雨长相见。
《洞仙歌》(般涉调)：嘉景，向少年彼此，争不雨沾云惹。
《长寿乐》(平调)：情渐美。算好把、夕雨朝云相继。

《满江红》四之二：访雨寻云，无非是、奇容艳色。
《临江仙引》三之一：香闺别来无信息，云愁雨恨难忘。
《安公子》(般涉调)：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
《燕归梁》(中吕调)：若谐雨夕与云朝。得似个、有嚣嚣。
《十二时》：怎得伊来，重谐云雨，再整余香被。
《凤凰阁》：懊恼恩情太薄。霎时云雨人抛却。

以"巫山神女"故事仙凡相遇模式，象征男女交媾，尚有"高阳"一说：

《倾杯》(散水调)：楚峡云归，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
《倾杯乐》(楼锁轻烟)：雨意云情，酒心花态，孤负高阳客。
《思归乐》：天幕清和堪宴聚。想得尽、高阳俦侣。
《宣清》：更相将、凤帏鸳寝。玉钗乱横，任散尽高阳。

"高阳"乃"高唐阳台"之省称。除此而外，柳永还用到其他道教意象，主要是仙凡相遇故事。示例如下：

桃花零落，溪水潺湲，重寻仙径非遥。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万斛须邀。檀郎幸有，凌云词赋，掷果风标。况当年，便好相携，凤楼深处吹箫。(《合欢带》)

这里用了两个道教典故。"桃花零落，溪水潺湲，重寻仙径非遥"，即刘晨、阮肇入天台遇仙故事，见刘义庆《幽明录》。"凤楼深处吹箫"，即萧史弄玉故事。刘向《列仙传》卷上："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作凤楼，教弄玉吹箫，感凤来集，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夫妇同仙去。"

自从回步百花桥。便独处清宵。(《西施》三之三)

《续仙传》载：元和初，元彻、柳实海上遇南溟夫人，求归。"夫人命侍

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驭二子。'……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①]

念解佩、轻盈在何处。忍良时、孤负少年等闲度。(《夜半乐》)

刘向《列仙传》卷上:"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求其佩。'……遂手解佩与交甫。"

(三)女性态度与道教男女平等思想

柳永一生多与歌妓为友,《乐章集》记下了师师、秀香、瑶卿、安安、虫虫、香香、英英、心娘、佳娘、酥娘等十位歌妓的名字。词人对这些色艺俱佳而身分卑微的下层女子往往倾注尊重和怜惜的感情,把她们视为"意中人"和红粉知己,体现出超越寻常的人道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听到的大量对女性美的赞歌,是在宋代的妓情词中。"[②]而柳永对歌妓的赞美是与众不同的。首先是对"多才多艺"的肯定,有"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昼夜乐》二之二)的秀香,有"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妒"(《木兰花》四之一)的心娘,有"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凤衔杯》)的瑶卿。其次是对"蕙质兰心"的欣赏,"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离别难》),柳永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甚至比作历史上的帝妃——"潘妃宝钏,阿娇金屋,应也消得"(《惜春郎》)。同时,柳永也毫不掩饰对"奇容艳色"的迷恋,面对"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昼夜乐》二之二)的佳丽,"算何止、倾国倾城,暂回眸、万人肠断"(《柳腰轻》),柳永竟有"算国艳仙材,翻恨相逢晚"(《洞仙歌》)的感叹。柳永细腻地描写她们的生活、爱情、从良愿望甚至悼亡追思。有"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甘草子》)的单相思,有"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昼夜乐》二之一)的担忧;有"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的从良愿望。上述种种,无不

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五,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8页。
② 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体现出柳永对歌妓抱有平等的态度和深切的关爱。

在我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一直是个颠扑不破的教条。与此相反，在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女性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受到尊崇和赞美。《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将天地生成之根，以母性的生殖来比喻，肯定阴柔的力量和母性之伟大。道教的女仙数量众多，并且各司其职，独主一方，并不依附于男性主神，也不仰仗男性诸神的权威。她们大都救苦济世，法力无边。在道教有关记载中，女仙无一不是才貌双全、美貌超群。道教的主要目标就是追求长生不死，由此演化出无数养生延年的方法如炼丹服药、气功引导术等。就修炼者资格来说，男女平等，皆可修炼。就修炼成就来说，男女也无高下之分，与许多女性修成了道术和名望极高的女仙。明乎此，大概可以解释柳永为什么对歌妓抱有超乎寻常的平等与尊重。

四、柳永女性描写与道教房中文化

（一）道教房中术在宋代的流传

房中术在我国的渊源十分久远，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信仰中的生命崇拜和生殖崇拜。考古及文献资料表明，至迟在秦汉时期，房中观念就已经非常成熟。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七部房中专书——《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辑录了八家房中书：《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尧舜阴道》《汤盘庚阴道》《天老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等。道教早期教派——五斗米道的创始者张道陵就是一位房中术专家，他采取"玄素"，即利用房中术来为世人治病，籍此吸收信徒，扩大影响。他曾普告世人说："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①]道教的兴起为房中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道教的大旗下，房中术升格成为一种宗教的修行方法及传教工具。《抱

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八，第56页。

朴子·微旨篇》:“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抱朴子·遐览篇》著录《太清经》《元阳子经》《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子都经》《容成经》《玉策经》《入室经》《六阴玉女经》等,惜大多早已亡佚。《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各有著录,书皆失传。从史志著录情况可以看出房中术的兴盛。北魏寇谦之改革道教,房中术一度受到外丹术冲击,由明转暗。唐五代,内丹术抬头。宋元以来,内丹术取代了外丹术的主导地位。内丹修炼,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房中术的“男女合气之术”惊人相似。随着内丹术的兴起,沉寂多时的道教房中术又卷土重来。北宋初年成书的《云笈七签》是宋以前道书的集大成者,该书十一、十二两卷涉及房中术,阐述固精、节欲等问题。两宋文人也屡屡论及房中养生。

苏轼《东坡志林》卷一“养生难在去欲”条:

> 太守杨君素、通判张公规邀余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死生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录之。

张耒《明道杂志》:

> 余平生所见方士道人,惟见陈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语言不常,有中理处。王侍读陶守陈,颇礼之,数问房中之方,江无所答。王问:“有强兵战胜之术,如何?”江曰:“百战百胜,不如不战。”其言大抵类此。
>
> 某尉河南寿安时遇(刘)几,时年已七十余,精神不衰,体干轻健。犹剧饮,无日不饮酒,听其论事,有过人者。余素闻其善养生,又见其年老不衰,因问谘之。几挈余手曰:“我有术,欲授子以是房中补导之术。”余应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妇,何地施此。”遂不

复授。

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九“后宫嫔御”条：

> 今贵公子，多畜姬媵，倚重于区区之药石，伐真气而助强阳，非徒无益，反以速祸。虽明理君子如韩退之，有所不免，情欲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绿丧身殒命，何可胜数！前覆后继，曾不知悟，射工狐狸，工于迷人，正自不能不尔。呜呼！安得广成子之术告之哉！

周密《癸辛杂志》续集上“偏僻无子”条：

> 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术，非惟致疾，然不能有子。盖交感之道，必精与气接，然后可以生育；而偏僻之术必加系缚之法，气不能过，是以不能有子也。爱身者当慎之。

上述征引诸家文献，立场观点各不相同。苏轼肯定性欲是人之本能，张耒拒学房中术，王楙指责蓄妓纵欲，周密批评房中术忍精不泄，尽管观点不同，但都说明了两宋士大夫对房中术的知晓程度。

（二）柳永的养身延年之道

柳永有一首《传花枝》，颇具自传性质，论者向来与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相提并论。确实，这首词无异是一篇浪子的立世宣言，表明了柳永对世俗的叛逆与抗争。其中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柳永的养生之道。

> 平生身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嗽，表里都峭。每遇著、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

待倩个、掩通著到。

□,吐出;漱,吮入。□指道教的食气导引养生功夫。葛洪《西京杂记》卷三:"嘘吸为寒暑,喷漱为雨雾。"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二十七:"唾者,凑为醴泉,聚为玉浆,流为华池,散为精液,降为甘露,故口为华池,中有醴泉,漱而咽之,溉脏润身,流利百脉,化养万神,支节毛发,宗之而生也。""解刷扮"是修饰仪表,"能□嗽"是养精聚气,结果是使"表里都峭"的柳永在风月场中如虎添翼。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八云:

> 回仙于京师景德寺僧房壁上题诗云:"明月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相传此词自国初时即有之。柳耆卿词云:"愁绪终难整,人立尽,梧桐碎影。"用回仙语也。

上引柳词为《倾杯》(大石调),回仙即吕洞宾。道教内丹派皆宗钟离权、吕洞宾,"钟吕道"实开内丹派之先河。内丹初起,即与房中术有不解之缘,其论多阴阳男女之说。吕洞宾《敲爻歌》:"也饮酒,也食肉,守定烟花断淫欲。""色是药,酒是禄,酒色之中无拘束。""仙花仙酒是仙乡。到此乡,非常客,姹女婴儿生喜乐。"道出道家宗旨,既不废酒色房中之事,又可长生不死。"道教既不禁欲,又能长生;既能得人间富贵,还能成仙了道;既快活,又高雅,真是妙不可言。"[①]后世内丹家攻讦房中术很是激烈,但是用房中夫妇交合喻内丹元气交会是不争的事实。两家互为表里,亦幻亦真,不可辨别。

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为了劝喻陷入"三角恋"友人,讲述了一个关于八仙的故事:"昔闻何仙姑独居于仙机岩,曹国舅一日来访,谈论玄妙。方款间,吕洞宾自岩飞剑驾云而上。国舅遥见之,谓仙姑曰:'洞宾将至矣,吾与仙姑同坐于此,恐见疑,今欲避之而不可得。'仙姑笑谓曰:'吾变汝为丹而吞之。'及洞宾至,坐话未几,而钟离与蓝采和跨鹤,冉冉从空中而

①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第174页。

来。仙姑笑谓洞宾曰:‘当速化我为丹而吞之,无为师长所见。’洞宾变仙姑而吞之。”友人感悟,遂放弃了对金陵妓的痴迷。这个故事正是以服丹比喻男女交合之术。

根据宋人笔记,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为永,字耆卿。至于改名的原因,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云:“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永者,长也;耆者,老也。永、耆二字,都有长寿延年之意。因为生病,怕死,所以通过改名换字来禳解。房中术正是延年益寿的良方。《后汉书·冷寿光传》:“(寿光)行容成公御妇人法,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注引《列仙传》:“御妇人之法,谓握固不泄,还精补脑也。”孙思邈《千金方·房中补益》:“此方之作也,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非苟欲强身力,幸行女色以纵情,意在补益以遣疾也。此房中之微旨也。”[①]男女交合,貌似主张纵欲。其实恰恰相反,房中术反对纵情快意,提倡节欲宝精,追求遣疾养生。房中术的理论逻辑是:遣疾——延年——长生。这正合乎柳永的愿望。柳词对男女之事的描写,往往透出端倪,表明柳永与房中术的某种内在联系。

(三)性心理与道教房中术

钱裴仲《雨华盦词话》评柳词:“柳七词中,美景良辰、风流怜惜等字,十调九见。”[②]可谓一针见血。《乐章集》中仅“怜惜”一词就出现十七次,引述如下:

《两同心》二之二:别有眼长腰搦。痛怜深惜。

《倾杯乐》(大石调):问甚时与你,深怜痛惜还依旧。

《八六子》(平调):为妙年、俊格聪明,凌厉多方怜爱。

《促拍满路花》:有时携手闲坐,偎倚绿窗前。温柔情态尽人怜。

《洞仙歌》(般涉调):每只向、洞房深处,痛怜极宠,似觉些子轻孤,早恁背人沾洒。

《洞仙歌》(中吕调):向其间、密约轻怜事何限。

① 宋书功:《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② 钱裴仲:《雨华盦词话》,《词话丛编》,第3013页。

《法曲献仙音》:惯怜惜。饶心性,镇厌厌多病,柳腰花态娇无力。

《减字木兰花》:花心柳眼。郎似游丝常惹绊。慵困谁怜。绣线金针不喜穿。

《浪淘沙》:殢云尤雨,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

《梁州令》:怜深定是心肠小。往往成烦恼。

《婆罗门令》: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殢人娇》:当日相逢,便有怜才深意。

《尉迟杯》:每相逢、月夕花朝,自有怜才深意。

《西施》三之二:有意怜才,每遇行云处,幸时恁相过。

《迎春乐》:怎得依前灯下,恣意怜娇态。

《征部乐》: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

《驻马听》:良天好景,深怜多爱,无非尽意依随。

如同柳永不厌其烦地运用"云雨"典故一样,"怜惜"二字也重复到了令人厌烦地步,何以如此呢? "握固不泄,还精补脑"是道教房中术的不二法门。房中要旨在于男子不能射精,而要还精补脑;御女之术,不是满足本能欲望或追求生理快感,而是益寿延年以致长生不老。正是由于这样,"性交"和"节欲"才奇妙地合二为一。房中术认为只有在女性最大满足的情况下,才对男女双方的身体有利(尤其是男性)。《素女经》:"以是为节,慎无敢违,女既欢喜,男则不衰。"[①]所以,房中术的性技巧大多针对激发女性快感而来。《素女经》:"男欲求女,女欲求男,情意合同,俱有悦心。"[②]房中术非常重视女子在性交中的感受和体验。《素女经》:"黄帝曰:'何以知女之快也?'素女曰:'有五征、五欲,又有十动,以观其变,而知其故。'"[③]为了达到女子的满足,对男子性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洞玄子》:"凡欲泻精之时,必须候女快,与精一时同泻。"[④]《天下至道谈》:"人有善者,不失女人,女人有之,善者

① 宋书功:《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第156页。
② 同上,第158页。
③ 同上,第160页。
④ 同上,第250页。

独能。毋予毋治，毋作毋疑，必徐以久，必微以持，如已不已，女乃大怡。……嬲乐之要，务在迟久，苟能迟久，女乃大喜。亲之弟兄，爱之父母，凡能此道者，命曰天士。"①

女性的性满足是必须得到保障的，道教房中术不断强调这种原则。基于此，国外学者如高罗佩、李约瑟等人皆认为中国古代房中术所展示的是男女平等，合理而又健康的性生活。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认为："在中国性文献中人们一再强调下述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男人的精液是他最宝贵的东西，不仅是他健康的源泉，而且也是他生命的源泉。每次射精都会损伤元气，除非从女人那里得到等量的阴气才能弥补。第二，男人与女人性交，每次都要使女方充分满足，但男子则只应在特定情况下使自己达到高潮。"②"这些房中术除教人以肉欲之爱以外，还教男人体贴女人的感情和理解女人在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问题。"③这不正是柳永在床第之欢中对女子的体贴和温存吗！

柳永《尉迟杯》云："风流事，难逢双美。"《玉女摇仙佩》云："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托名陈希夷（陈抟）的《房中玄机中萃纂要》记载，行房之时服用"双美丹"，能使"男女欢洽，双美不败"④。可为柳词作一注脚。

（四）性行为与道教房中术

1."御女多多益善"

虽然柳永对歌妓抱有平等、尊重的态度，但是他从来没有痴迷于某一个歌妓，这从他的词不断更换女主角就可以看出。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谓柳永"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柳词《集贤宾》："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玉蝴蝶》五之三："烂游花馆，连醉瑶危……见了千花万柳。"《满朝欢》："因念秦楼彩凤，楚观朝云，往昔曾迷歌笑。"《传花枝》："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所有这些描写都说明柳永狎妓之多，阅女无数。钱裴仲《雨

---

① 宋书功：《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第160页。

② 高洛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③ 同上，第153页。

④ 宋书功：《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第463页。

华鑫词话》评曰:“其为词无非舞馆魂迷,歌楼肠断,无一毫清气。”六朝房中书《素女经》:“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①]首先声张了男女交合的合理性,不啻为柳词的香艳之作张目。有了这顶保护伞,柳永可以肆无忌惮地描写艳情。

更何况房中术还为柳永提供了更多的庇护。《抱朴子·微旨篇》:“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②]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御女损益篇》:“能御十二女子而复不泄者,令人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不泄者,年万岁。”[③]《玉房秘诀》云:“数数易女则益多,一夕易十人以上尤佳。常御一女,女精气转弱,不能大益人,亦使女瘦瘠也。”[④]孙思邈《千金方·房中补益》云:“一夜御十女,闭固而已,此房中之术毕矣。”[⑤]在道家看来,数数易女,不仅是为了保护女方,也是为了获得最佳的采补效果。柳永《西江月》词云:

> 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情多。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姦字中心着我。

此词辑自罗烨《醉翁谈录》,书中载有该词的本事,兹不赘述。“四个打成一个”是说柳永与师师等三妓调情嬉戏。“姦字中心着我”,三个女子围着柳永一个男人,又何尝不是“数数易女”呢?

2.“当御童女”

《玉房秘诀》:“夫男子欲得大益者,得不知道之女为善,又当御童女,颜色亦当如童女。女苦不少年耳。若得十四五以上,十八九以下,还甚益佳也。”[⑥]柳永流连于烟花柳巷,周旋于百媚千娇,对雏妓也很感兴趣。《乐章集》有三篇描写其狎玩雏妓的情景,分别是《斗百花》三之三、《迷仙引》(双

① 宋书功:《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第512页。
② 同上,第196页。
③ 同上,第206页。
④ 同上,第227页。
⑤ 同上,第217页。
⑥ 同上,第227页。

调)、《促拍满路花》。引一阕如下:

>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

古以女子十五岁为及笄,始束发插簪。在这首词里,柳永露骨地描写了与一位刚满十五岁的雏妓绸缪缠绵。"已受君恩顾"道尽该女子的卑微与驯顺。道教第十福地为丹霞洞,位于江西麻姑山。《上清经》:"黄箓通紫府,青柬接丹霄。"丹霄,犹言天中也。以升天遨游比喻房事欢洽,明显打上了道教房中文化的印记。

柳永艳情词的大胆、暴露,令人咋舌。为《乐章集》作校注的薛瑞生对此有个评价:"以宋观柳,说他'薄于操行'似不为过;以今观柳,简直就是嫖妓专业户了。"[①]柳永的轻薄,柳词的淫秽,早就为人诟病。至于个中缘由,或归于人生失意,或解为个性浪漫,均未达一间。若目之以色情狂,未免失之简单。本文从道教文化的角度阐述柳永的女性意识及其艳情词,希望对柳永的理解更推进一步。柳永浪迹红尘,游戏人生,道士们清静无为,散淡逍遥,这不过是途径的不同。而实质上,放浪形骸,诗酒忘怀,逸性摅灵,对社会的悟彻、超脱、退避,寻求心理上的补充和替代则是相一致的。

提　要: 本文从道教的视角剖析柳词;围绕柳词与道教的关系,论述四个相关问题:柳永的游仙道情词与道教在北宋的传播,柳永的都市冶游词与道教享乐主义,柳永艳情词的仙道意蕴,柳永的女性描写与道教房中术。

关键词:柳永　艳情　仙道意象　房中术

① 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第14页。

试论严羽《沧浪诗话》对李白的评价

王红霞

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南宋诗论家、诗人。其著作散佚较多,流传下来而又比较完整的仅有《沧浪诗话》、《沧浪吟卷》和一部二十二卷本的评点《李太白诗集》。

《沧浪诗话》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严羽在诗话中将宋诗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沿袭唐人,中期到苏轼、黄庭坚等人"始出自己意",变革唐风,南宋中叶以后又转而学习晚唐。严羽对宋代诗坛多批评之辞,尤其反对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认为他们倡导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风,违背了诗学的传统。对于"四灵"和江湖诗人倡导的晚唐诗风也颇有微辞,认为"止入声闻辟支之果"(旁门小道),未进入"大乘正法眼"(《诗辨》)。[①]

其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妙悟",何谓"妙悟"?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诗辨》)[②]这

---

①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7 页。
② 同上,第 12 页。

段话有三个关键词:“禅道”、“妙悟”和“诗道”,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应该是这样的:禅道→妙悟←诗道,用“妙悟”把禅和诗联系起来了。在严羽看来,“悟”有深浅之分,有“分限之悟”、“一知半解之悟”和“透彻之悟”之别:“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①最符合“妙悟”特征的诗歌是谢灵运及盛唐诸公,达到了“妙悟”的最高境界——“透彻之悟”,严羽为了更形象地说明“透彻之悟”,接着还连用几个比喻加以阐述:“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②盛唐诸公中唯李杜可称道之,李白更是典型的盛唐诗歌面孔,自然也就引起了严羽的格外关注。可见,“以禅喻诗”是严羽接受李白的诗学背景,他对李白的接受正是以诗歌的自身规律及内在特征作为切入点,这正是严羽不同于前人之所在。可以说,严羽对李白的接受与他本人对诗歌的期待视野是完全一致的,这恰恰符合接受美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期待融合”,因为只有当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相融合的时候,才谈得上去接受和传播。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一、明确将李白诗歌界定为“太白体”

严羽对李白的接受首先体现在将李白的诗歌明确界定为“太白体”。《诗辨》开篇即言:

> 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

①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 页。
② 同上,第 26 页。

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1]

在这段文字里，严羽把唐代的诗歌分成初唐、盛唐、大历、中唐、晚唐五个阶段来论述，具体提及了他极为推崇的九位唐代诗人，李白不仅在其中，而且在提及李杜时，严羽用的是“独取”，从字面上可见出严羽对李杜的推崇和喜爱。接下来，他又说：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如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志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惊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误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来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2]

该段材料将魏晋和盛唐时期的诗歌奉为圭臬，更将李杜二人尊为典范，甚至认为应该将二人的诗集“枕藉观之”。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是“入神”，只有到此境界的诗歌才能将内心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达到“至矣”“尽矣”，而古往今来，能获得如此殊荣，达到“入神”之境界的唯有李杜。从这些稍显绝对的结论中不难见出，在严羽心目中，李杜之诗的成就无人可以比拟，无人可以超越：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

①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第1页。

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①]

在另一段材料中，严羽更是毫不掩饰他对李白的偏爱，将李白诗歌誉称为“太白体”：

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李陵、苏武也）。曹刘体、（子建、公幹也）。陶体、（渊明也）。谢体、（灵运也）。徐庾体、（徐陵、庾信也）。沈、宋体、（佺期、之问也）。陈拾遗体、（陈子昂也）。王、杨、卢骆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也）。张曲江体、（始兴、文献公、九龄也）。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高常侍適也）。[②]

唐之后，首次以“体”来概括李白诗歌风格的不是严羽，而是南宋诗人杨万里。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云：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又：“相随遥遥访赤城，三十六曲水回萦。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此李太白诗体也。“麒麟图画鸿雁行，紫极出入黄金印。”又：“折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又：“指挥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又：“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此杜子美诗体也。“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又：“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又：“醉中不觉度千山，夜闻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画像》：“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涴吾足乃敢嗔。”此东坡诗体也。“风光错综天经纬，草木文章帝杼机。”又“涧松无心古须鬣，天球不琢中粹温。”又：“儿呼不苏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此山谷诗体也。[③]

---

①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 页。
② 同上，第 58 页。
③ （宋）杨万里著：《诚斋诗话》，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37 页。

这是一段论及诗歌风格的文字，杨万里以诗人的诗风作为划分标准，总结了四种诗体，即“太白体”、“杜子美体”、“苏轼体”、“黄山谷体”，但杨万里仅仅是提出这个观点，并没有用文字对“太白体”作更详尽地阐述和说明。

严羽在承袭杨万里观点的基础之上，不仅更明确地指出了以人而论，则有太白体，而且用大量的文字对“太白体”的内涵作了较为清晰的说明。其一是，欲“观太白诗”，必须要先识“真太白处”：

> 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①]

仔细解读这段材料，会发现严羽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说的：第一，他认为只有从李白的诗歌入手，才能真正读懂李白，才能透过豪逸的语言和诗境去感受诗人的性情。第二，李白是“天才豪逸”诗人，诗风以豪逸而著称，其诗歌常不依常理，不守常规，率性而作，如范传正在《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所言“万象奔走乎笔端，万虑泯灭乎樽前。卧必酒瓮，行惟酒船。吟风咏月，席地幕天。但贵乎适其所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②]。其语言“多卒然而成”，毫不见斧凿之痕，这是李诗的独特风格，如果不能披文见质，就难以真正“识真太白”。第三，李白之诗还具有充实的内容，通过其诗可以观其为人，读者可以从中读出李白的人生，以及诗人安身立命的原则。严羽在评点李诗时常常能做到“识真太白”，如：

> 卷八评点《赠裴十四》说：“不轻世，不愤世，太上未能忘情。”[③]
>
> 卷十评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说：“说尽炎凉变态，可以警世，可以平情，正不必温厚。”[④]

①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3 页。
② （清）阮元、董诰：《全唐文》卷六百十四，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201 页。
③ （宋）严羽著，陈定玉辑校：《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9 页。
④ 同上，第 254 页。

卷十二评点《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说:“忠臣去国之思,见此三字。”[①]

卷十六评点《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说:“写其心胸。感慨放达,不妨纵言之。世以为五季间学太白者,非知太白者也。”[②]

卷十九评点《纪南陵题五松山》:“桐宫放太甲,摄政无愧色。三年帝道明,委质终辅翼。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说:“‘无愧色’与‘旷心’五字,真万古人臣之则。凡危疑之际,做事业不出,只为胸中有唐碍,面上多惭惶耳。”[③]

卷十九评点《独坐敬亭山》说:“与寒山一片石语,惟山有耳;与敬亭山相看,惟山有目。不怕聋瞶杀世上人。古人胸怀眼界,直如此孤旷。”[④]

其二是,“太白体”还具有“飘逸”的艺术特征。严羽在《诗辨》中将诗歌风格品评为九类: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⑤]

“飘逸“是其中的一品,这也是“太白体”的重要特征之一。为此,严羽还例举了《梦游天姥吟留别》和《远离别》两首诗加以说明,这两首诗之所以能成为例证,不是严羽随手拈来,而是有意为之。《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写于天宝五载(746),即李白离开长安的第三年。此时他准备离开东鲁南下吴越,与东鲁朋友告别时写下了这首留别诗。全诗意境雄伟,变化惝恍莫测,缤纷多彩的艺术形象,新奇的表现手法,向来为

① (宋)严羽著,陈定玉辑校:《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1 页。
② 同上,第 341 页。
③ 同上,第 374 页。
④ 同上,第 387 页。
⑤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 页。

人传诵,被视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诗歌通过梦境的描绘,刻画出想象中的天姥山奇丽明媚的景象,也隐喻了自己不能实现政治理想、怀才不遇的悲愤和执着追求光明的愿望。同时,也表达了独立不羁,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人格精神。前人对该诗的主旨也多有论述,《唐宋诗醇》卷六言:“七言歌行,本出楚骚、乐府,至于太白,然后穷极笔力,优入圣域。昔人谓其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而尤推其《天姥吟》、《远别离》等篇,以为虽子美不能道。盖其才横绝一世,故兴会标举,非学可及,正不必执此谓子美不能及也。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①]《唐宋诗醇》卷二引杨载云:“波澜开阖,如江河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正是,出入变化,不可纪极。”[②]以上几条材料足以说明,《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颇有屈原《远游》一诗的意蕴,《远别离》一诗则执着于对社稷苍生的关怀,这些诗作不但能体现太白体“飘逸”的特征,而且可见出诗中沉痛,这也难怪王夫之读到《远别离》时,感慨说:“工部讥时语,开口便见,供奉则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③]上面所论,说明这些诗作确实可视为“太白体”的代表诗作,通过这些诗作可以“识真太白”。

其三是,“太白体”除了具有“豪逸”、“飘逸”和“语多卒然而成”这个特征外,在诗法上还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

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④]

将李白变化无端的诗风喻为李广来去无踪的兵法一般,天马行空,出神入化,无迹可求,但有法可循。后代诗评家多赞同严羽此说,明代的王稚登在《李翰林分体全集序》中说:李白诗法如“飞将军用兵,不按古法,士卒逐水

① (清)爱新觉罗·弘历敕编,冉苒校点:《唐宋诗醇》,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5 页。
② 同上,第 16 页。
③ 王夫之点评,任慧点校:《唐诗选评》卷一,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 页。
④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0 页。

草自便”[1]，清代的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一中说：“发想超旷，落笔天纵，章法承接，变化无端，不可以寻常胸臆摸测；如列子御风，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2]，清代的王琦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四引《朱子语类》说：“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3]

严羽对“太白体”内涵的阐述，显示了诗人兼诗评家双重身份的严羽独特的品评视角。

二、李白诗歌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

诗人的诗歌风格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李白亦不例外。严羽眼中的李白诗歌有的“潇洒飘逸”，有的“笔力雄健”、“气象浑厚”：

> 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4]

郭绍虞先生在《沧浪诗话校释》中认为“金鳷擘海”比喻李诗“笔力雄健”，“香象渡河”比喻“气象浑厚”[5]，而贾岛和孟郊气格局促，意境狭小，与李杜相比，像“虫吟草间”而已。

严羽在诗话中没有对“金鳷擘海”作深入地说明，但他曾将诗歌风格品评为九类，“雄浑”是其中的一类，“雄浑”与“金鳷擘海”应是相同的意蕴。唐代诗评家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将“雄浑”列为第一品，并将其描述为：“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6]虽然严羽在诗

① （唐）李白著，朱金城、瞿蜕园校注：《李白集校注》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99 页。

② （清）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49 页。

③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27 页。

④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7 页。

⑤ 同上。

⑥ （唐）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38 页。

话中没有对“金鸡擘海”作更具体的阐释,但他在评点太白诗集时多次提及,如:

卷一评点《古风》(其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说:“雄快。”①

卷二评点《雉朝飞》“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饮泉勇气满,争雄斗死绣颈断”说:“《射雉赋》亦未有此雄丽。”②

卷三评点《幽州胡马客歌》“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说:“风流雄快,五字能摹。”③

卷四评点《白马篇》“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说:“何其雄丽。”④

卷八评点《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说:“通篇雄豪。”⑤

卷十三评点《梦游天姥吟留别》“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说:“太白写仙人境界皆渺茫寂历,独此一段极真,极雄,反不似梦中语。”⑥

卷十四评点《送王屋山魏万还王屋》“涛卷海门石,云横天际山”说:“自然雄旷。”⑦

卷十七评点《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说:“雄快风流。”⑧

卷十七评点《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说:“豪情如生,觉此会未散。”⑨

卷二十评点《浔阳紫极宫感秋作》“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

① (宋)严羽著,陈定玉辑校:《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② 同上,第140页。
③ 同上,第162页。
④ 同上,第165页。
⑤ 同上,第233页。
⑥ 同上,第286页。
⑦ 同上,第298页。
⑧ 同上,第344页
⑨ 同上,第351页。

说："上句得雄浑之气，遂无说理之病。"[①]

卷二十一评点《题东溪公幽居》说："犹存浑气。"[②]

在上述材料中，严羽将李白的诗歌语言或评价为"雄丽"，或评价为"雄快"，或评价为"雄旷"，或评价为"雄豪"，或评价为"雄浑"，将李白的诗歌气势或评价为"豪情"，或评价为"浑气"，这些品评均可视为"金鳷擘海"的具体阐释。

再来看严羽对"香象渡河"的说明。严羽认为诗之法有五，第三法即"气象"，严羽尤为看重诗歌的气象，在《诗评》中就四次提及，比如：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③]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④]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⑤]

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⑥]

在《考证》中也有两处提及：

《西清诗话》载：晁文元家所藏陶诗，有《问来使》一篇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余谓此篇诚佳，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得非太白逸诗，后人谩取以入陶集耳。[⑦]

"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今世俗图画以为少陵诗，渔隐亦辩其非矣，而黄伯思编入《杜集》何

① (宋)严羽著，陈定玉辑校：《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7 页。
② 同上，第 405 页。
③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4 页。
④ 同上，第 151 页。
⑤ 同上，第 158 页。
⑥ 同上，第 192 页。
⑦ 同上，第 221 页。

也?[1]

在《答吴景仙书》中也曾提及:

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止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2]

在评点太白集时也提及:

卷十八《登新平楼》:"去国登兹楼,怀归伤暮秋。天长落日远,水净寒波流",严羽评点说:太白多有此悠涵气象。[3]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严羽在对诗歌作审美品评时,尤其看重"气象",将其视为诗歌的五要素之一,尤为看重的是盛唐气象。在严羽看来,汉魏古诗,建安之作,盛唐诗歌都是有气象的,而且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浑",即"难以句摘"、"不可寻枝摘叶"的整体的艺术风貌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整体意象美,这也正是"盛唐气象"的一个重要风格特征。严羽的"气象"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时代特征,二是个体特征。就时代特征而言,宋诗虽然笔力劲健,但"气象"却似"子路未事夫子时",而盛唐诸公,不仅笔力雄壮,且气象浑厚。就内涵而言,"气象"指的是人的主观精神通过作品的意象和体制表现出来的整体的浑厚的艺术风貌,即诗歌的气势,而诗歌的气势或由语言来营造,或由意象来营造。严羽推崇的最佳气象是"浑厚"、"悠涵",对气象混沌的汉魏之诗持否定态度,在严羽看来,李白诗歌气象如"香象渡河"。

---

①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9 页。
② (宋)严羽著,陈定玉辑校:《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8 页。
③ 同上,第 356 页。

三、太白诗乃天仙之词

严羽在肯定李白诗风和诗法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表达对李白的偏爱，还将李白诗歌称之为“天仙之词”：

> 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①]

后人在评价李白时，最常用的溢美之词是仙、谪仙、仙才或诗仙，这些溢美之词或言李白有仙人般的容貌举止，或言李白诗歌潇洒飘逸如无拘无束的仙人，或言李白诗歌多写仙界。唐代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并称李白诗歌“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后耳”[②]。此外，他还在《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一诗的诗题中直言李白为“谪仙子”，并用诗句来描绘李白不同于常人的仙风道骨。之后，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③]言李白文辞宛若仙人之词。裴敬在《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用夸张的语言赞赏李白如天仙的诗风以及藐视尘世的思想。可见，在唐五代时期，人们已将李白定位为谪仙，将李白诗歌定位为仙人之词。

这种赞誉为很多宋人所接受，在宋代，称道李白诗歌风貌如天仙者络绎不绝。有的虽不直接点出“仙”字，但在指陈李诗风貌特征时，都是突出其宛若天仙之辞的特色。这方面的评论很多，这里只举若干有代表性的例子：

> 梅尧臣《采月石赠郭功甫》：“采月石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④]

---

①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8 页。
② (清)阮元、董诰：《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三，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798 页。
③ 《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七，第 4460 页。
④ (宋)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笺注：《梅尧臣集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57 页。

钱易曾在《南部新书》中说:"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①

欧阳修《太白戏圣俞》诗云:"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②

苏轼《水龙吟》云:"行尽九州四海,笑纷纷、落花飞絮。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③

吴文英《探芳信》(夹钟羽)云:"画船中、太白仙人,锦袍初拥。"④

辛弃疾《念奴娇》(赋梅花)云:"看取香月堂前,岁寒相对,楚两龚之洁。自与诗家成一种,不系南昌仙籍。怕是当年,香山老子,姓白来江国。谪仙人,字太白、还又名白。"⑤

严羽认为"谪仙"之称,不足以形容李白非凡的诗才,继李阳冰之后,再次将李白诗歌定位为"天仙之词"。并在评点《李太白诗集》时,多次将李白称之为"天才"、"仙才"、"逸才"或"逸人":

卷二评点《春日行》中的"弦将手语弹鸣筝"说:"'弦将手语'四字无所本,不嫌造,此,真天才。"⑥

卷三评点《关山月》说:"似近体,入古不碍,真仙才也。"⑦

卷六评点《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说:"篇中'谓逢'、'又如'、'只将'、'与君对此'、'便欲因之',是个'壁画';'雪'、'月'、'光'、'达明发',是个'烛照'。'皎若'句又有'画',有'烛'。

① (宋)钱易撰:《南部新书》,黄寿成点校,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32 页。
② (宋)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卷五,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86 页。
③ (宋)苏轼著:《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 页。
④ 赵慧文,徐育民编著:《吴文英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 2007 年版,第 678 页。
⑤ 叶嘉莹主编,母庚才、顾之京副主编,朱德才、薛祥生、邓红梅编著:《辛弃疾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 2006 年版,第 1164 页。
⑥ (宋)严羽著,陈定玉辑校:《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8 页。
⑦ 同上,第 145 页。

此逸才细心处。”①

卷十一评点《赠钱征君少阳》中的“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春风馀几日？两鬓各成丝”说：“赋情如丘山，而出口轻若蝉翼，真是逸才。”②

卷十三评点《别韦少府》说：“清人、逸人，自见月如水，闻猿忘愁。”③

卷十七评点《金陵凤凰台置酒》说：“逸人心胸，无境可束。”④

“天才”“仙才”与“天仙”一词的内涵是差不多的，但何为“逸才”、“逸人”呢？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将“逸”界定为：“逸，体格闲放曰逸”⑤，倾向于把“逸”阐释为偏重于静态的闲逸，显然严羽称李白为“逸才”不仅是“俊逸”，还有“豪逸”这个涵义，“逸”还有洒脱、不拘常态的含义。其实在严羽之前，与李白同时代的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价李诗时说：“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⑥，《河岳英灵集》选李诗十三首，其中的《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蜀道难》等诗篇均纵逸而奇警。严羽所说的“逸才”当是和殷璠相同的意思，都认为杜甫在《春日忆李白》所言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⑦，“俊逸”不足以概括李诗的特征，李诗除了具有“俊逸”的特征外，还有“纵逸”的一面。孟棨在《本事诗》中也以“高逸”名篇，并将李白诗评定为：“才逸气高。”⑧严羽在上述诗论家的基础之上，再次肯定了李诗“豪逸”的特征，并赞叹李白为“逸才”。

严羽视李白为“天才”、“仙才”或“逸才”，把李白诗歌称之为“天仙之词”的意义，除了上面所说的肯定了李诗纵横洒脱的特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

① （宋）严羽著，陈定玉辑校：《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8 页。
② 同上，第 265 页
③ 同上，第 296 页。
④ 同上，第 350 页。
⑤ （唐）释皎然著：《诗式》，（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36 页。
⑥ （唐）殷璠选编：《河岳英灵集》卷上，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11 页。
⑦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详注：《杜诗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 页。
⑧ （唐）孟棨著：《本事诗》，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4 页。

原了真实的李白，还原了真实的李诗。正如刘勉在《宋人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辨析》一文中所说：

> 宋人沿袭唐人关于"谪仙人"的说法，并进一步加以发挥……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虽是赞美实则神化、仙化的认识，与将李白俗化（"识度甚浅"、"多言妇人酒"）的倾向一样，都是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误解。
>
> 太白之诗是有法还是无法，是有待还是无待，是可法还是不可法，宋人一般认为李诗无法、无待，也不可法，所以艺术风格有一种似非人间所有的神秘性。黄山谷认为"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郑景韦认为"李谪仙，诗中龙也，矫矫不受约束"，杨万里则认为李白诗"如子列子之御风，无待乎舟车也"，"无待者，神于诗"，朱熹一方面认为"李太白天才绝出，尤长于诗"，一方面又认为"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严羽《诗评》云："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认为李白诗歌是有法的，只是李诗之法与一般意义的诗法不同，更多一些个性色彩和兴会标举，属于无法之法。严氏继李阳冰《草堂集序》之后，将李诗风格重新定位在"天仙之词"上，实际上恢复了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对正确认识其诗风格有重要意义。①

刘勉的论述是较为准确的。唐人赋予李白"谪仙"这个名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后人在评说李白诗风时，很容易陷入神秘化的泥潭，导致对李白的误解以及对李白诗歌的误读，即认为李白诗歌缺乏现实基础，严羽此说意在进一步纠正前人对李白的误解以及对其诗歌的误读，还李白及李白诗歌的本来面目。

---

① 刘勉：《宋人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辨析》，《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7 页。

四、李杜优劣论

在李白身后，人们在评说李白时，总是会和杜甫联系在一起。李杜孰优孰劣这个问题，早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很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此就不再赘言。严羽在诗话中也涉及了这一话题：

>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①

严羽明确主张李杜并称，二人的诗歌是各有千秋，各具特征，无法分高下，李白的“飘逸”杜甫“不能道”，杜甫的“沉郁”李白“不能作”，因此，论诗当“以李杜为准”，李杜二人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严羽对李杜的这种接受态度在他的评点《李太白诗集》中也有反映，在评点李白诗歌时，他就常以杜甫作为参照物。

> 卷一评点《古风》（十四）说：“此首可与老杜《塞上》诸篇伯仲。”②
>
> 卷十八评点《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说：“老杜亦有此诗，其写景甚雄，写情甚郁。此只一味清逸。各如其人。”③
>
> 卷二十评点《秋夕书怀》：“灭见息群动，猎微穷至精”说：“奥渺似杜。如此等句集中不多得。”④
>
> 卷二十一评点《在浔阳非所寄内》：“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

①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② （宋）严羽著，陈定玉辑校：《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③ 同上，第360页。
④ 同上，第397页。

说："似杜。"[①]

与此同时，严羽还辨析了宋代一些关于李杜的不正确的说法：

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十四处，至谓"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其情好可想。《遯斋闲览》谓二人名既相逼，不能无相忌，是以庸俗之见，而度贤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②]

这条材料在批评时人以为李杜因为"名既相逼"，故"相忌"这个错误观点的同时，引用二人之诗句作为佐证材料，指出二人是惺惺相惜，彼此欣赏的好朋友，并把二人同称为"贤哲"。这充分说明严羽既欣赏李白的诗才，对李白的人品同样欣赏。

在诗话中，有七条材料都是将李杜连在一起论述的，这个数据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严羽对李杜并无轩轾，认为二人都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观点虽非严羽首次提出，但与前人相比，严羽的见解更深刻，因为他不但提出"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这个结论，而且阐述了原因，严羽不但读懂了李白，也读懂了杜甫。

此外，严羽在《考证》中还仔细梳理、辨析了李白一些诗文，这些考证从风格的角度辨析了李白诗歌中一些作品的真伪。

提 要：严羽著作散佚较多，流传下来而又比较完整的仅有《沧浪诗话》、《沧浪吟卷》和一部二十二卷本的评点《李太白诗集》。严羽论诗宗盛唐，认为盛唐诸公中唯李杜可称道之。他对李白的接受正是以诗歌的自身规律及内在特征作为切入点，也与他本人对诗歌的期待视野是完全一致的。具体接受内容体现为以下几点：明确将李白诗歌界定为"太白体"，认为李白诗歌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太白诗乃天仙之词，李、杜二公，不当分优劣。

关键词：严羽 沧浪诗话 李白 太白体 金鳷擘海 香象渡河 天仙之词

① （宋）严羽著，陈定玉辑校：《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2 页。
②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7 页。

黄丕烈对宋人词籍的收藏与整理

曹明升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在乾嘉时期发展到了极盛阶段，其代表人物首推吴县黄丕烈。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就称："乾嘉以来藏书家，当以先生为一大宗。"黄氏士礼居收藏宏富为一时之冠，宋元旧椠、精校名钞，比比皆是，其中就有不少珍贵的宋人词籍。黄丕烈尝自云："余素不能词，而所藏宋元诸名家词独富。"[①]黄氏虽不作词，但出于"喜读未见书"[②]的爱好，对"厥品颇卑"[③]的宋人词籍还是予以了收藏与整理。这对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以及词籍校勘、版本研究后来成为清代词学的重要分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黄丕烈藏、校宋人词籍考略

黄丕烈所藏、校的宋人词籍究竟有多少？事实上已无法精确统计，因为

① 黄丕烈：《元刻本〈稼轩长短句〉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黄丕烈书目题跋》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0页。

② 黄丕烈：《残宋本〈编年通载〉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二，第27页。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07页。

有些词籍后来散佚了，有些被典卖而转购他书。现只能根据黄氏藏、校词籍留下的题跋以及其他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大致考出荛圃先生藏、校宋人词籍的数量，详见下表：

词籍名与卷数	版 本	黄氏校勘情况	著 录
张先《张子野词》一卷	钱孙艾钞本	未校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张先《张子野词》一卷	旧藏，版本不详，或为毛钞	未校	钱孙艾钞本题识
晏殊《珠玉词》一卷	明钞本	未校	《读有用书斋藏书志》
杜安世《寿域词》一卷	明钞本	未校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
苏轼《东坡乐府》二卷	元刻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苏轼《东坡乐府》二卷	校元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苏轼《东坡词》二卷.拾遗一卷	毛氏钞本	校过	元刻本《东坡乐府》题识
黄庭坚《山谷词》一卷	校宋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黄庭坚《山谷词》一卷	毛氏刻本	校过	校宋本《山谷词》题识
秦观《淮海长短句》三卷	宋刻补钞本	未校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秦观《淮海长短句》三卷	校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秦观《淮海先生文集》后集中有《长短句》三卷与补遗	旧钞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三
秦观《淮海词》三卷	钞本	校过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
周邦彦《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十卷	宋刻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周邦彦《片玉词》二卷	旧钞本	未校	宋刻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题识
王安中《初寮词》一卷	汲古阁精钞本	未校	《读有用书斋藏书志》
蔡伸《蔡友古词》二卷	明钞本	未校	《带经堂书目》卷四下
张元干《芦川词》二卷	景宋钞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张元干《芦川词》一卷	毛氏钞本	校过	景宋钞本《芦川词》题识
黄公度《知稼翁词》一卷	明钞本	未校	《带经堂书目》卷四下
黄公度《知稼翁词》一卷	汲古阁精钞本	未校	《读有用书斋藏书志》
朱淑真《断肠集》二卷	钞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赵彦端《介庵琴趣外篇》六卷	旧钞本	未校	《彊村丛书》本朱祖谋跋语

词籍名与卷数	版 本	黄氏校勘情况	著 录
王千秋《审斋词》一卷	旧钞本	未校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
曹冠《燕喜词》一卷	宋钞本	未校	《读有用书斋藏书志》
姚述尧《箫台公余词》一卷	绣谷亭钞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四
姚述尧《箫台公余词》，卷数不详	毛氏钞本	未校	绣谷亭钞本《箫台公余词》题识
管鉴《养拙堂词》一卷	旧钞本	未校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张孝祥《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	景宋钞本	未校	《适园藏书志》卷十六
吕胜己《渭川居士词》一卷	汲古阁精钞本	未校	《读有用书斋藏书志》
廖行之《省斋诗余》一卷	旧钞本	未校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十二卷	元刻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十二卷	校元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十二卷	明何孟伦刻本	校过	校元本《稼轩长短句》题识
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十二卷	毛氏钞本	未校	元刻本《稼轩长短句》题识
陈三聘《和石湖词》一卷	汲古阁精钞本	未校	《读有用书斋藏书志》
韩玉《东浦词》一卷	汲古阁精钞本	未校	《读有用书斋藏书志》
张镃《玉照堂词钞》一卷	绣谷亭钞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四
刘过《龙州词》，卷数不详	钞本	未校	《云间韩氏藏书目・附书影》
卢炳《烘堂词》一卷	明钞本	校过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
高观国《竹屋词》一卷	汲古阁精钞本	未校	《读有用书斋藏书志》
林正大《风雅遗音》二卷	景写明刊本	未校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
林正大《风雅遗音》二卷	旧刻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林正大《风雅遗音》二卷	毛氏钞本	未校	旧刻本《风雅遗音》题识
赵以夫《虚斋乐府》二卷	景宋钞本	未校	《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四
赵以夫《虚斋乐府》二卷	述古堂钞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赵以夫《虚斋乐府》，卷数不详	汲古阁钞本	未校	述古堂钞本《虚斋乐府》题识
洪瑹《空洞词》一卷	汲古阁精钞本	未校	《读有用书斋藏书志》
杨泽民《和清真词》一卷	钞本	未校	《中国善本书目提要》
陈允平《日湖渔唱》一卷	旧钞本	校过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蒋捷《竹山词》一卷	元钞本	未校	《荛圃藏书题识》卷十

黄丕烈所藏宋人词籍的数量虽还不到他藏书总量的十分之一，却已不少。从上表可以看出黄氏藏、校宋词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确有珍本秘册。像宋刻《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十卷，北宋词有注者惟此为完本，且“是书历来书目不载”，“幸赖此种秘籍流传”[①]，足见其珍贵；元刻《东坡乐府》二卷则为东坡词元延祐本系统之源，且经文徵明、季振宜等名家收藏或校阅，乃真正的善本，难怪黄丕烈在财力不支的情况下还要典卖其他书籍来转购此书。有些词籍虽非宋椠元刻，却也能补前人目录之缺，如《养拙堂词》、《省斋诗余》等虽有毛斧季的校语或跋语，但查毛氏批校的《宋名家词》等三种词集从书目录，均无载，荛圃藏书正可补苴。第二，多钞本而少刻本。黄氏尝自云：“毛氏旧藏诸词，余所收最富。”[②]又云：“是时适有友人借毛氏钞本宋元人词，尽发所藏以供展玩。”[③]可见其所藏宋人词籍以汲古阁毛氏钞本为主要来源。黄丕烈虽以“佞宋”出名，但他也知道“无宋刻则旧钞贵矣，旧钞而出自名家所藏则尤贵矣”[④]。词体卑微，刻本向少，而汲古阁精钞，经毛扆、陆贻典手校，价值不让刻本。在此情况下，黄丕烈自然只能以收藏宋词钞本为主了。第三，多有重本。表中所列词籍大半都有重本，这虽出于黄丕烈的藏书偏好，却为其校勘词籍奠定了基础，下文另作论述。

二、黄丕烈的宋词版本学思想

作为一名出色的藏书家，黄丕烈自然对所藏宋人词籍的版本十分留意，这首先体现在对宋词版本的分类与鉴定上。黄丕烈收藏汲古阁宋词钞本最多，众钞本形态各异，他将其厘定为“旧钞手校者”、“誊清稿本者”和“画一精钞者”三种样式[⑤]，所谓“画一精钞者”即指景钞本。这是从学理层面对宋词钞本的版本形态进行分类，分类往往意味着对事物认知的深入和研究的开始。但这种认知毕竟还主要集中在词籍的外观样式上，而在此基础上对一

① 黄丕烈：《宋刻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248页。
② 黄丕烈：《旧钞本〈省斋诗余·养拙堂词〉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251页。
③ 黄丕烈：《旧刻本〈风雅遗音〉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251页。
④ 黄丕烈：《校明钞本〈李群玉诗集〉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七，第164页。
⑤ 黄丕烈：《旧钞本〈省斋诗余·养拙堂词〉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251页。

些稀见版本的鉴定则需要从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序跋、藏印、著录等角度入手，内外结合，综合考辨，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像上文提到的十卷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的情况就更为特殊，不仅“历来书目不载”，而且“装潢甚旧，补缀亦雅，从无藏书家图记，实不知其授受源流”①。文献学家顾千里也只能根据字体、版式等大致判为宋刻，至于哪一朝所刻，就无法确定了。黄丕烈则从讳字入手，发现该本“惟避‘慎’字，‘慎’为孝宗讳，此刊于嘉定时。盖宁宗朝避其祖讳已上，讳或从略耳”②。后来朱祖谋又发现此本所附刘肃序乃写于“嘉定辛未”，确证黄氏所判不诬。此《片玉集》注本沉晦数百载，遇荛圃先生而自明矣。还有不少类似的情况，黄丕烈都能以其丰富的经验和科学的方法作出准确的鉴定，并用题识的形式将鉴定成果一一记录下来。所以缪荃孙称其“跋一书而其书之形状如在目前，非《敏求记》空发议论可比”③，洵非虚誉。

黄丕烈还非常重视收藏宋人词籍的重本与残本，这是荛圃藏书的一大特点，他曾得意地说：“蓄重出之本及不全之本，此余一己之独见也。”④黄氏喜收重本，并不是为了夸多斗靡，而是认为“凡一本即有一本佳处，即如此本固多讹舛，而亦有一二处为他本所不及，故购者必置重沓之本也”⑤。所以如上表所示，荛圃所藏秦观、辛弃疾等人的词籍多达四种，每一种确实都有“一二处为他本所不及”。像林正大的《风雅遗音》，黄丕烈先有汲古阁钞本，卷首有林序一篇，余序俱缺；卷末缺《清平调》词，但《酹江月》上下阕俱在。后来他又购旧刻本，乃南宋翻雕者，卷首有三篇序，但林序缺七行；卷末有《清平调》词，但缺《酹江月》。黄丕烈将二本对勘，使旧刻本得以补足，几还旧观。但若黄丕烈不收重本的话，毛钞与旧刻只能各自守缺，无法合成一善本。从中也能看出，残本仍然保留原书的面貌，自有其价值。正如黄氏自云：“余生平喜购书，于片纸只字皆为收藏，非好奇也，盖惜字耳。往谓古人慧命全在文字，如遇不全本而弃之，从此无完日矣，故余于残缺者尤

① 黄丕烈：《宋刻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248页。
② 同上。
③ 缪荃孙：《〈荛圃藏书题识〉序》，《黄丕烈书目题跋》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页。
④ 黄丕烈：《旧钞本〈庆湖遗老诗集〉跋》，《荛圃藏书题识》卷八，第183页。
⑤ 黄丕烈：《校旧钞本〈归潜志〉跋》，《荛圃藏书题识》卷六，第131页。

加意焉。"[①]许多宋词残本遇黄丕烈而得以保存传世，不少还被补缺为全，成为后人校勘、辑佚宋词的宝贵资料。此非殆宋季词人之幸，亦为宋词研究者之幸！

黄丕烈之所以称得上是版本学家，不仅在于他有宏富的收藏与精审的鉴定，更在于他对版本源流有较深的研究。他曾说："书籍贵有源流，非漫言藏弃而已。"[②]将版本源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自觉提出，这在文献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宋人词籍流传至清代，其间屡经翻刻传钞，已繁衍成一支成员众多的"版本家族"，所以黄丕烈才会收到如此多的重本。诸本之间，谁从谁钞出，谁从谁翻刻，某本又曾校于某本等等，复杂的关系犹如宗族谱系。而且词体卑微，书目记载不详，这就给宋词版本的源流考订带来了困难。黄丕烈采取的办法是先校后考，即先将新收词籍与已有词籍仔细对勘，发现两本之间的差异，然后再根据这些差异来考订其间的源流关系。例如黄丕烈从顾千里处购得元延祐本《东坡乐府》后，先用毛钞本《东坡词》对勘，发现两者序次不一，字句歧异，并非同源。那这毛钞本与元刻本又都从何而出呢？黄丕烈考诸《直斋书录解题》，其中录有《东坡词》二卷，并云集中《戚氏》注叙穆天子、西王母事。毛钞本《东坡词》之《戚氏》有此注叙，而元刻本无；毛钞本还有"绍兴辛未孟冬至游居士曾慥跋"，元刻本亦无。所以黄丕烈判断毛钞本《东坡词》当自宋刻出，而元刻本《东坡乐府》则另有源流。随着宋词版本研究的推进，现在我们知道东坡词集有三大版本系统，除注本系统外，就是宋曾慥辑刻本系统和元延祐刻本系统[③]，荛圃所藏元刻本乃是延祐刻本之源，毛钞本也确为宋曾慥辑刻本之流，黄氏所考不误，首发之功不可没。

前人如毛晋者，虽汇刻宋人词集，却是随得随雕，不重版本；其后毛扆、陆贻典虽有校勘，却少有版本源流、优劣之考订，亦无"蓄重出之本及不全之本"的理论思想，故宋词版本学当自荛圃始。

---

① 黄丕烈:《旧残钞本〈阳春白雪〉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 255 页。
② 黄丕烈:《明刻本〈宋纪受终考〉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二,第 28 页。
③ 刘尚荣:《苏轼词集版本综述》,《苏轼词编年校注·附录》,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042—1057 页。

三、黄丕烈对宋人词籍的校勘

黄丕烈把校勘藏书当作自己的日常功课，曾云："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所好在是也。"[①]故其所藏宋人词籍凡有重本者，多作校勘，有的还一校再校。黄丕烈在校勘宋词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提出了一些理论主张，现撮其大要，概述如下：

第一，对校众本，不惮复校。前文已云黄丕烈收藏宋词"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事实上，这是在进行版本搜集工作。只有先进行这项工作，才能再进行版本源流、优劣的考订与词籍的校勘。所以，喜收重本不单单是黄氏"一己之独见"，而应该是所有古籍整理的基础步骤。黄丕烈校勘宋词的方法基本只用一种——对校法，即将所收诸本一一对照，校其讹误，补其缺漏。例如，他从碧凤坊顾氏处购得述古堂钞本《虚斋乐府》，再从书友处借来景宋钞本，又出家藏汲古阁毛钞本，分别与述古堂钞本对校，发现述古堂钞本《二郎神·次方时父送春》中"白白红红多体态"一句，毛钞本"改'体'为'多'，然重一'多'字，与文义不合"；景宋钞本则亦作"多体态"，故黄氏认为"仍当以'体'字为是"[②]。至于校补缺文，前文已引《风雅遗音》一例，此处不再赘述。由于版本搜集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黄丕烈往往是先得先校，再得再校，至再至三，不惮复校。例如黄氏得乾道刊本《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后由《乐章》一卷，当时他没留意家中已藏毛刻本《山谷词》，便借来护经书屋本《六十家词》中的《山谷词》作为底本，以乾道本对勘，得一校宋本《山谷词》。后来乙酉春日"送考事了，儿辈检箧中亦有毛刻"，便再用毛刻本来复勘校宋本，发现校宋本尚有脱误，黄丕烈不由感慨道："盖校书如扫叶拂尘，洵非虚语。"[③]古书中的讹误脱漏就如落叶、灰尘，需要经常扫，反复拂。这种复校思想的提出，对词籍整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致使《清真词》、《梦窗词》诸集为后人一校再校，愈校愈精。

---

① 黄丕烈：《校宋本〈刘子新论〉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五，第97页。
② 黄丕烈：《述古堂钞本〈虚斋乐府〉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251页。
③ 黄丕烈：《校宋本〈山谷词〉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247页。

第二，只列歧异，存其真面。后人将黄丕烈只指出不同版本间的差异却不校改原本的方法称为“死校”。这种死校法出自他保存古书之“真”的目的，因为有些人强作解事，妄改原文，只会使古书越校越乱，徒添新讹。所以黄丕烈校勘宋词时，若遇歧异，则列于后，或记入题跋，从不轻下雌黄，妄改原本。例如黄氏得二卷本《断肠集》，又从鲍廷博处借来十卷本对校，两者多有不同，但二卷本“有田艺蘅序，似出于明时本，而鲍本之分卷既多，未妥，且词中有校语云‘据毛刻增入’，似出于毛后矣，未敢信，聊记其异而已”。[①]后又见潘訒叔本，与二卷本之词题多有出入，为存其真面，黄氏将其差异一一记于二卷本的跋文之中。这种谨慎的校勘方法既保存了宋人词籍的本来面貌，又汇列了各种版本的异文，为后人进一步校勘打下了基础。

第三，倩请高手，博采众长。黄丕烈的塾师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蘋，是乾嘉时期著名考据学家、校勘学家，以“不校校之”的校勘思想享誉士林。黄丕烈请他校过元刻十二卷《稼轩长短句》、述古堂钞本《虚斋乐府》等宋人词籍。顾千里据汲古阁钞本补足了元刻《稼轩长短句》所缺三页，其余一字未改。至于辛稼轩《鹊桥仙·为人庆八十席上戏作》中“人间八十最风流，长贴在儿儿额上”一句，有人认为当改“儿儿”为“儿孙”，顾千里却认为“儿儿”或是“奴家”之称，“八字”或当“眉字”解，要改“儿儿”为“儿孙”，于文献无证，不应妄改；但他自己的解释也只是一种猜测，所以都没写进跋语中去，只是将这种解释告诉了东家，黄丕烈将此写进了元刻本的题识。虽然后来邓广铭先生认为顾千里的解释也不对[②]，但顾氏审慎的做法至少使稼轩词避免了误于校者，这就是他的“不校”。但在《虚斋乐府》跋语中，顾千里却作出了明确的按断：“上卷《夜飞鹊》云‘竹枕綀衾’。《玉篇》‘糸’部已收‘綀’字。《集韵》曰：‘綀，绤属。后汉祢衡著綀巾。’《类篇》同于六书假借，亦用‘踈’字。此作‘練’，误矣……又《荔枝香近》当云‘凉馆薰风遶’以押韵，毛本讹，与此无异（均作‘凉馆薰风透’），则似宋椠已如是者也。”[③]“綀”误作“練”，于意

① 黄丕烈：《钞本〈断肠集〉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252页。

②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③ 顾广圻：《述古堂景宋本〈虚斋乐府〉跋》，《思适斋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不通；“遶”误作“透”，于律不协。很显然，两者都是因字形相近而出现的错误。顾千里不仅指出了这两处讹误所在，还暗示了出现讹误的原因，故其“校之”。这些校勘成果都被黄丕烈收进了述古堂钞本《虚斋乐府》的题识之中。顾千里为黄丕烈校勘的宋人词籍虽然不多，却很精审，提升了词籍校勘的质量，还在思想与方法上影响着黄丕烈的校勘工作。

黄丕烈常从他人处借来词籍复校，有时也会借给别人，当然，能从他那里借得藏书者，都是极为爱书者，如张訒庵，“爱书之专，校书之勤”，连黄丕烈都自愧不如。张訒庵自藏嘉靖历城王昭刊本《稼轩长短句》，从荛翁处借得元刊本校阅，两者“每多缪讹不合”，“有可疑者则两存之”。后来黄丕烈在撰写校元本《稼轩长短句》题识时，便采录了张訒庵的校勘成果[①]。此外，黄丕烈还曾向鲍渌饮、吴枚庵等人请教，博采众家之长，不仅有利于其校勘的完成，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清人对宋词的整理与研讨。

四、其他考订与阙疑

洪亮吉尝论藏书家流别为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等[②]，能做考订者位列最高。以此标准，黄丕烈自然跻身一流。除了前文所述对宋人词籍版本源流的考订外，他还对词人生平、词集名称甚至是词集传钞者等做出了考证。黄氏收钞本《张子野词》一卷，栏格旁有“幽吉堂”三字，卷中有“颐仲钱孙艾”印和钱氏幽吉收藏印。黄丕烈起初不知钱孙艾为何许人，后有书友携来校宋本《嘉祐新集》，其中亦有“颐仲钱孙艾”印，卷末有钱孙保跋语，云其舍弟曾手钞此书之一部分，今已亡殁。黄丕烈根据此跋与钱孙艾印，初步考订钱孙保与钱孙艾为兄弟行，《张子野词》则为钱孙艾手钞。钱孙保生平倒是有案可稽，黄丕烈从《苏州府志》中找到了相关记载，“钱谦贞，字履之，读书求志，辟怀古堂以奉母；子孙保，字求赤，为人方严抗特，勤读书，有父风”，却未及其次子钱孙艾。后来，黄丕烈又将钞本《张子野词》的笔迹与《嘉祐新集》逐一对照，发现最后一卷《老苏墓志铭》等与《张子野词》乃同出一人

① 黄丕烈：《校元本〈稼轩长短句〉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250页。
②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之手笔，由此确证，钞写《张子野词》的钱孙艾就是钱孙保跋文中所说的那个亡弟[①]。黄氏所考，初步确定了钱孙艾的身份，可补府志之缺；同时对后人了解《张子野词》的传钞情况有所裨益。其他再如考张功甫之史迹、《箫台公余词》名称之由来等，限于篇幅，不加胪列。

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会有其局限，不管是文献上的还是理论上的，黄丕烈也不例外，所以有些词籍的版本、讹字问题没有解决。但可贵的是，他将这些疑问都开列出来，写进题识，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基点。像前文提到的那本宋刻《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黄丕烈根据刘肃序，认为《片玉集》之名似由刘肃所命，"然余旧藏钞本只二卷，前有晋阳强焕序，亦称《片玉词》，是在淳熙时，又为之先矣。若《书录解题》美成词名《清真词》，未知与《片玉词》有异同否？又有《注清真词》，不知即刘序所云'病旧注之简略'者耶？"[②]刘肃在嘉定年间命名美成词为《片玉集》，而强焕本刻于淳熙，亦名《片玉词》，这究竟是刘肃与前人偶合还是他在盗用，还是强焕本的名字有问题？后来王国维也发出过《片玉集》之名"强焕何自用之"[③]的疑问。事实上，美成词确实在淳熙年间刊于溧水，为强焕所裒次，其名为《清真词》；但后来《清真词》被翻印，并被改名为《片玉词》，汲古阁所藏二卷本元刻《片玉词》即为翻刻强焕本[④]。黄丕烈家藏二卷本《片玉词》当从汲古阁来，所以他就搞不清楚这"片玉词"的命名权当归谁所有了。至于黄丕烈所疑《直斋书录解题》中载曹杓的《注清真词》是否即刘肃所云的那个"旧注"，朱祖谋也只是"疑即曹注"[⑤]，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期待新文献的出现了。这种开列阙疑的做法原本是注经领域中的优良传统，乾嘉时为卢文弨等引入校勘领域，现又为黄丕烈用于宋人词籍的整理当中，别有一番深义，后来成为了词籍校勘体例之一种。

综上所述，黄丕烈受当时乾嘉学风的影响，对所藏宋人词籍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他的一些版本思想与校勘方法对后来的词籍整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末朱祖谋辑校《彊村丛书》，所用宋词底本许多便出自士礼居所藏；其

---

① 黄丕烈：《钞本〈张子野词〉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 246 页。
② 黄丕烈：《宋刻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跋》，《荛圃藏书题识》卷一〇，第 248 页。
③ 王国维：《甘遯村居钞本〈片玉词〉跋》，《清真集校注·附录》，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520 页。
④ 吴则虞：《清真词版本考辨》，《清真集校注·附录》，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525—538 页。
⑤ 朱祖谋：《片玉集跋》，《彊村丛书》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21 页。

与王鹏运共校《梦窗词》时所商定的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五条原则，是公认的词籍校勘准则，然除“删复”一条外，其余诸条显然是承黄氏校法而来。所以从词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宋词版本学、校勘学虽至清末方臻于完善与极盛，然其学术基础却在乾嘉；黄丕烈于此有椎轮大辂之功，不可不记。

提　要： 黄丕烈受乾嘉学风影响，藏、校了数十种宋人词籍，其中不仅有像宋刻《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这样的珍本秘册，还有许多重本与残本，为其校雠、补缺奠定了基础。黄丕烈以丰富的经验和科学的方法对词籍的版本形态、源流情况等作出了精审的鉴定和深入的研究，并一一记录在题识当中。在校勘上，他以对校为主，不惮复校；若遇歧异，则只列不改，以存真面；还倩请顾千里等高手，博采众家之长。黄丕烈对词人生平、词籍名称甚至是抄者史迹多有考订，遇无法解决者，便开列阙疑，以俟来者。黄丕烈的词籍整理活动对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以及宋词版本学、校勘学在清末成为词学研究的重要分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黄丕烈　宋人词籍　收藏　整理

第三部分

近世汉文学研究

"口述史小说"的生成与演变

董国炎

一、"口述史小说"的生存土壤

中国是史官文化的国度,很多小说兼有口述史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小说口述史,或者口述史小说。口述史小说的内容特点、形式特点和一身兼二任的独特个性,不是偶然出现,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土壤所生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影响遍及社会人群,遍及社会文化生活各领域。中国文化的基本话语常有"历史叙事"色彩,这是口述史小说的生存土壤,是深层社会文化原因所制约。温带大陆农耕生产具有稳定性和有序性:四季有序,万物有节;应时而动,顺天而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制约人们的思想和思维习惯。血缘宗法制继承关系强调男女之别、嫡庶之别、长幼之别。大到国家,小到部族、家族,都特别在意自己的"根和直根、系和主干、枝和旁枝"。皇帝祭太庙,百姓祭祖,昭穆不混,统绪不乱。在中国,皇权与神权统一,皇权制约神权。重视此岸世界,轻视彼岸世界,重视真实可信,轻视玄虚幻想。老一辈谈话每每以"从前"开头,喜欢从古说到今。国人对"历史叙事",有深层认同和依恋,有各种无师自通的表述方法。

诸子百家都努力讲述历史,同时批评其他各家讲述的历史。儒家、法家、

道家、墨家等等，都展开自己对历史的描述，都把自己的政治理念融入历史叙事，同时批评别人的历史描述。围绕对历史的不同描述，斗争异常激烈。对孔子杀少正卯、孟子辟杨朱这些事情，儒家有自己的描述，其他派别也有自己的描述。围绕孔子生平大事，孔子与盗跖的关系，《庄子》有不少丑陋的记载，但是遭到儒家激烈否定。儒家说《庄子》出于虚构，是小说家言。不过道家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说法。

其他门派逐渐消亡，儒家独尊以后，旧的门派争论走向消沉。但围绕重要的历史叙述，新的观点冲突依然激烈。比如周武革命与伯夷叔齐的态度；比如以庶夺嫡、以幼夺长、以夷变夏、牝鸡司晨等等特殊的民族、政治或伦理现象，都可能受到一派人激烈批评；但另一派人表示理解。儒学内部的历史叙事，也出现明显差异，比如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历史叙述明显不同。而各个民族的历史叙述，存在更大差别和对立。围绕着不同的历史叙述，还发生过残酷的文字狱大案。

各文化部类都主动与历史联姻，稗官小说更主动靠拢历史，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对历史的叙述热情。正统史学家批评他们的故事依托虚诞，也许这正是口述史小说独特的阐释。古人常说：史失而求诸野。主要是求诸稗官小说、田夫野老。稗官小说有一个特点：小说家讲述的历史，其他各派最多轻视而已，但严厉敌视不多。因为小说家没有固定的社会蓝图和政治纲领，不容易为了观念而系统编造历史，不容易成为各家各派严厉攻击的对象。小说家讲述历史，来源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真实程度可能有变形，阐述更不够专业，但是小说家的民间立场，是显而易见的。民间立场决定：小说家讲述的历史，体现了民间意识、民间趣味。这种独特性正是其价值所在。不同时代，都有人喜欢这种独特的历史故事。这正是小说口述史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土壤。

对早期小说的主要形态，班固《汉书·艺文志》做过一个总体概括："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明显表明早期小说形式方面的口述特点。而内容方面，早期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的依附。内容、形式两方面结合，构成早期小说的口述史特征。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小说15家，1380篇。从这15种小说的名称及整理者所加按语来看，这些早期小说的性质可以称为讲史小说。它们都是直接以历史人物或者朝代名称作为小说题目。这15家中篇数最多的一家《虞初周说》有943篇，按语曰：“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这位作者虞初在汉武帝时担任郎官，所谓黄车使者，可能与巡行民间、采集故事的职务有关。小说全名恰好表示：这是由虞初采集和讲述的周朝的故事。这种小说里，口述史的成分可能占很大比例。

早期小说被写定文本、被整理加工的过程，也是口述史创作受到正统文人改造的过程。班固一方面著录这些小说，一方面采取按语或者小注的形式，对这些小说作出言简意赅的批评。例如《伊尹说》，按语云：“似依托也。”《周考》，按语云：“考周事也。”《青史子》，按语云：“古史官记事也。”《务成子》，按语云：“称尧问，非古语。”《天乙》，按语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按语云：“迂诞依托。”

这些按语基本都是针对历史真实性而发，对创作中虚诞、依托的“历史描述”，给以严厉的批评，实际把历史真实性作为衡量小说地位的首要标准。班固作为影响很大的史官，对小说口述历史作出这种严厉的批评，体现了他的正统史学家立场，这影响到后来的文人小说。文人小说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避免明显的虚构，而在当时认为真伪难辨的领域驰骋想象。有趣的是，魏晋六朝文人创作了一批有关汉武帝的虚构小说，还喜欢托名班固。这批小说如《汉武帝内传》、《汉武帝故事》、《汉武帝洞冥记》之类，都喜欢描写汉武帝好神仙，千方百计谋求与神仙见面，有时候自讨没趣，受到神仙的批评斥责。这类小说喜欢托名班固，坚持把虚幻的故事强加给正统史学家。

唐代以后，讲唱文艺日渐发达，在讲唱文艺基础上产生的宋元平话小说，在宋元平话基础上形成的明清评话小说，都保持着口述故事的鲜明特色。这些与讲唱文艺有密切联系的通俗小说，形式方面与“口述”有紧密联系，保持大量说书人的专用术语。如果内容方面能够反映真实的历史，那就具有“口述史”作品的主要特点。明清评话小说口述历史，在倾向性及表现形式方面，都独具特色。首先能够经常反映与官方文献不同的历史真相；再则趣味方面富于民间色彩，对民风民俗和普通社会生活很感兴趣。有不少

作品对当时的"近现代"历史兴趣浓厚,经常根据传闻甚至个人经历叙说历史,呈现出口述史最显著的内涵特征。很多说书人叙说发生不久的重大事件,滔滔不绝,绘声绘色。与史官文献相比较,评话艺人的口述史在传播领域、传播对象、传播效果方面,都有独特价值。

二、"口述史小说"生存之道——对题材的不同处理

面对重大题材,口述史小说采取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变形处理,这往往涉及到特别敏感的政治大事、朝廷要人,甚至帝王本人。这类问题历史著作不敢记载,或者严重歪曲变形。小说采取真实与虚幻相结合的方法,还能够保留一些真相。举凡宫廷权力斗争、朝廷党争、宦官干政等重要问题,小说中有不同反映。这方面重要小说如《唐太宗入冥记》,意义非凡。唐太宗为夺取帝位,杀掉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及弟弟李元吉,还囚禁了父亲李渊。但诚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正史文献把他描绘成慈祥仁爱的圣明之主,受到全方位肯定。然而在民间叙事中,他残杀亲人的历史并不能抹杀。敦煌讲唱文学写卷中保存《唐太宗入冥记》,以离奇的变形形式,讲述唐太宗杀害亲人登基之后的遭遇,描绘唐太宗的阴暗心理与手段。故事讲:唐太宗登基之后,灵魂被捉到阴朝地府,受到追查审问。看到地狱中罪犯受刑罚惨状,他心中很害怕。判官告诉他,捉他的原因是他两个兄弟的冤魂日夜啼哭,苦苦告状:"二太子在来多时,频通款状,苦请追取陛下。□□称诉冤屈,词状迫切,所以追到陛下对直"。

这个判官有一些很具体的审问:"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七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仰答!"这与其说是尖锐的问话,不如说是直接的指责,而且还命令皇帝抬起头来回答。敦煌讲唱文学敢这样对待唐朝开国皇帝,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阴间故事看上去荒诞,但披露了重要的历史真实。唐太宗无法回答审问,更不敢去和兄弟鬼魂对质。他依靠对判官大肆行贿,为阳世的判官家族提供好处,打动判官私心,侥幸逃脱回去。这样处理也是合理的,如果只求痛快,把唐太宗打入十八层地狱,则将与唐太宗做皇帝很久的历史事实严重不符。而且,揭露判官的肮脏自

私心理,揭露无所不在的行贿受贿,别具另一种深刻。这个卷子前后俱有缺失,“入冥记”这个中性名称是王国维拟定,一直沿用。也许本来名称更为尖锐。

另一种处理方法是真实描述,堪称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这种真实描述的作品,突出真实情节,记录具体的人名、地名、各种数据。通篇没有多少艺术虚构,好像缺少艺术吸引力。但是通过讲唱文体韵散结合的方式,抑扬顿挫,描绘渲染,也提高了艺术吸引力。敦煌变文有《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可以称为这种类型的重要作品。这种作品可以看作小说,学术界已经广泛接受。晚唐时期,西部广大地区沦陷于少数民族政权。甘州、肃州、凉州、瓜州、沙州五郡,苦难深重,与朝廷隔绝将近百年。其中唯有敦煌所在的沙州地区,张义潮、张淮深领导百姓,组织军队,捍卫家园。他们奉行唐朝正朔,与朝廷取得联系,重现中华衣冠文明。前一变文描写西南方吐蕃兵马前来侵掠沙州,张义潮带兵迎击。敌军在西同地方败退,张义潮追击千里,生擒敌军宰相三人,俘获三百余人,夺得驼马牛羊二千余头。敦煌以北千里的伊州地方,常受回鹘与吐谷浑之害:“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张义潮长途奔袭,突然攻击,大获全胜。这篇变文反映当时沙州战事、战斗日期和经过、俘虏人数、缴获牲畜种类和数量,并无夸饰之风,令人感觉非常可信,简直堪称信史。出于讲唱文艺,迅速传播,振奋人心,当刮目相看。

《张淮深变文》讲述张淮深继续领导沙州保卫战争,战果累累。他主动派使者去朝廷,迎来朝廷使臣。他带领使臣在沙州开元寺拜谒唐玄宗像,大家想到国家今昔盛衰,想到沙州地区百年历史,不胜感慨伤怀,也激起当前欣慰和保卫家园的决心。这番历史描述,不满足于流水账式的陈述,而有了若干心灵史的意味,也很珍贵。

三、口述风范与现实关注

宋元平话中,讲史类是最重要一大类。其中,当时的“近现代”历史很受重视。早在东京汴梁,就有专门说五代史的说书人。在可分可合的梁、唐、晋、

汉、周《五代史平话》中，常有一些人物、事迹和重要言谈“于正史无征”。例如《梁史平话》中，黄巢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情况；黄巢与尚让在起事之初的经历；朱温不满意黄巢杀戮洗城并且贪婪财物的做法；朱温对黄巢不愿“放散赏军，军有怨言”的形势加以利用；朱温发展壮大实力的过程。其中有很多叙述是独特的。对刘知远、郭威、柴荣等开国君王的描述，在家世出身、个人早期经历方面，常有不见于新旧《五代史》的独特内容。这些描述，风格质朴，感觉很真实，可能源于民间流传的口述历史。

《大宋宣和遗事》叙述宣和年间许多事件和人物。材料既来源于各种史乘、文人笔记，也来源于社会传闻和民间艺人。这部书的编辑撰写比较粗糙，在文体方面，呈现多样风范，从各部分的文笔往往能够看出来源。源于史乘和笔记者，多抄录或者改编原文，文字比较生硬，很多是文言文，可以寻求原著加以印证。源于社会传闻和民间说法者，文字水平不高，却通俗生动，常有非常真实的纪录，还大量记录口语。例如早期《水浒传》部分，杨志卖刀杀人被发配，在押送路上——

> 正行次，撞着一汉，高叫：“杨指使！”扬志抬头一觑，却认得孙立指使。孙立惊怪：“哥怎恁地犯罪？”扬志把那卖刀杀人的事，一一说与孙立。道罢，各人自去。那孙立心中思忖：“杨志因等候我了，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只得星夜奔归京师，报与李进义等知道杨志犯罪因由……

再如晁盖智取生辰纲之后，公差侦破案件，捉住酒店老板审问——

> 花豹依实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时分，有八个大汉，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问我借一对酒桶，就买些个酒去烧香。”张大年问：“那八个大汉，你认得姓名么？”花豹道：“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

以上情节不见于其他记载。这种生活化口语化的文字，在《宣和遗事》

全书中显得“与众不同”。其实这种风格变化与口述历史的题材变化正相吻合。以往的口述历史，被叙述的对象主要还是帝王将相。宋元时代口述历史中，最喜欢述说草莽英雄发迹变泰的故事。《五代史平话》中，主要叙述后来成为帝王将相的人物。早期《水浒传》故事中，大量描绘草莽英雄、民间好汉，口语叙事更为真实。语言变化带来艺术风格变化，整个故事更为生动粗犷。叙事节奏变成快慢搭配，有时重现口语原貌，详细描绘说话语气；叙事更为跳跃自由，速度较快。口述历史对白话小说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元讲史平话，在理论层面表现出自己的“现代意识”。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小说引子》一篇，载有一首讲史所用的开场唱词。唱词末四句云：“唐世末年称五代，宋承周禅握干符。子孙神圣膺天命，万载升平复版图。”这段唱词重视历史的延续，强调南宋政权的正统性，坚信他们必定收复失地，恢复版图。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贯穿于讲史平话，使南宋讲史平话特别关注“现代历史”。据吴自牧《梦粱录》载，咸淳年间讲史平话艺人王六大夫原是御前说话人，他演说的《复华篇》、《中兴名将传》等书目，在当时最受欢迎。南宋被称为中兴名将者，大致包括韩世忠、张浚、刘琦、岳飞等人。他们的事迹传播社会，受人敬仰。朝廷和民间对他们评价不同，特别对岳飞的看法，可能很不相同。平话之中可能保存许多真实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口述史著作。这两种书目后来失传，或许正是因为内容的真实和尖锐，既不容于权臣，也不容于后来的元朝统治者。

四、明清“口述史小说”的功能与传播

明清评话小说“口述历史”增多，重要原因是通俗文艺消费市场已经形成。因为口述史小说受到重视，出现了很多实用主义的直接利用。《英列传》讲述明朝开国君臣故事，故事中郭英在鄱阳湖大战中射死陈友谅，对朱明政权最终获胜，功劳很大。嘉靖间郎瑛《七修类稿》极力称赞郭英。他特别指出：这件事情史官失载，应该称赞《英列传》保存史实的功劳。然而万历年间沈德符《野获篇》却说，是郭英的后人武定侯郭勋为了个人目的而伪造历史，

并且安排编演《英列传》,“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演唱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上因惜英功大赏薄……”于是郭勋得到很大好处。

万历年间因为征讨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战事,发生四川巡抚李化龙与贵州巡抚郭子章的矛盾。矛盾的关键是对这场战争中,二人功过是非的记载不同。李化龙及其手下利用评话小说,郭子章则汇编材料,撰成野史,互相攻击指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4郭子章《平播始末》提要说:

> 万历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郭子章方巡抚贵州,被命与李化龙同讨平之。子章尝有《黔记》,颇载其事。晚年退休家居,闻一二武弁造作平话,左袒化龙,饰张功绩,多乖事实。乃仿纪事本末之体,以诸奏疏稍加诠次,复为此书,以辩其诬。

李化龙一派的平话指《征播奏捷传》小说,有四川佳丽书林刊本。卷首小引称赞此书“观其言事论略,皆有根由事迹,悉同之蜀院发刊《平播事略》……”蜀院发刊类似于地方政府简报,应当也是可靠的。我们无意分析上述人物的是非功过,以及这部评话小说的可靠性,只是注意一些人对“口述历史”的特殊态度。口述史小说有可能受个人目的左右,成为主要弊端。晚明时期,表现当代历史的小说明显增加。围绕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斗争,围绕辽东战局,围绕地方重大事件,都有所谓纪实小说很快出现。动机不一,真伪并存,艺术水平也有高低。这些作品、这种文学现象,都很值得研究。

例如松江地区出现的《黑白传》评话,真实又迅速反映当地大豪绅横行不法、气焰熏天的情况。而且这部评话还引发激烈的群众斗争,是难得的社会史料。所谓黑白,指松江乡绅董其昌和陆兆芳。董其昌是著名官宦文人,号思白。陆兆芳只是普通乡绅,他生得脸黑。董其昌势力很大,横行乡里。他看中陆兆芳家的侍女绿英,竟指派儿子带领二百多人到陆家大打出手,抢走绿英。当地舆论普遍指责董其昌,随即出现评话小说《黑白传》。此书以这“黑白”二人为主要人物,以品评无赖恶霸的口气,调侃嘲骂,把董其昌说得极其不堪。这书不胫而走,到处评说。董其昌恼羞万状,抓来他怀疑是小说作者的范某人,私设公堂拷打,致使范某屈死。事情激起民愤,松江等地

百姓,无不欲杀董其昌而后快。外地来松江的各类商人、船夫和三教九流都参与斗争,揭露材料传播很快、很广。随后出现的《民抄董宦事实》云:"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最后大批民众冲进董宅抄打,董其昌一家狼狈逃走,民众火烧董宅。此事可参看1964年6月2日《人民日报》,冶秋文章:《民抄董其昌一案述略》。在整个事件中,评话小说迅速又真实地反映社会重要事件,起了很大作用。

清代社会风气、学术风气与明代有很大不同。加之统治者的控制,都影响到口述史小说的发展。总体看来,清代口述史小说不够发达,但是在清初、清末以及思想文化控制相对宽松的时期和地区,仍然产生了不少口述史小说。有些作品描写清兵入关之初,各地的反抗斗争,艰难曲折,屡挫屡奋。描述官员和士绅的态度、政权的更迭情况,都非常真实,正史中根本没有这种反映。清末苏州评话《张文祥刺马》,真实描述当时封疆大吏、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始末,直接驳斥了当时官方文献对刺客的污蔑,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有一些作品,整体上口述史价值有限,但是部分记载非常真实,非常珍贵。例如三藩之乱时期,广东潮州汉军反叛朝廷的故事《刘进忠三春梦》小说。这部小说的战争描写,在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绝对是一个另类,但却是真实可信的。在我们常见的战争小说中,总是描写两员大将大战多少回合,双方兵卒们总是摇旗呐喊,作用有限。正史记载中,虽然不见这类大战几百回合,但也是集中于主将的勇武和谋略。士卒个体不受关注,小民个体更不是描述对象。《刘进忠三春梦》中却是完全不同的描述。在这部小说中,汉军兵将在常规战斗中,远远不是彪悍八旗兵将的对手,连汉军统帅刘进忠本人也被打落马下,狼狈逃命。在争夺潮州城的巷战中,汉军开始处于守势。但是城中百姓参战,有全民皆兵之势。四乡八镇百姓,也纷纷前来参战,形成不分前后左右的立体战争:正面大街上,汉军依靠陷阱、木栅栏、弓箭、火枪、灰瓶、石块、长矛,步步死守。街道两旁窗孔内,军民用弓箭和火器袭击八旗兵。广大百姓在屋顶参战,"晒台屋顶百姓子弟将石子、秽物、缸片打将下来"。旗军身经百战的头号猛将,竟然丧身在这样的战争中:

> 豆腐店铁心肝张宝见旗军到来，就将一桶粪溺在铺顶上面泼落，谁料一桶秽物泼下，余无别物可发，只剩一个溺桶，想到讨你何用，不如将此桶随手抛掷下去，不先不后，刚刚抛到光明头上。邓花面头上被那粪桶罩下，盖了头面，却被温岳川同众将赶上，一同手起刀落，片刻之间，剁为肉泥。

自古以来战争小说中，有关一方主将死亡的描述不少，然而这种死法的描述，真是少见。在这样生动的情节中，现场参与的个体被突出，不管他是普通士兵，还是豆腐店主人，他们不同于其他小说中的英雄好汉，而是一些更平凡的普通百姓。他们好像没有武功，甚至没有武器，但是却得到记载和赞赏。记载和赞赏他们的人，可能就是街坊邻居中的说书人。豆腐店张宝也有绰号，但不同于江湖好汉的绰号，而是诸如“铁心肝”这样的市井绰号。最普通市井百姓及其日常生活，与英勇壮举也可以联系。这给我们一种特殊的真实感，还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正是口述史小说的独特魅力。口述史小说记载过众多历史事件，其中很多记载有独特的真实价值，这是这种作品保存历史真实的重要功能。怎样认识并正确处理以上两种功能，不但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提　要：中国史官文化发达，有些说书体小说以比较真实的纪实风格讲述历史故事，可以称之为口述史小说。有些作品讲述当时重要事件和人物故事，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空白，纠正了历史文献的曲解，有珍贵的史料研究价值。有些作品则对社会史诸多方面、特别民俗风情，有真实详细的描绘，这弥补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薄弱环节。口述史的生存之道和传播特点都很值得研究。

关键词：口述史　生存　功能　传播

稗官野乘悉为制义新编

——游戏八股文概观

黄　强

游戏八股文是指融入八股文的一种或几种文章要素而写成的或幽默、或诙谐、或庄重的文学小品，是中国古代文体家族中极为特殊的一体，属于俗文学的范畴。由于种种原因，历来人们忽视了游戏八股文的存在，如今可谓重新“发现”了它。科举时代，游戏八股文就不起眼，推崇正宗八股文的明清文人绝大多数对之不以为然，随着科举制成为历史，曾经喧闹一时的八股文烟消云散，它更是湮没无闻。文体的多样性是由每一个文体种类构成的，文体的多样性反映了文体演变的规律，每一种文体都是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无论这种文体大小如何，品位高低，均有其考察的意义；更何况游戏八股文的“游戏”性质，无论就内容还是形式而言，都是对正宗八股文的一种反拨，从而将中国古代游戏其貌、正经其心的“以文为戏”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呢？

一、游戏八股文的由来与种类

游戏八股文从正宗的八股文中衍生出来，或与之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

又与母体有着不同的品貌。八股文是中国古代文体中综合性最强的一种，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兼容了几乎所有文体的要素，又形成了区别于古文等文章体裁的鲜明特征，诸如代言体的虚构性、题型的多样性、“律文”的声韵特性、为文之法的趣味性等等集于一体，确也不可谓非文格之创体。自幼从事八股文训练的明清文人在日常练笔时，很容易产生八股文的游戏之作。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云：“万历后作小题文字，有谐谑失度，浮艳不雅者，然未至如(周)延儒，以一代典制文字引申圣言者而作‘岂不尔思’、‘逾东家墙’等淫秽之词，其无所忌惮如此。”[①]由此看来，搜取“四书”中风流话头戏作八股文，明代万历以后已开风气，连周延儒这样后来中了状元的人也在所不免。

正宗八股文中小题类的戏作尤其多，这是因为小题截取经言为题，相对于意义明白正大的大题而言，内涵外延显得陌生和不确定，从而造成了理解取向的多元化，代言者可以在被动中有“主动”，在理解取向的选择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获得了文心活跃而带来的愉悦。王思任《唐诗记事序》云：“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②]为人诙谐幽默的王思任本人就擅长小题文，焦循《易余籥录》卷十六云：“八股有小题，或枯窘，或游戏，如诗之咏物，宜出以古雅，令人解颐。明末王遂东最工于此。”[③]由此可见，小题文是对八股文文学因素的一种机智运用。王思任将小题文中的文心活跃之作视为有明一代“必传之言”，可见其之推崇，也可见当时小题文中的戏笔必不在少数。

小题文中的戏笔虽然对游戏八股文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但还不是本文所认定的游戏八股文，游戏八股文是好事文人随意拈题、有意识地利用八股文或变化了的八股文文体而创作的文学小品。当包括小题文在内的八股文训练服务于科举考试时，其实用性相对掩盖了其所包含的文学因素，而游戏

① 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3 页。

② 《唐诗记事序》，《王季重十种·杂序》，《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上海杂志公司 1936 年版，第 79 页。

③ 焦循：《易余籥录》卷十六，光绪戊子夏德化李氏刊木犀轩丛书本，第三十册第十叶。

八股文将此种文体运用于文学领域，减少了其严格束缚所造成的弊端，大大张扬了八股文的文学因素。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游戏八股文不等于都是正宗八股文的结构形式，例如，集“四书”原句为题的作品被清代文人称之为“制艺”，在文章形式上却相当随意，根本不是正宗八股文的结构形式，游戏八股文的出现也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孙仁孺《东郭记》传奇刻本卷首附列的萧伯玉题为《齐人》的一篇是现存最早的游戏八股文。此文虽以《孟子》中描述的“齐人”为题，但嬉笑怒骂，极滑稽之致，作者一肚皮愤世嫉俗之郁闷俱倾泻笔下，分明是有意而为的讽刺文学小品。文前小序云：“尝读萧伯玉《齐人》篇戏作十首，各一仪局，俱堪诸笑。聊刻其一，以为此传别录，即以作跋可也。游戏之仙，滑稽之圣，当不令汤若士独有临川。”[①]仅“齐人”一题，萧伯玉的游戏八股文竟多达十首，而且孙仁孺以之与汤显祖的传奇相提并论，认为毫不逊色。《齐人》这样的戏作不断出现，文人的游戏神通由此及彼，一发不可收拾，游戏八股文的题材和内容越来越丰富，明末清初乃至于出现了“稗官野乘悉为制义新编”的文化景观。[②]金圣叹作过集“四书”文句的《春郊演剧》。[③]褚人获《坚瓠十集》卷三“遗臭文词”条云：“顺治甲午春，郡中陇西翁与太原君有虞芮之讼……滑稽者乃序其事，而次之以《开场始末》一折、《四书文义》五篇……颜曰《遗臭文词》。”[④]如此则现实中的狱讼都可以成为游戏八股文的素材。顺治、康熙年间，代戏曲人物立言的《西厢》制艺的出现，为游戏八股文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效法者变本加厉，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一“侮圣人之言”条有云：“吴门有某秀才者，狂放不羁，每以经文断章取义，或涉秽亵语，作四书文，如‘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则慕少艾’、‘男女居室’为题，令人不忍卒读，较《西厢》制义、《春郊演剧》尤有甚焉。”[⑤]游戏八股文还能被编成专集，《清稗类钞》云：“平湖钱起

---

① 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 1989 年版版，第二册，第 1334 页。吴梅先生引此段文字时，首句标点为“尝读萧伯玉《齐人》篇，戏作十首”，认为“戏作十首”的是孙仁孺本人，细玩文义，非也。参见其《东郭记·跋》，同书第二册，第 1336 页。

② 叶梦珠：《阅世编》卷八《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3 页。

③ （清）顾公燮等编：《丹午笔记》“金圣叹《春郊演剧》集《四书》文”条，凤凰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

④ 《笔记小说大观》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年版，第 15 册，第 324 页。

⑤ 《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年版，第 25 册，第 155 页。

隆有所著制艺一卷，名《采芳集》，皆摘‘四书’中艳丽字句，游戏成文，嘻笑怒骂，无所不有。”[1]类似的游戏八股文虽被视为“侮圣人之言”，但它们的出现是反对者所无法阻止的。直至1915年末，北京还传抄过讥讽袁世凯聚集党徒鼓吹恢复帝制的游戏八股文《筹安会》[2]。从万历后到此时的三百多年中，游戏八股文竟也一脉相承。

尽管流传至今的游戏八股文只占曾经有过的总数的一小部分，但也足以供我们考察其基本面貌。集中收录游戏八股文的专书主要有黄周星《夏为堂全集·秋波六艺》、钱书《绣像西厢时艺雅趣藏书》、《才子西厢醉心篇》（佚名编）、范滨《六才子西厢文》、《唐六如先生文韵》（佚名编）[3]；缪莲仙编《文章游戏》初编及二编[4]；《岂有此理》（佚名编）[5]、《更岂有此理》（佚名编）[6]；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四册中的《讥讽类》等等，余则散见于各种笔记或小说中[7]。

按照不同的标准，游戏八股文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以文题区分，主要有以《西厢记》曲词为题者，如《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佛啰成就了幽期密约》等等；有以民间俗语为题者，如《急来抱佛脚》、《秀才人情纸半张》、《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头》等等；有以割截“四书”文句为题者，如《齐人》、《使铜银》[8]、《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9]等等；有以事件为题者，如《春郊演剧》、《乡试》、《求雨》、《平定江南文》等等；有拈出某一类人物为题者，如《王髯笑柄》、《嘲军机章京》、《村学究文》、《皇上帝赞》等

①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讥讽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四册第1556页。

② 本文见《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287页。文前述缘起云：“流寓青岛遗老闻筹安议起，有为筹安会八股体制艺者，北京传抄之。”

③ 以上五种专书的版本见王颖《〈西厢〉制义考》，《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④ （清）缪莲仙编：《文章游戏》初编及二编，道光元年经纶堂刻本。

⑤ 《岂有此理》，嘉庆四年己未刻本，绛雪庐藏版。

⑥ 《更岂有此理》，嘉庆五年庚申刻本，绛雪庐藏版。

⑦ 本文所提及的游戏八股文除散见者分别注明出处外，余皆见于上列专书，为节省篇幅，不另说明。

⑧ 五色石主人著，陈翔华、萧欣桥点校：《八洞天》卷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113页。

⑨ 邹弢：《三借庐笔谈》卷五“笔籙”条，《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26册，第345页。

等。以文体加以区分，主要有相对正规的八股文体，如以《西厢记》曲词为题者和以民间俗语为题者；有集"四书"句体，如《元帅会》、《由吾》、《道士四书文》等等，此体相当特殊，乃是根据题意的需要，将"四书"中现成的句子组织成文，至于这些句子在"四书"原来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有时候会发生变异。以表现手法而论，或写景，如《虎邱制艺》；或抒情，如《西厢》制艺；或叙事，如《春郊演剧》；或议论，如《穷》、《厘正文体上谕书后》、《嘲军机章京》等等。以是否入口气为标准来衡量，可以区分为代言体与非代言体两大类。《西厢》制艺大都是代言体，而俗语题者一般使用第三人称，不入口气。勾勒市井生活者如《交易制艺》、《戏馆制艺》、《酒席制艺》、《赌场制艺》等，也都不入口气。

二、游戏八股文的独特意蕴

游戏八股文从根本上转移了八股文的功能，变"代圣贤立言"为代芸芸众生立言，力求其能够反映更多的题材内容。就内容层面而言，游戏八股文的游戏性质主要是指其利用了八股文的文章要素，却并不以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宗旨为目的，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即使是以"四书"文句为题的游戏八股文同样是如此。平心而论，"以文为戏"自古以来就有纯正与油滑之分，游戏八股文中也有极少坠入恶趣的油滑之作，然而，绝大多数游戏八股文游戏其貌、正经其心，以独特的意蕴显示出与正宗八股文不同的价值。

第一，对文学形象心灵世界的开掘。这种价值在《西厢》制艺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作为古代戏曲的杰作，王实甫的《西厢记》丰富优美的曲词堪称剧诗的典范，在刻画人物心灵世界方面达到了传神的效果，但剧诗意无穷而言有尽，这就为代言体的八股文进一步开掘《西厢记》杂剧人物的心灵世界留下了空间。畅发文题意蕴乃八股文擅长之技，《西厢》制艺使得每一题题无剩义。

剧中红娘对张生的感情历来是许多研究者所讳言的话题，认为过于强调这种情感会损害红娘的形象，孰不知红娘也有源于自己现实地位的追求，她曾与张生有过这样的约定："不图你甚白璧黄金，只要你满头花，拖地

锦！”(第三本第四折)也就是说，红娘希望与张生成婚，做小夫人。对此今人已有考证者[①]，而早在清初钱书的游戏八股文《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中，已将红娘对张生的爱慕之情作了精细入微的刻画，文中以“自见于梵宫，而此情动矣”，“自见于寺警，而此情又动矣”二股，将红娘从佛殿相遇到白马解围后对张生逐渐增添的感情，刻画得丝丝入扣。《唐六如先生文韵》中的同题文更是直白：“向者僧前致语，娓娓可听，我所以拒之者，特为其造次以陈辞，其实已心许之。向者法会趋跄，依依近人，我所以诮之者，特怪其仓皇之无谓，其实已心照之。”文后评云：“红娘何尝心硬？若心硬便不留情矣，其自言心硬者，正越见得留情之至也……却是作《西厢记》人，代他瞒过耳。”是的，《西厢记》作者“瞒过”的情感，赖《西厢》制艺娓娓道来。

《赖简》一出，明明是莺莺约张生到园中幽会，她却当场变卦，原因何在？今人猜测不已。《唐六如先生文韵》中《便做道搂得慌也索觑咱》虽是代红娘立言，却借红娘被误搂而道出了张生最终被莺莺“赖简”的原因：“大抵幽期密约，原非躁率者可为，其事则甚忙，其心则甚暇。冒然一搂，谨闭者固如是耶？”“无论我非应搂之人，即使其为意中人也，白首之盟何其郑重？秀才以一搂遂乃愿乎？犹幸我非必不可搂之人，假令其为堂前人也，青春之子何以为颜？秀才竟一搂败乃事矣。”所揭示的原因有三：张生的卤莽急躁；莺莺对“白首之盟”的担忧；莺莺对老夫人的畏惧，真是击中要害！《西厢》制义选题遍布全剧每一折，题题以小见大，数十篇的连缀组合，为《西厢记》全剧开一胜境。

第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游戏八股文并非只是无关痛痒的“游戏文字”，恰恰相反，它们的作者同样将现实生活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同样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游戏笔墨中寄寓严肃的内容。

社会新闻在游戏八股文中也得到反映。如苏州王三胡子有二侄，其阿二秀才，来则饭之，阿三童生，来则不饭，有人仿时文体嘲之。末二股云：

> 惜也！阿二仅得为秀才也。浸假而为举人焉，浸假而为进士

① 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焉，浸假而为翰林焉，王三胡子方且援屁捧臀之不暇，而奚止于一饭？幸也！阿三犹得为童生也。浸假而为雇工焉，浸假而为轿夫焉，浸假而为乞丐焉，王三胡子又且闭门驱逐之不暇，而奚止于不饭？

结论是："势利起于家庭，至王三胡子而已极矣。"

《厘正文体上谕书后》一文针对慈禧太后关于厘正八股文文体的所谓上谕冷嘲热讽，表现出在八股取士制度行将就木的时代，作者所具有的沉重的忧患意识：

今又懿旨下降矣，诰诫试官，禀承有自。鉴衡偶舛，磨勘之咎难辞，吾知保四千年中国之文明，壮四千万士林之元气，恃此一策也。周公、孔子，斯文未丧，保佑命之已，猗欤盛矣哉！文明以正，有道万年，他邦人士，行将拭目俟之矣。

可想而知，此文对八股文即将被彻底废除的历史命运的影响。《筹安会》愤怒声讨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可笑行为，大声疾呼："筹安会诸君乎，非今之所谓民贼而何？"与《厘正文体上谕书后》堪称姊妹篇。

社会生活特别是市井生活的许多现象均被游戏八股文的作者摄入笔底。《戏馆制艺》描绘了嘉庆初年苏州山塘一带戏馆密布，花雅竞呈，不同剧种声腔交相辉映的火热场面："歌一曲而丝竹均谐者，越调昆腔之谱，演集秀则赞其声容，唱萃芝则夸其情节，此非有色有声之乐事乎？然清歌虽能悦耳，而乱弹亦可开心，试观击鼓鸣锣，梆子熟枪刀之法，秧腔放烟火之光，而点烛齐全，摆款样于戏园之热闹。"《元帅会》叙写民间气氛热烈的迎神活动；《乡试》叙写士人对待考试的不同态度和天壤之别的结果；《放生》充分肯定动物保护的合理性；《求雨》表现清代后期人们面对干旱的无奈和乞求甘霖的场面；《由吾》抨击了毒化社会的赌博风气；《妁》形容巧舌如簧的媒婆能将"宿瘤也以为仙姬，姣童也以为娇客"，"优隶也以为俊秀，贫窭也以为豪华"的惯伎。

第三，对世态人情的揶揄。相当一部分游戏八股文对世态人情的揶揄堪称一绝。例如，《习医四书文》感慨庸医遍布天下："甚矣！不幸而有疾，是则可忧也，医来，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哀哉！"《交易制艺》呼唤商品交易的诚信，披露了黑中介种种瞒天过海的宰人手段。《和尚拜丈母第一遭》揭示了"今之做和尚者，则尽有丈母"的奇异现象。与此相对，《师姑养儿子众神着力》则云："师姑亦禅门也。和尚既拜丈母，师姑岂无夫婿？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吾道推原之论也，而是可充夫养子。"所谓遁入空门者之虚伪，于此可见一斑。《猢狲戴帽儿学为人》、《老虎驮蓑衣没人气》主旨相近，前者揶揄"世之沐猴而冠者"，后者"讥刺世之肖蓑衣者"，均入木三分。后者有云：

> 而世之类老虎者不少矣！时穷则智短，慕万锺之富，而富属子虚；袭千乘之荣，而荣归乌有；皆作驮蓑衣观焉可也。通其说宜与啣砻糠之麻雀等量齐观。而世之肖蓑衣者更多矣，鼠窃狗偷之辈，俨然舜步而尧趋；贩夫俗子之流，倏尔峨冠而博带；皆作没人气睹焉可也。充其类直与戴面具之猢狲相提而并论。

上股写迷恋子虚乌有的功名富贵正如老虎驮蓑衣，下股写自以为得意者不过是戴面具之猢狲。

民间俗语往往是世态人情的概括，因此，俗语题的游戏八股文大多揶揄世态人情。《怕老婆的都元帅》调侃"元帅之令行于三军，而娘子之令复行于元帅"的惧内风气，《急来抱佛脚》刻画"事迫途穷，徒作无可如何之态"，《晴天不肯走直待雨临头》批评世间懒人"举动纡迟，心神缓懈"，"天道之或晴或雨总不关怀，充其类春不肯走而待夏，夏不肯走而待秋冬也，大抵如斯矣。人情之宜雨宜晴终无介意，充其类少不肯走而待壮，壮不肯走而待耄耋也，大抵如斯矣。"《秀才人情纸半张》极言寒士之情薄而又薄，《枪手》写尽其人操纵自如，而决胜于风簷寸晷的本领。

虽说揶揄世态人情，但游戏八股文毕竟都是文人所为，揶揄之中不免网开一面，偏袒落魄之文人秀才。《秀才人情纸半张》写尽穷酸窘相之后，末尾

笔锋却陡然扬起："窘哉！秀才而窘，莫窘于纸，显亦莫显于纸也。异日名魁榜第，而昔日之寸楮以加遗者，今则报以满幅之泥金。"得意之态，溢于字里行间。《枪手》中虽也有"要之名列刑书，法无可逭，惟冀三宥之典，如戴二天"之类谴责的话，但通篇却处处为枪手开脱："若夫名未登于天府，身则困于篷门，亲老家贫，飘零湖海，故不得已而为枪手焉。"如此开脱，甚至令人疑心作者也曾有过作枪手的经历。

第四，对自我孤愤的倾吐。游戏八股文的作者多有名不见经传者，穷途落魄，愤世嫉俗，不免借此体聊抒孤愤。缪艮的《穷》一文虽系集"四书"文句而成，但文义晓畅，充溢"穷则独善其身"的正大浩然之气。面对"饥饿不能出门户，一瓢饮，一豆羹，免死而已矣"的窘境，作者认为应坦然处之：

> 天地之大也，食夫稻，衣夫锦，人皆有之，我独亡……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愉愉如也。君子谋道不谋食。朋友之交也，与之釜，与之庾，不识有诸，曰：亡矣……贫而无怨，贫而无谄，侃侃如也，君子忧道不忧贫。

好一个"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能够到达这一境界，诚如文中所云，对于富贵，自然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功名，自然是"他日，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则安富尊荣，若固有之，分定故也"。卑之无甚高论，行之却大不易。

《嘲某入学》中调侃不学无术的秀才，《乡试》中嘲笑"其既得之也，宜若登天然"的举人，《村学究文》中挖苦误人子弟的迂腐塾师，均是胸中块垒，借"四书"文句截搭成的妙文化解之。

第五，对"四书"题意蕴的形象阐释。以"四书"文句为题的游戏八股文由于是作者兴到笔随之作，既无须依从朱熹的集注，又不必谨遵八股文的一般程式，换言之，作者获得了无异于文学创作的自由，因此，在代言时，文笔往往能够左右盘旋，充分挖掘和回护题义，使之更加血肉丰满和形象可感。例如吴之彦的《胁肩谄笑》小品文，题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中二股云："肩卑乎首，胁之而肩反高乎首；肩附乎背，胁之而肩忽远乎背。笑发乎心，

谄则违心而仅谐于面；笑因乎事，谄则无事而强柔于色。”[①]小人胁肩谄笑尽至于肩高乎首，肩远乎背，竭尽夸张渲染，嘲讽挖苦之能事。虽代孟子立言，却也寄寓了作者本人对谄媚者的鄙视。《攻乎异端》一文系一女子因丈夫不纳忠言，执意弃儒就释，削发入山而作："夫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吾末如之何也已？""呜呼！远送之门，哭泣之哀，而良人未之知也……已而已而，盍归乎来？"[②]创痛之深，使得"攻乎异端"斯言有了更具体可感的故事内涵。

三、游戏八股文的欣赏趣味

一种文体的确立，除了取决于它曾有过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得到当时和后来人约定俗成的认可（即使对内容的贬斥态度也是对文体的一种认可）；有源于内容因素的价值支撑这三个条件以外，还必须具有足以吸引欣赏者的趣味。然则游戏八股文特殊的欣赏趣味何在？曰相对于正宗八股文而存在。

一曰通俗之趣。"清真雅正"在清代被标举为正宗八股文的最高境界。其实"清"、"真"、"正"三者也可视为广义的"雅"。"清真雅正"这一标准是"代圣贤立言"所带有的霸气的雅。恰恰相反，游戏八股文所呈现的则是一种稚气的俗。之所以稚气，是因为游戏八股文尽管曾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但作为一种文体，毕竟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展示，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其欣赏趣味的俗还处于尝试阶段。

通俗，一是表现在题材上。《扶小娘儿过桥》、《钟馗着鬼迷》、《肚疼埋怨灶君》、《老虎吞蝴蝶儿》这样的俗语题文，其题材之通俗自不必说。游戏八股文所选择的许多题目，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他文体做过，也很难想象其他文体会选择这样的题目；而且即使做了，会有游戏八股文这样的效果。代剧中人立言的《西厢》制艺，甚至是"四书"题文，也都表现出题材的通俗化。"西厢"故事本来就是家喻户晓的通俗题材，《西厢》制艺更是将其中为人们所称

① 焦循：《易余籥录》卷十六，光绪戊子夏德化李氏刊《木犀轩丛书》本第三十册第十一叶。
②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十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7页。

道的通俗文句作为演绎的对象，如《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我是个多愁多病的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亲不亲尽在你》、《难道是昨夜梦中来》等等，无不概括超越时空界限的青年男女之间的世俗常情，有的文题已经成为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俗语。

通俗，二是表现在语言上。相对于正宗的八股文而言，游戏八股文的语言显得浅俗。集“四书”文句成文者虽然今日看来显得晦涩，但在清代科举社会中，对一般读书人而言却是十分通俗的。除此以外，游戏八股文或是浅近的文言，或在浅近的文言中施以口语。《唐六如先生文韵》中的《佛啰成就了幽期密约》一篇，叙张生祈祷菩萨玉成自己与莺莺的好事，竟让张生一连吐出 17 个诵经术语“佛啰”，例如：“佛啰！如珙之与莺，可缔同心于百岁，早移来撮合之山；佛啰！如莺之与珙，曾私一笑于三生，善付嘱氤氲之使。”憨态可掬，令人忍俊不禁。《钟馗着鬼迷》有云：

> 当是时，大鬼小鬼，既上天而落地；强鬼弱鬼，乃后应而前呼，左窜右跳者，溜打鬼也；装妖作怪，形容鬼也；比肩并立者，鬼夫妻也；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鬼婆婆也；若即若离，若有若无，疑心中之暗鬼也；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枕头边之妖鬼也。男鬼曰：“吾放鬼剑，尔何以阻我？吾起鬼人，尔何以见我？”女鬼曰：“吾扮鬼脸，尔何以笑我？吾怀鬼胎，尔何以堕我？”

信手拈来《醉翁亭记》、《前赤壁赋》中的成句，又杂以“扮鬼脸”、“怀鬼胎”、“疑心生暗鬼”等等俗语。此种语言构成，在其他文体中同样很少见到。

题材的俗和语言的俗，关键在于游戏八股文作者写作动机上对俗趣的追求。兴之所至，走笔为文，各取所需，各逞己意，以游戏之名，行玩世不恭之实，雅的趣味与游戏文字是不相容的。

二曰虚构之笔。此亦相对而言，正宗的八股文既是“代圣贤立言”，不可能没有虚构的成分。对作者而言，借八股文立言的过程，也就是化其身为代言对象，传其神、刻画其形象的过程，须设身处地、梦往神游，“刻画千古圣贤

之须发眉面，与夫毛孔衣褶之微，靡不精致。”[①]“必使人恍然见三代之遗而后为无愧。”[②]

游戏八股文的文学虚构性脱胎于正宗八股文。然而正宗八股文的代言对象不过是尧舜孔孟等圣人贤人，揣摩其音容笑貌必须虔诚规矩，着不得游戏笔墨，纵使学富五车，厚积薄发，无奈题目有定，朱注有准，岂能任意纵横驰骋？因此虚构的余地有限，此所谓之“实”也。而游戏八股文选题是自由的，即使以经言命题，也是因有切身感触而取之，无须谨遵朱注，无须仰人鼻息，可以顺题发挥，直抒胸臆，更可以借圣贤之题目，发自己之心事，借助于隐蔽的曲解甚至偷换，驱使儒家经典原句为我所用，注我思想，因此，游戏八股文事实上进入了视接千载、思通万里的文学虚构领域。

《西厢》制艺的每一篇无不以悬想的虚构笔墨取胜。或猜度人物情感，如《才子西厢醉心篇》中的《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一文云：“纵异日者，西楼闷倚，忽见山色中有夹道而驰者，仿佛伊人也……南郊极望，忽见残照里有扬鞭而前者，依稀伊人也。”让莺莺遥想张生他日人归故园的情景，以突出眼前离别的痛楚。或揣摩人物声口，以一题见一折，见全剧，使得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在目前，主要人物如此，次要人物也不例外。《寺警》一折写惠明下书，一套曲词已突显出一个叱咤风云、威武勇猛的和尚形象，《唐六如先生文韵》中《绣幡开遥见英雄俺》一文更以气吞山河的言词描绘其先声夺人的气势、豪迈激昂的胸襟和一往无前的胆略。末二股及结句云：

> 向也闻殿角之春雷，雄心暗动，无如削发披缁，英雄无用武之地；
>
> 向也听松梢之风雨，杀气时腾，不谓提刀仗剑，英雄有建绩之时！
>
> 请观今日之蒲东，竟是谁家之小姐！

无怪乎文后评云：“其声势如海上奔涛，天边怒雷，披读之下，恍见普救

---

① 曾异撰：《叙王有巢文》，《明文海》，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184 页。

② 章世纯：《半舫斋稿序》，《明文海》，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223 页。

寺前,绣幡开处,有一赤身露顶莽撞和尚直跳出来。"

"扶小娘儿过桥"这样的题目,如果就事论事,确实没有多少话可说,作者却通过没话找话说式的虚构,上下牵扯,左右逢源,写出了两篇十分风趣的文字。第一篇主旨在于惜玉怜香,佳处在于接连排出三股关于美人和桥的文字,浮想联翩:"桥为何桥? 小娘何氏? 扶而过者为何人? 而要非无说以处此:长亭送别,怨走荒郊,或莺娘其人也。别离魂而梦者曰草桥,扶而过者疑为张君瑞。越府私奔,旅逢侠客,或一妹其人也,则盘山而渡者曰板桥,扶而过者疑为李药师。楚江一曲,晤谢花笺,或素徽其人也,则美人家住者曰大桥,扶而过者疑为于叔夜。"[①]第二篇主旨在于男女有别,佳处在于刻画彼时桥上"扶之者"与"被扶之者"复杂微妙的不同心态。中国古代文章绝大多数非代言体,惟代言虚构,须体验真切,故能逼入深细,游戏八股文乃能有此。

三曰讽喻之言。正宗的八股文以"代圣贤立言"为最高准则,正是旨在提供一幅儒家伟人的人格与心灵的图画,是赞颂型的。与此大异其趣的是,游戏八股文相当一部分作品却是讽喻型的,这也是它被视为游戏文章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讽刺成分是游戏笔墨的重要体现。

讽喻可以是否定性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民间俗语多否定性的讽喻之言,所以俗语题的游戏八股文多否定性的讽喻之作。讥讽社会现实也是否定性的,例如《酒席》制艺挖苦"口衔大白,座间闹酒,面发深红,而喧声顿起……跌倒沿街,而越搀越醉,乱骂山门"的酒鬼;《赌场》制艺嘲讽"日夜之精神不倦,众目昭彰,眼镜晶莹于白昼;人头拥挤,蜡台照耀于黄昏"的赌鬼。反讽是否定性讽刺中的一种手法,一些游戏八股文充分利用了这种手法。《厘正文体上谕书后》一篇以八股文形式嘲讽八股文,嘲讽慈禧太后关于厘正八股文体的上谕,句句反话正说,皮里阳秋。《墨派滥调》以句调圆熟却叠床架屋的文字刻意讥刺空洞无物、庸恶陋劣的八股文。

肯定性的讽刺也即善意的讽刺。《西厢》制艺中不乏否定性的嘲讽,如代

---

①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第五章中曾描写方鸿渐与孙小姐过桥的情景,旁观者李梅亭"用剧台上的低声"问顾尔谦看过《文章游戏》没有? 说:"里面有篇《扶小娘儿过桥》的八股文,妙得很。"李梅亭所指应是本篇。若没有读过原文,确实无法理解李梅亭称"妙得很"的真实用意。

红娘立言的《偷韩寿下风头香》(钱书《雅趣藏书》),快人快语地表达了红娘对企图抢婚的郑恒的鄙视,但《西厢》制艺各篇主要是以善意的讽刺来写莺莺、张生、红娘三者之间的误会性冲突。如《便做道搂得慌也索觑咱》(《唐六如先生文韵》),入红娘口气,讽刺张生跳墙赴约,急切慌忙之中误抱了自己。《晚妆楼上杏花残》(《唐六如先生文韵》)也入红娘口气,讽刺莺莺不理解自己:"我怜你牛女常睽,欲鹊桥之高架,而今反增罪戾也。楼头红杏,谅予心耳。"至于分别入三人口气,在委婉的陈述中自嘲自讽的文字,各篇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古代各类文体中,讽喻之作在作品总数中所占比例之高,无如游戏八股文者,仅就这一点而言,也不应轻视这种文体。或许是一种对正宗八股文赞颂功能加以反叛的集体无意识,导致了游戏八股文讽喻功能的强化。

四曰灵活之体。正宗的八股文体制虽可据题目的类型有相当灵活的变化,不必拘泥于八股,极端之作甚至可以不分股,但与游戏八股文相比,仍然有整与散的区别。散者,自由也,与内容的自由相适应,游戏八股文在充分利用八股文的文体要素的同时,又不受其形制的束缚,股法和句法相当灵活。《王髯笑柄》仅六股,钱书的《西厢》制艺《晚妆楼上杏花残》则排下十六股,《亲不亲尽在您》十四股,《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十二股,《难道是昨夜梦中来》则以三股构成排比。俗语题文《怕老婆的都元帅》以"怪其怕之不辨妍媸也","怪其怕之不论年纪也","怪其怕之不察颜色也","怪其怕之不分时刻也"领起,布下四股句式相同的文字。《唐六如先生文韵》中的《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如同散文诗,最长两股每股不过 53 字,全文不过 414 字。《从今后由他一任》(《唐六如文韵》)写红娘热心帮忙,却遭到对之隐瞒真相的莺莺的屡屡冷淡,委屈之极,不禁想撒手不管,文中以"淡淡春山由他损,盈盈秋水由他穿"等十八个"由他"句一气贯穿,淋漓尽致地倾泻出红娘的不满。以上股法和句法的灵活运用在俗语题类等采用八股文基本形制的游戏八股文中十分常见。

说游戏八股文追求股法和句法的灵活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八股文的基本形制。恰恰相反,八股文也是有形式美的,然而在"代圣贤立言"的正宗八股文那里,因为思想的独立性遭到排斥,人们不屑于承认这种形式美。

只是到了选题自由因而写什么内容也是自由的游戏八股文中，八股文的形式美才有了相对广阔的用武之地，有了和内容配合默契的可能性，也才易于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形式美为《西厢》题类、俗语题类等采用八股文基本形制的游戏八股文提供了重要的附加值。可以想象，如果不讲究形式美，失去了抑扬顿挫的诗歌韵味，排比对偶的赋体句式，像“立苍苔绣鞋儿冰透”、“急来抱佛脚”、“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头”以及“扶小娘儿过桥”、“怕老婆的都元帅”这样并没有深刻的思想、复杂的意蕴的题目，即使再进行没话找话说式的虚构，其欣赏趣味也会大打折扣的。游戏八股文的独特趣味于此又可见一斑。

集“四书”原句而成的游戏八股文，除了破题、承题以外结构更随意。其集“四书”句有几种类型：第一，一字不改地照搬原句，绝大多数属于此类；第二，照搬原句，但个别字眼在理解时原来的义项必须被替换，如原来是用作虚词，现在则必须作为实词的特定义项来理解；原来采用的是实词的此一义项，现在则必须以彼一义项来理解。第三，所集“四书”成句中的某些关键字必须作为另一字的谐音来理解。如《八洞天》中《使铜银》一篇，讽刺以铜冒银者，“善与人同”，以“同”谐“铜”；“甚矣形色”，以“形色”谐“银色”。第四，“四书”中一句无法达意，必须割截两句合为一句。无论哪一种类型，都是使用了八股文截搭题的技巧，紧扣题目，将各句的意义连缀起来。或者利用本句在“四书”原来语言环境中的意义，或者巧妙地赋予其新的意义。高手戏为此体，信手拈来，皆得其妙，例如金圣叹的《春郊演剧》便是佳作，不妨借此作以明其体集句的各种类型。

先写演剧的倡议：“与众乐乐，好事者为之也”。观众呢？“乡人皆好之，亦为之而已矣”，“达巷党人曰：‘于戏！是人之所欲也。’”“戏”字原作虚词，此处作戏剧之“戏”使用。演戏的计划确定后，忙于选择戏台，物色戏班：“当是时，其徒数十人，填然鼓之，管籥之音，翕如也。”乡人想知道该戏班敷演何种剧目，“于此有人焉，请问其目”，“衣锦尚絅”的班主介绍一番：“听其言也，如之何，如之何，有始有卒，此其大略也。”班主尚骄傲地向乡人介绍剧团的角色。首先是末：“彼哉，彼哉，抑末也。”其次是生，“正其衣冠，南面而立……坐以待旦，曰‘吾生也。’”再次是外，“杖者出，望之俨然，如五六十，冕衣裳，

加朝服拖绅，外也。”其他角色尚多：“凡同类者，其三人，胁肩谄笑，手之舞之，无所不至。”演出时盛况空前：“此一时也，近者悦，远者来，达乎四境；闻其声，观其色，众皆悦之。”观众有三教九流：“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农夫也，衣敝缊袍……襁负其子而至”，一一形神俱妙。身高者“为大人，长一身有半”，影响了他人的观看，“众恶之曰：‘彼丈夫从而掩之，吾何以观之哉？’”身材矮小者，“或为小人，则具体而微，引领而望之，出语人曰：‘吾未尝得见也，易地则皆然，如之何则可也？’”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更妙者，“有妇人焉，衣服不备，不能出门户，讪其良人，乞诸其邻而与之”。又“有贱丈夫焉，则慕少艾，以左右望，睨而视之，眸子瞭焉”，如此不端行为，自然招来一片斥骂之声：“恶声至：‘无耻！’又顾而之他。”正在看得入神时，天公不作美：“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茫茫然归：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散而之四方。”未过足戏瘾，不免怨声载道，但又都抱有新的希望：“追天之未阴雨，择其善者，再斯可矣。”

这简直就是一篇集“四书”文句而成的小小说，借助于巧妙的谐音，对原句意义的机智挪移，惟妙惟肖地描写了春郊演剧的全过程，文句意义的搭合天然浑成，无生拉硬扯之弊，也无须依照八股文的基本形制。正因为全文集“四书”文句而成，颇有一种先秦语言带来的古朴简约的风味，这种风味在中国古代其他文体中不可能体验到。饱读“四书”虽然是明清文人的基本功，但在醉心于正宗八股文的文人笔下，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游戏八股文，其出于金圣叹这样于小说、戏曲、八股文无所不通的滑稽文人之手，是十分自然的事。

五曰诙谐之格。正宗八股文的内容决定了其格调的庄重，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游戏八股文则是以格调的诙谐取胜，失去了诙谐幽默、滑稽调笑的格调，也就没有游戏八股文。诙谐幽默、滑稽调笑的格调自然与俗的题材、俗的语言以及讽喻特征有密切关系，但又非必然，即讽刺不一定有诙谐效果，俗的题材、俗的语言也不见得就是诙谐的题材或诙谐的语言。游戏八股文则追求讽刺的诙谐性，并在题材和语言层面上往往将俗与诙谐两者统一起来，下举各例少有例外，故不再赘言，仅考察其诙谐性。

不同类型的游戏八股文其诙谐性的具体表现内容有所不同。

《西厢》制艺的诙谐性主要来源于原剧误会性冲突的喜剧性。由于一句唱词化为一篇人物心理的独白，这种喜剧性得到了更深的开掘和展示。《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唐六如文韵》)让张生幻想："夫安得东风一阵，吹小姐使之出？又安得游丝千丈，囊小生使之入耶？"《佛啰成就了幽期密约》中，张生将全部希望寄托于菩萨保佑："发慈悲心，运广大力，非吾佛不为功也。"二文写得相思入骨，憨态可掬。红娘原是误会性冲突的关键人物，而且出语泼辣风趣，到了《西厢》制艺中不减本色。《便做道搂得慌也索觑咱》(《唐六如文韵》)一篇末尾红娘调侃张生云："年未三十，而视茫茫；秀才，你饿眼花矣！"《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同上)一文中红娘自信一定能说服小姐，于是不免卖弄自己的能耐："放心波，张秀才也！"在《立苍苔绣鞋儿冰透》(《才子西厢醉心篇》)中她诉说委屈："功则为首，罪则为魁，偏成祸种。尔其谓我何！"在《他说小姐你权时落后》(《唐六如文韵》)中她抵赖："我于是飘然归也！"或调侃，或卖弄，或委屈，或抵赖，联系剧情，句句幽默可笑。而且上举四句皆为文章尾句，也就意味着全文在红娘诙谐的声口中结束。

俗语类游戏八股文是诙谐色彩最浓的一类。其往往用穷形极相的表述，将有违常情的现象推向极端，由此显示浓郁的诙谐意味，篇篇如此。或代菩萨立言，《急来抱佛脚》一文云："而大佛于此又讶然询矣：子欲亲我，胡弗拉手？子诚爱我，胡弗掇臀？念掣肘之多烦，示余屈膝；怜步趋之欠速，为我搽油。无事不登三宝，而手忙脚乱，子以为窃屦来舆？"写尽了急来抱佛脚者的丑态。或代老虎立言，《老虎驮蓑衣没人气》一文云："嗟嗟！闻斯旨也，老虎大悟：今而后如有衣冠禽兽故向虎前立者，老虎必昂头摆尾不顾，而唾曰：'没人气！没人气！不驮！不驮！'"借老虎戏谑的声口，骂尽天下衣冠禽兽之辈。或极度夸张，如《瘌痢头上放毫光》；或捏合性质悬殊的事物，如硕大的老虎与细微的蝴蝶；或造语奇特，如《和尚拜丈母第一遭》仿丈人称之为"泰山"而称丈母为"泰水"。凡此种种，插科打诨，能不令人觉得滑稽可笑？

集"四书"句体或因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唐突经典的"戏说"而诙谐，如王思任的《冯妇》[①]；或因巧妙截搭经言的原意生发出新的意义而幽默，如《道

① 焦循：《易余籥录》卷十六、光绪戊子夏德化李氏刊木犀轩丛书本第三十册第十叶。

士四书文》；或因对“四书”题意蕴的形象化而风趣，如蒲松龄的《早起》[①]。

游戏八股文的出现说到底是对“代圣贤立言”的正宗八股文的戏弄和反叛，但无论这种戏弄和反叛的笔墨如何放纵自由，融入八股文的一种或几种文章要素的游戏八股文均与正宗八股文相对立或相映衬而存在，失去了包含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八股文要素，游戏八股文的特质也就不复存在；失去了正宗的八股文，游戏八股文的独特趣味的欣赏也就失去了参照系。正因为如此，欣赏趣味与正宗八股文相对立的游戏八股文，其命运却又大致与正宗八股文相始终。正宗八股文是中国古代文体演变的终结，游戏八股文则是这一终结的饶有趣味的余波。

提 要：游戏八股文是指融入八股文的一种或几种文章要素而写成的文学小品，属于中国古代俗文学的范畴。其独特的意蕴主要表现为对文学形象心灵世界的开掘，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世态人情的揶揄，对自我孤愤的倾吐。其特殊的欣赏趣味相对于正宗八股文而存在，表现为通俗之趣，虚构之笔，讽喻之言，灵活之体，诙谐之格。

关键词：游戏八股文　文学因素　文体　以文为戏

① 盛伟编：《蒲松龄全集》第二册，《聊斋文集》卷十《聊斋制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3页。

《醒世姻缘传》中明代书籍免税史料一则

葛传彬

明代的刻书业极为兴盛，一些学者对相关原因也作了准确的分析[①]。其中李致忠先生特别强调了明初书籍免税政策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明代刻书事业的发展，还因为它对刻书实行了特殊政策。洪武元年八月除书籍、田器税，这对刻书事业无疑是个极大刺激和解放。……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数以千万计明代官刻和私雕的书籍流行，盖与明代推行的这条政策有直接关系。……明代洪武时免除书籍税，则书籍的雕印出版也很快发展起来，足见政策作用之大。"[②]明代刻书大多是商业行为，税收政策显然具有导向作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明初制定的书籍免税政策究竟延续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它是临时性的扶持政策呢？还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整个明代一直保持未变？如果是后者的话，该政策会使我们对明代刻书业的兴盛原因把握得更为全面。

据《明史·太祖本纪二》记载："洪武元年……除书籍、田器税。"[③]这条材

① 可参考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文史》第23期，中华书局，1984年；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文史》第23期，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9、130页。

③ 《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页。

料也见于《明史·食货志五》及《明会要·学校下》。此举旨在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和兴办教育推广教化，显然是一项扶持性政策。洪武十四年“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①]，可见当时北方书籍的匮乏情况。其实，明初刻书业整体上都呈现萧条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战乱甫定，人们尚无暇顾及于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更关键的，就是刻书所需的物质基础如纸张生产等尚不具备。

那么，明代刻书业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全面繁荣的景象呢？结合相关史料，这种情况大概出现在成化前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条记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叶盛卒于成化十年，书中所言小说杂书“家畜而人有之”的情况应该距此不远。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也说：“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②]陆容主要生活在成化年间，“今”指的应该也是这一时期。到了嘉靖、万历时期，明代刻书业极于鼎盛，特别是以小说戏曲为主的俗文学读物此时已成为出版热点，且利润丰厚。在这种情况下，明初制定的书籍免税政策是否仍在实行呢？《明史》等相关史籍对此语焉不详。

我们知道，明代后期及一些清初问世的白话小说中保存了许多明代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多能弥补正史之缺。非常幸运的是，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中有一段文字无意中为上面的问题提供了解答。小说第三十三回开始有这样一段文字：

> 但这穷秀才有什么治生的方法？只有一个书铺好开：拿上几

① 《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页。
② 《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页；《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页。

> 百两本钱，搭上一个在行的好人伙计，自己身子亲到苏杭买了书，附在船上，一路看了书来，到了地头，又好赚得先看。沿路又不怕横征税钱。到了淮上，又不怕那钞关主事拿去拦腰截断了平分。却不是一股极好的生意？但里边又有许多不好处在内：第一件，你先没有这几百银子的本钱。第二件，同窗会友，亲戚相知，成几部的要赊去；这言赊即骗，禁不起骗去不还。第三件，官府虽不叫你纳税，他却问你要书。你有的应付得去，倒也不论甚么本钱罢了。只怕你没有的书，不怕你不问乡宦家使那重价回他；又不怕你不往远处马头上去买。买得回来，还不知中意不中意。这一件是秀才可以做得生意？做不得了。至于甚么段铺、布铺、绸铺、当铺，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即使有了本钱，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与官府赔垫，这个生意又是秀才们做不得的。(《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裩中遗便》)[①]

需要说明的是，《醒世姻缘传》具体的刊行年代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但它反映的是明末(主要是崇祯年间)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此点并无多少争议。[②]另外，《醒世姻缘传》作者经常在每回的开始针对当时社会风气发表批评意见，这段文字与小说情节也无直接关系，故不可能是出于虚构。这是我们可以将此段文字当作史料来使用的两个基本前提。

引文中作者抱怨穷秀才生计艰难，对官府的横征暴敛极为不满，但无意中透露出许多信息。有的已为我们所熟知，如苏杭是当时书籍发卖中心，北方书籍多由南方贩运过去。其中与我们话题相关、也最具重要史料价值的是关于书籍免税方面的。这就是，明末书籍仍然享受优惠的免税政策。

为了弄清这段引文中的相关问题，下面有必要将明代的商税制度简要地介绍一下。明代税收制度屡有变更。就商税而言，大体上包括关税和交

① 《醒世姻缘传》，齐鲁书社 1980 年版，第 421—422 页。

② 这一点可参看《清代文学研究》，张燕瑾、吕薇芬主编，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8—491 页。也可参看金性尧《〈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伸脚录》，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8—119 页。

易税(营业税)两部分。关税的征收对象是贩运途中的货物,根据其种类、数量而制定相应税额,由隶属户部的税务司局或其分支机构、人员征收,明初即开征此税。关税征收点大都设在一些商业较为发达的市镇及道路的关津桥梁处。宣德四年,又设置钞关。钞关之设本来是为了强力推行纸钞流通使用。后钞法不行,钞关变成明代重要关税征收机构。明代七大常设钞关为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关、杭州、九江,主要集中在南北交通动脉的运河沿线。钞关的征收对象是运货的舟船,此税又称船料,属于运输成本,也等于关税。有的钞关也兼收货物税。交易税是货物到达销售地后针对买卖行为而征收的。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名目的税种,如门摊税(摊位税)、储藏税,本质上也属交易税。①

对明代商税制度有了大致了解之后,我们对《醒世姻缘传》中这段文字的史料价值就会认识得更加清楚。上面引文中的"淮上"应指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上的淮安钞关。据此可知,小说提到的到苏杭买书并运回销售应该是沿运河南下北返。我们知道,明代南北商品流通最为重要的通道便是京杭大运河。运河沿线多商贸重镇,也是明政府重要的财税来源地,沿运河南北往来的商人所承担的商税应该不轻。虽说明政府对商货税率有明文规定,但我们根本无法相信有关税收官吏会严格奉照执行。小说中所说的"沿路又不怕横征税钱"指的是针对货物征收关税。运河沿线关卡如林,但这段文字明白无误告诉我们,明末书籍在贩运途中是免交关税的。

那么,书籍到了销售地是否要缴纳交易税呢?揣摩小说的语气,答案也是否定的。小说中"问你要书"的官府应该指的是销售地的官府,因为"买得回来"意味着由进货地回到了销售地,显然指的不是沿途官府。"官府虽不叫你纳税"也就意味着在销售地不用缴纳交易税。关于这一点,小说的叙述与《明史》相关记录稍有不同。《明史·食货志五》记载:"(应交税货物)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②据此,书籍一旦发生买卖行为,似乎又需要缴纳交易税。难道《明

① 可参看《明史·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明史·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74页。

史·太祖本纪二》所言“除书籍、田器税”指的只是关税？下面我们会提到，明代商税中关税要远重于交易税。既然书籍、田器的关税都免了，又何必征收营业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这句话作另一种解释。这里的“不鬻於市者”规定的只是“他”物，农具和书籍不在此列。因为《明史·食货志五》接下来又说：

> 胡惟庸伏诛，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①]

“他”物指的就是“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如果这些东西不在市场上交易，则无需交税。而农具、书籍由于社会急需，要大力扶持，即使有买卖行为也无需交税。这种解释毕竟不能成为明代书籍免收交易税坚实证据，由于史料不足，难以遽下定论。但不管怎么说，明代书籍享有优惠的税收政策是一定的。

更需提到的是，明代商税中关税与交易税所占比例相差悬殊。研究明代税制的专家曾指出，明代关税要远重于交易税。吴兆莘在《中国税制史》中说：“明代之商税，即古之谓关市之征，所课于货物之税之总称。然其中课于通过货物之通过税特别发达，买卖税受其影响而不发达也。”[②]这里的“通过税”指的是关税，“买卖税”指的是交易税或营业税。另据明人黄汴《一统路程图记》记载，嘉靖七年，御史朱实昌奏请免除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经营店铺的交易税并得到批准[③]。这些地方都是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地区，也是财税重地。如果交易税数额巨大，免除这些地方的交易税会造成财政困难或财政危机，不管对于嘉靖帝还是朱实昌都是不智之举。可见交易税在商税总额中所占比例不大。其他商品的交易税如此，书籍——如果有交易税的话——也不会例外。因此，即使明代书籍销售需要缴纳交易税，也不会太重。

---

① 《明史·食货志五》，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75 页。
② 《民国丛书》第五编 35 册，上海书店 1990 年版，第 168 页。
③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44 页。

我们知道，明代中叶以后，国库空虚，再加上法纪松弛，肆意增设税卡税种的现象极为普遍。如《明史·食货志五》记载："万历十一年革天下私设无名税课。然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矣。"[①]尤其是崇祯朝，为了支撑辽东战事和镇压农民起义，明政府财政状况几近崩溃，新增加"辽饷""剿饷"只能通过大肆搜刮民财获得。前面提到过，《醒世姻缘传》反映的是明末社会状况，这种情况下书籍仍然免税（至少是免缴关税），使我们有比较充足的理由相信，明初制定的书籍免税政策可能大体上一直延续实行到明末。

这一政策对明代图书出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明代的刻书地虽然遍及全国，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南直隶的南京、苏州、徽州和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等地。这些地方刻印书籍所需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则比较低廉[②]，北方在商业性刻书上无法同南方竞争。正如小说中所叙述的那样，北方的书籍大部分是从南方贩运过去的[③]。很显然，书籍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说并非生活必需品，如果贩运成本过高，即需缴纳高额关税，会对书籍流通造成阻碍。而运输销售环节的畅通反过来刺激了图书刻印出版，产销形成良性互动。所以我们看到明代书坊林立，从业者甚众。另外，明代图书尤其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读物与当时其他商品相比价格偏高，利润空间较大。[④]而书籍免税进一步保证了销售利润。这会吸引社会资金或者说商业资本流向书籍刻印销售行业。明代出版业的兴盛应该与此有着密切关系。上面小说引文中有一点信息就间接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图书销售相对于其他生意需要投入的资金是比较小的，应该是一个热门行当。穷酸秀才筹措几百两银子可能比较困难，但对于商人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当然，我们不会相信明代书籍免税政策会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而且，正像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官府会变相加重书商的负担。但不管怎么说，书籍

① 《明史·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78页。

② 叶德辉：《书林清话》"明时刻书工价之廉"条，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5页。

③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卷四说："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④ 如万历舒载阳版《封神演义》定价纹银二两，万历龚绍山版《春秋列国志》定价白银一两。根据《醒世姻缘传》中反映的物价，二两银子可买一亩地。见小说第九回。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14页。

免税政策对明代刻书业——尤其是完全依赖市场的商业性刻书——繁荣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醒世姻缘传》中的这条材料使我们对明代出版业繁荣的原因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金兆燕诗文中的“依人”表现与反思

——金兆燕与两淮盐官、盐商关系述论

明　光

清代乾隆时期的著名文人金兆燕(1719—1791),字钟越,号棕亭,别号芜城外史、兰皋生。安徽全椒人,幼称神童,与张鹏翀齐名。性不耐静坐,多言笑,时人目为“喜鹊”。乾隆十二年(1747)30岁中举,此后。七次会试不中,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 49岁进士。51岁官扬州府学教授, 62岁迁国子监博士,升监丞,曾任四库馆缮写处分校官。著有《棕亭古文钞》十卷、《骈体文钞》八卷、《诗钞》十八卷、《词钞》七卷,合称《国子先生全集》。

两淮盐业的中心在扬州郡城,而金兆燕与扬州的关系极为密切。1779年,他62岁,在扬州回忆:“丙子丁丑间,余客(扬州)仪征令署……嗣是入运使幕十年,作教授十二年皆在扬州”[①],这阶段是他39岁到62岁。其实,他13岁时就第一次来扬,住有年余;20多岁在扬居住三四年。37岁时亦住扬州数月,八月来扬居徐凝门附近,与姨父吴敬梓寓所相近,两人往来甚密;十月,吴敬梓在扬病逝,金作长诗哭之。62岁从扬州府学教授任上进京任职,64岁辞官离京,还是寓居扬州盐商府中八年,到71岁才返回家乡。

---

① 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335页。

他的诗文集中多有与两淮盐官、盐商的交往、唱和。梳理、分析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与两淮盐官、盐商的交往，是他生命历程的重要部分；而由此带来的荣辱悲喜，更显示出“依人”文士的复杂心态。

一、投盐官：《旗亭》一曲蒙荣辱

两淮盐业的最高长官为巡盐御史，俗称盐政、盐院，其次为盐运使。金兆燕在扬州投诗盐运使卢雅雨而入幕，卢致仕后金为继任盐运使赵之璧留用至登进士。1765年冬诗云“十年漂泊老扬州”，盖约指1754年以来十余年，主要生活在扬州。

卢雅雨，名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691)进士，两度任两淮盐运使，前为乾隆元年(1736)至三年(1738)；后为乾隆十八年(1753)至二十六年(1761)。他工诗文，爱才好客，名流咸集，主东南文坛，四方求访者不绝，极一时文酒之盛。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修褉虹桥，作七言律诗四首；和修褉诗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传为盛事。赵之璧接任卢雅雨，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金兆燕与继任赵之璧的关系，资料无多，只存中进士前的一首题为《和赵恒斋都转九日游平山堂原韵》的唱和诗，即事写景，但最后两句“看山更有登楼客，令节那知宴会嘉”[①]，作者似乎错过了一次与赵都转同游的机会，略有怅惜之意；另有一篇代笔文章。金兆燕中进士任扬州府学教授以及后来寓居扬州期间，与几任盐运使自然还有来往，有《呈朱子颖都转八首》、《病中朱子颖都转馈食物诗以谢之》等。本文主要考察金与卢的关系。

(一)一般交往的阶段

金兆燕与卢雅雨发生联系的时间，从目前资料看，至迟在1754年。卢雅雨初任两淮盐运使，为乾隆元年(1736)，三年罢职，滞留至五年(1738)，遣戍伊犁。这期间，金兆燕20岁左右，随父到嘉定数年，后居里教书、结婚，似乎

①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60页。

未来扬州；即使出入扬州，他尚未中举，默默无闻，估计也没有机缘结识。1754年，卢雅雨再任两淮盐运使，吴敬梓病逝扬州，得卢雅雨资助，方入殓送归金陵。吴死时，身边只有幼子，能管事的只有正好在扬州的姨侄金兆燕。卢既出资料理吴的后事，金兆燕与卢雅雨当有接触。有文章说，当时金兆燕与王又曾（与吴敬梓儿子吴烺同为乾隆十六年南巡诏试举人）一起求见了卢雅雨。[1]

在《棕亭诗钞》中，金兆燕与卢雅雨接触的最早诗作是，写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三月的题为《卢雅雨都转以亡友李啸村遗集雕本寄赉，开缄卒读，凄感交至，率题卷末兼呈卢公四首》的诗，此时他客仪征令幕中。李啸村即李葂，为扬州八怪中人，是吴敬梓、金兆燕父亲金榘的好友，其诗才也为卢雅雨所赏。雍正十三年（1735）开博学鸿词科，李啸村由卢雅雨推荐上报，却被学使放归；后卢雅雨罢职滞扬，啸村与之相依不弃。金兆燕因父辈的关系，与啸村也成好友，1750年金在芜湖，喜晤啸村，作有《喜李啸村至，即同汪琴山访晤主人鲍洗桐，留饮西枝最小斋，啸村索余赠诗，即席成长句塞命，兼示同座诸子》长诗。正因为金与啸村为好友，卢公才有寄诗之举。金兆燕在诗中，哀悼亡友的同时，称赞卢与啸村的友谊是"怜才千古属知音，生死交情感最深"[2]。这首诗有答谢之意。此后，两人关系近起来，金兆燕曾进雅雨官署饮酒。当然是金兆燕主动，金四年后所写《呈卢雅雨都转》诗中一条小注云："丙子秋游西湖，谒云林寺，闻寺僧吟公'潮当谢后知回避，峰偶飞来亦逗留'之句，因渡江投谒见公。"[3]

（二）有意投靠的阶段

第二年金兆燕有《丁丑夏自都门南归过邗江，独游湖上见壁见雅雨都转春日修禊唱和诗，漫步原韵即用奉呈四首》，主动投诗给卢雅雨。"官署衔杯忆去年，金英秋老画檐前；不缘久滞红尘迹，应许同登碧嶂巅"，流露出套近乎的自信；而"悔向长安淹岁月，听残春雨凤栖更"[4]，则清楚表达了因进京

① 张田有：《吴敬梓行述》，吴敬梓纪念馆编印《文木乡音》，1986年，第6页。
②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52页。
③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62页。
④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57页。

考试未能参加春日红桥修禊的遗憾。不多时，他又作《又次卢雅雨都转红桥修禊韵四首》，中有“一自江滨开郑驿，顿令海内识荆州”[1]一联。“郑驿”典故出于《汉书·郑当时传》，喻迎宾之所。“荆州”典故出于唐代李白《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后人多用“荆州”喻指对方德高权重，而“识荆州”也暗含希望提携自己之意。金兆燕这联诗的潜台词算是向卢雅雨发出了奉承、求助的信息。又投诗慨叹“千里关河仍作客，半生踪迹只依人”，进而“似闻槐署方虚左，未必荷衣便遂初；他日蒯缑交戟下，定堪重曳野人裾”[2]，明言卢公眼下正在延揽宾僚，不惜毛遂自荐，并请求一定收留。次年秋日所作诗中回忆道“去年踏雪渡江归，又向膺门试檄衣”[3]。“膺门”的典故出于《后汉书·党锢传·李膺》：“是时朝庭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膺门”遂借指名高望重者的门下。这是自己明确承认曾向卢雅雨乞求位置。

（三）幕僚阶段

大约到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天，金兆燕就成了卢雅雨幕中之人。秋日所作《呈卢雅雨都转》云：“幸舍栖迟春复秋，逢人便道此间乐。官梅亭畔百花妍，戏谱新词付锦宴。”[4]“官梅”为关涉扬州的典故，卢雅雨遂以官梅亭为书室名。此诗固然不免奉承、夸张之词，但奔波半世，暂时有了相对稳定的安排，且离家乡全椒不远，金兆燕心情应该比较愉快。陆萼庭《金兆燕年表》评语十分准确：“卢署中俊彦如云，能于其中得一位置，远胜于终年奔波，固兆燕所求之不得者。”[5]乾隆二十六年(1761)卢公告老卸职，兆燕作诗送别，回顾“几载南楼对月圆，共然官烛检吟编；搜罗轶事存风雅，商略新词付管弦”的岁月，表达“独有信陵门下客，蒯缑长铗怅离筵”[6]的惜别失落情怀，结束了与卢公的主宾依附关系。

---

①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57页。
②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60页。
③ 同上，第162页。
④ 同上。
⑤ 陆萼庭：《清代戏曲家丛考》，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⑥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66页。

金兆燕在卢幕前后四年,作为幕僚,替主人代笔也是应尽的职责,《棕亭骈体文钞》中收有为卢雅雨代笔两篇。然而四年中他归省老父数次,两次赴京会试,费时不少。看来他在幕中并无要事,至少不需要负责日常文墨或校阅图书之事。其时客卢幕而操笔墨者约略有惠栋、沈大成、程绵庄诸人。沈大成为卢公左右手,程绵庄“居上客,操刊著书”[①]。那卢雅雨为何接纳金兆燕呢?是金兆燕的诚恳之意吗?是金的学问令其佩服吗?从金给卢雅雨所投诸诗看,称对方为“荆州、郑驿、膺门、槐署”,用“蒯缑”、“幸舍”自比冯谖,金兆燕投靠之意确实诚恳;金的诗文也确实有名江淮。但诚意为求入幕者必备,不足为奇,主人也很少因此动心;而其诗才,也非卢公所必求。当另有原因。

答案在金兆燕的戏曲作品《旗亭记》。《旗亭记》今存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本。卢雅雨为剧本作序,叙述了创作起源、过程。约在1756年,假馆仪征的金兆燕,投诗谒卢公,议及唐代诗人王昌涣、高适旗亭画壁的故事,卢认为是戏剧的好题材,惜尚无人谱之。金不忘此事,约在1758年再谒卢公,奉上了《旗亭记》剧本,卢公十分高兴,“爱其词之清隽,而病其头绪之繁,按以宫商亦有未尽协者,乃款之于西园,与共商略”[②]。这恰与金所谓“幸舍栖迟春复秋,逢人便道此间乐”、“戏谱新词付锦宴”的时间和内容相吻合。商略、修改一年左右的时间,第二年《旗亭记》就刊刻行世了。显然,正是金兆燕投其所好,撰写《旗亭记》而被接纳。

(四)反思“商略”事,放胆抒怨愤

从卢公《旗亭记序》看,这部戏是金兆燕入幕的敲门砖。进署后,宾主共商修改剧本,由卢公出资刊行。在卢公笔下,因为嫌其头绪太繁、宫商未尽协,遂引“梨园老教师为点板排场,稍变易其机杼,裨兼宜于俗雅间,出醉笔挥洒胸臆。虽素不谙工尺,而意到笔随,自然合拍”[③]。卢雅雨为修改剧本提供艺术条件(梨园老教师点板),还提出修改原则(雅俗兼顾),这两点有助于提高作品的质量,也有适应观众欣赏的合理因素。卢公嫌宫商未尽协、自己动手修改时,也许能做到内容方面的“意到笔随”;但既不谙音律就很难“自

① 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336页。
② 卢见曾:《旗亭记序》,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页。
③ 同上,第536页。

然合拍”,因此这句话只能是自我吹嘘的门面话。至于时出醉笔,挥洒自己的胸臆,难免越俎代庖之嫌。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在“共商”过程中颐指气使的自负幕主,他几乎不考虑幕客作者的创作原意。

1765年,金兆燕在《莲花岛传奇序》中对这段“共商”有过回忆:“主人意所不可,虽谬宫商拍度以顺之不恤。甚则,主人奋笔涂抹自为创语。”看来基本情形虽一样,但感受却大不同。主人认为合拍,作者认为不协;主人意到笔随,作者认为强加人意。从卢雅雨方面来讲,他不仅是主人,也是长金兆燕近30岁的长者,而且是功成名就的长者,动手修改依附自己的晚辈作品,自负之外,还会觉得理所应当,是对年青人的器重和提携。从他序中不避讳甚至不无得意的表述,可以印证这点。而在作者看来,创作不能自主,自尊心受到伤害;但想到“老亲在堂,缸无储粟,非是则无以为生;故澳涊含垢强为人欢”,只有“高兴”接受主人的奋笔涂抹。这种情形使金兆燕大为伤心,说自己是“不自知耻为新声,作诨剧依阿俳谐,以适主人意”①。在这自责而愤懑的言词中,不难看出一个落魄文人感受到“依人”的屈辱和痛苦。这里他痛苦的显然不是因为从事戏剧创作,而是违心接受别人的强加还要强颜欢笑。在今人看来,更不公平的是,《旗亭记》在刊行后,竟然有不少人认为是卢雅雨的作品,当时扬州诗人闵华就有《题雅雨先生旗亭画壁传奇后》,并称赞“不道稗畦居士后,又因唐句演唐年”②,把卢雅雨与《长生殿》作者洪升相提并论,显系恭维之词。

笔者感兴趣的是,金兆燕的锥心痛苦是当年的即时感受,还是作文时反思的结果?

幕主奋笔夺志,对幕僚来说并不是特别耻辱的事情。既然是寄人篱下,入幕的人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故此,金的内心当可以容忍。若真有锥心之痛,卢公卸职归里时,金兆燕的送别诗就不会仍有“商略新词付管弦”的回忆,尽管这是应酬之作。那事后,金的态度为何那样怨愤呢?

笔者认为,尽管金是以新词娱人敲开卢幕大门,但在卢幕的自我定位不等于就是娱人的角色,金在《旗亭记》刊行后,可能希望卢公能刮目相看,不

---

① 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336页。

② 闵华:《澄秋阁集》三集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拾辑21册,第607页。

再以"娱人"视之。但卢幕中人才众多,金很难尊为"上客",不免有失落之感。在这种心态下,反思自己"作诨剧依阿俳谐"的行为,"屈柔翰为他人借面"①,《旗亭记》传奇游戏之作亦虽刊行而不能署己名,真是觉得不值,心中萌芽出某种怨怅和不满,但不能出之于口、形诸笔墨。到了1765年,曾同为幕友的程绵庄请其为剧作《莲花岛传奇》作序时,还在为生计和参加会试而奔波的他,当触发起心中多年的隐痛,酸恶甚于当年;此时卢公已归里数年,与自己不复主宾依附关系,自可放胆直言,故借序文一吐为快。

照理,金兆燕在幕中除了修改《旗亭记》,似当还有为官署欢会所作的新词。但查考金兆燕诗文集,一篇也没有。看来,晚年整理诗文时删却了。

二、交盐商:身份转换含悲喜

(一)独客苍茫扬州路,一笑谁为依恋人

尽管金兆燕早年即来扬州, 40岁之前频繁出入扬州,但现有资料显示,在他入卢雅雨幕之前,扬州盐商与这位举人交往不多。比如他37岁那年(1754),落第南返,八月来扬谋事,四个月时间,虽有二三好友不时相见,但除了料理吴敬梓后事外,自己所谋一事无成,似乎也没有与盐商交往接济。虽与著名盐商马曰琯兄弟认识②,但可能无交情。此时还结识一位商人,即后来入赀做官的黄稼堂。据金所作《黄稼堂太守传》,金"于甲戌、乙亥(1754—1755)之交,往来淮扬,即与稼堂相识",但此时的黄某,还只是为"诸大吏及禺筴之豪"③帮闲打理的角色,自身尚未富裕。所以, 1754年底返家前,金在扬州作有《过万松亭别寰宗上人墓》一诗,留下"霜风十里扬州路,独客苍茫惨将去。一笑谁为依恋人,销魂只有高僧墓"④的诗句,道出不第举子无所依靠、求助无门的惨然心境。

他较早熟悉的两淮盐商,应当是汪玉枢父子。金《汪恬斋先生诗集序》

① 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336页。
② 王又曾:《马嶰谷半查兄弟招同程午桥、闵玉井、陈竹町、金棕亭集行庵同题东坡海外石刻像用集中赠写真何充秀才韵》,但金兆燕诗集未收此次聚会诗作。
③ 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300页。
④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40页。

云:“兆燕十三四时,侍家大人读书扬州,暇日随诸宾客游城南葭湄园,主人出一编示客,客传读交赏。兆燕从旁窃观,未测涯涘,然已能强识数语”。汪玉枢是他的父辈,孩童的金兆燕当年只是目睹父辈游筵唱和,尚无资格交游。金兆燕入卢雅雨幕,“已卯(1759)春,复客扬州,而先生归道山数年矣”。与汪玉枢儿子汪荪谷的交往,约始于1760年,“庚辰(1760)秋间,扬人之望幸者,葺治园林至于南郭,葭湄园又重新焉。乃复过之,遂与先生之子椒谷相识订文字交。”[①]后来的文章中,金称与荪谷“以诗交垂三十年”[②]。

入幕后,金的诗作里才有了与盐商诗人唱和的诗篇和为商人所写的传序。搜检入幕到任扬州教授之前的诗作,与盐商诗人有关的只有一首《闻江澄里自浙归之柬之》,约写于1765年。诗中称“旧友”,表达老友远归重逢的喜悦之情,约定重阳节聚首;交往必定已有数年。他人诗集中亦有同金兆燕到盐商江春净香园聚会的记载。十年幕僚岁月中,文集中为商人的写作也就只有《汪恬斋先生诗集序》一篇。看来,幕僚身份虽然提供了他与盐商接触的平台,但交往还不多,也许是盐商们还看不起他,也许是金兆燕自卑,主动不够;更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二)盐商主人雅好客,冷官自况求馈赠

他于1768年任扬州府学教授后,与商人的交往日见密切。

这十余年的扬州学官生涯,虽收入不丰,但公事无多,金与众文士、社交名流唱和,期间交往结识的有著名诗人袁枚、翰林蒋士铨等,而与盐商诗人马曰璐、江春、江昉等人的交往时时出现在诗歌、文章中。他为盐商及其家人所作的序传,大半写于此时。盐商吴砚农,本是名家子弟,因家道中落,走上盐业一途,喜与士大夫交往,自称与金兆燕、袁枚、蒋士铨这些出入扬州的著名文人结文字交。他先是请金兆燕为自己作生传,后又为死去的妻子请作传。首席总商江春及江昉与他的关系迅速升温。江春本是诸生,从诸名士游,承父业为盐商,事业发达,仍热心文化事业。他甥孙阮元在《江春传》中写道:江春“喜吟咏,好藏书,广结纳,主持淮南风雅”[③]。他家的诗文酒会,

---

① 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325—326页。

② 金兆燕:《汪荪谷诗序》,《棕亭古文钞》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322页。

③ 阮元:《淮海英灵集》戊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682册,第282页。

是当时扬州文坛的中心，府学教授金兆燕也经常出入其中。约在1769年秋，江春招集吴鲁斋使君暨汪秀峰、陈对鸥、金棕亭、沈学子、汪石恬集饮小斋，以吴鲁斋所增韵筒各人拈韵赋诗，金兆燕拈得“潸”韵，吟出《江鹤亭以吴鲁斋所赠竹籤韵筒集同人各赋一诗分得潸韵》的五言诗：“主人雅好客，高情矗云栈。秋堂开纱橱，晚食罗珍馔。胜引既广招，鄙人亦获羼，倘同海屋添，为君算醴醆”[1]，篇末落笔在为主人祝寿。这天江春拈得“屑”韵，“惭予昧韵读，急缓苦难别”，“哦诗博众欢，声乱寒蝉咽”[2]。江春修葺康山草堂、新建秋声馆，金兆燕都参与相关聚会雅集，吟有《题秋声馆》、《江鹤亭新得康山招饮率赋》、《康山讌集次袁简斋太史韵八首》诸诗。

金兆燕不再是“苍茫扬州路”的独客，而是社交界的名流、盐商的座上客，这显然与他进士、教授的身份有很大关系。身份的转换，使得双方的交往心态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促进了良好关系。金兆燕功成名就，有了与富商平等交往的身份资本，不再有乞食求人、依人时的压抑、忍辱心理，并以参与各种社会交往来显示身份，获得精神满足。扬州盐商世家子孙多有求学、求仕的欲望，某些较有文化的盐商更愿意交往士大夫，尊重、交结府学教授，也是自然之事。盐商多以主动、仰承的姿态与学官交往，双方其乐融融。

与社会交游场面热起来相对的，倒是他诗歌中时常冒出“冷官”之类的自况。

上任第三年，即吟道“堂前列炬看新妇，座上口毡笑冷官”[3]；1779年即将调京任职前，他还在叹息“堪笑冷官邻破庙，日寻拳石上浮山”[4]、“扬州花月地，薄宦十二年”[5]。教授与知县相比，固是冷官，收入自然要薄不少；但从他日后不就知县而赴任国子监博士以及很快辞官的举动来看，金兆燕显然并非热衷官场之徒。那“冷官”的频频哀叹意味着什么？

---

①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84页。

② 阮元：《淮海英灵集》戊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682册，第284页。

③ 金兆燕：《庚寅十月于广陵学署为葛菱溪完姻诗以赠之四首》，《棕亭诗钞》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91页。

④ 金兆燕：《和张荔门松坪集康山赠江鹤亭韵六首》，《棕亭诗钞》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221页。

⑤ 金兆燕：《将迁官入都管澹川以诗赠别次韵奉酬》，《棕亭诗钞》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221、147、152、156页。

他来扬上任时，住在学署中跟随就食的有“先君子之老妾暨余一妹二女一媳，一吾友孤子之妇；余妹及余长女各携稚女一，余次女携一儿一女，余媳携一儿二女，吾友孤子之妇携女二”[①]。区区七品学官的俸禄要养活这么多人，真是太难了；但金兆燕也养活了他们，并还帮他们成家。可以想见，金兆燕除了俸禄外，必有其他进项支撑。揆以事实，至少有这么两项是肯定有的，一是为他人作传、序和为亭台楼阁题撰楹联的润笔，一是朋友的主动馈送。这里面都有商人在。如为盐商吴砚农夫妇所作的《吴砚农传》、《汪孺人传》及其为盐商汪玉枢父子所作的多篇诗序、寿序等。因此，金兆燕频叹“冷官”，当具有“哭穷”的宣传功能，起到一种告知作用，暗示盐商们不时馈送。这里，没有半点贬低金兆燕人格的意思。金兆燕不是贪财之人，辞官后，还是寄人篱下而非腰缠万贯的寓公。他确实为生计所迫，“哭穷”是他生存而非敛财的技巧。事实上，教授期间，他与好几位大盐商关系很好，尤以江春兄弟为最。如果金兆燕以声名敛钱财，以哭穷骗钱财，精明的盐商是不会在他辞官后还与之交往的。

（三）老境幸味甘蔗甘，客游谁识苦荼苦

1781年，他“不作扬州官，仍作扬州客”[②]。凭借在扬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和自己的才学声望，赢得了盐商尊重，他辞官、重返扬州，客居江春宅第多年。

这里不能回避的是，他辞官后出于什么心态或考虑，不荣归故里，反而寄居盐商为食客？毫无疑问，与以江春为代表的盐商群体的深厚友谊是一重要因素。但这绝非唯一因素，盐商的友好甚或邀请，这只能是一种契机，一种条件，切合了他内心的需求。那他内心的追求是什么呢？有两点值得重视。

一是对扬州文化氛围的眷恋。扬州自清初以来，一直是江南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扬州地处长江、运河的交汇处，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众多士

---

① 金兆燕：《夏寔原配黄孺人五十寿序》，《棕亭古文钞》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352页。

② 金兆燕：《寄祝袁鲤泉明府三首》，《棕亭诗钞》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233页。

大夫南来北往必经之地；本是盐业中心，商业繁茂，而且西南邻南京，东南近苏州，进而连动杭州，兼之扬州官员周亮工、王士祯等较多文化意识，扬州文化活动很有影响力。康熙朝诗人孔尚任就已指出："天下有五大都会，为士大夫必游地：曰燕台，曰金陵，曰维扬，曰吴门，曰武林"；两大诗人群集重镇："天下之言诗者，莫盛于燕台与维扬。"[①]蒙皇帝额外议用的孔尚任，当年在扬州广结诗人，频频举行诗文酒会：30余人的秘园大会、70余人的琼花观月大会、30余人的观涛大会；其秘园大会诗人来自八省，时人称为"八省大会"。乾隆朝卢见曾仿王士祯红桥修禊，和者7000余人，这是金兆燕亲身经历的盛事。稍前，扬州诸诗人的"韩江雅集"，他虽未及参与吟诵，但雅集中的好几位诗人也相当熟识，如汪恬斋、马曰璐、闵玉井等。而书画界的"扬州八怪"中，也有金兆燕的好友如李葂、熟识者如郑板桥、罗聘等。作幕僚、教授的二十余年中，金兆燕参与了太多的诗酒流连之类文化活动，熟悉并享受着盐官、盐商诗人凭借经济实力、吸附名士共同打造的豪奢、精致的文化盛宴。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长期浸润于这种文化氛围的金兆燕眷恋扬州的诗意生活，还不想放弃它回到全椒，寂寞地度过余生。况且，他一生漂泊，在家乡的朋友恐怕还没有扬州的朋友多。

二是经济原因。60多岁的他，虽然不需要挑起家庭重任，但可能需要凭他的交际和场面，为儿孙们寻觅生计。他辞官寓居扬州的当年，已是诸生的儿子台骏便来到扬州做事；1785年，台骏便被父亲老友、盐商出身、以赀入官升任江西抚州知府的黄稼堂招入幕中。1789年春他离扬返乡前，有诗表明归里的原因是"栖枝既已失，乞食无津梁"，而"归定追饥窭，相与赴阡冈"[②]的诗句，则是对今后生活的悲观预想。他诗集中在扬所写最后一首诗为《咏牛和俞耦生韵》："远道踉跄一牸牛，无轮可驾且归陬。已知筋力全疲惫，那有仓箱可代谋。……也知上坂堪休息，可奈全家责饘馐"[③]，此牛极似自喻，明显透露出晚年依食盐商有着为家庭经济考虑的因素。金兆燕一生都在为

① 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汪蔚林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版，第459、476页。

② 金兆燕：《补哭吴奎壁兼呈乃翁暮桥》，《棕亭诗钞》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63页。

③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64页。

生计而操劳。

不过，辞官寓居的最初几年，金兆燕相当潇洒快意。某日，在江昉的紫玲珑馆饮酒后，移宿在小西藏书别馆，吟道：“东家饮酒西家宿，我生快意此其独。”[①]造成这种快意的因素不止一端，既有寓居主人的尊重，也有辞官后工作压力的消解，所谓“寓庐颇静便，客至惟谈艺。既不挂朝绅，复免拥征袂，暖招春风来，寒送冬日逝”[②]，颇为自在，因此“便思假馆常为客，涤砚钞书过一生”[③]。联系他年轻时即为谋生乞食四方和不懈考试以博第一的责任心，此时的快意当还有儿孙长大、卸去家庭重担的轻松，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把的潇洒。

金兆燕对主家自然少不了赞誉、歌颂之声，这也是正常之事。江春兄弟虽是盐商，却都有较高文化水平，主宾之间的良好关系，不是仅仅靠经济施授与感恩的道德维系，而有着诗文创作的精神契合。早在任教授期间，金兆燕就“与颖长、旭东结文字之契者有年”[④]，常为诗社谈筵。在他眼中，江春兄弟好读书好结文士友，“翰墨图书未肯收，朝朝三径待羊求”，本身也是富有才情的诗人，“花萼新诗颂几章，弟兄才调重班扬”[⑤]。江昉曾集宋代张炎的词句作为创作，金兆燕为之序云：“盖其好之既专，故而契之最密……信手拈来，无非妙谛，操觚立就，不似陈言”[⑥]，高度赞扬其深得张炎词作精髓。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兆燕与主人盐商江春的亲密关系有了某些变化。金的诗篇里不时有些不和谐之音，乃至怨言。1784年春天，他被要求换住所，不换不行，于是有《移寓课花阁叠前韵》：“岂有诗章继乐天，但无拘检似僧虔。抛家已在春云外，徙宅偏当社雨前。千里关河萦旧梦，一庭草树恋新烟。强移栖息仍漂梗，何日吾庐永息肩。”[⑦]“偏”、“强移”的字眼，显得较

① 金兆燕：《饮紫玲珑馆后移宿小西藏书别馆》，《棕亭诗钞》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29页。

② 金兆燕：《（壬寅）元旦作二首》，《棕亭诗钞》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31页。

③ 金兆燕：《饮紫玲珑馆后移宿小西藏书别馆》，《棕亭诗钞》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29页。

④ 金兆燕：《汪（江）母程太宜人传》，《棕亭古文钞》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306页。

⑤ 金兆燕：《和张荔门松坪集康山赠江鹤亭韵六首》，《棕亭诗钞》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21页。

⑥ 金兆燕：《江橙里集玉田词序》，《棕亭骈体文钞》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389页。

⑦ 金兆燕：《棕亭诗钞》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45页。

为刺眼，倔强地表现出诗人心中不满情绪；最后一句则是真诚的企盼。过了一年，诗人又被强逼从课花阁搬出，“寝处犹存山泽仪，何妨系梶任洪縻。新衣偏欲加屡敬，旧曲应难托李奇。失酒每因蛇画足，逃名焉用豹留皮。依人一笑雕笼翮，栖息难安又强移。”[①]分析诗句，诗人倒是喜欢上了课花阁的环境，但是主家用十分恭敬的态度坚决要求搬移，只好顺从；而“依人”一词，显系勾起了作者及第前依食他人的心理感受，字面的“一笑”掩饰不住内在的痛心。在早些时间，金已吟出“岁月既已逝，声名何足传”[②]，虽可理解为泛泛而言，但如果理解为某种暗示似乎也很恰当：时过境迁的慨叹，隐约传出已失去旧时府学教授的尊敬；而关于移居的这两首诗，则是缘事而发、情绪激动。看来宾主之间多少有点不愉快。

寓居之初的金兆燕也许认为，自己是进士、曾任本地学官多年，与居停主人相交甚深，这种寓居与布衣之身的寓居，大不相同：后者，主人对宾客是朋友加同情，有施舍的因素；前者，主人对宾客是朋友加尊重，更多借重的成分。笔者猜测，也许正是江氏兄弟的招邀，才促使金兆燕辞官寓扬的。金兆燕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寓居江氏可以受到足够的尊敬；这使他忘记了辞官寓居商家的“依人”性质，还带着为官时的心态和受敬标准来感受居停主人的行为。当遭遇“强移”时，金兆燕才醒悟过来，如今还是“依人”，不能按自己的喜恶行事。按常理，主人在“强移”时还“屡敬”，也多少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尊重，如果对方不是进士、曾经为官，根本就不会有“屡敬”的待遇。但此时的金兆燕毕竟不是当年的布衣，他还是感到屈辱，并写在诗中表现不满。其“失酒每因蛇画足”的诗句，喻自己多此一举，辞官寓扬，晚年再受“依人”的屈辱，略略传达出后悔之意。他后来更发出“世事险如砂缩蜜，交情滑似水拖莼”[③]的慨叹，应该不是泛泛的认识，而是切身经历的体味。当然，出于生计的考虑，金兆燕不会拍案而起，抽身走人，只要还在忍受范围内，他还会寓居下去；直到 1789 年春，寓居主人江春病重或去世，金兆燕才返回故里，此

① 金兆燕：《自课花阁移居秋声馆二首》，《棕亭诗钞》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1442 册，第 246 页。

② 金兆燕：《元旦作二首》，《棕亭诗钞》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1442 册，第 231 页。

③ 金兆燕：《管蠡臼以移居诗见示次韵赠之四首》，《棕亭诗钞》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1442 册，第 253 页。

时他已是71岁的老人了。

在寓居初年,金兆燕也有着愁情,“弃官仍浪迹,休老知何年。中夜不能寐,照影灯空然”[①];“艰难思故里,逼迫住他乡。镜里窥双鬓,朝来已点霜。”[②]老来寓居异乡,觥酬交错、诗歌唱和之余,时有乡愁和叹老,正是人之常情。但到后来,尤其是离扬时次诸友送行诗中,乡愁被后悔寓居所代替。“犹忆薄宦乍归田,悔不小人止怀土。耦耕尚有沮溺辈,闭户便是禽尚侣。投赠谁解南金双,鬻身止索五羊皮。”[③]又云:“罢官还作客,蔽裘思续貂。荏苒七八年,衰鬓依花娇。妄思冰成山,岂有水覆槽。曾不悔蹉跌,犹自频推敲。少年重意气,执手申漆胶。老子不晓事,闭目持双桡。”[④]这似乎意味着,寓居生活的最后几年中,金兆燕感受到更多的不愉快。寓居期间,金兆燕应当为主家做了不少钞书、校刊、代笔、陪宴之类文化、交游事务;从“投赠谁解南金双,鬻身止索五羊皮”来看,作者此时的后悔情绪,可能源于对主家送行馈仪的不满;这种情绪频频发之于诗,真情流露的同时,多半也有希望传到主家耳中,增加馈送数目的成分。

晚年作客扬州的金兆燕,享受着潇洒诗意的喜悦,也体验着乡愁、依人的痛楚,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老境幸味甘蔗甘,客游谁识苦荼苦”[⑤],个中甘苦自知,难为外人道也。

金兆燕30岁中举后到71岁离扬归故里的42年生涯中,以中进士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约为20年,以入卢幕分为求依人和依人阶段,前者是到处奔波谋事、谋食,常是求依人而不得;后者入幕,有人可依,生活相对稳定。第二阶段约22年,以辞官为界,可分为官自立阶段和辞官依人阶段。在这42年,为官自立14年,求依人和依人的时间共有28年。据前面的分析,为官期间,也必须“依”盐商的经济赞助才能满足维持其“官”员相对体面的生活,或可看成“依人”的一种特殊表现。

① 金兆燕:《元旦作二首》,《棕亭诗钞》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31页。
② 金兆燕:《暮》,《棕亭诗钞》卷十六,《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38页。
③ 金兆燕:《次吴暮桥送行韵留别》,《棕亭诗钞》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64页。
④ 金兆燕:《次吴梅查送行韵留别》,《棕亭诗钞》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64页。
⑤ 金兆燕:《次吴暮桥送行韵留别》,《棕亭诗钞》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1442册,第264页。

从他早年“一笑谁为依恋人”的企盼、哀告，到晚年“依人一笑雕笼翮”的自耻自嘲，我们看到封建知识分子尤其是寒士，在生存压力和精神追求的双重作用下，不得不“依人”的困境，在获取生存条件、满足部分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体验着难以言说的屈辱、酸辛、悲哀和无奈，付出了一定的精神代价。这显然不是个人的错误选择所致，而是时代、社会的悲剧——传统和时代决定了封建文人的“依人”情结。半是自尊、半是愿望难遂，金兆燕在诗文中抒发了不平之气、怨悔之情，不无反思之意。但显然未能对“依人”心态、处境，作出精神上的自我反思。这正是古代部分文人的悲哀所在：惯于“依人”而缺少真正的独立意识。

提　要：清代乾隆年间诗人金兆燕与两淮盐官、盐商多有交往，前后近40年。其诗文记载了这段历史的演变：中进士前，“一笑谁为依恋人”的企盼；进盐官幕府的感恩；任扬州府学教授成为盐商宅第座上客的自得优游；晚年寓居盐商“依人一笑雕笼翮”的自耻自嘲。这彰显了封建寒士不得不“依人”的困境，及其为此付出的精神代价。金兆燕在诗文中也抒发了不平之气，流露出某种怨悔之情，却错失了从精神独立层面对文人“依人”心态、处境的文化反思。这正是古代部分文人的真正悲哀所在：惯于“依人”而缺少真正的独立意识。

关键词：金兆燕　两淮盐商　依人心态

元代南曲散曲佚文辑录

许建中

在我国古代戏曲史上，先有元杂剧而后接以明清传奇，是一个传统的错误观念。这个观念直到1915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出版才得到纠正。1920年，叶恭绰在英国伦敦小古玩铺发现《永乐大典》卷13991的戏文3种，1931年影印出版，我们得以看到元代戏文的全本。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我们才知道在明清各种曲谱和曲选中还存有不少宋元南戏的残曲。由此，赵景深在1934年出版了《宋元戏文本事》，同年钱南扬出版了《宋元南戏百一录》，两书共辑得南戏残文56种。1936年冯沅君、陆侃如出版了《南戏拾遗》，据新发现的《南曲九宫正始》，增辑南戏残文72种。南戏辑佚工作大致于此。钱南扬于1956年出版了《宋元戏文辑佚》，做了一个总结性的、集大成的工作。南戏文本和残曲的辑佚，以及由此确立的宋元南戏的观念，是20世纪学术研究获得的重要成果之一。百年以来，这一成果逐渐被学术界认识和接受，成为普遍承认的科学定论和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与此相关，对于元代南曲散曲，除隋树森《全元散曲》辑录了一些作品外，却长期以来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对此的研究也付之阙如，客观上形成了南散曲始于明代的错误认识。资料不足是造成研究欠缺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对《全元散曲》辑录的元南散曲作出了一些具体考辨[①],同时发现在《九宫正始》[②]中存有许多明确标注为"元散套"或"元南北散套"的曲子。初步梳理,共得 41 套, 90 支曲子,其中初见于《九宫正始》者 54 支,已见于《全元散曲》者 26 支,后世元明互题者 10 支。仔细校核,这些曲子只有冯沅君曾予提及[③],即成绝响,是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注意的宝贵文献资料。它的存在,有助于确立元南散曲的历史存在,填补中国散曲史上元代南散曲失缺的重要环节;可稗益于元南曲文本的辑校,了解元南散曲在明代的传播及其变异。现摘出这些曲子,以飨同好。

本文仅收录明确题署"元散套"、"元南曲合套"的作品,以保证逻辑上的统一完整性。对于后世兼题元明的散曲,仅录标署"元散曲"者,并在第三类"元明互题"中予以考察。

辑录工作,尊重原谱:曲文正、衬,一遵原式;原有注评及辑录者的相关考评,一并置于曲文之下。为了便于阅读,略作分类:将分散于各卷中大体可以判断为属于同一套的各支曲子,归并于一处;并略加考订。

关于这些元南散曲的体、用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容后另文专门讨论。

一、初见于《九宫正始》者 54 支

1.[黄钟宫过曲·神仗儿]……家家启,华筵共乐,举杯相庆。……

无名氏,元散套《薄日乍烘晴》,页 56

2.[黄钟宫过曲·耍鲍老]看的每喤啰,挨拶市井。滚灯球不暂停,耍鲍老乔相领。弓鞋灯挑过,舞得来时有笑声。

---

① 参见拙作《〈全元散曲〉辑录的南套、南北合套考辨》,《西北师大学报》, 2008 年,第三期。

② 徐于室,纽少雅:《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台湾学生书局 1984 年版。本文每曲末尾所标数字,均为此书页码。

③ 冯沅君:《〈南戏拾遗〉导言》:《九宫正始》"可借以校辑散曲。书中所引虽以剧曲为主,但也有一部分散曲,已佚者可辑,尚存者可校。"《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7 页。

无名氏，元套《薄日乍烘晴》，页 60

此曲列［耍鲍老］正格，咏唱本题；尾批详辩此曲与［黄钟调近词·玉翼蝉］、［黄钟过曲·永团圆］和［鲍老催］之异同。《新谱》正将此曲列为［玉翼蝉］之例曲。

3.［黄钟宫过曲·画眉序］薄日乍烘晴，槛外梅梢，坠粉飘零。扇东风消尽，岸北残冰。……

无名氏，元散套《岁时丰稔》，页 76

此曲列［画眉序］第五格。原题注："首句仍五字，次句实确八字二截。"

4.［黄钟宫过曲·玉漏迟］游人慢行，问谁家，爱月何处闻灯？才子佳人，并肩笑语盈盈。买玉梅斜插鬓云，觯金凤寒笼花影。(合)琉璃宫殿，今宵暂借来人庆。

无名氏，元散套《薄日乍烘晴》，页 88

此曲列［玉漏迟］第三格。原题注："合头首句四字，不合诗余。"

5.［黄钟宫过曲·喜看灯］纱笼儿过处过处人争竞，尽说道今夜灯，似彩云移下一天星。桂魄澄澄一样明，谢吾皇，与民同乐喜看灯。

无名氏，元散套《薄日乍烘晴》，页 114

原题注："此调首句叠字乃定式，此曲皆然。"

6.［黄钟宫过曲·玩仙灯］无限俏勤，买市的都争胜。酒肆歌楼相招请，格范尽学京城。人如在广寒宫殿，风味胜蓬莱仙境。火树银花烂暗尘，飘兰

麝喷馨。

无名氏,元散套《薄日乍烘晴》,页 115

以上六曲,当属同一套。"薄日乍烘晴"是其过曲首牌第一句,常例用作题目,而本套之题目当为《岁时丰稔》。

7.[黄钟过曲·斗双鸡]绮罗丛里乐声喧,闹蛾儿人喜欢。抹土搽灰,恣舞盘旋,仕女儿双双斗娇面。向天街上相并肩,向天街上相并肩。

元散套《鳌山耸云高》,页 58

此曲列[斗双鸡]第一格,原题注:"此调,今人错以[滴溜子]诬其名。"

8.[黄钟过曲·斗双鸡]乱撒琼瑶坠光粉,想滕神真恁狠。剪水裁冰,下得越紧,转觉寒威透重门。怎不教人怨恁,怎不教人怨恁。

元散套《元夜撒珠玑》,页 58

此曲列[斗双鸡]第二格,原题注:"末句亦六字,句节不同。"上曲末句为六乙句式,此为六字句式。

9.[黄钟调近词·玉翼蝉]……这天街上怎行?

元散套《元夜撒珠玑》,页 1057

原[黄钟调近词·玉翼蝉]尾批:"有时散套《元夜撒珠玑》有平煞云云。"此曰"时散套",乃言明末清初仍在流传;据上曲,原本当是"元散套"。以上两曲属同一套。

10.[正宫引子·缑山月]春昼日迟迟,金兽喷烟微。清明过却误佳期,记年时花下深盟誓,人何处负芳菲?

11.[前腔换头]无言魂断栏干倚,心事有谁知?云山万叠信音稀,掩重门一阵黄昏雨,厮合唈泪偷垂。

无名氏,元散套《顿成萦系》,页135

据原文注释,此为[缑山月]之变格:末句由五字改作六字,[换头]首句由六字改作七字。

12. 道宫调近词·解红序]顿成萦系,对美景,虚负好天良夕。人生最苦,欢正美争忍恩情,翻成离恨,鸳鸯各自飞。闷手捻花枝自叹息。伤悲,把春愁万思千虑付双眉。

13.[前腔换头]岑寂,困人天气,剪牡丹,犹记去年今日。余香未歇,难拚却一缕相思,悬肠挂肚,何日得见你?怕日远日疏恋那人。终日,恣迷花恋酒不道有人忆。

14.[前腔换头第四格]争知,憔悴损玉容怎受持?须念咱千种看承你。如何下得顿忘却,玉体同雕,香云双剪,灵神设誓时?想薄劣冤家在那里?孩儿,没前程负心薄倖有天知。

15.[前腔换头第五格]思之,料想我前生曾负你,今世里教我填还你。临风对月,无限事横在心头,教人难弃,衷肠竟诉谁?更羞睹梁间燕双飞,残红乱落随流水,闷转添子规不住啼。

无名氏,《遏云奇选》元散套,页1292

此四曲列[鲜红序]第二格。首曲原题注:"第二句减为二字,三句增为七字,末句并七字。"然详勘始调,此第三句实由原四字增为六字。第三曲原题注:"此与上《李亚仙》[第三换头]同体,但争末句七字耳。"尾曲原题注:"第八句下减去二字一句,增七字一句。"以上六曲,属同一套,以过曲首牌第一句为题。《遏云奇选》当是一部曲选,其中存录有元南散曲,惜此书已佚。[1]

① 《奇云遏选》未为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收录,可补其缺。第三类第5—10条亦出自《奇云遏选》。

16.[正宫引子·燕归梁]庭树昼阴多,照纱窗海榴如火,卷珠帘暂把绣工那。燕将雏,蓦地双飞过。

无名氏,元散套《倦临鸾》,页135

原题注:"与[羽调·燕归梁]不同。[羽调·燕归梁]即九宫[商调·风马儿]也,但又不与十三调[越调·风马儿]同。"

17.[南吕宫过曲·青衲袄]倦临鸾懒画蛾,鬓云偏钗凤亸。偶向池边,倚栏闲坐,被鸳鸯惹起我情恨多。往来穿翠荷,避人深处躲。天生匹配雌雄,并宿并栖,他冷眼儿因笑我。

无名氏,《乐府群珠》[①]元散套,页544

此曲列[青衲袄]第二格。原题注:"第三句变八字二句,末句减为六字。"以上两曲属同一套,以过曲首牌第一句前三字为题。

18.[正宫过曲·薄媚衮]花占得秋容幽雅,蜂蝶何曾惹,风味殊佳。黄金蕊,白玉英,翠叶遮。须管年年,不负此花。

无名氏,《乐府群珠》元散套,页208

此曲列[薄媚衮]第三格。原题注:"比上《拜月亭》格,减去第四、第五二句。"

19.[仙吕宫引子·望远行]人生不满百年,七十尚稀有。十岁童蒙不算,十岁更昏耄。大都五十光阴,一半夜眠分了,试闲将岁月折倒。

20.[前腔换头]总休休,算只余二十五岁,等闲如露草。碌碌争名夺利,

① 《九宫正始》所引《乐府群珠》中的元南散曲,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乐府群珠》这部曲选的认识,补充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曲集·散曲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乐府群珠》条的相关叙述。以下第一类第18、36—37、44条,第二类第9—11、12、16—18、19—24、25—26条,第三类第1、2条等,亦出自《乐府群珠》。

岂无烦共恼。便做日日欢娱，数著能得几遭？枉痴迷作千年调。

无名氏，元散套《劳生扰扰》，页 267

21.[道宫调近词·双赤子]勘破尘劳，一场梦觉。好似花开谢，涌退春潮。子孙贵娇，贤哉不肖，成败难保。

无名氏，元散套《劳生扰扰》，页 1280

此曲列[双赤子]第二格。原题注："此第四句减为四字。此格多有。"

22.[道宫调近词·拗芝麻]花开酒一壶，月下琴一操。酒半醺，琴半调，起舞时清啸。长教月下随，满簪花压帽。趁取身闲未老，须索开口笑。

无名氏，元散套《劳生扰扰》，页 1283

此曲列[拗芝麻]第四格。原题注："第八句变为六字。"始调原作七字句。以上四曲属同一套。

23.[仙吕宫引子·醉落魄]丹青妙手，难描就那人丰采。倾城艳质羞花态，一种风流，谁与巧安排？

24.[前腔换头]瞥然见时心惊骇，那娇姿欲与诉情怀。双眉不转秋波隘，懊恨婚迟，何日遇多才？

无名氏，元散套《怨婚迟曲》，页 271

此二曲列[醉落魄]第二格。上曲原题注："首二句互倒，与黄山谷诗余同。"下曲原题注："首句与《孟月梅》始调同。"

25.[仙吕宫过曲·掉角儿]镇日价如醉如痴，愁和闷几时宽解？许多价惺惺俊俏，到如今顿无聊赖。瓜甜蒂苦事难全，只落得半尴不尬。姻缘未来，诸余事乖。三二次，媒人去问，更不倸保。

无名氏，元散套《丹青妙手》，页 331

此曲列[掉角儿]第三格。原题注:“第五第六并为七字一句,是体偲有。又减去第七句三字一句。”以上三曲当属同一套,作《丹青妙手》,是以引曲首句为题;《怨婚迟曲》,第27曲有“懊恨婚迟”句,第28曲有“姻缘未来”句,当是此套散曲的题目。

26.[仙吕宫过曲·掉角儿]早梅开争夺化工,明月来描写真容。怪无情夹雨和濛,助寒威加霜犹重。点红炉,欺白屋,飘翠馆,千秋西岭,三友玄冬。藏檐冻鹊,书空暮鸿。奇绝处,云霞淡淡,楼阁重重。

无名氏,元散套《岁将冬》,页331

此曲列[掉角儿]第四格。原题注:“第八句变为四字。《寻亲记》之‘他顽劣’犯此。”

27.[仙吕宫过曲·掉角望乡][掉角儿]睹红轮蓦忽地坠西,画堂中渐生凉意。试兰汤浴罢共伊,再传杯诉些情意。按宫商,歌金缕,醉醺醺,双双共入纱厨里。[望吾乡]挥罗扇,我共伊,扇我还扇你。

无名氏,元散套《酷暑炎威》,页333

原题注:“第八句变七字,元词偲有此体,但多见于犯调。陈大声《风儿》套亦仿。”

28.[仙吕宫过曲·八声甘州]……数声,未成曲调,先惹离愁。

无名氏,元散套《千呼万请》,页337

此曲列[八声甘州]第六格。原题注:“末句变为八字二句。”原曲注:“全调皆同,不录,止录末三句云。”

29.[仙吕宫过曲·解三醒换头]远别离,只为蝇头薄利牵,怎容那野蔓闲藤胡乱缠?记春衫上钮松沉香钏,涛浪滚涌温泉。……

无名氏，元散套《想起旧姻缘》，页 349

列［解三醒换头］第二格。原题注："首句上增三字一句。二曲皆然。"尾注："下同，不录。"

30.［中吕引子·沁园春］暖送蛾黄上柳条，香飘宫粉褪梅梢。玉壶解冻渐冰消，岁稔时丰民富饶。凤城三五夜，还又赏元宵。

无名氏，元散套《铁锁放星桥》，页 385

［中吕宫引子·四园春］尾批："此调之章规句律，直与［中吕调·沁园春］无二"，引此曲为例曲。又页 1129［中吕调慢词·沁园春］引此为例曲，仅"蛾"作"鹅"，余全同。原题注："与诗余不同。"尾批："此调与［仙吕宫·四园春］无异，此或一调二名。人疑书写之误，今虽承其备此，终不敢为其然也。"所谓"慢词"，在南曲即为引子。所言［仙吕宫］，当是［中吕宫］之误。

31.［中吕宫过曲·粉孩儿］彩结鳌山侵汉表，望珠楼翠幕，万烛高烧。天街王孙骏马骄，竞豪奢五陵年少。问谁见月闻灯，肯辜负如此良宵？

无名氏，元散套《铁锁放星桥》，页 474

此曲列［粉孩儿］第二格。原题注："首句变作七字，第七句减为六字。"实为合并首两句作七字一句。页 188［正宫过曲·锦渔儿］尾批引此末二句，题署"无名氏，元散套《铁锁放星桥》"，原注："但'谁'字，原磨脱一字，不敢妄续。"参考此曲，"谁"字无误。

32.［中吕过曲·红芍药］……百忙里娇眼偷瞧。

无名氏，元散套《铁锁放星桥》，页 475

［红芍药］尾批："末句仄煞。有元散套《铁锁放星桥》此调平

煞云云。”

33.[中吕宫过曲·会河阳]院院烧灯珠翠绕,家家开宴管弦调。玉人何处教吹箫?携舞妓歌姬来到。座间自有十分俏,醉中赌买千金笑。

无名氏,元散套《铁锁放星桥》,页478

此曲列[会河阳]第三格。原题注:“亦减去第三二字一句,第四、五并作七字一句。”以上四曲当为一套。

34.[中吕宫过曲·金孩儿][缕缕金]谁知道,这滋味?门掩著梨花悄,最凄其。破却我一床蝶梦,输他双枕共追随。[般涉调·耍孩儿]无端晓夜檐花坠。岂识情怀苦最难禁,自挑灯晕残煤。

无名氏,元散套《夜迟迟》,页397

原题注:“[缕缕金]乃《拜月亭》格,但减去第六四字一句。”原尾批:“此[般涉调]之[耍孩儿],仅见于此犯调。其全本调虽见于元谱目中,然其本调词曲,未尝有之。故今无从考订。”

35.[中吕宫过曲·扑灯蛾]春风桃李满枝,梧桐秋月惨凄。灯影只,鸳帏与谁同共也?恨良宵苦短睡,感君王忧忆,叹魂魄不入梦里。恨悠悠,死生不忍两分离。

无名氏,元散套《忆昔汉宫时》,页402

此曲列[扑灯蛾]第十格。原题注:“第三句减为三字,第四句用‘也’字煞,下增六字二截一句,第六句下减七字一句。”

36.[中吕宫过曲·舞霓裳]极目春光无限美,果是奇。满泛金杯拚沉醉,醉扶归。百年三万六千日,四时中光景似梭掷,莫忘了花朝月夕。怕朱颜一去不回来,和伊且欢会。

无名氏，元散套《春昼日迟迟》，页 466

此曲列［舞霓裳］第三格。原题注："此格不惟第二、第四句另文，且末二句更不同。"

37.［中吕宫过曲·拗荼蘼］春昼日迟迟，和风扇韶华明媚。景观绣陌香尘细，往来车马争驰。穿花径，度柳堤，莺歌蝶拍，园林景万红千翠。风光可人，时当令节又催。布暖阳和，无限早景致。柳拖金线摇万缕，梨花绽如玉砌，时复暗香扑鼻。见簇簇海棠花，犹如锦绮。烘晴严日，紫燕双双，呢喃早声细。

无名氏，《乐府群珠》元散套，页 498

原题注："一名［绞荼蘼］，一名［荼蘼香］。"以上两曲属同一套。此套与以上第 10—15 曲一套不同：彼引曲首句作"春昼日迟迟"，过曲首牌第一句作"顿成萦系"，故题为《顿成萦系》；此过曲首牌第一句作"春昼日迟迟"，故题为《春昼日迟迟》。此两套虽然内容相近、用韵相同，但宫调不同，名称不同，内容亦不同：彼套抒离怨相思，此套写惜春美景，不可混淆。

38.［南吕宫过曲·香遍满］他说道别离时暂，谁知杳无书半缄，冤家下得将人赚。影孤形只，眼前愁怎担？花懒簪，景物慵观览。

无名氏，元散套《梦返秦楼》，页 574

此曲列［香遍满］第五格。原题注："此与《伯喈》同体，只争第六三字句；但字倍严于《伯喈》，且无衬字。"

39.［南吕过曲·浣纱溪］兽炭红，销金帐，相思病最苦听笙簧。没眠没寐象牙床，几番教奴自暗伤。更漏迟迟催曙鼓，一声声偏也凄凉。愁来无倚懒梳妆，金钗儿横簪双凤凰。

无名氏，元散套《锦绣韶光》，页 580

此曲列［浣纱溪］第二格，题注："此亦'杨柳眉'格。"尾批："此二调各成一体，决不可谓此是彼非也。""元散套"之"元"，原作"云"，当是形近而误。

40.［南吕宫过曲·东瓯令］泪珠滴，两三行，斜倚定围屏教奴自忖量。当初指望同心意，时时的常念想。谁承望半途废，风吹檐马响叮噹。叮叮噹噹，怎不断肠？

无名氏，元散套《锦绣韶光》，页588

此曲列［东瓯令］第五格。原题注："第五句下增五字一句，末煞变八字二句。此格偎多。"

41.［南吕宫过曲·满园春］悄悄春夜长，默默空断肠。莲开水阁，是奴堪宜宴赏。殿阁生凉，风吹十里芰荷香。把冰弦漫理，采莲歌自吟，是奴开樽泛觞，小池夜凉。

无名氏，元散套《锦绣韶光》，页593

此曲列［满园春］第三格。原题注："第六句增为七字。又名［挂真儿］。"始调题注："与商调［满园春］，又名［遍地锦］者不同。"以上三曲属同一套曲。

42.［南吕宫过曲·梁州序］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地远接著衡庐。星分翼轸，襟带几多江湖。大郡物华天宝，射入龙光，斗牛之墟。地灵人杰，俊彩星驰，兴尽东南宾主美。朋满座，凤蛟口。

43.［前腔换头第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听渔翁唱彻，响穷彭蠡。声断衡阳之浦，雁阵惊寒，逸兴遄飞。皓齿清歌，白云遏住，鼎食钟鸣舸舰迷。四美具，二难并。

无名氏，元散套《拟滕王阁》，页617

第一曲列［梁州序］第六格。原题注："第八、九、十三句，兼效上《薛云卿》及《乐昌公主》二格之变。又名［古梁州序］。"末字缺佚，原注以为应作平声字。第二曲原题注："第七、八、九句，亦祖始调句法。"以上两曲属同一套曲，隐括唐人王勃《滕王阁序》而成，故名。第二曲下有［前腔换头第四］，原题注："同，不录。"

44.［南吕宫过曲·绣带儿前腔换头］无伴，楚台月下闲风管，因循岁华将半。想天涯海角飘零，花前酒边盘桓。金猊何处薰帏幔，把恩情雪消冰泮。缭乱，肝肠似剜，因此上随风喘。

无名氏，元散套《花阴下》，页632

此曲列［绣带儿换头］第四格。原题注："减去第六二字句。前五句《韩寿》格，第六、七句常格，末三句末详。"尾批指出此套载《乐府群珠》，并详细论证此调与时谱之［痴冤家］不同。

45.［南吕宫过曲·奈子花］ 告雁儿停翅驻云飞，诉衷肠说与伊知。相烦寄一封书去，他家在三仙桥住。过赚西，嘱罢闷归房睡。

无名氏，元散套《芙蓉花渐开》，页661

此曲列［奈子花］第四格。原题注："首句、三句，句读不同；末句六字。此又名［对金环］。"页649［琐窗寒］尾批引此曲之首二句。此曲似与第二类第5—8曲同属《如醉如痴》一套，声韵、内容都相吻合，然宫调不同，名称亦不同。

46.［双调引子·红林擒］欲逐风流愿，翻惹风流怨。刚道花星临现，好事竟无成，方知侬命蹇。岁岁桃花人面，虽得见，如不见。

无名氏，元散套《虚度芳春》，页867

此曲列［红林擒］第二格。原题注："第六句减为六字。"

47.[仙吕入双调过曲·嘉庆子]咫尺之间,如隔万山,怎能够厮守百年?想是缘悭分浅,因此上不团圆,因此上不团圆。

无名氏,元散套《虚度芳春》,页971

此曲列[嘉庆子]第二格。原题注:"首句变为八字二句,末句用叠文。"以上两曲属同一套。

48.[双调过曲·红林擒]娉婷,晚妆倦再整。云鬟乱,金钗坠,翠袖冷,销尽麝兰馀馨。往常是对景追欢,今日惯因春成病。清昼永,漫有梨花雪淡,柳絮风轻。

无名氏,元散套《过眼韶华》,页890

此曲列[红林擒]第二格。原题注:"第六、七并为六字一句,但此句不可为式。按三叠句,此格为正。"

49.[双调过曲·侥侥令]休嗟时物换,莫惜客囊悭。准备沽酒浇肠情无限,想是故时人下榻陈蕃。

无名氏,元散套《行李萧萧》,页896

此曲列[侥侥令]第三格。原题注:"末句句节不同。"

50.[仙吕入双调过曲·忒忒令]庶人家闺门咫尺,尚然有许多回避。何况在九重宫阙森严地,知他姓名是谁?措虚就实,除非是,插双翅,到深宫禁闱。

无名氏,元散套《尚惜当时》,页960

此曲列[忒忒令]第五格。原题注:"第四句下增四字一句。"

51.[仙吕入双调过曲·尹令]空满西楼十二,空满后宫华丽。空有千娇

百媚，空有舞衫歌女。从元宪死，不称明皇心转痴。

无名氏，元散套《咏杨妃》，页 973

原注："古今传奇及散套用此者比比。今又查得元传奇《东窗事犯》，又元散套《咏杨妃》套，亦皆有此调，亦与本曲无异，益信时谱及坊本之调体章句皆非也。"杨阴浏先生《天宝遗事拾残寻谱》（一名《元王伯成〈天宝遗事〉残本》，稿本），均北曲，与此无相同、相近之曲。

52.[仙吕入双调过曲·锦衣香]傍花桥，红楼闹。象板敲，金缕调。我听得可意娇姝，歌喉清妙，双双对舞纤腰。香罗暖裙，汗湿鲛绡。这风流畅想，人不乐空老。宜把金樽倒，管谁闷恼？花前且醉，拼眠芳草。

无名氏，元散套《春雨如膏》，页 1027

此曲列[锦衣香]第六格。原题注："第七句减为六字，十一句减为五字。"

53.[越调慢词·风马儿]银河清浅，风露洗高秋，一片遥天。花影寒笼，桐阴斜转，庭前皓月娟娟。翠屏闲彩云飞梦，珍簟冷清夜无眠。傍画檐，控银钩，再把珠帘高卷。

无名氏，元散套《挂银河》，页 1205

原注："与九宫[商调·风马儿]不同。"

54.[般涉调近词·尚如缕煞]……纱厨似水，胜如昨宵一梦长。

无名氏，元散套《庭馆占风光》，页 1302

在评论明传奇《子母冤家》[尚如缕煞]末二句时，原尾注："此末句仄煞，有元散套《庭馆占风光》平煞云云。"

二、已见于《全元散曲》者 26 支

1.[正宫过曲·白练序]沉吟久,奈好事从来不自由。芙蓉帐,未暖又还分手。别后万种愁,叹晓梦高唐一旦休。添僝僽,梨花暮雨,燕子空楼。

2.[前腔换头]绸缪,两配偶,思量旧友。花阴月下同欢笑,阆苑瀛洲。无由愿再酬,恨飞絮飘香趁水流。成迤逗,金杯满酌,丽曲歌讴。

无名氏,元散套《明月双溪》,页 194

上曲列第二格,题注:"首句三字。"下曲列[前腔换头]第三格,题注:"第四句变为七字,第五句减为四字。"

3.[正宫过曲·醉太平换头]悠悠,清宵路远,绣鞍归晓,山盟虚谬。分开美玉连环结,怎能够两情依旧。频修,鸾笺锦字到皇州,每一句泪痕湿透。甚时相守,钗分凤拆,弦断空篌。

无名氏,元散套《沉吟久》,页 200

《雍熙乐府》无名氏南散套[正宫·白练序]《春愁》,五曲组套,有此三曲,题[白练序]、[捣白练]、[太平令]。《全元散曲》承之。考宋元戏文《孟月梅》、《风流合》、《裴少俊》、《韩寿》等残曲中均有曲牌[捣白练],然入[南吕近词];宋元戏文《玩江楼》残曲有曲牌[太平令],然为[中吕过曲][1];北曲有[双调·太平令][2];句格均与《雍熙乐府》所录不同。《九宫正始》所题,有元南戏曲牌可为互证,当从之;《雍熙乐府》所题误。《全明散曲》此套尾注:"南曲《九宫正始》引[白练序]、[捣白练]、[太平令]三曲,注'元散套'。"后句对,前句误将《雍熙乐府》所题曲牌名移作《九宫正始》了。《吴

① 所引戏文,均见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以下凡引戏文佚曲,除特别注明外,均出于此书。

② 参见郑骞《北曲新谱》,艺文印书馆 1973 年版。以下凡引北曲曲牌定式,均出于此书,不另出注。

骚合编》属关九思,《全明散曲》题署关思,言其为万历年间人,然此曲最早见于嘉靖十年(1530)之《雍熙乐府》,题误显然;《全元散曲》承《雍熙乐府》题无名氏,是。以上三曲属同一套,"沉吟久"是其过曲首牌第一句,常例用作题目,而本套之题当为《明月双溪》。

4.[仙吕宫过曲·乐安神]闲来思虑,自从那日赋归欤。山河日月几时虚,风光渐觉催寒暑。欲求生宝贵,须下死功夫,且常教两眉舒。

无名氏,元南北散套《远害全身》,页298

此曲又见《全元散曲》沈和[仙吕·赏花时]南北合套《潇湘八景》。《盛世新声》、《雍熙乐府》均以北曲[仙吕·赏花时]首句"休说功名皆是浪语"为题,不注撰人;《词林摘艳》同,注"元沈和甫",与《正始》合。"全身远害"为此套第二曲南曲[排歌]首句,则《正始》以南过曲首牌第一句为题,题署方式与《盛世》、《摘艳》、《雍熙》等不同。

5.[仙吕宫过曲·八声甘州]……仗托谁人,传递消息?

无名氏,元散套《如醉如痴》,页340

原注:"[八声甘州]合元散套《如醉如痴》末二句云云。"

6.[仙吕调近词·孤飞雁]南来雁声嘹呖,一个个声传韵悲。听得心儿碎,教我闷怀堆积。

无名氏,元散套《如醉如痴》,页1109

原题注:"即[油葫芦]。与[南吕宫·孤飞雁]不同。"尾批依据元谱详论此调乃一调二名。

7.[仙吕调近词·告雁儿]告得雁儿,雁儿,休只管在空中嘹呖。雁儿,与

我梢书去，教他早早回归。

无名氏，元散套《如醉如痴》，页 1111

原题注："此调今皆错认为［油核桃］，大谬。"尾批："此调之章句，比上［孤飞雁］止争第二句之叠文，及第三句下'雁儿'二字。但其第二句之叠文是其定体。"

8.［仙吕调近词·醉雁儿］［告雁儿］告得雁儿，雁儿，［解三酲］记当初共伊设誓，到如今误我归期。为君家受尽多劳役，爷娘骂我你争知？傍人讲说相思你，只教我饮气吞声，无语可回。相烦你，千言万语，说向他知。

无名氏，元散套《如醉如痴》，页 1112

以上四曲，属同一套曲。此套，《群音类选》不注撰人；《吴歈萃雅》、《词林逸响》、《南音三籁》、《古今奏雅》均注沈青门作，故《全明散曲》录入沈仕名下。《全元散曲》无名氏南曲散套［双调·一机锦］《离思》尾注："《萃雅》、《逸响》所注作者固不可尽信，惟此套曲文与《九宫正始》所引数曲已颇有差异，疑经后人大改。"是。或即沈青门所改，故后人归之。

9.［仙吕宫过曲·小醋大］浪潮拍岸，口江风扫芦花。鸥鹭破烟，飞落汀沙。见茅舍两三家，在夕阳下，一簇晚景潇洒。问无言使我时将珠泪洒，愁转加，瘦减香肌只为他。懊害杀，闷萦心鬓生白发，蹉跎误却年华。

无名氏，《乐府群珠》元散套，页 358

原注："此曲首句，按古本原文曰'浪潮拍岸'。今时本皆改作'暗潮'。若曰'暗潮'，当为'涌岸'，不当'拍岸'也。第二句'江'字上原脱一字，疑是'蔽'字，但不敢妄续，量必非今之'断'字耳。若据'断'，犹今方言'静江'也，不得不连'风'字。但'断江风'三字，读非句法。若以'断江'二字读，似乎'风扫芦花'断江矣。设使风

总大，芦花总多，必不至于断江也。宜详之。”

10.[仙吕宫过曲·长拍]叠叠离情，重重幽恨，羁旅怎生禁架？家乡遥遥，楚水迴阔，迢迢遍接天涯。斜日映红霞，望水村隐隐，酒旆高挂。浅水滩头有鹭立，见枯木噪寒鸦。来往橹声咿呀，正水涨野塘，浪激汀沙。

无名氏，元散套《浪潮拍岸》，页360

11.[仙吕宫过曲·短拍]芳草渡口，白蘋岸侧，潺湲水绕人家。还再赴京华，共诉说许多，潇潇洒洒。异日图将此景，俺待归去凤城夸。

无名氏，元散套《浪潮拍岸》，页362

以上三曲属同一套曲，用过曲首牌第一句为题。此套最早著录于《新编南九宫词》，注“古词”；后《吴骚合编》题注“旧词”，目录注“古调”；均与《正始》合，《全元散曲》于“无名氏南曲”收录。《南词新谱》录此三曲，注“散曲”，未标时代；《南词韵选》不注撰人。《吴歈萃雅》、《词林逸响》、《南音三籁》、《古今奏雅》均注罗钦顺作，故《全明散曲》归其名下。《萃雅》、《逸响》等不可尽信，此套仍当为元曲。

12.[南吕宫过曲·香遍满]鸾凰同聘，寻思那人忒志诚。谁信今番心不定，顿将人薄倖。可怜无限情，一似纸样轻，把往事空自省。

无名氏，《乐府群珠》元散套，页571

尾批：“细阅此调，无不第四、五句自联，第六、第七自联者，唯此曲第五、第六句相联。此章亦异。”眉批：“《沈谱》曰：此曲无衬字，有规矩，胜于‘因他消瘦’及《琵琶记》二曲。”参见沈璟《增定南九宫曲谱》。

13.[南吕宫过曲·浣纱溪]谁惯经，相思病？怨只怨枕余剩衾。两三杯酒全无兴，空教我十二栏杆独自凭。心耿耿，想起虚脾性。耳边言，那讨真

本兰亭?

无名氏,元散套《鸾凰同聘》,页 577

原题注:“俗作[浣溪纱],非此体。元词不甚多。”尾批对明曲中此体有详细的考辨正讹。

14.[南吕宫过曲·刘泼帽]对景对景无心咏,时闻枝上流莺,如何唤得春愁醒?羞对画屏,花间翡翠双双并。万虑生,独守房栊静。

无名氏,元散套《鸾凰同聘》,页 585

此曲列[刘泼帽]第四格。原题注:“首句用叠字,此格僅有。第二句变六字,第三句下增四字、七字二句。”

15.[南吕宫过曲·满园梧桐][满园春]漫教忆茂陵,调弦谁共听?少个知音,斗帐沉吟。孤帏最苦,良宵夜永。[梧桐树]这等凄凉如何教我捱到明?心肠总然如铁硬,[满园春]若也思量,扑簌簌珠泪倾。

无名氏,元散套《鸾凰同聘》,页 594

原题注:“与九宫[商调·桐花满园]不同。”尾批对时人改调作出辨正,以为虽可通,“但非原词古调也。”以上四曲属同一套,以过曲首牌第一句为题。此套,《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及《群音类选》、《盛世词林》等不注撰人;《旧编南九宫谱》不注撰人;《吴歈萃雅》、《南音三籁》题王九思作,误。《全元散曲》录之,尾注:“南曲《九宫正始》引[香遍满]、[挂梧桐]、[浣溪沙]、[刘泼帽]”;《全明散曲》亦录之,尾注同上。然四支曲牌,误题二曲;《词林摘艳》题[南吕·挂真儿]套,即用[挂梧桐]、[浣溪沙],所误当出于此。

16.[商调过曲·黄莺儿]霜降水痕收,迅池塘已暮秋,满城风雨还重九。白衣人送酒,乌纱帽恋头,思忆那人一似黄花瘦。强登楼,云山满目,遮不断

许多愁。

无名氏,元散套《从别后》,页 732

此曲列[黄莺儿]第三格。原题注:"末句五字,乃《蔡伯喈》之奇体。"

17.[商调过曲·集贤宾]西风桂子香韵幽,奈虚度中秋。明月无情穿户牖,听寒蛩声满床头。空房自守,暗数尽樵楼更漏。如病酒,这滋味那人知否?

无名氏,元散套《从别后》,页 743

此曲列[集贤宾]正格。

18.[商调过曲·二郎神]从别后,正七夕穿针在画楼。暮雨过纱窗凉已透,夕阳影里,一簇寒蝉衰柳。水绿蘋香人自愁,况轻拆散鸾交凤友。得成就,真个胜似、腰缠跨鹤扬州。

无名氏,《乐府群珠》元散套,页 749

此曲列[二郎神]第三格。原题注:"第八句三字,类多。"据作者在页 696[二郎神慢]之题注:"余今遍查元谱及古今传奇,仅见《拜月亭》有此,后又勘得元散套《从别后》,于目中注得有此引及以过曲,检之,仅存得首一句,余皆蠹损矣,惜哉!"以上三曲属同一套,以过曲首牌第一句为题。编者失之于元谱,实又得之于《乐府群珠》,而竟失察也。《词林摘艳》注无名氏散套,王世贞《曲藻》:"'人别后'是元人作",《新编南九宫词》、《南宫词纪》、《词林白雪》等均属高则成,则此套为元南散套无疑,或即高明所作。《全元散曲》归之,是。

19.[双调引子·珍珠马]箫声唤起瑶台月,独倚栏干情惨切。此恨凭谁

说，又值那黄昏时节。花飞也，点点是离人泪血。

无名氏，元散套《暗想当时》，页 875

原题注："正。此调今或疑其为北调，非。"尾批详论此调非犯调，与［珍珠帘］、［风马儿］不同，并且非为北调。

20.［仙吕入双调过曲·沉醉东风］……微笑对人悄说……

无名氏，元散套《暗想当时》，页 957

在评论元传奇《唐伯亨》［沉醉东风］第二格第三句时，原注："'那值'句与元套《暗想当时》之'微笑对人悄说'同句法。"

21.［仙吕入双调过曲·川拨棹］……怎禁他人斗迭。……

无名氏，元散套《暗想当时》，页 967

在评论明人咏朱买臣散套《妻子散》［川拨棹］第四格第二句时，原注："此第二句句法，合古本之《暗想当时》套此调此句，曰'怎禁他人斗迭'。"所言古本《暗想当时》，当即是元散套《暗想当时》。

22.［仙吕入双调过曲·锦衣香］将楚馆焚，秦楼拽。洛浦填，泾河绝。梅家庄水灌汤瓶，打为磁屑，贾允宅守定粉墙缺。武陵溪间，花儿钉了桩橛。楚襄王梦惊，汉相如赶翻车辙。深闭芙蓉阙，紫箫吹裂。碧桃花下，凤凰把翎儿生扯。

无名氏，元散套《暗想当时》，页 1025

此曲列［锦衣香］第五格。原题注："第五句上截增一字，第八句变六字二截。"尾批："此实古本原文古体，今人何不从之？"并引元词与时本对照，详细论证调之句律。

23.[仙吕入双调过曲·浆水令]响叮噹菱花碎跌,则楞楞丝弦断绝。咭孜孜同心扯裂,咭叮噹宝簪断折。采莲人偏拣并头折,比目鱼就池中,冷水烧热。连理树,生砍折,打捞起御水流红叶。蓝桥下,翻滚滚,波涛卷雪。祆神庙,焰腾腾,火走金蛇。

无名氏,元散套《暗想当时》,页 1031

此曲列[浆水令]第四格。原题[浆江令],题注:"第二句下增七字二句,第六句变为六字二截,第十五、十六句不叠文。"

24.[仙吕入双调过曲·有结果煞]饶君使尽机谋彻,止不过负心薄劣,梦儿里对他分说。

无名氏,《乐府群珠》元散套,页 1047

原题注:"'箫声唤起'是其引子,'暗想当时'是其过曲。"以上六曲属同一套,以过曲首牌第一句为题。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元、明归属,二是南套、合套,三是名称。《南宫词纪》、《词林逸响》、《古今奏雅》属郑虚舟;《吴骚集》、《乐府先春》属王百榖;《群音类选》属李爱山,《全明散曲》归李氏,注:"元人亦有李爱山,非一人"。然王世贞《曲藻》:"'暗想当年罗帕上把新诗写'南北大套,是元人作。学问才情,足冠诸本。"所论正与《正始》题署合。又《南北词广韵选》、《萃雅》、《吴骚合编》、《乐府珊珊集》、《南音三籁》等,均注元人作,或注高东嘉作。故《全元散曲》归元无名氏,是。再则《盛世新声》、《词林摘艳》、《群音类选》等均仅录南套,且曲牌名称、数量也有所不同;《雍熙乐府》、《新编南九宫词》、《弦索辨讹》等则全录南北曲,作南北合套。《全元散曲》尾注:"《广韵选》云:'查北词内语多重复,《箫声唤起》阕亦疑是后人增入,故不录。'《九宫大成》云:'此套北曲体多有牵强推凑,因欲合下文作续麻体,以致结句皆与正体有乖;况与南曲迥然出乎二手,想后人因有南曲,而作此以杂之耳。'案此套见于各选本者,以《盛世新声》为最早。惟《新声》有

南曲，兹改据《南九宫词》。"《正始》题署十分严格，仅以上第二类第4曲明确标署为"元南北合套"，其余均题署"元散套"，并无混淆，因此，此套原本应为南套。据王世贞所论及《新编南九宫词》、《弦索辨讹》等记载，至迟在嘉靖年间，就有人已对此套完成了南北合套的扩充补写工作。此套北词确实一般，表明作者长于南而疏于北。南、北曲词并不相称，亦可为补写之一证。据《南九宫词》，此套首三曲为[珍珠马南]、[新水令北]、[步步娇南]，[珍珠马]首句作"箫声唤起瑶台月"，[步步娇]首句作"暗想当年"；《盛世新声》无前两曲，首曲为[步步娇]，首句亦作"暗想当年"；所题均与《正始》不同。由本套第1曲题注可知：元代南散套，是以南曲过曲之第一句为题的；南曲可用引子首句为题，如第一类第23曲，但极少见。依此惯例，此套题"暗想当时"，是。明代曲选题作"暗想当年"，当是在传唱过程中已发生了改动和变化。

25.[仙吕入双调过曲·一机锦]宝钗分，鸾镜缺，瓶坠簪断折。三叠阳关争忍别，心儿里，痛哽咽。眼儿里弹泪血，空教我摝斥揉腮，执手和伊相看也，没一句话儿说。

无名氏，《乐府群珠》元散套，页921

此曲列[侥侥令]第二格。原题注："此比上《王祥》格，止减末煞上之一句，正与《蒋谱》所收者相似。"

26.[仙吕入双调过曲·锦上花]初相见，誓盟设，空教我暗伤嗟，恨千叠难割难舍。他把奴全然不籍，直恁的信音绝，谁知你到今心性别。咭叮的玉簪折，支楞的弦断绝。盼的痴呆，我则想尽老同欢，弄巧翻做了拙。

无名氏，《乐府群玉》元散套，页922

此曲列[锦上花]第二格。原题注："此比上《王祥》格，止争末句五字。亦可证《蒋谱》非。"此两曲又见《全元散曲》所引元无

名氏南曲[双调·一机锦]《离思》套。该套《雍熙乐府》、《新编南九宫词》不注时代与撰人。此两曲当从《正始》,属同一套,为元南曲散套。

三、元明互题者 10 支

1.[仙吕宫引子·望远行]恨花前酒边,人去远,想著俺只手托红颜。心撩乱,画滚滚飞烟,叹今生缘分直恁浅。酬过了少年心愿,断绝了谐老姻缘。身不定随着荡荡游丝,恩情事晓露朝烟。你道是莺花三月老,又只怕鬼病四时缠。

无名氏,元散套《群芳绽锦鲜》,页 268

此曲列[望远行]第四格,原题注:"此与上三格大不相同。"尾注:"此调绝非[望远行]之体;古本只存其题,文词已逸;今引得之于口传,非伪即篡;俟再查明。"页 751 引[字字锦],首句作"群花绽锦鲜",题署"《乐府群珠》,明散套",题注:"唐谱曰:汉曰[字字珠]。后上阅李白诸词,字字成锦,故易名为[字字锦]。"尾注:"此系古调原文",今人多在第十二、十四、十六句下各增一句,"不知何所本也,竟不思[字字锦]之调规章法有限,何得任意增改而坏此古调耶?"页 1197 引[二郎赚],首句作"离绪恹恹",题署"《群芳绽锦鲜》,明散套"。《全元散曲》页 1880 录无名氏南散套[商调·字字锦]"群芳绽锦鲜",共[字字锦]、[赚]、[满园春]、[么篇]、[余音]五曲,无此曲。要之:"群芳绽锦鲜"当属元散套,即所谓"古本"、"古调";《盛世新声》、《词林摘艳》等所录各曲在文词格律上颇有差异,表明此套曲词已为明人"任意增改",故《正始》有题署"明散套"者。[望远行]当属原有之调,然所存既是"今引得之于口传"之曲,当非原词,故未为诸选本所录,《正始》存录以备考;然《正始》明标"元散套",故本文收录之。《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新编南九宫词》等,均不注撰人。《吴歈萃雅》

注高东嘉作,误。《太霞新奏·发凡》):"前辈不欲以词曲知名,往往有其词盛传而不知出于谁手者。《吴歈萃雅》悉取文人姓字,妄配诸曲,欲眩世目,贻笑明眼。"《词林逸响》、《乐府珊珊集》、《南音三籁》、《古今奏雅》等均从《萃雅》,亦误。《乐府先春》、《吴骚集》注沈青门作,《群音类选》、《吴骚合编》注杨彦华作(彦华即明初著名诗人杨贲),然此四种曲选晚出,亦恐非是。

2.[中吕宫过曲·石榴花]教人对景无言终日减芳容,恨蹙破翠眉峰。不知他垂柳何处系青骢,谁想他锦莺花冷淡了芙蓉。空著我为他时终朝闷转增,好教我越添了些病症。每日家行时思、坐时想、成孤另,我骂你个薄倖没前程。

无名氏,《乐府群珠》元散套,页 431

此曲列[石榴花]第五格。原题注:"九字三截移在第七,末句变为七字。但此调今人皆谓其为[瓦盆儿],谬。"尾批详论此调之变,云:"余今按调从律,剖分正衬,详正久讹。"然同书同卷[渔家灯]第三格所录"几番欲把金钱问"曲,题注:"[渔家傲],《拜月亭》格,从第四句起。俗为[喜渔灯],误。"题署:"明散套'教人对景'。"又页 1115[仙吕调近词·喜渔灯]尾批:"[喜还京]本调其第二句,律应六字二截,但今本曲所犯之第二句,止用下截三字,此非失体,然元人俱有此例者耳。且今人犹有认《教人对景》套之'几番俗把金钱卜'……皆系[喜渔灯],皆谬矣。"故《群音类选》署贾仲名,《吴歈萃雅》、《词林逸响》、《南音三籁》、《古今奏雅》俱作郑虚舟作,《乐府先春》题李集虚作,《全明散曲》从《先春》,此套归李集虚。问题在于《雍熙乐府》、《盛世新声》、《词林摘艳》以及《三径闲题》、《乐府争奇》、《盛世词林》等等,不注撰人;包括上述各种曲选,均题[瓦盆儿]、[喜渔灯],都是《正始》所辨误者。要之:《正始》所凭,当早于《盛世新声》等诸种曲选,题"元散套",必有所依据;《正始》所录,与其它曲选在文词上均有差异,疑已为后人所改

动;[渔家灯]又题"明散套",或即为明人改动后之曲文。

3.[南吕宫过曲·浣纱溪]雪片飞,寒风起,闷恹恹自守孤帏。薄衾寒侵透香肌,盼情人阻隔何日归?戍楼悠悠三弄品,气丝丝废寝忘食。鸾笺锦字诉与别离,痛伤情痕湮透湿。

无名氏,元散套《柳径花溪》,页581

此曲列[浣纱溪]第二格旁证之曲。

4.[南吕宫过曲·东瓯令]花容貌,柳颦眉,云鬟堆鸦,温柔旎旖。方才款步我这金莲浸罗袜冷,腾腾困困娇无力。雕栏曲槛,游蜂粉蝶飞,婷婷袅袅欲缓迟。

无名氏,元散套《柳径花溪》,页588

此曲列[东瓯令]第六格。原题注:"第二句下皆大异。"尾批:"此格备而难式。"以上两曲属同一套曲。页593[南吕宫过曲·满园春]第二格题注:"明散套《柳径花溪》。"故此套于《全元散曲》、《全明散曲》分别收录之。此套最早载于《盛世新声》,然[浣纱溪]作[浣溪沙],[满园春]作[四团花];《雍熙乐府》、《盛世词林》等与此同,均与《正始》题署不同,当已经过明人改动。

5.[正宫调近词·雁过声]现团团桂轮,光皎洁相映。耿耿碧天澄清,遍天街人烟涌盛。见佳人观赏元宵景,(合)摆着袖儿月下行。

6.[前腔第三换头]天生,自然娉婷,西施脸儿堪称。媚态儿济楚轻盈,比观音只少个净瓶。向华灯密处偏他逞,(合前)

7.[前腔第三换头第二格]万般严稳,万般鹘伶。效院体时样新妆,巧身材千般媚生。黛眉颦掩映秋波莹,(合前)

无名氏,《遏云奇选》元散套,页1074

首曲原题注:“又名[塞鸿秋],又名[大摆袖],与九宫[正宫·雁过声]不同。”次曲原题注:“凡九宫[正宫·雁过声换头]多借此首三句,至第四句仍归本调矣。”又《正始》页172有注:“[正宫调·雁过声]之[第二换头],起首乃是二字、四字、六字句,例皆平韵。比有元散套《现团团桂轮》之[第二换头]云云可证。”尾曲列为[前腔第三换头]第二格,原题注:“《蔡伯喈》《思乡》套第四阕起处犯此格首二句。”尾批:“第四曲与上[第二换头]同,不录。”

8.[正宫调近词·摊破第一]好时好景,夜色澄澄。不负此宵佳境,六街九衢歌声竞。笑声喧,闹骈阗,看潋滟倾国倾城,引行人浑不转睛。另巍巍,万般都断称,摆着袖儿月下行。

无名氏,元散套《现团团桂轮》,页1080

9.[正宫调近词·倾杯赚]总入都城,御楼前仰观舜庭。风传帝乐,御香飘散满宸京。胜蓬瀛,似神仙紫府降迎,龙啣诏宝光莹莹。棘盘里,金杯赐酒人尽饮,竞起欢声。

10.[前腔换头]念吾皇皇(后一“皇”字疑衍)同乐与编氓,万姓山呼贺圣明。传帝旨,撒金钱坠落端门。须臾间,听鸣鞘声声渐杳,俄然早驾与人静。天街涌盛,经纪闹热好市井,可人时景。

无名氏,元传奇《现团团桂轮》,页1085

第二曲题注:“第二与第四句,句法互易;第三与第八句,句法互易。”此两曲原题“元传奇”,然却与上之四曲同名、同韵,且均题咏本题,当作“元散套”。以上六曲属同一套,以过曲首牌第一句为题。又页1072录[正宫调近词·衮衮令]二首,题署“明散套《现团团桂轮》”,首曲为正格,题注:“又名[侥侥令],但与[双调·侥侥令]不同,又与[仙吕宫·衮衮令]不同。”第二曲列作第二格题注:“末句变五字。”考其内容、韵律,与以上六曲均同,此二曲抑或元散套而误题?录以备考。

[正宫调近词·衮衮令]舞的俊,作耍斗夜逞。幕次卷珠帘,高挂宝灯。两行仕女每,遍体销金。指挥买市步芳英,听歌讴声竟。

[前腔]回还道,玉勒趁雕軿。队队纱笼,仆从玩引。都是贵戚口豪家,相府簪缨。将相宅眷御街行,尽嬉戏游人静。

附录

纽少雅《九宫正始自序》言访友途中,偶得奇书:“乃汉武帝及唐玄宗之曲谱也。凡今之词调,多从上古之乐府来源。然今此书,致多有式无文者,上古名曰《骷髅格》,至汉易为《蛤蟆贯》,后唐玄宗鄙其不雅,易作《歌楼格》,又曰《词舆》,又曰《词林说统》。”今《九宫正始》有标署为《词林说统》者 5 曲,均为小令,不能确知其年代。冯沅君先生在《〈南戏拾遗〉导言》中对此作过一些研讨,认为:所谓《骷髅格》,多半是假托“汉唐古谱”,以取得人们的赞同;关于具体曲文,不能武断为杜撰;这些曲文所咏大都是“本意”,与早期的词大都咏“本意”一样,怕也是早期的作品;至于这些曲子的渊源,仍是个谜。我们今天的认识虽已有所进步,但仍存在许多分歧。[①]惟末曲不是歌咏本题,当属依调填词,与前 4 曲有所不同。全录 5 曲,正、衬一依原谱,存以备考。

1.[黄钟过曲·春三柳]暮景不堪描写。记上林窈窕,太液摇拽。想佳人眉黛,凭伊远山新月。比来梦腰还瘦怯,比太真眉更微些。转眼新黄,回头嫩绿,端不惹雾锁烟迷,莺栖鸦歇。又还愁由基持箭,预子关弓射。怕渭城人误唱《阳关曲》,断送人离别。风弄柔条,日挤细桔,有谁来折?除非是,错认章台金线,西湖飘叶,霸陵桥空悲切。恁般憔悴,这般磨灭。屈指也,春已矣,夏时节。

《词林说统》,小令,页 110

① 冯沅君:《〈南戏拾遗〉导言》,《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5—146 页。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曲原》(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有《骷髅格》、《歌髅格》、《蛤蟆贯》、《词舆》、《词林说统》等条,对此有所介绍。周维培认为《骷髅格》的正名当是《词林说统》,可能源于宋人《乐府混成集》,当非纽少雅伪造,见其《古谱〈骷髅格〉考》,《南京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康保成则认为骷髅格出于佛教诵经,形成时间最迟应不晚于金代,见其《〈骷髅格〉的真伪与渊源新探》,《文学遗产》2003 年,第 2 期。

冯文录此曲,"细桔"作"细楷","错认"作"错误","西湖飘叶"下作句号。

2.[仙吕过曲·渡江云]半壁自西来,始疑天坠于托人忧怀。有万绪千端,更迓重山迈,似层峦叠嶂拟安排。顷然腾沸,无声有色,骤然更变,有形匪骸。那更电光闪,雷势轰,身覆于山,眉影射于江濑。深林拗壑老樵夫,犯风痴;临江高阁狂书生,害呆獃。唬杀烟波叟,惊死利名客。子陵离钓,买臣罢采,兴万籁,亡欸乃。牧竖投牛笛,耕奴弃犁隔(再加竹字头),一个个手不能举,一个个头不敢抬。只见攒眉蹙额,惊奔荒郊外。俄尔天高树,却是山氛水魄,凝成触石,从云的派堪爱。屏香松佐翠霭,隔连筌补断崖。形随风幻,容分日彩。嫦娥剪,神女裁,曾怪朱明七夕,咱何曾睹此奇哉!异哉,美杀氤氲缥缈,飞过溟源一带。渐溶化,漫疑猜:非雾非烟从何处来,逾峙逾江向何地埋?

《词林说统》,散小令,页311

原题注:"增《王维图》[渡江云]'浩然提灯'。[月云高]犯此。"

3.[南吕过曲·怨别离]仰屋长吁,人之睽合如真戏。悠悠昊天曰父母,且良缘既假,盍使人恒聚?畴昔之宵,馥郁花边,葱茏叶底。共酌侵情绪,如何倏尔离吾矣。驹难系维,心似旌旗,难宁一点灵犀。银海迷离(两字均有目字旁),潸潸如雨襟带腻。中央宛在,神如飞蝶何时已?昼无语,宵无寐,饮食何滋味?有雁书难寄,无翅体难飞,怨别离何时会?

《词林统说》,散小令,页566

原题注:"唐式《蒋谱》疑[一江风]后三句为[怨别离],误。"

4.[南吕过曲·寄生子]万物同心,群伦一志。蜾蠃负螟蛉,一似吾人,虑作若敖氏。匪蝶匪蜂,木空中,伊之市。飞至桑畦,沃若丛丛,何尝吞噬,那知他唯螟蛉自思?微如一粟,明珠相似,载欣载负,岂若鸱鸮恣?静言思之,

以两间变化,大都如是。吾羡彼不必恩斯,不必勤斯,七日内成伊嗣。

《词林说统》,散小令,页 602

原题注:“亦名[细腰儿]。[金络索]犯此。”页 1323[高平调过曲·锦腰儿]尾批引此第四、第五两句,注曰:“[细腰儿],有唐玄宗歌搂格此调云云。”页 1324 引此第七、第八两句,注曰:“[细腰儿],亦歌搂格云云。”冯文录此曲,第七句破作三字两句,“何尝吞噬”下作句号,第十一句破作“5 乙, 2”两句,第十七、十八两句合作九字一句,第十九句破作“3, 4”两句。

5.[商调近词·渔父第一]忆昔邂逅招提寺,这般不言不语。问你名儿住居,悄低声细说姓字。家居古树双门里,怙恃双亡少故知。从学未得师揆理,感荷多娇盼小的。盼小的,贫彻骨,寒酸无比,草庐中未娶妻。读书问圣贤,探微奥揆情测义,又谁思议恁般滋味。红炉暖阁偎珠翠,锦被鸳衾挹玉肌。殢雨尤云魂梦飞,是梦里醉里?

《词林说统》,失名氏,页 1195

提 要:本文从《九宫正始》辑录元代南曲散曲(包括残曲)共 90 支,略加分类、考订。这对于确立元南散曲的历史存在,填补中国散曲史上元代南散曲这一重要环节的缺失,对于辑校元南散曲文本,了解元南散曲在明代的传播及其变异,提供了新的文献材料。

关键词:《九宫正始》 元代散曲 南曲散曲 辑佚

复古思潮与清末民初小说

庄逸云

在清末民初时期，变革之风大盛，这种变革既体现于政治领域，也体现于思想文化领域，如梁启超即在文化界倡导“三界革命”，清末民初的诗歌、散文和小说都呈现出异于往昔的新气象。然而与此同时，又有一股复古主义的思潮在朝野鼓荡，并对当时的小说发展态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

复古思潮在清末民初的形成，首先与晚清朝野界保护国粹的运动有关。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国民的自信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官方及民间对西方文化均产生了一种程度不同的“艳羡心理”，趋新尚西的风气逐渐在社会蔓延。对此，朝野皆有不少人表示忧虑。针对这种现状，一种保存国粹的思潮开始兴起，民间出现了国粹学派，官方也有人士在为保存国粹作出努力。1905年，以邓实、黄节等人为代表的国粹学派创办了《国粹学报》。在《发刊辞》中，邓实明确提出，“本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不明一国之学，不能治一国之事。乃若有兼通他国之学以辅益自国者，则兼材之能也，国杰之资也。然而不通自国之学，在古不知其历史，在

今无以喻其民，在野不熟其祖宗之遗事，在朝则无以效忠于其子孙。知其历史，熟其遗事，则必以读本国之书、学本国之学为亟。”[①]与民间的国粹学派相应，清廷也有不少人致力于保存国粹，张之洞即是其中的代表。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认为在“新故相资”的前提下，弘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是国势强盛的必要条件。“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国文既无，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②]基于此，他采取了在湖北兴建存古学堂等措施。

在中学西学碰撞、梁启超等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大行其时的时代，清末以国粹学派为核心的国粹保护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较于西学更为“优质”，并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发扬，这使得他们的文化论调在当时多少带有一些复古的倾向。

复古思潮的形成，又与民国初期袁世凯政权的文化复古政策直接相关。袁世凯在当上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以后不久，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复古尊孔的活动。1912 年 9 月，袁世凯发布《崇孔伦常文》，提出儒教“八德乃人群秩序之常”，人民应当“恪循礼法，共济时艰”。1913 年 6 月，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奉孔子为万世师表，提出通过“尊孔祀孔”“以正人心，以立民极”。1913 年 10 月，在袁世凯的操纵下，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定孔教为国教的决议。1914 年 6 月，教育部发出“饬京内各学校中小学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文”。1915 年 2 月，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在“教育要言”中规定：“一、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孔孟以致其用；二、中小学教员宜研究性理，崇习陆王之学，导生徒以实践，教科书宜采辑学案，以明尊孔尚孟之渊源……”在“教科书”部分，强调“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又教育部编入课程”，并对各级学校的读经科目作了具体的规定：“初等小学，《孟子》；高等小学，《论语》；中学，《礼记》节读，如《曲礼》、《少仪》、《大学》、《中庸》、《儒行》，《礼运》、《檀弓》等篇，必须选读，中小学校国文教科书除编订者外，应读《国

①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1906 年，第 7 期。

② 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第二册），中国书店 1990 年版，第 145 页。

语》、《国策》，并选读《尚书》”。[①]晚清政府的要员张之洞等也曾实施过一些保存国粹的措施，但其声势远不及此时的强大，影响也远不如此时的普遍。袁世凯政府对孔教的尊崇和对“国学”的倡导具体化为种种强制性的政策，不仅渗透到了学校教育中，还渗透到了日常生活里。如1913年，袁世凯政府通令全国，将孔子生日定为圣节，放假一天庆祝。

袁世凯政府的文化政策直接导致了复古思潮在民初的盛行，对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多次论及，如：“自1913年袁黄帝专政以来，复古潮流一日千里；今距袁黄帝之死已二年有余，而复古之风犹未有艾。”“清末亡时，国人尚有革新之思想；到了民国成立，反来提倡复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国民不但不反抗，还要来推波助澜，我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②]其实正如本文前面所叙，提倡复古的行为并非始自民国成立，复古思潮在晚清即已暗流涌动，只是进入民国后发展到了甚嚣尘上的地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看来，袁政府是以复古政策愚民，而“国民不但不反抗，还要来推波助澜”，“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袁世凯推行文化复古政策的心理也许很复杂，但国民拥护该政策的“居心”其实并不难揣度——说到底，这是当时渴望价值重建的社会心理的体现。

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涌入中国的不仅有西方可资借鉴的政治体制和科学技术，还有西方的文化，而后者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陈寅恪先生曾说：“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③]因“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个人固有的价值体系随之而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是崩溃的命运，此时，自我认同的问题已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成为了那一时代整个民族的追问和探索。在此情形下，晚清有人提出了保存国粹的思路，民初的复古政策也获得了不少的支持，这实际上均反映出时人重塑民族和个

---

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② 宋云彬：《黑幕书》，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③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辞序》，《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

体的自我身份的渴望。只是囿于其知识结构,时人更倾向于从古老的文化中寻找认同感而已。已有研究者提出,民初社会的复古潮流其实是时人的一种文化反思的结果:"20世纪初年,人们由单向追求西学,进而主张中西会通和向传统文化回归。这与其说是一种复古倒退,毋宁说是一次文化反思,即对19世纪中叶以来国人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业已逐渐形成的思维定势的第一次反思。"[1]

二

在清末民初的复古思潮中,作为古文化的语言载体的文言被提升到"国粹"的高度,成为维护的对象。文言的地位在过去并未受到挑战,所以它的优越性一直是不言自明的,但在晚清时期,文言的生存环境开始有了一些风吹草动。在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情形下,当时不少人开始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产生怀疑,甚至有人提出废弃中国文字、采用"万国新语"的主张;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言文一致"的观点以进化论为裹挟,似乎在部分人群中也有"蛊惑人心"的力量。此外,在一些人看来,由于"东瀛文体"的流行,中国语文的词汇、文法等的纯洁性也开始遭到了破坏。"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以俱亡矣。"[2]面临此种种忧虑,以保存国粹为要务者,觉得对传统语文的优越性实在有重新辩护并加以捍卫之必要。

邓实在1903年提出,"自有世界以来,以文学立国于大地之上者,以中华为第一,立国之久而文学相传不绝者,亦以中华为第一",故"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3]到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邓实在《略例》中明确表明了该报的语言定位:

①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② 《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
③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见《光绪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74页。

"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源懿精实,一洗今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当然,对于当时以白话开通民智的现实需求,国粹保护者中的大部分人还是赞同的,他们认为保护文言与推广白话并不矛盾,只是文言适用于高等人,白话适用于"中下之人",二者在不同的领域各施其能。刘师培即主张:"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粹。恕前贤规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①]严复亦有此思想,他认为文辞宜分雅俗两类,不过他无意于"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因为"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面对梁启超关于他所译之书"过求渊雅"、难以导俗的指责,严复明确表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他表明其所译乃"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②]

晚清白话文和白话小说运动的倡导者采用了流行的进化论以证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必然性,对此,国粹保护者的看法则不尽相同。在章太炎等人看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纵然是一个普遍的自然规律,但这种进化未必就具有向善、向美的意义,社会的发展并不就是一个合目的的过程:

> 虽然吾不谓进化之说非也……若云进化终极,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则随举一事,无不可以反唇相讥……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行,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智识愈高,虽欲举一废一,而不可得。昔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昔时之苦乐为小,而今之苦乐为大。然则以求善求乐为目的者,果以进化为最幸耶?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③]

① 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② 严复:《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6、517页。
③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6、387页。

在章太炎看来，进化当为不可抗拒的规律，但因历史所自然选择的并非就是最向善、向美的，所以在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内应遵从人的自主性，以美、善为追求之目标。这样的体认实则为以文言为国粹、在新的时代必须弘扬的观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来源。章太炎曾于1906年在东京主持“国学讲习会”，专讲“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及“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章士钊在起草的《国学讲习会序》中特别提到语言文字的问题：“中国立国已二千年，可得谓无独优之治法乎？言治法犹晦，中国之文字，于地球为特殊，可得谓无独至之文词乎？必曰无之，非欺人之言，则固未之学也。”[①]关于语言领域里的进化论问题，当时的国粹维护者还有另一种认识。他们大体上认可俗语必将取代文言的规律，承认言文一致是文学的发展方向，但他们同时认为那将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如刘师培在《论文杂记》里提出，“就文字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但他同时声明，“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②]。看来，古代文词的废弃还是必然的，只是不能“骤废”而已。梁启超在当时的诗界、文界、小说界虽都提出了所谓的“革命”口号，但事实上他所掀起的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改良”；其实文学也罢、政体也罢，时人所乐见的还是一种渐进的平稳过渡状态，而非骤然的废弃或替换。所以，刘师培所持的“古代文词，岂宜骤废”的观点在清末民初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三

清末民初的复古思潮以文言为国粹，对文言文学的雅文学品格大力倡导，这种论调对当时的小说发展态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小说界，用文言还是白话创作，是一个争议不休的热点问题。在梁启超等主张以小说开通民智者看来，小说应以俗语即白话创作，方能发挥启蒙的功能；而在国粹维护者如恽铁樵等人看来，小说的创作应出以文言，如此方能达到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作用。随着复古思潮的或隐或现，文言小说与

① 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章士钊全集》（第一册），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② 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白话小说这两大小说系统的力量对比在清末民初时期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清末虽然兴起了维护国粹的运动,但梁启超主导的白话文运动具有无可撼动的强势地位,在自己创办的小说期刊《新小说》上,梁启超甚至亲自操刀以白话翻译和创作小说。其后晚清的三大小说期刊《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接踵而至,都是以刊登白话小说为主。但是至迟从 1909 年起,小说领域里便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国粹思潮的拥护者,他们创办的小说刊物如《小说时报》(1909 年创刊)和《小说月报》(1910 年创刊)等皆以文言为主要的语言载体。在进入民国后的十年间,由于复古思潮的甚嚣尘上,以文言创作或翻译小说竟至成为风气,文言小说在当时呈现出堪称空前绝后的繁荣状况。

不妨以民初十分流行的小说杂志《礼拜六》为例,对其所载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情况进行粗略的统计,结果如下表:

集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数(篇)	52	63	32	54	19	58	48	64	0	
白话	2	9	2	6	4	10	10	8	0	
文言	50	54	30	48	15	48	38	56	0	

《礼拜六》杂志创刊于 1914 年,共 100 期, 1916 年中华图书馆汇订为 10 集出版。该刊的第 9 集全为译作而无创作,第 10 集乃前几集中的部分作品汇辑而成,所以不列入统计范围。在该刊的 1—8 集中,可以明显看到文言小说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除了《礼拜六》,民初的其他几种主要的小说期刊如《小说丛报》、《小说新报》、《小说月报》等所刊载的文言小说也都远远多于白话小说。

受复古思潮的影响,民初以文言为主要语体的小说家在谈及其创作意图时,大都声称是为了保存国粹。《民权素》的编者在第一集的《序言》(1914 年)里自称,于"近者河山迟暮,国粹沦亡"之时,有"合负提携之责",所以该刊在"说海"一栏里登载的小说大都出之以文言,文言小说在该刊所载小说中的比例甚至高达 90 %以上。徐枕亚、吴双热是民初的小说名家,二人曾宣称"近今以来,国粹浸微,章句之学每况愈下,间有率尔从事者,类皆侈褒

诨之词,不足为风骚之继”[①],有见于此,两人才热衷于用文言尤其是骈四俪六的文字来创作小说,并在民初的文坛掀起了一股骈文小说热。由于复古思潮在民初的文化界具有绝对主流的地位,所以在小说创作中采用文言就已经从自主的个体选择逐渐发展为一种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社会要求,若有人敢于逆流而行,则很可能遭致舆论的指责。民初颇为著名的小说家许指严曾在1919年的《小说新报》上自叙其创作历程:“不才弄翰三十余年,为制艺经说史考诗古文辞十之四,为小说笔记十之六。而小说中又为短篇文言者十之八,长篇章回白话者十之二……顾环视社会中识字者且不多,何论文言,且呕心沥血,其如人之不解何?彼《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之类,久已衣被社会,则以白话之效力,比较上不止倍蓰也。乃亦试为章回白话体,而每一稿出,则为前辈所诃,又不敢自申其说,说亦恐无效……其欲以白话小说启迪社会而为文学界树一新帜之厦,竟成虚语矣。”[②]“亦试为章回白话体,而每一稿出,则为前辈所诃”,于此可见民国初期的舆论导向。如果说以白话小说新民是清末文人的责任,那么以文言小说宣扬国粹则成为了民初文人的义务。

由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介绍,进化论在清末民初已有相当的影响,民初的小说家在对待进化论的问题上,态度也与复古思潮的倡导者如出一辙。《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提出:“外国言文一致则可,吾国独不可。或曰:此拘墟之见,何妨沟通?然而失其国文性质,且此事在千百年以后则或可,今日骤强言文一致,必不可。盖凡事蝉蜕,循自然之趋势。藉曰可以勉强,则是《诗》、《书》可燔也。”[③]1919年第5卷第7期的《小说新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写信者建议该刊的编辑:“说汇选材宜注重文言也。自欧风东渐,小说之为文学,已无可疑议。若谓小说仅供消遣,只须白话,则直无有是处。况社会通用语言,因地而异,白话难期尽人皆喻,且失其补助国文之效用矣。按外国文言一致则可,吾国骤强其文言一致,则不可。”这里所提到的观点“吾国骤强其言文一致,则不可”与恽铁樵持有的论点“今日骤强言文一致,

① 徐枕亚、吴双热所辑:《锦囊》之广告词,见于《民权素》1914年,第2集。
② 许指严:《说林扬觯》,《小说新报》1919年,第5卷,第4期。
③ 见于恽铁樵与读者的通信,《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1号。

必不可"何其近似！其实所谓的"读者来信"往往是编辑表达自身观点的一种伎俩,《小说新报》向来就是发表文言小说的阵地,在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冲击之下,该报无非是借"读者来信"表明捍卫文言的立场而已。不难看出,在对待进化论的问题上,民初小说界以"文丐"或"文娼"自嘲的小说家与知识界的精英分子如刘师培、章太炎等具有高度一致的立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复古思潮对民初社会的渗透力度可谓强大。

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小说家们产生了选择文言作为语体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这是民初文言小说繁盛的重要原因。除此,复古思潮还直接影响到小说家们的小说文体观。五四时期的小说家大都接受了西方的小说文体概念,即认为小说当具备"人物、环境、结构(情节)"三要素,清末民初的小说家则较少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小说。随着维护国粹运动的展开及蔓延,小说家们更多地是从文章(国文)的角度去看待小说,即他们往往将小说视为文章,在创作和评论中更愿意凸显小说的文章特质而非小说属性。在他们看来,将以文言为语体的小说当传统的国文来写,这自然有利于提升小说的雅文学品格,也便于实现弘扬国粹的目的。古代的小说作者和评论者如金圣叹、冯镇峦等大都有以文章的概念来观照和约束小说的意识,他们认为小说与文章并非畛域分明,小说应以左、马、班、韩等经典文章为范本,在审美要素方面,小说除了要塑造人物外,还应讲究"文法",形成一种"文章之美"。由于所使用的语言与文章相同,篇幅的长短与文章一致,特别是在起源上文言小说脱胎于史传,因此将小说与文章相提并论,甚至认为二者同构的现象在文言小说系统里尤为突出。尽管将小说当文章看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到了清末民初时期,为了发扬国粹,小说家们将文章意识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清末民初尤其是民初的小说界兴起了一大批的古文小说和骈文小说。

以古文家的姿态进行小说的创译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当首推林纾。林纾好将西方小说与左、马、班、韩的古文相提并论,并从中寻找二者的相通之处,如此既能增加时人对西方小说的接受度,又可以彰显中国古典文学的恒久魅力。在创译小说方面,林纾"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在当时深受欢迎。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曾对林纾的小说有过整体

的评述：

> 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家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①]

明确倡导创作古文小说、并在当时的小说界有相当影响的还有恽铁樵。恽铁樵认为小说可以充当古文写作的教科书，这也是小说存在的一个重要价值。"谓初学借小说以通文理，则为世所公认。故小说可谓作文辅助教科书。"[②]在恽铁樵的鼓吹下，《小说月报》成为民初发表古文小说的一个重要阵地。骈文小说在民初的兴盛程度甚至超过了古文小说。五四新文学革命者曾谈及这一派小说不仅在上海一带盛行，"北京也是如此，内地中学生更是欢迎他了"[③]。骈文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其发表的阵地主要有《小说丛报》、《小说新报》，代表性的作品除了大名鼎鼎的《玉梨魂》之外，还有《雪鸿泪史》、《孽冤镜》、《兰娘哀史》、《賈玉怨》、《鸳湖潮》、《茜窗泪影》等。尽管在五四时期被称为"滥调四六派"，并遭致了最为严厉的批判，但骈文小说流行的原因还是值得深思的。实际上，骈文小说家之所以要以骈四俪六的文字来写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顺应当时的复古思潮，让小说尽量向古代的文章靠拢，以满足自身及读者内心深处的古典文化情结。如徐枕亚在《雪鸿泪史》的自序里就声称："余著是书，意别有在，脑筋中实未有'小说'二字，深愿阅者勿以小说眼光误余之书。"[④]勿以小说眼光读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5 页。

② 恽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第 6 卷第 7 号，1915 年。

③ 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郑振铎编《中国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51 页。

④ 徐枕亚：《雪鸿泪史自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选》(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53 页。

他们的书，那应该以何种眼光读呢？徐枕亚等人自然是希望读者视自己的作品为“文章”而非“小说”，如果读者还能读出一些发愤著书的意味，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清末民初时期的小说家大都为“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对古典文化也即所谓的国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也有一份自觉维护的意识。在宣扬国粹的层面上，骈文小说与古文小说可谓“体裁虽殊而实异途而同归”。复古思潮对清末民初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众多小说家以文言创作古文小说或骈文小说的行为其实也助长了复古思潮的声势。复古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唾弃的名词，在五四人看来，复古相当于反动；清末民初尤其是民初的小说也是被新文化运动者猛烈批判的对象，在五四人看来，这些以古文或骈文写作的小说抱残守缺，不过是“死文学”。其实，复古思潮也罢，古文小说或骈文小说也罢，都是应当被付诸“同情之理解”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认可这些古文小说或骈文小说的文学价值。

提　要：由于晚清保护国粹运动的兴起及民初文化复古政策的施行，在清末民初尤其是民初社会，复古思潮大为盛行。复古思潮的倡导者视文言为国粹，对文言文学的雅文学品格进行了捍卫。该论调对清末民初的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为了张扬国粹，民初的小说家纷纷选择文言作为小说的语体；受文章意识的主导，小说家创作了大量的古文小说和骈文小说。

关键词：清末民初　复古思潮　文言　国粹　古文小说　骈文小说

第四部分

汉文学的传播研究

关涉北宋人物的越南古代叙事文本述论

朱旭强

一、越南古代叙事特征及文献略述

在历史上，越南是汉文化圈的南方边境。并且，由于今越南北部地区曾直接隶属于汉唐，一直要到北宋建立之后，中央政府几经波折，才放弃了直接辖治权，而任其割据自立，从而构成宗主—朝贡的国与国关系；这就使得越南受汉文化的影响历程与朝鲜半岛、日本、澎湖等国家及地区相比较，在程度上更显深厚，并有其自有特色。

自汉至唐，这一越南史上称之为"北属时期"的阶段，越南与汉文化之关系的紧密程度自不待言；即使在公元10世纪丁部领建立丁朝之后，越南在政治制度、语言文字、经典认同及礼俗风尚各方面，至上而下，尤以北方的汉文化为标尺，又步趋了近一个千年纪。直至近代，受法国殖民政策以及红色革命因素的影响，越南才慢慢滋生更具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继而有所谓"去中国化"的文化倾向。因此，在越南古代，从国家命运角度，丁部领称帝可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中越历代历史学家大多将此认定为越南自立的标志；而文化走向上，在这一个政治上的拐点处却并没有相应出现大的变革，却呈现出顺延继而特化的趋势：因其自主意识与独立政权，若干越南民族固

有习俗与文化要素有了合法地位，而与我国南方如两广地区相比，越南的汉文化表现为并不完全覆盖的状况，譬如汉语的推广与使用约略停滞了，从而使得越语中保存了大量以唐长安音为基础的语汇即所谓“汉越音”；另一方面汉文化作为在东亚地区最发达的文明，其政治体制与文化理念乃是越南视野中当时唯一的文明模式，加之之前越南与中国的从属关系，使得越南本土民族语言文化就总体而言沉潜于底层，知识阶层与政治精英无不以汉文明为他们行为、思考与道德约束的资源。

正是存在着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关联，与中国相关的越南传统故事情节比比皆是，渗透到其民族叙事之间，譬如：其文学经典《金云翘传》是对中国明末同名白话小说的创造性译写，其信仰传说“扶董天王事迹”宣称在北方“殷”贼入侵的背景下英雄应运而生护国有功，其民族神话“龙子仙孙”则托言越人最初的血脉两次来自北方炎帝之裔，等等。

并且，这些古代叙事大多以汉字书写。现存越南古代叙事文本，可以依据其记录方式与文字的不同，分为喃字文本和汉字文本两种。其中，喃字是越南自立之后，从民间逐渐出现的记录越南语语音的文字体系，由于其造字遵循汉字的“六书”法则，从文字本位而非语言本位的角度来说，亦可视为汉字的一种地方变体。与中国的粤语字一样，喃字经常假借并引用汉字字词，且书写随意，异体众多，并未完全发育成熟。从历史上看，喃字也仅在胡朝和西山朝两代一度曾被钦定为官方文字，但这两个王朝都非常短暂，并被后世认定是僭伪政权，史称“闰胡”、“伪西”。根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一书的统计，喃字文本多为宗教、俗信文献，歌曲、剧本，以及常以韵文和说唱方式翻译的汉文书籍译本[①]，据知其在民间颇为盛行。但由于汉字长期稳定的官方文字地位，以及越南长期施行与中国一致的科举考试，从而构成了汉文教育传统和儒教意识形态；在这几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汉字才是古代越南正式、庄重并且神圣的文字。汉文叙述不仅成为越南古代精英阶层持续的表述方式，他们在史籍、传奇、笔记、章回小说诸文体方面模仿中国历代文

---

① 喃字书籍的分布与统计，见《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收录资料统计表》，《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 年 12 月版，前言第 xlvii–l 页。

献而形成了自己的写作传统；而越南各阶层所创造的那些涉及自身(譬如家谱)、关乎鬼神(譬如“神迹”即神灵传记类文献)的文献，在运用到文化现场时，因为常与祭祀及其他仪制相联系，所以也基本上都以汉文进行表述。而这其中，又富含关于祖先传说、神灵事迹、神异事件、报应故事的情节。

据此，通过对诸如《大越史记全书》这样经常采信传说的越南史籍、神迹、人物传记，以及越南历代文人意在志怪或存实的笔记、传奇等文献的考察，我们可以对越南古代叙事作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譬如可以建筑于统计学与类型分析方法上，探讨中国历史人物在越南的传说，比勘其与中国所记录的史实之间的差异，探究越南古代对中国历史的态度，以及对汉文化的认同等等。而其中，关涉北宋一代人物的情节，则在前述政治拐点因素的映照下，而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二、显灵和转世：北宋名臣的越南传说举隅

北宋人物在越南传说中出现的并不算太多。其中，查各地神迹文献可知，有一位封为高山大王的神祇信仰颇为广传，而其人原名高显，字文长，一说为宋人，一说是明人，籍贯为“广南郡宝山”，其事迹主要是“文武全才，官至丞相，讨伐东夷有功，死后封神，令诸侯各国立庙奉祀”。[①]该人传说色彩浓重，是否真是中国历史人物，有待考实，但从“东夷”和“诸侯”的叙述语气，以及“广南郡”这一地名上辨识，大约不会真是赵宋时期的人物。

稽考越南笔记，我们发现，有两位北宋名臣以不同方式进入了越南传说。其一例是韩琦。

> 庭试日，策问，汪全惯熟，自谓首选属我无疑矣。范镇仿佛见傍有两人，一称东方朔，一称韩琦，附耳读以助镇。镇写不及，闻朔语琦曰：“须使杜病以缓之。”俄见汪抱腹呻吟不能下笔，追镇写过

① 参见林庆彰主持：《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汉译目录》(初稿)，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12月版。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三百种高山大王的神敕神迹文献，例：《清化省东山县光照总多士村神迹》，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藏书号：AE.b2/3。

一段，汪病随愈。以是汪文力稍减。既而胪唱，镇状元、汪榜眼。

……后杜潜至蓝桥看镇祖墓，见两土堆在旁，汪指而言曰："从来胜我数番，以有那神童附耳。"用脚跟叩土堆各一。俄而镇聋病，医治弗效。有以汪击土堆事语镇，即以告于朝论，汪谢镇祖墓，镇病寻愈。(《嘉福范杜》，载《南天珍异集》卷一，失名撰，汉喃研究院图书馆藏书号 A.1517。)

该篇略谓，莫代光宝十年(1556)，嘉林县杜汪、范镇是两位才力在伯仲之间的学子，相友善，亦相竞争，但杜汪往往不及范镇。尤其是科举考场上的关键时刻，受祖墓庇佑的范镇甚至有两位神灵出场作弊：附耳读助，并使杜汪病，从而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这里的东方朔和韩琦也许只是叙述者随手拉了两位中国名人来，就科举所考的儒家经义而言，越南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会是这方面的行家，故而，也不管历史上汉代的东方朔并不以经学闻。而韩琦固然有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以弱冠中榜眼的辉煌经历，但他恰不是状元，而是榜眼，助人考取状元云云，叙述结构上并不圆满。更重要的是，韩琦以刚直见闻，这一段越南的名人轶事附会上他，显然也有悖其真实性格。文本中甚至以全知充作限知的叙事角度称"一称东方朔，一称韩琦"，自报家门式的交待充满了戏剧性，也呈现出逻辑不周延、技术不纯熟的民间叙事特征。

但除了《史记》所载东方朔事迹之外，后汉魏晋间，东方朔还有一个被神异化了的形象，他被认为是："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子，越为范蠡，齐为鸱夷，言其变化无常也。"(《太平御览》卷六·天部六·星中引应劭《风俗通》)，又有传说称："东方朔得神马一匹，……之王公之坛，因骑绕日三匝，此马入汉关门犹未掩。"(《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关第八引郭子横《洞冥记》)，而托名东方朔的道教奇谭《海内十洲记》中也自称："周流六天，广陟天光"，变化无常而经历遥远，这样的东方朔形象，与他出现在越南的试场上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而韩琦进入这个传说的合理性在哪里呢？据考，韩琦在中越关系史上是有迹可寻的。在英宗登基后不久，皇帝想结束越南割据局面，收复唐代安

南都护府辖土，但此举遭到了当时已任朝廷枢要的韩琦的阻拦，他认为，当年宋太宗未能以武力屈服黎桓的历史证明：遣使招诱，怀柔分立倒是良策，不然，险僻烟瘴之地，即使得到，恐怕不能长守。[①]尽管英宗并没有完全采纳韩琦的意见，边境屯兵，两国关系一度紧张；但终英宗一朝，未启战端，可见韩琦的意见还是左右了当时的对越政策。

直至熙宁八年(1075)，韩琦去世，同一年，北宋与越南终于爆发了战争。从元佑元年苏轼的奏状中所称"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苏轼全集》卷五十三)以及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等文献来看，那时候执掌权柄、施行改革的王安石是中越关系变化的责任者。越南史籍《大越史略》亦载："宋王安石秉政，有献言者谓我国已为占城所破，余众不满万人，可计日以取。于是以沈起、刘彝知桂州。"而此前，韩琦正是王安石新政的反对者之一。这场战争的胜负，中越史籍对此记载大相径庭，当代学者的研究亦无更新结论，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也认为，王安石当承担责任，而战争结果难考："宋臣王安石以交趾新败可取，乃大治戈船。越仁宗李乾德乃先发制之；……至此役究竟胜属何方，颇难明也。安南史书谓乾德胜(《越史略》卷三)，中国史书则谓郭逵胜(《文献通考》卷二十四)……"[②]

但这场战争对中越关系的影响却不可言小。于宋而言，这是最后一次统一交趾的努力，这种努力并没有如期达成，并且王安石在此之后被罢相不用，变法以失败告终。[③]而越南方面，是役塑造了一位民族英雄李常杰。当时李仁宗仅十岁左右，李常杰作为越南方面的实际领导者，成为相关叙事的主角。尤其是当时出现了一首七言汉诗："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其作者被归为李常杰，也有叙事作品称其采用了类似吴广设神道、夜狐鸣的方式，假借神灵，鼓励士气，并昭告了两

① 黄纯艳：《转折与变迁：宋朝、交趾、占城间的朝贡贸易与国家关系》，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十辑，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2008年7月版，第216页。

② 马伯乐撰、冯承钧译：《占婆史》，中华书局1956年5月版，第68页。

③ 黄纯艳：《转折与变迁：宋朝、交趾、占城间的朝贡贸易与国家关系》，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十辑，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2008年7月版，第217页。并参见维基百科网"宋越熙宁战争"条，网址为：http://zh.wikipedia.org/zh-tw/宋越熙宁战争。

国分立的局面，在越南历代文献中被反复引用。自此之后至北宋末年，以及偏安半壁的南宋始终，中越之间关系再没有发生过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熙宁之战的宋方责任者王安石也以特别的方式，出现在越南后世的一位名人轶事中：

> 至靈傑特典簿阮公，天资粹甚，德行过人，为乡里所服。永盛末年，公梦见王安石入相，觉以语人曰："朝廷用人当必有大异，当静以观之。"未几，改元保泰，覃惠百官，阮公沆以兵部右侍超升礼部尚书参政从，遂一意更张，纷乱诸事，无异安石……（《公余捷记》，武芳瑅等撰，抄本，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藏书号 VHv.14）

该故事有另一种颇有差别的异文：

> 阮公沆，扶轸东彦人也。父母生公之夜，其父梦神人告之曰："君当洒扫门庭，有王安石来。"已而生公。父素不识字，以此梦问于人。人告曰："此是非常之梦，必显君之门户。"及长，有神童名。正和庚辰科，二十一岁中隽进士，历仕吏部尚书、太子太傅、爵朔郡公。管中锐军营，富贵风流，当时莫比。但公之为政，颇好更张，性抗而偏，大类王安石所为。常于座边有对句云："六七华姓字，人但知南国大臣；十八子宗祧，谁能识德江贵气？"公自谓李氏之苗裔也，又欲开丞相府，与郑氏王府相对。龙德元年壬子十一月，阴葬九龙大地，为人所告，贬为宣光处承政使。郑主大元帅令王阴使镇官云郡公掘穴杀埋之。（《尚书阮公沆传》，载《听闻异录》，失名撰，抄本，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藏书号 A.2954；另载于《本国异闻》，失名撰，抄本，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藏书号 A.3178）

阮公沆（1679—1732），后黎朝名臣，并曾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出使清朝，有《往北使诗》等作品[①]。他被认为是王安石的转世，传说中交代，故其性

①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二册，阮公沆《往北使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5 月版。

格、禄位与真实的王安石均所相似。而传说造作可能出自这种因果关系的逆向作用。

正和为后黎熙宗(1676—1705年在位)的年号,龙德为后黎纯宗(1732—1735年在位)的年号,后黎朝,又有"黎郑"之称,皇室大权旁落,而世代摄政的是郑王家族。阮公沆在其权力巅峰时期有志于"开丞相府与郑氏王府相对",显然也是一次政治体制改革。以此传说所述,他变法的策略更加诡异,以风水阴谋来策划;其结局也要比王安石更加悲惨,这不知是不是六百多年以来越南叙事者对王安石以及熙宁之战的情绪积淀?其上文描述的王安石和阮公沆之共同性格也不免是贬词与缺点:"颇好更张,性抗而偏"。而在阮公沆出生时,神人托梦,其父文盲,自不认得王安石是谁,于是去求教于读书人,读书人的回答也有一点答非所问:"此是非常之梦,必显君之门户。"从故事叙述来看,并没有明确告以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其经历与性格如何如何之类的答案,以解其惑,而是模棱了情感判断,而仅说是"非常"和"必显",似有不肯多言、讳说凶人的语气。如果联系前文所揭王安石对越影响,我们来解释其中人物的心理动机,很是顺理成章。

三、替换与分冀:越人所述的宋代开国传说再探

前一部分的探讨,是以越南后黎朝或更晚时代的叙事者对中越关系史事、中国历史都相当熟稔为前提,从而提出:韩琦的神魂出现在越南庭试的考场上帮助越南考生,与其经历中对越南自立的历史进程起过帮助者的功能有关;一位变法失败者被认定为王安石的转世,其开篇的遮掩与末尾的惨烈和王安石主事熙宁之事相关。那么,这样的前提可靠么?

> 本国从前专尚科举,学者埋头北史,而祖国名人胜事,置若漠然。故问以汉高、诸葛之事迹,虽三尺童子,应对而有余;至问以黎祖、陈王之事功,则老师宿儒,搜讨而不足。(《南国佳事序》,失名撰,《南国佳事》刊本,越南国家图书馆藏书号 R.1508)

越南近代历史学家黄高启在其启蒙性质的作品《越史要》自序中也提到：

> 举国读书人不知我土地种族为何若；知有汉祖、唐宗，而不知有丁先皇、黎太祖之为君；知有孔明、狄仁杰，而不知有苏宪诚、陈国峻之为臣；知有泰山之高、黄河之深，而不知伞圆山山脉从何来、九龙江源头从何发。（越南阮朝维新甲寅年（1914）印本）

这是近代越南知识界的反思，其中不免有其过激的表态，也映现了近代奋袂勃发的民族意识，但亦可据知在越南古代，中国史事和历史人物对其常识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在更早时期，还曾经促生了一段更具有想象力的人物传说。这是在民间文艺学上被称之为“老獭稚”的故事类型，略谓：人间女子和水獭婚合，以致怀孕，之后水獭被女子的族人发觉打死；水獭之子（即“老獭稚”）慢慢长大，水性非凡，而趁远来的风水师在水底发现能葬发天子的龙穴，将母亲私存在灶上的水獭骸骨偷葬之，他或者他的后代果然成为了皇帝。韩、日、中三国民间文艺学者在上个世纪研究发现，这个故事广泛流传于东亚包括中国、越南北部和朝鲜半岛。在中韩所搜罗到各版本的写定年代最早只能溯及20世纪初，而在越南则早在18世纪的文献中就记录了这个故事，见诸后黎景兴十六年（1755）武芳堤所撰《公余捷记》一书，乃是“老獭稚”故事完整形态的最早版本。

> 丁先皇，花闾峒人也。世传峒中旧有深潭。其母为驩州刺史丁公著媵妾，尝于深潭中浣濯。适撞见一巨獭，胁与之交。归而有娠。居期生一男子，丁公甚钟爱之。母独心知其为獭所出。未几，丁公卒，而獭寻为峒人所获。众烹食之，弃其骨。母闻之，候众人散去，拾骨以归，封裹置之灶上。尝嘱之曰：“尔父骨在此。”及稍长，轻捷善泳，号为丁某部领。
>
> 时有北客就我国看地，因从龙脉至此。适夜观天文，见红光之

气，自潭中起，望之如一匹练，直射于天马星。明日，到其傍观看良久，曰："个中必有神物。"因求善汆者下探之。原潭内有一处最灵，人莫敢近，客人以厚赏邀来，丁某闻而自往。即汆入深处，以手摩之，果见一物，似马形，立于水底。登时回报。客人曰："尔可复下，以草饲这马口，试看如何？"丁某即将草一把，向马之前，马果开口嗑之。再归以告。客人相语曰："果然有穴。"即索银与丁某曰："今少酬劳，他日更必有厚赠。"他约以暂且归国，不久复来。时丁某年虽少，是个聪明的人，闻北客语，猛省曰："穴在马口无疑。"待他去后，即取灶上骨，以草包之，下水推入马口。马尽吃之。

既而人多慑服，推为众长，居陶澳栅。常与叔交战，奔过潭涯。桥折，陷于潭。叔来，欲刃之。忽见二黄龙拥之，叔惧而退。由是，归附益众。

居数年间，这客人即火先人墓，自北而来，寻至伊处，欲葬之。闻丁某英才盖世，手下已千余人，知这穴是他葬了。自以枉费工夫，因此含怒。即就与之语曰："闻君已得地，此穴虽佳，第马没剑不好。今许剑一把，置诸马头。必能纵横寰宇，到处清夷。"丁某信之。遂汆就神马处，以手摩其头，置剑而回。其后，所战必克，号"万胜王"。卒平十二使君，舆图混一，是为丁先皇。在位十有二年，寻为内人杜奭所弑，及其子琏。盖坠于客人之计，马头有剑，带杀故也。

（《公余捷记》，〔黎〕武芳堤撰，抄本，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藏A.44。并见《历代名臣事状》、《大南珍异集》、《喝东书异》等书。）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即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丁部领，但这也可以算作是越南所传宋太祖赵匡胤传说的隐性版本，因为在迄今为止可以搜集到的不下一百余个"老獭稚"故事异文中，数量最多的是主人公为赵匡胤（或其先人）的传说。此外，也有部分版本称是明太祖朱元璋是水獭与人间女子婚合所生；而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有不少传说被写定，其口传情节的主人公可以考证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据异文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故事中所反映

的风水内容，前辈学者钟敬文因此认为中国是该故事的发祥地。[1]

但依据笔者综合近百则异文，从灵物种类、葬式内涵、地理分层、专名语用等方面的考察，则发现它极有可能源自越南。故事中反映的文化交流史状况是：自中国南方地区传来的形法派堪舆术影响了越南当地传统中的二次葬习俗，新的葬俗涂饰了堪舆风水观念表象之后表述为“改葬”，基于一种与神话言说相类似的需要，促生出这样的一个故事。

而这个文本的传播轨迹却很可能是逆向而行，从越南传到了中国，从丁部领传说换置于赵匡胤故事。[2]这结论可能还需要更多证据来使人认同，譬如：除越南外，在域内外流传的同类型故事的不同异文主人公，均是中原王朝的太祖即开国君主。在越南，同样的情节并没有被置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框架里，而是以越南的第一个皇帝为主人公。假设丁先皇版本是从中国故事转换而来，被域外的越南人将其语境“地方化”了——这种情形在越南确实是存在的，譬如在20世纪前期，为响应法国远东学院有偿征求旧籍，有越南士子改窜中国叙事作品，更换语境，包括时代名、地名和人名，造作成越南文献者[3]——但相同的情境下，为何在朝鲜并没有这么发生呢？朝鲜文献《云渊实迹》及其他故事所记努尔哈赤的经验表明，该故事的视角很难离开中国中心，那么存在过的丁部领—赵匡胤的转换只能是在此之前，转入中国中心，而非转出。这一假设与诸异文的年代早晚也相吻合。

在这一研究结论之中，有一个子命题可能更容易被证实，即丁部领—赵匡胤的转换过程一定是越南叙事者完成的，因为固然前文黄高启称越史知者甚少，但毕竟还有很多越南古代史学家及其他知识分子比较熟悉，甚而还有不少历史著作问世，而古代中国人了解越南古代史的可能性却极低。丁部领和赵匡胤之间，却又蕴含着一个巧合的秘密，非得通晓两国历史细节者

---

① 钟敬文：《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三个分布于朝鲜、越南及中国的同型传说的发生地域试断》，《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版。

② 朱旭强：《安南汉化研究：以公元十世纪的史实与传说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

③ [台]陈益源：《〈聊斋志异〉、〈后聊斋志异〉与越南的〈传记摘录〉》，刊《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并参见[台]陈益源：《〈亦复如是〉、〈志异续编〉与越南的〈异闻杂录〉》，载《东亚文化研究》第七辑：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专号，高国藩、柳晟俊主编，香港东亚文化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20页。

方能领会的：即丁部领（？—979）和赵匡胤（927—976）这两位开国皇帝是同一时代的，甚至《宋史·外国传·交趾》记载了他们俩的一次交集："开宝八年，（丁部领）遣使贡犀、象、香药。朝廷议崇宠部领，降制……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趾郡王。"换言之，丁部领为獭子和赵匡胤为獭稚的两个故事，是在同一时间纬度下展开叙述的，只是进行了地点—舞台的平移。这种将越中历史分栏平行的做法，在中国古代，不论精英或民间阶层，都难以想象；而在越南，却是史籍上惯用的结构，越南最重要的古代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就是以中越两种纪元平行罗列的。

因此，越南人出于某种目的，可能是为了便于向某些在越南或边境上的中国人传播这一故事，轻松地改换了舞台和主角。越南民间盛行将水中灵物信仰之风气，故此在丁部领文本中，并不存在着对丁部领这一越南史的开创人物太多的冒犯，即便《大越史记全书·丁纪》觉得此事荒诞，不合信史而并没有记录下"獭子"的情节，但多种文献却都对此津津乐道。而反观中国古籍，有关宋太祖出身发迹情节的文字亦可以找及不少，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 20 世纪之前有关赵匡胤是獭稚的记录；汉族出身的开国帝王，也始终鲜有异类婚生的文献记载（象征动物龙除外），因为那是类似图腾崇拜的遗响。

而当历史上，越南古代叙述者至少有一次（也是第一次）改讲起赵匡胤是水獭之子的虚妄情节时，他从此有了同时进行的两个故事。同时，他和他惊愕的中国听众分享了历史叙事从一条线索（宋初之前越南作为中国之一个部分，随着历史发展大势而动，被记录在中国史籍之中）到双轨并列（宋之后分立成国）的分蘖经验，这也正是从丁部领开始，越南统治者对宋朝廷阳奉阴违、在遥远的宫殿里自称皇帝，其所开创的历史新变。

提　要：越南古代叙事文本中，神圣和庄重的部分大致包含在以汉字书写的史籍、神迹、传记、笔记、传记及章回小说等文献中。本文对散见于各种文献中涉及北宋人物的传说故事进行了考证与分析，来观察越南古代人士视野中的中越关系史，并试图反映其对于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一种微妙的接受心理。

关键词：越南古代叙事　中越关系史　汉化

元代使越文学与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

王　皓

在元代的中越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既有政治色彩、又具文化意义的团体——使越大臣。他们充当着政治的载体，为中越关系的不断发展提供动力。同时，他们在使越过程中创作了一批文学作品，为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在研究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时，探讨使臣及使越文学是十分必要的。

一、元代的使越文学作品

元代的使越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使越文集里。刘玉珺在《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第五章第二节《中国使交文集考述》中考述过元代的八部使越文集。[①]

① 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第五章第二节《中国使交文集考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337 页。刘玉珺学长为本文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使越时间	人名	使越事宜	使越文集
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	张立道	与宁端府奉使安南谕旨。	《安南录》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	李克忠	从柴椿、哈剌脱因等持诏往谕安南国王陈日烜入朝受命。	《移安南书》及诗八十韵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一月	徐明善	从刘庭直、李思衍、万奴等使安南，持诏谕陈日烜来朝。	《安南纪行》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九月	陈 孚	与梁曾持诏再谕安南国王陈日燇来朝。	《交州稿》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六月	萧泰登	与李衎持诏往抚绥安南国哀。	《使交录》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	文 矩	与教化使安南，宣英宗皇帝即位诏。	《安南行纪》
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年）	智熙善	从铁柱、智熙善等使安南，宣顺帝即位诏。	《越南行稿》
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年）	傅与砺	与铁柱等使安南，宣顺帝即位诏。	《南征稿》

表中所列的使越文集仅是对文献记载的反映，究其遗存情况并不乐观。第一，留存至今的仅有陈孚《交州稿》，收在《陈刚中诗集》卷二；徐明善《安南纪行》，见存于《说郛》，内容为此次出使的全部过程，和与之相关的诏表文章及进贡物品单；傅与砺《南征稿》，其出使作品多见于他的《清江集》中。第二，其余使越文集现已不传，但在《安南志略》中仍保留着一些作品，应该与这些失传文集相关。如张立道在卷三至元二十八年条后附有《张尚书行录》，卷五《大元名臣往复書問》中收有《张立道显卿与世子书》，卷十七《至元以来名贤奉使安南诗》收录有他的七律诗一首。同样《至元以来名贤奉使安南诗》还收录有萧泰登的《即席和世子韵》，文矩的《赠世子太虚子》和七言律诗一首，智熙善的《安南喜雨》和五言律诗一首。此外从相关文献中还能找到两

部使越著作，段信苴《征行集》与何中《元贞使交录》[①]，二书均已不传，内容可能含有使越文学作品。

除元代使越文集之外，还有部分使越作品同样是由使臣创作，并没有结成文集，只是一些零碎的诗歌而已。这些诗歌多见于《安南志略》之《至元以来名贤奉使安南诗》中，有李思衍诗四首《世子燕席索诗》、《世子和前韵有自顾不才惭锡土只缘多病欠朝天之句即席次韵》、《行贶有礼辞之世子举陆贾事亹亹见爱谢绝以诗》、《观棋》，梁曾《吃荔枝》，徐明善《佐两山使交春夜观棋赠世子》，李仲宾《和洞妙自真世子韵》，李景山七言律诗一首，杜希望七言律诗一首，杨廷镇《答太子世子韵》，赵子期《和太子世子韵》等。

二、元代使越文学的创作动因

据统计，元朝一共向越南派出过二十七次使团[②]，使越的频率增多，与此同时使越文学的创作也愈加繁盛起来。使越文学在元代的创作，有其多方面原因。从历史上看，能在外交场上驰骋纵横、游刃有余的几乎是饱读诗书、能言善辩的文士。降至元代，尽管统治者以其狭隘的民族意思压制着文人的成长，但在外交思想中却呈现出了清醒的认识。程文海《送礼部侍郎乔元朗使安南》有诗句云："一士贤于万甲兵，文星两两使星明。"[③]《安南志略》之《玉堂诸公赠送天使诗序》中王希贤有赠诗云："长缨致越非难事，寸舌强秦君不劳。"又李清有赠诗云："服远自应文德在，五溪何必动干戈？""我有一言君试听，古来定远是书生。"[④]和《安南名人诗》中内附安南国公善乐老人

① 段信苴：《征行集》。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均录有段信苴的《征行集》，有注文曰："大理僰人，从兀良哈台征交阯道里所作。"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记载："元，段信苴，福，大理僰人，思平之后。宪宗时，从其主兴智入觐，献地图，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后又率僰爨军二万，导元将乌梁海台平诸郡，降交阯。所著有《征行集》。"据此可知段信苴《征行集》，大概写作于1257年至1258年之间，现已失传。何中《元贞使交录》。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中录有何中的《元贞使交录》。《元史·何中传》（卷一百九十九）记载："何中，字太虚，抚之，乐安人。"大概写作于1295年至1297年之间，现已不传。

② 马明达：《元代出使安南考》，载于《专门史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83页。

③ 程文海：《雪楼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十七《玉堂诸公赠送天使诗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2—403页。

《赠天使张显卿使还》有诗句云:“尽道朝廷用文士,尚书志气香秋天。”[①]上述中越大臣赠予元使的诗歌,均表达了使越当用文士的一致内容。说明元朝统治者的外交思想,促使大批文士先后踏上使越路途,这无疑是为使越文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此外,使越环境是影响使越文学创作的另一个原因。元代从大都到安南近需半年之久,如果是军情急务,一路上更是车马不息。如陈孚在《交州稿》中提及马的诗歌就有二十余首。

> 《中山府》:马上秋云拥节旄,霜花如雪点征袍。
> 《全州》:停鞭欲问炎州事?不奈侏离见矮奴。
> 《自永福县过八十里山》:下山如井上如梯,乱石嵯岈割马蹄。
> 《过邕州昆仑关》:势如蛟螭夭矫下绝壑,驻马侧视不敢攀。
> 《度摩云岭至思凌州》:对此停鞭空自慨,吾独何为在荒裔。
> 《交趾境丘温县》:天涯海角茫茫路,马蹄声里光阴度。[②]

这些诗句均以马作为参照物,既表现了使越路途的艰辛和时间的漫长,也暗示着诗人对这种单调骑行所产生的困倦和乏味。绵长的使越路程固然让使臣感到郁闷,而元代的出使制度对使臣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使臣的日常活动倍受元代出使制度限制,诸如,禁止使臣人家安下、使臣不过三站、禁止使臣拷打站官、使臣不得骑马入酒肆、禁止使臣索要妓女、禁止使臣稍带沉重等。还选有专职官员脱脱禾孙来监督使臣的行为。如《元史·刑法·职制下》载:“诸乘驿使臣,或枉道营私,横索祗待,或访旧逸游,饿损马乘,并申闻断治。”[③]严格制度的限制,压缩了使臣的私人空间,使臣除了能在驿站有短暂的停留外,几乎没有会见当地闲客的余裕。为此,就不难理解使臣运笔泼墨、愉悦山水、描摹风土的动机,是为了缓解使越的困乏。

因此,使越路途的劳苦和出使制度对使臣的限制共同激发了使越文学

① 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十八《安南名人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15页。
② 陈孚:《陈刚中诗集》卷二《交州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三《刑法·职制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29—2630页。

的产生。而这些仅仅是影响使越文学创作的外在因素。

元代使越文学创作还有源自使臣自身的内在因素。陈孚《交州稿》中有一首诗，题为《入安南官事未了绝不作诗清明日感事因集句成十绝奉呈貢父尚书并示世子及诸大夫篇篇见寒食》，这首诗题包含了两个信息，即是使越文学创作的两个原因：第一，使臣出使主要是去办理政治事务，从事文学创作只是一个附带的行为。第二，《交州稿》中的诗歌几乎是因感事而作，由感物而发。使越文学含有政治味道在所难免，毕竟是政治活动为它提供了生存空间。对于陈孚"感事"作诗之说，便是作者的内心情感在使越文学创作中的流露。前文已述及使越环境的特殊，使臣身在其中，整日与道途相伴，唯有特色各异的见闻是对使臣辛苦跋涉的心理安慰。当其使臣将映入眼帘的事物形诸笔端时，不能否认他们是在借物达情。所以傅与砺在《南征稿》中自序云："嗟夫！古之《皇华》遣使，《杕杜》劳还，《采薇》歌戍役之苦，《黍离》闵宗周之旧，斯皆原情所生，而诗由作也。今人之情，岂异於古哉？余惟不能禁余之情，而达诸辞耳，恶能保其必存以久也。自古之诗零落亦多矣。矧后之人所作乎！余独有感于行迹之远，而悯夫宗玉之志之勤，于是叙而存之。"[①]还需注意，诗歌是使越文学的共同体裁。使臣们之所以乐于在使越途中写诗，主要有以下二端：一是诗歌要求语言简洁、精炼，便于使臣在行路当中记录那些触动他们的事物，而篇幅较长的文体自然难以运用。二是诗歌最益于表情达意，这才有了陈孚"感事"写诗，傅与砺"不能禁情"而作诗的举动。

三、元代使越文学的功能

(一)记录功能

萧方崖《使交录序》云："客有诮曰：此子使交日录也，板行于世，将不免钓名之讥，小廉曲也。"[②]这句评论颇有几分嘲讽的味道。所以萧方崖用了较大篇幅来说明这部诗集有益于世，总结起来不外乎三点：一是"若不传之

① 傅与砺：《傅与砺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三《大元奉使》，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4—75页。

永久,何以昭宣聖化!”二是“使后世知圣代臣妾万国之盛”。三是“出使远宦者,亦有所考焉”[①]。看来萧方崖对“使交日录”的评价并不同意。但有一点需要肯定,“使交日录”四字指出了使越文学的“日记体”写作特征。使越文集中的诗歌按时间先后排列,内容又都是在记录,被说成“日录”也不算委屈。至于“钓名之讥”的评论不免有些“诮过其实”,但“使交日录”之说却是对使越文学记录功能的肯定。

中越宗藩关系的建立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在典籍中并未发现有使越文集的遗存。[②]《宋史·李度传》载:“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图经观其胜迹,皆形篇诗,以上所赐诗有‘奉使南游多好景’之句,遂题为《奉使南游集》,未成编而亡。”[③]这段文字当是使越文学创作的先声,《奉使南游集》则是使越文集结集的萌芽;“每至州府,即借图经观其胜迹,皆形篇诗”则表明了使越文学体裁以诗歌为主和内容取材于途经之地的创作趋向。这种创作导向在元代使越文学的创作中得到了延续,形成了元代使越文集特殊的结集原则。

徐明善《安南行记》包括:至元二十五年和至元二十六年两篇安南国上表,元谕安南诏,使越过程,安南国进贡物品单。[④]

《元诗选·刚中集》云《交州稿》:“其于安南道途往返纪行诸诗,山川草木虫鱼人物诡异之状,靡不具载。”[⑤]附录包括:《元史列传》、《元谕安南国诏》、《元奉使与安南国往复书》、《元安南国进万寿颂并表奏》。

萧方崖《使交录序》云:“凡经行见闻,辄加记录,不觉成集,归以板行,以广其传。……用自上都至安南,州郡山川、人物礼乐、故塞遗逸、异政殊俗、怪草奇花、人情治法、愈病药方、逐日编纪、通成一集。钦录圣诏,冠乎集首。次以安南世子,回表贡物;及中朝诸老,

① 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三《大元奉使》,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4—75页。
② 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第315页。
③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九十九《李度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21页。
④ 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五十一《安南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2—815页。
⑤ 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刚中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2页。

送行诗章。编次于后。间有应酬记咏,亦借附集末。”[①]

袁桷《文子方安南行记序》云:“还都示予《行记》一篇,夫诵诗专对夫子之训也。予于书独有取焉,宣上意儆,有众誓命焉,有考山川导别,表土俗,以宜于民,莫详于贡书。”[②]

傅与砺《南征稿序》云:“道途所经山川、城郭、宫室、墟墓、草木、禽虫百物之状,风雨、寒暑、昼夜、明晦之气,古今之变、上下之宜、风土人物之异,凡所以感于心、郁于情、宣于声而成诗歌者,积百余篇。”[③]

以上材料能反映元代使越文集结集的大致原则:第一,使越文集多以诗歌为主,其内容多取材于途中,对山川、草木、人物、禽虫、古迹、气候、土俗等内容最为留意。第二,使越文集多含有元朝谕安南国之诏书,能表现使越的原因。第三,部分使越文集中还载有使臣与安南国王的交涉文书和自述使越经过,则反映使越过程。第四,安南国之上表、贡书多在使越文集中,体现了使越的结果。尽管元代使越文集的内容并不是都含有这四个方面,但这四点为我们识别使越文集提供了可能。就使越文集的构成情况来看,诗歌多以途经之地名为标题,内容多摄奇闻异端、人文物理,地域色彩相当浓厚;除诗歌之外的中越诏表、贡书、交涉文书等内容都是与政治相关的材料。这些内容无一不是对使越文学记录功能的深刻体现。

再看后世对使越文学的接受情况。有人创作,就有人品读。元代使越文学的接受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使臣,另一是使臣之外的文人。首先讨论使臣,萧方崖《使交录》自序云:“出使远宦者,亦有所考焉。”[④]袁桷为文子方《安南行记》作序亦云:“是宜广梓,以告于后之使者云。”[⑤]表示使越文学有益于“后之使者”,但不能将之视为使越文学的创作原因。前文已述,使越文学并非使臣有意而为,而是在内外因素影响下的产物。结集之时,可能

① 萧方崖:《使交录序》,载于《安南志略》卷三,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74—75 页。
②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③ 傅与砺:《傅与砺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萧方崖:《使交录序》,载于《安南志略》卷三,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74—75 页。
⑤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使臣们也未想到使越文学与传统文学竟会相别较大，为了不惹来类似"使交日录"的嘲笑，而发现了使越文学的记录价值也许对"后之使者"有所帮助，这才述之于序。但萧、袁二人的判断是准确的，使越文学有益于"后之使者"之说在清代道光年间使臣丏香《越南竹枝词》卷首自题中得到了印证。

皇华载道，昔传使者之章。白雉呈祥，远献交人之项。双诏沛深恩，命衔豸绣，一行承末吏，力效凫趋。天涯海角，异俗殊风，瘴雨蛮烟，授餐适馆。虽无鼻饮头飞之怪，绝非耳濡目染之常。一路衣冠人物，愈出愈奇。四时草木昆虫，无冬无夏。见闻所及，记载颇繁，慢为竹枝淘浪之词，可作牛背牧猪之曲。露宿风餐，此日归途羞涩，聊充郑子空囊。春花秋月，他时把酒胡庐，差胜灌夫骂座云尔。[①]

丏香言"虽无鼻饮头飞之怪"，显然表明他认真阅读过《交州稿》，曾把它作为了自己的出使指南。许多大臣是初次使越，并不了解越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他们会借鉴于前使，参考他们的事迹和作品。这既在前使之料，又在情理之中。

其次，使越文学的另一批接受者是后世文人和学者，他们与"后之使者"的目的不同，而是将使越文学当作文献使用。以《交州稿》为例。明代郎英《七修类稿》曰：

元诗人陈孚出使安南，有纪事之诗曰："鼻饮如瓴甋，头飞似辘轳。"盖言土人能鼻饮者，有头能夜飞于海食鱼，晓复归身者。予见《臝虫集》中所载，老挝国人鼻饮水浆，头飞食鱼。近汪海云亦能鼻饮酒，头飞则怪也。昨见《星槎胜览》亦言，占城国人有头飞者，乃妇人也，夜飞食人粪尖，知而固封其项或移其身则死矣。作书者自云目击其事，予又考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挝正接安南西北，信

① 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陈诗之不诬也。[①]

郎英把《交州稿》当作考证的对象。“鼻饮头飞”是《安南即事》中的一句，其记录比较奇怪，难免会引起人们的质疑，所以郎英对此作了考证，并得出了陈诗记事不诬的结论。

《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徐氏笔精》、《元明事类钞》等书皆针对《安南即事》有关交趾产“龙荔”的记载，云：“交趾有龙荔，实如小荔支。元陈刚中使安南诗云：‘龙荔缀如珠。’纪其实也。”[②]又明胡世安撰《异鱼图赞补》中谈到虾须可做拄杖这一现象，曰：“交趾虾巨如柱，须长七八尺者，海滨以作拄杖，甚佳。陈刚中诗：虾须作筇杖。”[③]又姚之骃撰《元明事类钞》中记“罗我”一事，曰：“元陈孚《安南即事》诗：抵鸦身偃豕，罗我背拳狐。自注其舁人用布一疋，以绳系圆木，上大竹贯绳，两人舁之，人侧其中，若举羊豕然，名曰抵鸦。象背施鞍辔，几座名曰‘罗我’，人坐其上，拳曲如狐。”[④]都把《交州稿》作为了引证资料。

陈孚《思明州》有诗句云：“元宵已似春深后，龙眼花开蛤蚧鸣。”吴景旭撰《历代诗话》曰：“所云元宵似春深，见其地暖，即萨天锡‘闽土腊如春’之意，亦犹四月熟荔枝，称火山耳。”[⑤]把《交州稿》视为研究的对象。

从后世的文人和学者对使越文学的接受实例来看，使越文学与传统文学确有不同，传统文学的审美和娱兴功能在使越文学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当其后世学人相继将使越文学作为资料来引证和研究时，我们就不得不对它的记录功能再作肯定了。

（二）政治功能

使臣是一个政治符号。使越文学出自使臣之手，含有政治色彩是在所

---

① 郎英：《七修类稿》卷四十九，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515页。

② 刘灏：《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三十六、徐《徐氏笔精》卷八、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胡世安：《异鱼图赞补》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难免的。使臣使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进行文学创作，本质还是为了办理政务。元代统治者向来重视使越之事。

《元史·张立道传》载："帝召至香殿，谕之曰：'小国不恭，今遣汝往谕朕意，宜尽乃心。'立道对曰：'君父之命，虽蹈水火不敢辞，臣愚恐不足专任，乞重臣一人与俱，臣为之副。'帝曰：'卿朕腹心臣，使一人居卿上，必败卿谋。'"[①]

李谦受益《送尚书柴庄卿序》云："自古非有才之难，而择才之不易。今主上知庄卿纯茂辩给，弘毅博洽，足以任重致远，始于四方，不辱君命；故寄以阃外，委之以绝域，凡师旅之事，得以专制之。"[②]

元朝廷对使臣的选择十分细心，当选者多为才学出众之士；朝廷赋予使臣较高的权利，如"凡师旅之事，得以专制之"，"使一人居卿上，必败卿谋"，皆说明朝廷为了出使成功，给了使臣临机应变、处事立断的较大空间。

此外，元朝上下对使臣都有着很高的期许。杨载《送李侍郎使安南》曰："奉扬天子命，慰答远人情。"[③]《安南志略》之《玉堂诸公赠送天使诗序》中庚恭曰："此行识得君王命，要补西南半壁天。"[④]张伯淳《送李仲宾萧方崖序》更是用大量篇幅来讲告诫使臣当竭尽全力。序云：

大抵柔远，惟德与威，德者圣人所先；威者圣人所不得已。舜敷文德于两阶，文王修教，而因垒皆时也。今天子六龙正御，大霈解泽，不以安南远服而外之，谋所以布宣德音者。……人谓此行易，余独以为难！奚言其难？向者谕旨于是邦，孰不晓以君臣大义与祸福利害之机？彼挟其惧心以听，则言易入；不然，归而报闻，吾尽吾职，国家固自有以处。今二君涉跋数千里，播尺一书，开其自新

① 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六十七《张立道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917—3918页。

② 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十七《玉堂诸公赠送天使诗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99页。

③ 杨载：《杨仲弘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安南志略》卷十七《玉堂诸公赠送天使诗序》，第402页。

> 而已。倘于于而去，于于而来，是夫人而能为传，安事我辈？！况人情积惧之余，一旦自拔于无过，则不胜喜。然喜者玩之萌也！吾就其所喜，而能使之，舍其迟回不决之旧，而新是图，斯不负皇华礼乐之遗。[①]

朝廷的重视必然会加强使臣的政治责任感，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言行。一旦使臣进入到越南，他们政治情调定会一度升高，即便是写诗作文，都难免会与政治沾染上关系。

如果从政治上考虑，使臣使越绝不仅仅是办理政务这么简单，他们还能起到探听安南虚实的作用。《元史》载："安南来使邓汝霖窃画宫苑图本，私贾舆地图及禁书等物，又抄写陈言征收交趾文书，及私记北边军情及山陵等。"[②]安南派使偷窥元朝地理、军要，而元朝又何尝不是在借遣使之机来暗探安南的动向。陈孚《安南即事》诗最后一句云："沐薰陈此什，礼部小臣孚"[③]，这似乎说明了陈孚作此诗的用意就是在向某人讲述越南情状。又程文海《送李景山侍郎使安南》最末两句诗要求李景山："交州九郡皆王略，他日殷勤话所经。"[④]也从某个角度证明了元朝对越南的具体情况相当关切。可以明确地说，自从中越宗藩关系确立以来，使臣就开始充当起了"情报员"的身份。《宋史》载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派遣大臣宋镐、王世则出使越南，二人使还后，太宗则令他们"条列山川形势及黎桓事迹以闻"[⑤]，二人便将在越南的所见所闻上奏于帝，其内容略曰：

> 至城一百里，驱部民畜产，妄称官牛，数不满千，扬言十万。又广率其民混于军旅，衣以杂色之衣，乘船鼓噪。近城之山虚张白旗，以为陈兵之象。……城中无居民，止有茅竹屋数十百区，以为军营。

① 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十七《玉堂诸公赠送天使诗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5页。

② 宋濂等：《元史》卷二百九《安南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652页。

③ 陈孚：《陈刚中诗集》卷二《交州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程文海：《雪楼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八《交阯》，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061页。

> 桓质陋而目眇，自言近岁与蛮寇接战，坠马伤足，受诏不拜。……士卒殆三千人，悉黥其额曰“天子军”。粮以禾穗日给，令自舂为食。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枪、竹枪，弱不可用。……桓轻侻残忍，昵比小人，腹心阉竖五七辈错立其侧。好狎饮，以手令为乐。凡官属善其事者，擢居亲近左右，有小过亦杀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宾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黜为阍吏；怒息，乃召复其位。①

这段文字与《安南即事》②诗的注文有异曲同工之妙，记录虽不及《安南即事》详细，但是也涉及了安南社会的多个方面，对统治者了解安南大有裨益。遗憾的是宋镐未曾写诗，倘若为上述条目冠以诗句，就是一首宋代版的《安南即事》；反之，把《安南即事》诗中的自注摘列下来，又何尝不是一篇条列安南山川形势的奏文。

元代使越文学中有一批与安南君臣的交流诗歌，其中部分作品不能看作是纯粹的诗歌唱和，更像是在进行对话。例如：

> 李思衍《世子燕席索诗》有诗句云：“北阙星驰新诏命，南交春转旧山川。”又《世子和前韵有自顾不才惭锡土只缘多病欠朝天之句即席次韵》前四句云：“雨露汪洋普汉恩，凤衔丹诏出红尘。拓开地角皆和气，净挟天河洗战尘。”
>
> 萧方崖《即席和世子韵》有诗句云：“明代保民如赤子，不须忧国重颦眉。”
>
> 文子方《赠世子太虚子》后四句云：“历阶再拜钦明诏，式燕多仪礼上宾。从此君臣保民社，主恩长畀越南人。”③

---

①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八《交阯》，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4061—14062 页。

② 安南纪事》是陈孚《交州稿》中的一首长篇五言排律，全诗共五十八句，多数诗句下有陈孚自注，如“国尉青盘护，军撅白梃驱”一句，其注文为“当国二人，其叔伪太师陈启，弟伪太尉陈晔，国事巨细，晔、启皆专之。每至殿门下舆，则二人各执二大木，圆如镜，色青，广六尺，上画日月北斗二十八宿，意以自障也。每州县有官曰‘将撅’，司巡徼之事，兼领士兵。有警则尽驱丁壮以往，器械悉自备。无弓矢，惟持药弩、标枪，亦有操白梃者”。

③ 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十七《至元以来名贤奉使安南诗》，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391、394、396 页。

元朝使臣的赠诗大都着力于向安南宣扬朝廷的恩德,其政治意图极为明显。而相同的政治愿望也在陈朝君臣的赠诗中得到了回应。例如:

> 陈太宗《送天使麻合麻乔元朗》有诗句云:"上国恩深情易感,小邦俗薄礼多惭。""鼎语愿温中统诏,免教忧国每如惔。"
>
> 陈明宗《再用韵呈天使》最后两句云:"圣恩浩荡慈云阔,化作甘霖满人间。"又《送天使撒只瓦赵子期》有诗句云:"四方专对男儿志,一视同仁天子心。"[①]

显而易见,在政治环境中滋生的诗歌,传统的文学功能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政治功能和外交功能的萌发。回到历史长河中,上述诗歌片段难道不是对"赋诗言志"的一种延续吗?既然诗歌有运用于外交场合的先例,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使越文学的政治功能表示认同。更何况诗歌在外交中还确有功效,徐明善《席上口占》诗云:"乘传入南中,云章照海红。天边龙虎气,南徼马牛风。日月八荒烛,车书万里同。丹青入王会,茅土胙无穷。"《中洲野录》云:"徐芳谷尝奉使交趾国,其王子陈日炫闻公善诗,举卮酒立索吟,公口占云云。日炫遂纳款奉贡,公声名大振。"[②]席间一首诗就使安南国王甘愿纳款奉贡,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诗歌有推动政治外交的巨大作用是明显的。不同的场合就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文学,元代使越文学进入到外交场合中就具有了政治功能。

(三)交流功能

诗歌具有交流的功能不容置疑,使越文学亦然。在越南文学史上,安南国王的文学成就不容忽视,多数国王都有作品流传。陈朝的国王特别热衷于汉诗创作,几乎都著有诗集,潘辉注《历朝宪章文籍志》载:"陈太宗《课虚集》一卷、《御诗》一卷,圣宗《贻后录》二卷、《箕裘录》一卷、《诗集》一卷,仁宗《中兴实录》二卷、《诗集》一卷,明宗《诗集》一卷,英宗《水云随笔》二卷,

---

① 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十八《安南名人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17、419页。
② 陈衍辑撰,李梦生校点:《元诗纪事》卷九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艺宗《葆和殿余笔》八卷、《诗集》一卷。"[①]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们在临终之前多将自己的著述焚烧，如《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上皇（陈英宗）天性谦冲，友睦同姓，朝廷庶政，皆自裁决，万机余暇，游神翰墨，一书一画悉焚之，御制诗集名水云随笔，临崩亦焚之。"又如"（陈明宗）疾笃，命侍臣阮民望取御制诗稿焚之"。[②]尽管陈朝国王有自焚诗稿的行为，也掩盖不了他们对汉诗的喜爱。上有所好，下必流行。不管陈朝文人是出于对汉诗的偏爱，还是为了迎合统治者，汉诗同样在他们中间刮起了阵阵流行风。潘辉注《历朝宪章文籍志》载：

> 朱文贞《樵隐诗集》一卷，威文王陈国遂《岑楼集》一卷，昭明王陈光启《乐道集》一卷，司徒陈元旦《冰壶玉壑集》一卷，阮忠彦《介轩诗集》一卷，范师孟《峡石集》一卷，陈元（王寿）《菊堂遗草》二卷，胡尊鹫《讨间效颦》一卷，阮飞卿《蕊溪诗集》一卷，韩诠《披砂集》一卷，李济川《越甸幽灵集》一卷。"[③]

不难看出陈朝是一个汉诗升腾的时代，汉诗显然在陈朝社会中成为了最时髦的文体。如此，当我们面对元陈之间的交流向诗歌倾斜，使越文学中的诗歌交流主要在元朝使臣和陈朝君臣之间进行时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据不完全统计，元朝使臣的交流诗歌有：李思衍《世子燕席索诗》、《世子和前韵有自顾不才惭锡土只缘多病欠朝天之句即席次韵》、《行赆有礼辞之世子举陆贾事亹亹见爱谢绝以诗》、《观棋》，徐明善《佐两山使交春夜观棋赠世子》、《席上口占》，陈孚《交趾伪少保国相丁公文以诗饯行因次韵》，李仲宾《和洞妙自真世子韵》，萧方崖《即席和世子韵》，李景山七言律诗一首，杜希望七言律诗一首，文矩《赠世子太虚子》和七言律诗一首，杨廷镇《答太子世子韵》，赵子期《和太子世子韵》等。陈朝君臣的交流诗歌有：陈太宗《送天使

---

① 潘清简等纂：《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越南建福元年（1884）刻本。

② 黎文休、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六、卷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2年，第399、429页。

③ 潘清简等纂：《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越南建福元年（1884）刻本。

张显卿》，陈仁宗《馈天使张显卿春饼》、《送天使李仲宾萧方崖》、《送天使麻合麻乔元朗》、《和乔元朗韵》，陈英宗《送天使阿鲁威李景山》，陈明宗《赠天使撒只瓦文子方》、《谢天使马合谋杨庭镇》、《再用韻呈天使》、《送天使撒只瓦赵子期》，老国叔昭明王乐道先生《赠天使柴庄卿李振等》、《送柴庄卿》等。另外还有内附元朝的安南国公乐善老人《赠天使张显卿使还》，黎崱《赠尚书撒里瓦使安南还》、《送郎中赵子期》、《送侍郎智子元使安南》、《送文史傅与砺佐天使安南》、《赠傅与砺使安南还》。

四、元代使臣所带动的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

（一）儒学的传播

儒学是元代的中越文化交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体现汉文化在越南深入传播的实例。中越儒学交流的途径很多，使臣应属其中一种。在元、陈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摩擦，但元朝会本着和平的原则，常常以谴责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而谴责的语言文字常取自儒学经典，其执行者则以外交机构和使臣为主。如《元史》记载：

> （至元）七年十一月，中书省移牒光昺，言其受诏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理，遂引《春秋》之义责之。
>
> 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泽等奏安南来使邓汝霖窃画宫苑图本，私贾舆地图及禁书等物，又抄写陈言征收交趾文书，及私记北边军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诏责以大义。①

我们能否说这种“引《春秋》之义责之”、“责以大义”的方式，为儒家文化在越南的进一步传播和中越儒学交流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呢？我想这条途径是存在的。这条途经的合理性在于：安南社会一直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具备对儒家文化的接受能力；安南同样用儒学为政治服务，而外交是能够体

① 宋濂等撰：《元史》卷二百九《安南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4636、4650 页。

现儒学的政治场所。所以中书省复光昺牒云:"考之《春秋》叙王人于诸侯之上,《释例》云:王人盖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贵者也。下士,内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贵者之上,盖以王命为重也。"[①]陈孚在与安南交涉时说道"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②]张立道在《张尚书立道显卿与世子书》中写道:"五不韪之责,首见春秋,卒于此日;三可谓之道,尝闻鲁语,君子当知。"[③]这些对儒家经义的引用说明:外交为中越的儒学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实际上元朝机构和使臣"引经义"谴责安南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从另一个层面讲它对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文学的传播

对于元代的中越文学交流,前文以作探讨,主要表现为诗歌的交流。元使对中越诗歌交流的推动也不必复叹,这里仅以"集句诗"这一诗歌的变体作为补充。陈孚《交州稿》有《入安南以官事未了绝不作诗清明日感事因集句成十绝奉呈贡父尚书并示世子及诸大夫篇篇见寒食》十首集句组诗,诗题言"奉呈贡父尚书并示世子及诸大夫",是对"集句诗"被用于交流的证明。集句诗是"杂集古今以成诗"[④]的一种特殊的诗歌写作方式,集句诗的出现要追溯到晋傅咸所作的《七经诗》,陈绎曾《诗谱》认为:"晋傅咸作《七经诗》,其《毛诗》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终有淑。勉尔遁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此乃集句诗之始。"[⑤]

考察越南整个文学史,集句诗作品不在少数。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著录越南的集句诗集就有:《春云诗集》作者不详,书前载录五言八句集句诗十六首,所集多为唐宋诗句。《集唐述怀》武范諴撰,集句诗三十首,表达归隐之意;另收录阮其南的集句诗四首。《葫样诗集》二卷,阮德达撰,录诗四百四十四首。[⑥]另外还有一些零碎的集句诗作,如:黎贵惇于1760年出

① 宋濂等撰:《元史》卷二百九《安南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637页。
② 陈孚:《陈刚中诗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五《大元名臣往复书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6页。
④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⑤ 陈绎曾:《诗谱》,出自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3页。
⑥ 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第694、715、720页。

使中国，途经永州时写的《永州初秋闲望集古》组诗；高伯适《高周臣诗集》中有三首用“集唐诗成句”为题的集句诗，即《落第有感集唐诗成句》、《乱后集唐诗成句》和《饯直学士阮翁回休集唐诗成句》。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集句诗在越南的发展，越南文人并不仅仅将集句运用在诗歌上，还使用到了经史上，如《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著录的《阮探花淡如甫史论十三经集句》，又名《史论集句》，又名《集句史论》，阮文交撰，以集录十三经成句的方式，对自伏羲至春秋时期的中国历史加以评论。集句诗在越南的发展和变迁，是中越诗歌交流的硕果，元使可谓功不可没。

（三）书籍的传播

使臣往往是元代中越书籍交流的载体。如《大藏经》是一部汇集佛教一切经典的全书，历代对它都有过刊刻。越南的各个朝代都会请求中国赐送《大藏经》，如黎朝国王黎桓还写有《请大藏经表》，李朝太祖（公蕴）也曾向宋朝乞赠《大藏经》，陈朝“（陈英宗兴隆）三年（1295年）春，二月朔，元使萧泰登来，帝遣内员外郎陈克用、范讨偕行，收得大藏经部回，留天长府，副本刊行”。[①]元使是否将《大藏经》直接带到过安南，虽无文献可证，但是从汉文化在越南传播的方式上考虑，《大藏经》在越南的传播也应与使臣有关。

上述种种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事例表明，汉文化之所以能在越南深入传播，往往存在着多种传播途径和角度，而使臣当是其中的一种。在中越关系发展史上，使臣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就元代使臣而言，他们代表了宗主国的皇权政治，强有力地推动着中越宗藩关系的友好进程。同时，外交也为中越文化交流提供了空间，使臣又具有文化意义，成为推动汉文学在越南传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提　要：元代是中越宗藩关系深入发展的时期，汉文化在越南得到进一步传播，中越文化交流硕果累累。使臣是汉文学在越南传播的一条特殊途

① 黎文休、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2年版，第374页。

径,他们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推动中越关系、文化不断发展和交融。本文通过元代中越文化交流的实例,探讨使越文学的主要特点:其创作动因,其特殊的记录方式,其在政治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功能。对于域外汉文学研究来说,使臣文学研究可以开拓新的视角和领域,提出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元代 使越文学 汉文学 传播

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经《华严经》叙录

汤 珺

俄 TK88《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十》[①]：残卷，内容实即《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正文部分。首自"以普贤行愿力，故起深信解，现前知见，悉以上"至尾；次另行界格，次另行界格内顶格书题"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十"；次另行界格，次另行界细格四行，内顶格小字书"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 守瓊 散施此功德 大安十年八月 日流通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塗苦。普施尽法界，万类诸舍识。依经行愿行，广大无有尽。灭除恶业罪，速证佛菩提。"本卷页 28 行，正文行 15 字，楷体，上下双栏，版口有"行愿经"三字，下有原卷页码如"八、九、十"等等。偶尔也有漏刻"行愿经"三字的，如"十三"上即无。据此卷后面的题记，知其为大延寿寺大德守瓊施舍刻行，时间是在西夏惠宗大安十年(1084)八月八日，是较早的一种西夏流传的佛教经典。其题记后的偈语，显然乃守瓊所为，表达了其超度众生，速证菩提的美好愿望。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卷子装，高 29.5 厘米，栏面高 24 厘米， 14 纸，纸幅 53.5—55.5 × 29.5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17—325 页。

厘米，最后一纸 59.5×29.5 厘米。纸色黄，纸质光滑，厚 0.12 毫米，表面显出淡白色石膏斑点。[①]不过，孟列夫称大安十年八月日为公元 1085 年 8 月 23 日—9 月 22 日，这是不确的。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题记的特征，多有“某月　日”的写法，此实当时人的习惯省写。若月日数字相同者，皆如此。故而本处的“八月　日”实际为“八月八日”的省写。惠宗大安元年始于 1075 年，故大安十年为 1084 年，此易知，无需多辨。

俄 TK258《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②]：残片，版本同俄 TK88。首自“终不堕恶趣若为利益亡过者清净受斎于舍利塔处”至“其彼亡者由宿业故设”。正文行 15 字，楷体，上下单边。

本文按：《大方广佛华严经》又称《华严经》、《杂华经》，大乘佛教要典之一，系如来成道后之第二七日，于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上位菩萨所宣说华严经教乃教法中之根本法轮，记述佛陀之因行果德，开显出重重无尽、事事无碍之妙旨。出于印度，然直至我国成立华严宗，方才发扬其真义。《华严经》之译本有三种：一、六十华严。凡六十卷。梵本有十万偈，由东晋支法领从于阗国携入三万六千偈，安帝义熙十四年(418)三月，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又称《旧华严》、《晋经》。收于《大正藏》第九册，总成七处，八会，三十四品。然入法界品尚有缺文；二、八十华严。梵本乃实叉难陀应武则天之请从于阗国携入我国翻译，自唐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三月，于遍空寺内始译，武后亲临译场，挥毫首题品名，至圣历二年(699)十月功毕，凡八十卷。又称《新华严》、《唐经》，收于《大正藏》第十册。总成七处，九会，三十九品。文辞流畅，义理更周，故流通较盛，为我国华严宗之主经；三、四十华严。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十一月，由南天竺乌荼国师子王派使者进贡其所亲写华严经之梵本，翌年六月，于长安崇福寺，由罽宾般若三藏译之，澄观及圆照、鉴虚等诸师详定，至贞元十四年二月译毕，共四十卷，此即四十华严。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略称《普贤行愿品》，又称《贞元

---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4 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6 页。

经》,收于《大正藏》第十册。为新、旧两译《华严经》"入法界品"之别译,此品占华严经四分之一以上,内容记述善财童子历参五十五善知识(或谓五十三参),而成就普贤之行愿。普贤菩萨既为善财称叹如来胜功德已,复说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世界。与新、旧两《华严经》之"入法界品"大同小异,然文较广,于卷四十中新添加普贤十种大愿,及"重颂"(以偈颂重覆阐释经法)之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偈。此外,本经记述善财童子游南,历访善知识,与《道行般若经》等所述萨陀波伦菩萨东行参求般若之说类同。又本经所记之诸大声闻不能闻知佛之自在神变,以寓斥责小乘,称叹大乘之意,与维摩经等之旨趣一致。俄孟列夫认为俄 TK258 卷是 1196 年 10 月 8 日俄 TK98《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版本的第 12 纸第 3 折面,题记的第 3 折面。[①]本文认为当是 1195 年 10 月 8 日,详见下文俄 TK98 卷的分析。孟列夫以为在 1196 年,那么他的理解"三年之中"应该是三周年,本文认为可能是第三年的意思;其二,俄 TK258 卷和俄 TK88 卷的版心全同,而俄 TK98 卷的版心只有页码数,没有经名简称。故而,虽则俄 TK258 卷和俄 TK98 卷的经名更加一致,但本文还是认为俄 TK258 卷和俄 TK88 卷似乎有着更多的关系。

俄 TK261《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②]:残片,9 行。存自"普音佛号一切智偏照此上"至"佛号宝餤幢此上过佛",然上半部皆残脱。正文行字数不清,字小,宋体。下单边,推测上亦单边。其背有编号为俄 TK261V 的《窦庸献蝇佛子启》,内容为:"窦庸敬献结织蝇佛子一把伏乞国公平章大人钧座笑口(纳?)为妙"。楷体,手写。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1 折面的下半截,9.5×13 厘米的残片。每行原有 23 字。纸色浅黄,厚 0.14—0.15 毫米。11 世纪上半期的宋版本。卷背的"国公平章大人钧座",大概是赵钧。[③]

---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30 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 329 页。

③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16 页。

本文按：本卷为八十华严之一部分。窦庸是谁？待查。"国公"为古代爵号，古代五等爵中"公爵"第一。隋封爵有国公，位次郡王，高于郡公，沿袭至明。平章大人，应该是平章政事大人的简称。平章政事本意为商议国家大事。唐贞观八年为官名。唐中叶以后，凡非侍中、中书令，而居宰相职者，率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平章军国重事"。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宰相之职；以"平章军国重事"优礼硕德老臣，序位宰相上。辽三京（东京、中京、南京）宰相府置之，分左右同平章事。金尚书省置之，二员，从一品。考西夏官制里面尚未发现此职，颇疑。钧座乃对长官的敬称。故而，孟列夫所疑本卷之"国公平章大人钧座"大概是赵钧的说法肯定是有问题的。窦庸若是宋朝人，则国公平章大人是谁？待考。若窦庸是西夏人，那么本文颇疑此处的"国公平章大人"和任得敬有关。西夏崇宗大庆元年（1140），任得敬因镇压哆讹番部起义有功，被封西平公。之后又贿赂察哥，于西夏仁宗天盛元年（1149）七月入朝，任尚书令，不久升为中书令，此官衔于宋朝，恰好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类似于宰相。之后，天盛八年（1156），察哥死，任得敬晋升国相，成为真正的宰相，大权独揽。任得敬本为汉人，任宋西安州通判，后投降西夏。他对宋朝官制很熟悉，所以本文颇疑本卷的"国公平章大人"乃其被封西平公，又渐次捞得中书令之后，以及出任国相之前的称谓。果然的话，则本卷当存在 1149 至 1156 年之间。

俄 TK241《注华严法界关门卷上》[①]：残。首页存"法赐紫　遵式治"、"（注华）严法界观门序"、"州刺史裴休撰"、"一切众生身心之"等字样；次页自正文"心如此之灵矣众生之迷也"处至"如全水之波非水以动义非湿故"处止。页 16 行，正文行 9 左右字，注文双行小字或单行小字。有手标的点活圆圈或句读或注音。宋体，上下单边。同俄 TK186《注清凉心要》卷一样，正文和注文以上，空出约五格乃以曲折线条的方式，配以简要文字又对正文和注文加以注释，这个叫科文。序言、注和科文，不见于《大藏经》，正文的段落划分也不同。版心上部有"法界上"字样，为经名简称，其下下沉两格书"二"至

---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 250—277 页。

“二十六”等数字，为页码。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第2至28纸，用单页的纸印的木刻本，大概原准备粘连成卷子。纸幅44×34厘米，文面44×24.5厘米，正文和注高16厘米；上面是科，高8.5厘米。纸色淡黄，纸质柔软，厚0.07—0.10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每轮流相隔1—5、5—5、5—1厘米有道竖纹。手标点或圈为朱色。有首题《注〔法界〕观门》和尾题。首题后是小字的注释者署名：“□(圭)峰兰若沙门宗密注”。正文开头有作者的名字：“京终南山释杜顺集”。注释中指出了他的异名，以及继承者的名字：二祖俨尊(即智俨，602—668年)和三祖康国师(即法藏，643—712年)。正文至“是故行由解成行起解绝”，见于《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32帙第2册第22页下栏第19行—第25页下栏第16行。[①]

俄TK242《注华严法界关门卷下》[②]：残。本卷同俄TK241卷实为一书，故卷子情况全同，唯版心经名简称作“法界下”。首存注释的第一行“为我无理离”及正文“为真理如来即波无动而非湿故”至尾；次另行下沉约五格书题“注华严法界关门卷下”。《大藏经》中无科，段落划分亦不相符；次另行小字顶格书题记，宋体，24行，行22字。文云“恭惟毗卢，现相称性，演百千偈之大经，彰生佛也无二，如一味时雨，甘苦自分。曼殊化身，随机设三十重之妙门，明阶降也非一。似三兽渡河，浅深各异。是故　定慧祖师叹云：奇哉显诀！文约义丰，理深事简。以科注释其义，引学者击其门。至于悟入大经法界，则方通相虚万象，性实一真也。相国裴公制序，指示惑者，讚斯法门，都可谓入圣玄术，出凡要路，意俪词存，简易尤忻，举网提网(《花严经》云，张大教往于生灭河，漉人天鱼置涅槃岸)，此之观文，若唯注而不科，如无网之网。若但科而不注，如无网之网。科注别轴，稍劳披览。故有先贤，移其科格，以就观文。既观下有注文，上有科三者，备矣。一经显焉，使诸修观之徒，讲宣之侣，无烦眩目。移科之意，其在兹乎？今者　德真　幸居帝里，喜遇良规，始欲修习，终难得本。以至口授，则音律参差。传写者句文脱谬，致罢学心，必成大失。是以恭捨囊资，募工镂板，印施流通，备诸学者。若持若诵，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92—193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278—295页。

情尽见除；或见或闻，功齐种智。仰此上乘，遍严法界。延龙筭于皇家，曜福星于官庶，道如尧舜之风，国等华严之境。惣期万类，性反一真。不间冤亲，将来无对。溥冀含情，悉如我愿。大圆镜中，欲垂慈照者也”；次另行下沉三格小字书题款“皇朝天盛四年岁次壬申八月望日沔道沙门释法随劝缘及记”；次另行下沉六格小字题款“邠州开元寺僧西安州归义刘德真雕板印文谨就圣节日散施。”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第13—30纸。正文“为无我理离”到“障无阂深思之令现在前”，见《大日本校订大正藏经》第32帙第3册第27页上栏第18行—第29页下栏第11行。“注略，法界，观门”，第28纸第9行—第30纸第3行，从“若无人欲识真理空”到：“（注释的第二直行）。山河石壁不相妨，即是智通无窒阂。”押韵的七言偈，每行一句诗，每诗又以押韵的四句七言诗加以注释。有首题，其后是小字的作者署名：“杭乌山沙门智藏注”。此作品有关文献中未被登录过。[①]

本文按：本卷乃汇集了杜顺的注文、定慧禅师宗密的科文、沙门智藏的偈和裴休的序为一体的《华严经》注本。据卷后题记和孟列夫《叙录》所见，知本经《注华严法界关门》为华严宗初祖杜顺所作。杜顺（557—640），唐雍州万年（西安）人，俗姓杜，讳法顺，号帝心尊者，俗称炖煌菩萨。十八岁出家，投因圣寺僧珍受禅业，后隐居终南山，大张华严教纲。唐太宗召之入宫，礼遇有加。后游历郡国，劝念阿弥陀佛，又着《五悔文》赞咏净土。贞观十四年（640）十一月十五日，示寂于南郊义善寺。著有《十门实相观》、《会诸宗别见颂》、《华严法界观门》、《华严五教止观》等文，后二文是否确为杜顺所作，尚未有定论。《华严法界观门》之“观”字，本卷作“关”字。智藏（741—819），俗姓皮，祖西印度种族，祖父从华，世居官宦，后侨寓庐陵。智藏对律藏精敏。唐贞元中遇大寂禅师，笃明心要。游会稽，于杭乌山顶筑室安，著《华严经妙义》。至元和十四年二月无疾而终。定慧禅师（780-841），唐高僧，我国华严宗第五祖。俗姓何，号宗密，唐代果州（四川西充）人。唐武宗会昌元年去世，葬于圭峰，世又称圭峰禅师、圭山大师，谥号定慧禅师。元和五年，入澄观（清凉国师）座下，受持华严。元和十一年正月，于终南山智炬寺，誓不下山，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0页。

遍览藏经三年，撰有《圆觉经科文》二卷。后入终南山草堂寺，潜心修学，着《圆觉经大疏》三卷。再迁寺南之圭峰兰若，专事诵经修禅。太和二年(828)征入宫中讲经，帝赐紫方袍。相国裴休等受其教，未久请归山。会昌元年(841)正月六日坐化于兴福塔院。裴休(797—870)，字公美，唐代孟州济源(河南济源)人，一作河东闻喜(山西闻喜)人。进士，名相，操守严正。善诗文，尤工书法，似柳体然更遒媚劲健，楷书造诣尤受推崇。与沩山灵佑同门，精通《华严》教旨与禅宗心要，因撰《传心法要序》，与黄檗希运也有殊胜的因缘。曾随圭峰宗密禅师学习华严，故凡圭峰著述，皆邀他撰序，如《圆觉经序》、《华严经法界序》、《禅源诸诠集都序》等。中年后，断绝肉食，摒弃诸欲，焚香诵经，世称"河东大士"，"宰相沙门"。上述四者，皆为《华严经》的研奉者。而将它们编写为一体者，应该是西夏仁宗天盛四年(1152)八月初一法门释法随，且由他向　州开元寺僧西安州归义刘德真劝缘，雕板印施于圣节日，其目的在于使得学者有良好的版本来学习《华严经》。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刘德真本这里开元寺的僧人，后投降西夏。西安州，即今宁夏海原县，宋咸平五年(1002)，党项族夺得。1038年，西夏建国，属西夏，于今县境西置南牟会城。宋元符二年(1099)，南牟会新城复为宋地，置西安州，属秦凤路。靖康元年(1126)西夏又攻取西安州，更名为南威州，又名安州。为西北边陲军事要地。刘德真应该是辗转到这里归顺到西夏的。据西安州一名，则知刘德真的归顺，应该在1099年至1126年之间。虽然本卷的施刻在1152年，但他仍然记下了自己归顺的时期和地点。

俄TK72《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①：首版画，上下双边，佛正面坐于画面中心，上榜题"教主大毗卢遮那佛"，佛座前一像向佛而立，旁榜题"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左边立华服少年，旁榜题"威光太子"。佛上方为左右群佛小像，各五身。边上为飞翔之凤凰、乐器和天神。佛座两侧为侧向菩萨，他们身后各九身天神、梵王、天王和保护菩萨；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下沉一格，小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94—107页。

字书“罽宾国三藏般若奉　诏译”,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正文尾小字双行书写“京市□□□□□僧口(雕?)字□三□(藏?)译”(据孟列夫辨认,此句是“京市周家寺/僧　雕字王善慧”);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次另行顶格书题“华严感通灵应传记”,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一格题跋:“大夏□□□巳十三年(下缺)”。据残缺之首二字字痕,又据“巳十三年”字样,指本卷刻行当在西夏仁宗天盛十三年(1161)岁次辛巳。页5行,正文行18字,楷体。双行小字注,行24字。上下单边,卷轴装。本卷刻、印、装、画、存,均极精美,字迹清晰,但个别地方有粘损痕迹。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共21纸,每纸四折面,第11纸和第21纸各3折面,另有1纸5折面版画。各纸沿栏线的粘接处有页码。折面10×29厘米,栏面10×22厘米。纸色灰,涩滞,厚0.16—0.18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大夏□□□巳十三年(下缺)”的题记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版画的第1折面与封皮相粘,封皮上有印着经名《□(大)方广佛普贤行愿经》的黄色书签,围以4道绳纹形栏线。此刊本背面粘着西夏文刊本和写本的纸页(当时的裱褙)。[①]此处有关封皮的描述,今上海古籍影印本似乎不见,待查。

俄TK73《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②]:残本,版本全同俄TK72。首自“(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至“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提)”;次自“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至“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文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1161年刊本的两个单页,面幅10×26.5厘米,栏面10×22.5厘米。纸色黄,厚0.14—0.20毫米。[③]

本文按:以上两个版本,可考是西夏仁宗天盛十三年(1161)年刻施者,也属于较早的华严经版本。经后所附《华严感通灵应传记》中,有“诵偈破铁城之极苦”、“天帝请讲”条下有唐武则天垂拱三年(688)贤安坊郭神亮、西域

---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3—124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107页。

③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4页。

三藏实意的灵异故事。这些故事为武则天上台的舆论支持。若依孟列夫所见，则俄TK72的题记是用小纸条贴上去的，那么显然这是修复者所为。这个修复者应该是与刻印时代不远的人。俄TK73卷的两段残文说明，刻行当于西夏仁宗天盛十三年(1161)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其发行量可能也不是很小。

俄TK61《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①]：首版画，佛像端坐正中，身边为两菩萨侍立，周围是诸天神和弟子众；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下沉三格，小字书"罽宾国三藏般若奉　诏译"，次另行顶格书小标题"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终"，次另行下沉七格小字书"太原崇福寺沙门澄观校勘详定译"；次另行顶格书题"华严感通灵应传记"，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顶格题跋："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巳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页6行，正文行18字，楷体。见于《大正藏》卷10第844—848页。偶有双行小字注。上下双边，卷轴装，卷上部左上标"行一"、"行二""行三"等等，"行"当指经名，"一、二、三、四"等等，当指页面。本卷刻、印、装、画、存，均极精美，字迹清晰，完好无损。据题跋，知此部经典刻行时间明确在西夏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施舍者是仁宗皇帝的正宫罗皇后。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文描述可补充者如次：1189年的木刻本，经折装，13纸，每纸叠成5个折面，第13纸3个折面，各纸第1行前面增补了标明纸数的页码。版画3个折面，栏面41.5×23厘米。右边粘着1189年4月2日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刊本版画的第1折面。正文占据第1纸的第1折面至第12纸的2折面。折面11×27.5厘米。每纸30行。纸色淡黄灰，涩滞，厚0.19—0.20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第12纸第3折面至第13纸第2折面为《华严感通灵应传记》。题记则占据第13纸的第3折面。[②]

---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55—65页。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4—125页。

俄 TK63《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①]：残片，版本全同俄 TK61。其包括有编号俄 TK63A 的佛经残片，内容为“行十二”之“尔时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至“诸菩萨摩诃萨众大智舍利弗摩诃目揵连等”处。其背面有编号为俄 TK63AV 的残片，内容亦接正面，至尾“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有编号为俄 TK63B 的《佛经》残片，内容待定。其背后有编号为俄 TK63BV 西夏文的《文书》片段，内容待定；次为编号俄 TK63C 的西夏文《佛经》残片，内容待定。其背后有编号为俄 TK63CV 西夏文的《杂写》片段，内容待定。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文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1189 年 4 月 2 日版本。上封皮硬纸板由汉文和西夏文刊本的纸块粘成，下封皮糊着一张蓝纸。[②]

俄 TK64《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③]：残本，版本全同俄 TK61。首版画；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下沉三格，小字书“罽宾国三藏般若奉　诏译”，次另行顶格书小标题“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诸菩萨摩诃萨众大智舍利弗摩诃目揵连”处，以下残；次粘贴《华严感通灵应传记》正文，至尾。其后残脱罗皇后施舍之题跋。本卷背后有编号俄 TK64V 的《金刚经》等残文和杂写。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文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1189 年 4 月 2 日版本。[④]

俄 TK65《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⑤]：残本，版本全同俄 TK61。无版画，首自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下沉三格，小字书“罽宾国三藏般若奉　诏译”始，尾至《华严感通灵应传记》之“水洗持华严人之手诸类承着命尽生天”及注释文。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文描述可补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 66 页。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6 页。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 67—77 页。

④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6 页。

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 77—87 页。

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①]

俄TK71《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②]：残本，版本全同俄TK61。首自“行一”之“十种广大行愿，何等为十？”至“行三”之“复次善男子言请佛住世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数诸佛如来将”处；次存偈语自“十方所有诸众生”至“恒不忘失菩提心”。又其背面编号为俄TK71V的为《华严感通灵应传记》的末尾一段，自“大非小尘尘谛了”至尾。无罗皇后题记。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文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上背面糊着此书别种印本(封皮余幅)的纸块。[③]

俄TK161《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④]：残，版本全同俄TK61。首自页一“十种广大行愿何等为十一者礼敬诸佛二者”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终”，次另行下沉七格小字书“太原崇福寺沙门澄观校勘详定译”；次另行顶格书题“华严感通灵应传记”，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双行小注文“经云：此经十方诸佛同说通讃，海会菩萨俱来”处止，以下残缺。其背有编号为俄TK161V的《金刚经等》粘着痕迹。其中杂写部分依稀辨得有“大地铺祥，长空布瑞，正恁　时借位”，“堂堂祇麽祇如今无能无伎俩若猛”，疑为小说残文。精美行书体；册页书痕迹的界行列表有“宋三十一人　陆探微　子绶　顾宝先”等，秀美楷体。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文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⑤]

本文按：以上六种《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皆属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太原府太崇福寺沙门澄观详定的同一版本。根据其后的仁宗罗皇后的题跋，知道均为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版本，这个版本有可能在同一年的九月十五日被仁宗皇帝再次刻印施舍。

---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6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92—94页。

③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6页。

④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5—18页。

⑤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6页。

这六种刊本，孟列夫定为甲种本，以区别于俄 TK69《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残本（孟列夫定为乙种本）。关于俄TK69卷的详情，稍后描述。而被孟列夫定为此甲种本的还有俄 TK160、俄 TK66、俄 TK67、俄 TK68、俄 TK62、俄 TK320 等卷。然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并无此数卷存在，故而依孟列夫描述，一一补充如次：俄 TK160 卷，木刻本，第 9 纸（第 2—5 折面）的残片，颜色褐灰；俄 TK66 卷，木刻本，经折装，一折面（第 5 纸第 3 折面）；俄 TK67 卷，木刻本，第 5 纸第 2 面[①]；俄 TK68 卷，木刻本，经折装，经文残片和尾题，其后为小字的编者署名："太原崇福寺沙门澄观校勘详定译。"后记存《华严感通灵应传记》前两折面。上封皮损坏严重，外面是蓝纸，粘在用被裁断的汉文刊本的书页糊成的硬纸板上。封皮里面粘着俄 TK14 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刊本的版画《释迦摩尼说法图》的第 1 折面（本文按，俄 TK14 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罗皇后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巳酉三月十五日的题跋）[②]；俄 TK62 卷，木刻本，经折装，有首题，其下为小字的译者署名。经文残，有后记的正文，但无首尾[③]；俄 TK320 卷，木刻本，经折装，残片。根据以上经卷的罗皇后的题跋，知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刊刻，与俄 TK14、俄 TK17、俄 TK18、俄 TK39、俄 TK41、俄 TK45、俄 TK16 卷、俄 TK42、俄 TK44、俄 TK46、俄 TK48、俄 TK49、俄 TK52、俄 TK54、俄 TK57 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刊刻同因同时同批。西夏崇宗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仁宗即位，十二月，纳后罔氏。西夏仁宗天盛十七年（1165）冬十一月，罔氏卒。西夏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三月，立罗氏为后。罗氏本文中国人，因战乱陷没于西夏，时入宫已数年。仁宗幸之，遂立为皇后。罗皇后施刻此经的目的何在？按照西夏皇家施刻佛经的惯例，一般大型的施刻，都有序跋介绍施主施刻的原因、规模、祝福等。但此次施刻保存下来经卷如此之多，却未发现其留下的题跋之类，的确奇怪。因无题记，故而没有直接答案。但据刻印的日子恰好是在"三月"，则与其两年前被立为后的时间完全一致。考虑到罗氏为后的原因，

① 以上三种均见于（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5 页。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5—126 页。
③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6 页。

所以推测其施刻本经的原因在于感恩佛主令她的命运神奇转运吧！其保存者或为“温家寺道院”，或为某僧徒自己，如“李善进”等。从保存情况来看，俄TK14、俄TK17两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保存在温家寺道院，比较完整无损。而俄TK18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保存在僧徒李善进手里的。又据俄TK41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留的题跋和书写的偈语，知李善进很可能就是温家寺道院的僧徒。那么此处七种《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经卷是否也是为温家寺保存者呢？待考。另据俄TK58《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之仁宗皇帝的《施经发愿文》所云：“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之语，则疑本卷佛经乃乾祐二十年(1189)九月十五日，仁宗于大度民寺大法会时，重施罗皇后三月十五日刻印者。此外，被孟列夫定为乙种本的俄TK69《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①]残本，基本同俄TK61，但当为初刻本或翻刻本。无版画，首自“行二”之“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身命经不可说”至尾罗皇后施舍题跋俱存。其正文或有少许残损漫灭处。其排版一同俄TK61。然俄TK61版口上半部中央部分“行四”、“行五”至“行十三”等等，在本卷中变更为版口上半部中央部分一律是“行愿经”三字，版口下半部中央部分则是“四”、“五”至“十三”等等数字。故而本卷当是翻刻而成，抑或是最早罗氏的刻本。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文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折面11×27.5厘米，栏面11×23厘米。纸色黄，厚0.18—0.20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②]而孟列夫称另有俄TK162卷的同题经卷，也属于这个乙种本。但这个俄TK162卷今亦不存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本中。此依据孟列夫描述补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把不同印本的版画的单个折面粘在一起，包括：俄TK267《弥勒上生经讲经文》版画的最后一个折面；[③]同一版画的

---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87—90页。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5页。

③ 本文按，此处有误。孟列夫原文说其著编号133的版画的最后一个折面，然编号133即为俄TK267《弥勒上生经讲经文》。可孟列夫对TK267卷的描述中并无版画内容，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本也没有版画部分。

西夏文本的最后6折面；同一个版画的汉文本的最后两折面；此刊本版画的第1—2折面；同一个版画的第2—3折面，这些版画的下端损坏严重。第1纸第1折面至第5纸第5折面，经文，不到尾。页边间或标有朱点，有尾题，其下是小字的译者署名。此刊本背面糊着西夏文写本和汉文刊本的纸条（当时的裱褙）。①

俄TK98《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②：首版画，双边，左上角题“行愿经变相”。首左侧坐佛，上榜题“教主毗卢遮那佛”；左右各坐一菩萨，榜题“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佛身后为八天神，榜题“天龙八部众”。佛座右下有六身跪像，榜题“声闻众”、“梵王众”。一男童立佛前，榜题“善财童子”。佛座左边三身男像，榜题“帝释众”。次十身跪像，榜题“弟□□（子众？）”。佛像以下，依次是本经的十种场面，据榜题为“一礼敬诸佛”、“二称讃如来”、“三广修供养”、“四忏除业障”、“六请转法轮”、“七请佛住主”、“五随喜功德”（随喜及涅盘／分布舍利善根）、“八常随佛学”（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示种种神通／处种种众生）、“九恒顺众生”、“十普皆回向”（极重苦果／我皆代受）。版画前有封皮，封皮硬纸板用木刻本的纸块粘成，外糊一张蓝纸；次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次另行下沉三格双界行内小字书“罽宾国三藏般若奉　诏译”，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自首至“复次善男子言称讃如来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极微一一尘中皆有一切世间极微尘数”，以下残；自“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极微尘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至“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次粘接《净除一切业障如来陀罗尼呪曰》，题另行顶格书，次另行顶格书咒文；次署名罗皇后所作的《施经发愿文》，文云：“恭闻含灵失本，犹潜尘之大经；正觉开密，若烛幽之杲日。是以王毫散彩，拯苦恼于群生；梵说流徽，徵奥旨于一致。今斯大方广佛花严经普贤行愿品者，圆宗至教，法界真诠，包括五乘，该罗九会。十种愿行，摄难思之妙门；一轴灵文，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6—127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360—373页。

为无尽之教本。情含刹土，誓等虚空，示诸佛之真源，明如来之智印。身身同毗卢之果海，出世玄猷；心心住普贤之因门，利生要路。繇是一偈书写，除五递之深殃；四句诵持，灭三途之重苦。今　皇太后罗氏恸　先帝之遐升，祈觉皇而冥荐，谨于大祥之辰，所作福善，暨三年之中，通兴种种利益，俱列于后，将兹胜善。伏愿　仁宗　皇帝佛光照体，驾龙轩以遊净方；法味资神，运犪乘而御梵刹。仍愿　萝图巩固，常临万国之尊；宝历弥新，永耀阎浮之境。文臣武职，等灵椿以坚贞；玉叶金枝，并仙桂而郁翠。兆明贺尧天之庆，万姓享舜日之荣。四生悉运于慈航，八难咸霑于法雨。含灵抱识，普会真源矣”；次另行下沉一格列仁宗死后三年内皇太后罗氏为他所作的佛法功德种种：大法会烧结壇等三千三百五十五次；大会斋一十八次；开读经文：藏经三百二十八藏(大藏经二百四十七藏、诸般经八十一藏)、大部帙经并零经五百五十四万八千一百七十八部；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散　僧三万五百九十员；放神幡一百七十一口；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部，数珠一万六千八十八串；消演番、汉《大乘经》六十一部；《大乘懺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皇太后宫下应有私人尽皆　放并作官人；散囚五十二次；设(赦)贫六十五次；放生羊七万七百七十九口；大赦一次；又诸州郡府边复之地遍□□□□(以下残)。页 6 行，正文行 15—16 字，428 行。见于《大正藏》卷 10 第 844—848 页。楷体，上下单边，版心下半部中央有一、二、三、四等等之类的数字，当时页数标记。据皇太后罗氏的发愿文，则指本卷的刻行是在仁宗死后的第三年，即西夏桓宗天庆二年(1195)年。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不刻本，经折装。版画，第 1—6 折面，经文，第 3—5 纸、第 7—10 纸各 6 折面，第 12、6 和 11 纸各 5 折面；题记，第 12—14 纸，不少于 8 折面。各纸叠成 9×21 厘米的折面，1 纸 6 折面；第 1、2、6 纸各 5 折面。文面 9×16 厘米。纸色白，稍发黄，每厘米 8 道帘纹，厚 0.11—0.17 毫米。版画栏面 55×15.5 厘米。刊本印行于仁宗的三周年忌辰，应该是天庆三年九月二十日(1196 年 10 月 8 日)。[①]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7—129 页。

俄 TK99《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①]：残卷，版本全同俄 TK98。首自"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至"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处。其字体、排版、字数、版口具列页数等，均全同俄 TK98。然仔细考察其版口页数数字的位置，则又不全同，知一为原版，一为翻刻无疑。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不刻本，经折装，第 3 纸(第 4 折面残)至第 10 纸(第 5 折面)。[②]

俄 TK100《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③]：残卷，版本全同俄 TK98。首自"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讃乃尽"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次另行顶格书题"净除一切业障如来陀罗尼呪曰"，次另行顶格书咒文；次署名罗皇后所作的《施经发愿文》，文自"恭闻含灵失本"至"大乘懺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本卷文字，排版、格式亦全同俄 TK98，然版口数字位置则全同俄 TK99。此说明俄 TK99 和俄 TK100 属于同一个版本。而俄 TK98 多处断裂、粘接的地方也说明它属于重印本，或恰恰相反，它属于初刻本。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不刻本，经折装，第 9 至第 12 折面是题记。[④]

俄 TK146《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⑤]：残卷，版本全同俄 TK98。首自"终不堕恶趣若为利益亡过者清净受斎于舍利塔处"至"骨上、尸上或坟冢上其彼亡者由宿业故设"处止。正文行 15 字，楷体，上下单边。存文比对，知其全同俄 TK98 版本。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不刻本，经折装，第 13 纸第 3—4 折面是题记的后面的部分。开列了施舍品。此刊本的印纸是一些不知名刊本的封皮，被裁成 19×9 厘米长条，大概是要适合于此书的开本。纸色浅灰黄，涩滞，厚 0.12—0.15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 374—382 页。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9 页。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 382—395 页。

④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9 页。

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8—240 页。

毫米,每厘米 7 道帘纹。[①]

俄 TK258《大方广佛华严经人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②]:残卷,版本全同俄 TK98。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第 12 纸第 3 折面,题记的第 3 折面。[③]

本文按:以上五种,诚属同一版本。它们刻行者是西夏皇太后罗氏;刻行时间是仁宗死后的第三年,即西夏桓宗天庆二年(1195)年;刻行的原因是为死去的仁宗皇帝祈福冥荐。孟列夫的意见可商榷者有二:其一,俄 TK98 卷据皇太后罗氏的发愿文"谨于大祥之辰,所作福善,暨三年之中,通兴种种利益,俱列于后,将兹胜善"之语,中国古代,父、母丧后一周年举行的祭礼叫"小祥",两周年举行的祭礼,叫"大祥"。《礼记·间传》,卒哭祭后(百日),孝子只能食粗饭饮水,小祥祭后才可以吃菜与果,至大祥祭后,饭食中才可用酱醋等调味品。小祥祭礼与卒哭同。大祥祭则于宗祠递迁改题神主之事祝告祖先,使善书者一人改题毕,陈设行礼。归后即撤除灵床灵座,停朝夕之奠,并断弃丧杖。《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郑玄注:"小祥、祭名。祥,吉也。"贾公彦疏:"至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祭。"则指本卷的刻行是在仁宗死后的二周年、第三年,西夏仁宗 1139—1193 年在位,即西夏桓宗天庆二年(1195)年。《宋史·夏国传下》记载绍熙四年(1193)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又俄 TK12《佛说转女身经》发愿文云:"今皇太后罗氏,自惟生居末世,去圣时遥,宿植良因,幸逢真教。每思仁宗之厚德,仰凭法力以荐资,遂于二周之忌晨,命工镂板,印造斯典,番汉共三万余卷,并彩绘功德三万余帧,散施国内臣民,普令见闻蒙益。"其末题记为:"天庆乙卯二年(1195)九月二十日皇太后罗氏发愿谨施"。[④]则本卷的刻行也有可能在同一时期。白雪《西夏罗后与佛教政治》也认为此次《大方广佛华严经人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施刻:"是罗太后为去世二周年的仁孝举行大

---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30 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326 页。

③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9 页。

④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第 271—292 页。

祥追念，规模大，舍施多。"[1]孟列夫以为在1196年，那么他的理解"三年之中"应该是三周年。俄TK98因其版口数字位置异于俄TK99、俄TK100、俄TK146，所以可能更早或更晚一些。而后两者全同，属于同意批次印行的产品。不过，孟列夫虽然也同意此五种同属于一个版本，但他根据各卷的字体、段末小花饰、段末纸数的排列、征文的排版以及栏线边页码的标注等方面，将它们分为甲种本（俄TK99）、乙种本（俄TK100）、和丙种本（俄TK146）三种。此外，他没有明确指出俄TK258卷属于甲、乙、丙三者之间的哪一种。[2]

俄TK142《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3]：首《教主大毗卢遮那佛》版画，双栏。画面中心佛正面高座莲花座上，头光三圈，背光四射，外围花纹光带。佛身两边有射形光带，身后有佛舍和树木，其顶端有五尊佛，坐于祥云中。佛头戴宽冠，上方榜题"教主大毗卢遮那佛"。佛莲座前有像面佛坐。有头光和射状背光，头上榜题"眉间胜因菩萨"。其小右毯上有跪像男童，头上榜题"善财童子"。左边小毯上立僧一人，榜题"弟子宝戒"。童子和僧人的右为五身踩莲头光向佛女像，榜题"请法上道"。左边为五身三女二男踩莲头光向佛像，榜题"菩萨天主"。佛两侧各五身坐莲菩萨，有头光和背光。左边的榜题分别是"文殊菩萨"、"功德林菩萨"、"法慧菩萨"、"贤首菩萨"、"座内海慧菩萨"。右边的榜题分别为"普贤菩萨"、"金刚藏菩萨"、"金刚幢菩萨"、"心王菩萨"、"青莲菩萨"。画面右下端为十身坐莲菩萨，有头光和背光，榜题"长随菩萨众"。其上方为十身恶相或皇族服饰人，榜题为"八部四王众"。再右端下边为两身皇族服饰坐像，另有两身残像，均有头光，榜题"欲色诸天众"。其上方为六身恶像和一身残像，榜题"杂类诸神众"。整个画面诸佛周围饰以三两团祥云，底部饰以莲花瓣图案，左上角榜题"大花严经／九会圣众"；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序"（未入《大正藏》），另行下沉三格小字书"太原府太崇福寺沙门　澄

---

① 白雪：《西夏罗后与佛教政治》，《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9—130页。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216—233页。

观奉　诏述”，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尾；次另行下沉一格小字书题记“经此南天竺国王手自书写梵本，进奉大唐皇帝。于贞元十二年（本文按，796）六月五日奉诏，令长安崇福寺内译罽宾三藏般若宣梵文，沙门广济译语，沙门圆照笔受，沙门智柔、智通廻缀，沙门道弘、鑑虚润文，沙门道章、大通校勘、证义，太原崇福寺沙门澄观共道邃详定”（文与《大正藏》卷10的同类者异）；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次下沉四格小字书“罽宾国三藏般若奉　诏译”，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见《大正藏》卷10第844—848页）；次另行顶格书题“四分律七佛略说戒偈”，次另行顶格书正文。各偈语后，次另行下沉两格小字题记如“此是毗婆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说是戒经”、“此是尸弃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此是毗叶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此是拘留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此是拘那含牟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此是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戒经”、“此是释迦牟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十二年中为无事僧说是戒经。从是以后，广分别说。诸比丘自为乐法乐，沙门者有残有愧。乐学戒者，当于中学”等（此一部分书名、内容均仅见于此）；次另行顶格书佛偈“我今说戒经，所说诸功德，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其后无题记，其作者当为澄观；次另行顶格书题“四分律七佛略说戒偈　竟”；次另行顶格书题“大乘起信论立义分”，次另行下沉两格小字书“马鸣菩萨造　梁天竺三藏真谛译”，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大乘起信论立义分　竟”（此部分见于《大藏经》卷32第575、576和583页）；次另行顶格小字书题记：“蓋念荷君后之优恩，上穷罔极；戴考妣之元德，旁及无涯。欲期臣子之诚，无出佛乘之右。是故畅圆融宏，略者华严为冠；□□乐玄，猷者净土惟先。仗法界一真之妙宗，仰弥觉六八之弘愿，今安亮等印《普贤行愿品经》一万有八卷，绘弥陀主伴尊容七十有二祯，溥施有缘，仍肇薨逝之辰，暨于终七，恒兴佛事，广启法筵，命诸禅法师、律僧、讲主转大藏及四大部经，礼千佛与梁武忏法，演大乘忏悔，屡放神幡，数请祝寿僧诵《法华经》，常命西番众持《宝集偈》，燃长明灯四十九海，读声不绝，《大般若》数十部。至终七之辰，诠义法师设药师琉璃光七佛供养，惠照禅师奉西方无量寿广大中国西天禅师提点等，烧结，灭恶，趣壇，矧六道

法事,袭此功德。伏愿帝统延昌,迈山呼之景筭;正宫永享,坤载之崇光。皇储协讃于□□",以下残缺。页6行,正文行15字,宋体,上下双边,卷轴装。本卷刻、印、装、画、存,均极精美,字迹清晰,完好无损。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版画单独一纸,6折面,然第1折面缺。栏面47×16.5厘米,双边。经文即其他16纸:第1—4、6—8、10—14纸各6折面;第5纸2折面;第9纸5折面;第15纸4折面;第16纸3折面。第2、第5—7、第9—15折面的粘接处有页码。折面9.5×20厘米,栏面9.5×16厘米。纸色灰,涩滞,厚0.11—0.17毫米,帘纹模糊,每厘米6道。金刊本(12世纪中期的)。[①]

本文按: 据本卷后残存题记,知此部经典刻行者是西夏皇室安亮等人,刻行的原因似乎是为死去的父母、皇帝或皇后作法事。其时间暂不明确。本次施刻的规模宏大,孟列夫关于此卷的判断有两处小误:一万〇八卷《普贤行愿品经》误作一百〇八卷;"皇储协讃于□□","□□"孟列夫认为"千秋"。皇储显系太子。此指的应是安亮得到了太子的赞助。孟列夫却理解为此句为"表明出版者和出版地点:'储协讃于千秋'(今河南省渑池)"[②],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据其"数请祝寿僧诵《法华经》,常命西番众持《宝集偈》"之语,可断其为西夏人物之事必不为中原所出。本文颇疑此安亮,与西夏襄宗李安全有关。李安全系党项皇族,父为西夏仁宗弟、越王李仁友。李仁友1196年逝,李安全要求袭越王爵位,西夏桓宗不许,只肯降封其为镇夷郡王,李安全不满,遂萌篡位心。1206年废桓宗自立,改元应天,即西夏襄宗。据本卷题记"荷君后之优恩","戴考妣之元德","欲期臣子之诚"等语,知其必为显赫重臣。又因其"肇薨逝之辰"之语,则知其死者必是诸侯或有爵位者。联想到李仁友生前爵封越王,则其逝世本该称薨逝或薨殂。若此推论成立,则此卷的时刻当在李仁友初死的终七之日,终七一般是死者死后的第七个七天完毕的日子,也就是第四十九天。李仁孝死于西夏桓宗天庆三年(1196)12月,则终七之日应该是在西夏桓宗天庆四年(1197)的二月或三月,本卷的刻施或在此时。桓宗李纯祐(1177—1206)为西夏第六代皇帝,仁宗长子,母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0页。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22页。

罗太后。其于1193即位,时17岁,至1197年20岁,至1206年被废30岁,史料无载其册立皇后和子嗣之事。再联系到安全废桓宗,命罗皇后上辽国表称纯祐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安全为为王之语,且罗皇后在仁宗过世以后一系列的为自己揽权造势的情形,桓宗的皇储问题,更是令人疑惑了。1211年,李安全的堂侄、齐王李遵顼发动政变,李安全被废,一个月后死去。李遵顼是李安全堂兄弟李彦宗之子,显然也不是李纯祐的儿子。换句话说,桓宗被废后,其后嗣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故而这时的皇储是谁?尚为疑问。

俄TK185《大方广佛花严经梵行品》[1]:残卷,首自"剃发是戒耶着袈裟衣是戒耶"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花严经梵行品";次另行顶格书题记:"粤以灵灵不昧,是万行之本源;了了常知,乃一真之心境。夫梵行品者,意不外此。所以为三天之奥义,九会之雄文也。故特仗鸿勋,虔资妙识(下缺)。伏愿慈航电激,作沉迷旷劫之津梁;宝籙长绵,印社稷万年之席福。辛未太原王　简施"。页4行,正文行9字,行宋体,上下单边版心小字"行五",乃经名和页数标志。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单印本。木刻本,经折装,纸色白,刊本的下半部分,最后的十四折面。第5折面的行间有小字的版号:"行　五"。大概总共是6版4纸,每纸7折面。面幅7×15厘米,栏面7×11.5厘米。纸色浅褐,纸质光滑,厚0.07—0.08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写刻体。经文第1—12折面,题记第12—14折面。山西的宋刊本,辛未年应该是1091年。[2]

本文按:本卷即八十华严,为实叉难陀应武则天之请译者。比旧东晋佛驮跋陀罗译之六十华严,文辞流畅,义理更周,故流通较盛,为华严宗之主经。据题记乃辛未太原王简所施。西夏王朝的辛未羊年有三次:西夏崇宗天佑民安二年(1091)、西夏仁宗天盛三年(1151)、西夏神宗光定元年(1211),若此王简为西夏时期人,则本卷当在此三个时期之中,为个人施舍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62—165页。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17页。

捐赠者。

俄B62《大方广佛花严经》[1]：抄本，残。首顶格题“大周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序”，下紧接小字书“卷第一平”，次另行下沉一格小字书“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制”；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兴妙会之缘普光法堂爰陁”；次自“譬如他性一　众生各别往”至“无数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止，下残。乃八十华严卷13之《菩萨问明品第十》；次自“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至“复次善男子言称　如来者”止，以下残。为四十华严卷40之《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次自“廻向法界诸众生”至“成就普贤广大愿”止，3残行，未知出处。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写本，叠成折子而折缝已破裂的卷子装的散页，大概是用来作封皮硬纸板的。各页背面有一或两个直径8.5厘米的圆形黑印，印文是中亚的婆罗迷文(13行)，印鉴中心有高4厘米的塔影。共18页，二十八个印。是四件不同的宋写本残片(12世纪初的)。《大周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序》是8×18厘米的3小页，文面8×13厘米。《菩萨问明品第十》为8×22厘米的10小页。《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4小页，页面8×21厘米，文面8×14厘米。[2]

本文按，本卷比较特别：首《大周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序》部分为武则天所作序文，但显然未抄写完。页6行，正文行11—13字，楷体，多衍字、错字。上下双边，外线粗，行间有细界格。下面经文部分页5行，正文行11—13字，楷体，然上下单边，且无界格。故而疑是抄本，且两种纸张拼凑而成。其《大周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序》当为后来所抄，故而并未抄完。孟列夫以为是12世纪初的宋刊本，待考。

俄TK251《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上二》[3]：残片。文自“皆名尘者坌污心识”至“等水界二者身内润性泪汗等身外润”。页6行，正文行15

---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64页。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18—119页。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278—295页。

字，宋体，上下双边。版中有黑底阴文字双栏书“善男子六尘清净故地大清净地清净故力大清净水大风大不复如意”字样。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解释“四大”概念和它们的两种表现（“内”、“外”）的文字，正文中有《宝积经》的引文。木刻本，两折面，大概是裁短作封皮硬纸板用的，折面 9.5×20.5 厘米，文面 9.5×16.5 厘米，第 6—7 行在好像装饰图条的栏内印成阴文。天头高 3.5 厘米。纸色浅黄，涩滞，厚 0.12—0.14 毫米，每厘米 8 道帘纹。12 世纪上半期的。[①]

本文按：《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三十卷，宗密自己有《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序》，裴休也有《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序》。本卷为宗密《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注》卷上之《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上二》的部分内容。“善男子六尘清净故地大清净地清净故力大清净水大风大不复如意”亦未其中内容，当挖补刻上的。孟列夫将本卷列为“未考定出的作品”，但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已经正确考订出来了它的名称。

俄 TK186《注清凉心要》[②]：首封面，左上角三白线围成的竖方框内，黑底阴文印书题“注清凉心要”字样；次另页版画《清凉答顺宗问图》，上下单边，一僧坐小桌前，右立一侍者，左坐皇帝，皇帝后立官员一。桌上燃香炉；次另行下沉八格大字书“清凉答顺宗”，次另行下沉八格书释文（小字）、正文（大字）至尾；次另行下沉八格大字书题“注心要法门”。正文结尾有标题为《心要法门颂》的五言诗；下紧接黑底阴文椭圆印鉴一枚题“善友施”字样。正文和注文的上端，即空出的八格，乃以曲折线条的方式，配以简要文字又对正文和注文加以注释。正文行 10 字，双行小字注，宋体，上下单边，左右单栏。尾端左上角有双边栏长框内，白底阴文印鉴一枚，文为“李丑儿宅经记”，字楷体。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纸色白，涩滞，厚 0.09—0.11 毫米，12 世纪前 25 年的宋版本。版画 3 折面，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50 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 166—173 页。

一纸，栏面 28×20.5 厘米。著作和注释的正文第 1—4 纸均 4 折面，第 5 纸 2 折面。页码在各纸的右栏上。折面 10.5×28 厘米，栏面 10.5×21 厘米。版画被分成两个部分，下面是正文和小字双行注释，上面是注释结构示意。"李丑儿宅经记"印鉴为淡紫褐色，4×5 厘米。封皮表面为黄纸，里面糊了一张有汉文文书（草体）的纸。12 世纪前 25 年的。[①]

本文按：本卷孟列夫标题为《圭峰兰若沙门宗密注顺宗皇帝所问心要法门华严疏主清凉国师澄观答》，这显然是他根据内容拟的。根据他拟的这个题目，和本卷所留下的线索，可以明确知道，本卷是澄观答唐顺宗的《心要法门》和其后宗密对这个《心要法门》做的注。澄观（738—839），俗姓夏侯，字大休，唐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广学律、禅、三论、天台、华严各宗的教义、天竺悉昙诸部异执、博综经、传、子、史、小学，儒佛俱通。776 年，居五台山大华严寺，讲《华严经》，华严宗四祖。唐德宗赐号"清凉法师"，礼为"教授和尚"，奉诏入译场刊正克什米尔三藏般若译南印度乌荼国王所进《华严经》后分 40 卷（即《四十华严》）唐宪宗加号"大统清凉国师"，敕有司铸金印。著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后世或将这两部书合在一起，简称《华严经疏钞》）、《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又称《华严经行愿品疏》或《普贤行愿品疏》）、《华严法界玄镜》、《华严经略策》、《新经七处九会颂释章》、《三圣圆融观门》等，又参加翻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由他证义。于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各朝皆受礼重，与齐抗、韦渠牟、武元衡、郑絪、李吉甫、权德舆、李逢吉、严绶、孟简、韦丹等公卿大臣，亦过往甚密。唐文宗开成三年（838）三月圆寂，世寿 102 岁（一说终于元和年间，世寿 70 余）。文宗为撰《华严四祖清凉国师像赞》，宰相裴休等"重臣缟素，"并为树碑。弟子中，以宗密、僧睿、法印（或作法宝）、寂光四人最著名，被称为门下四哲，而继承他法统的则是宗密。唐顺宗李诵（761—806），德宗长子。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八月即被宦官逼迫退位，禅位宪宗。作太子时与僧人来往，垂教华严四祖澄观令述《了义》一卷、《心要》一卷并《食肉得罪因缘》，频加礼接。宗密，见上文。因师从澄观，故为《清凉心要》做注。据本卷"善友施"和"李丑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89 页。

儿宅经记”两枚印鉴，知是经为僧人善友施舍，被李丑儿保存过。本文按，英藏敦煌文献 S4504 卷《乙未年灵图寺僧善友贷绢契》载：“乙未年正月壹日，灵图寺善友往于西州充使，欠少绢帛，遂于押牙（阎）全子面上贷生绢壹疋，长肆（下缺）。此沙州灵图寺僧善友，亦曾奉命出使西州，“通致使命”。英藏敦煌文献 S4685 卷有《沙州李丑儿与弟李奴子家书》中提到了李丑儿，俄藏敦煌文献 ф229δ 卷《景德传灯录》也有“李丑儿宅经记”的印鉴。则本卷是否属于宋初由敦煌流入西夏者呢？它与前俄 TK242 卷有无关系？待考。

俄 TK147《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①]：残卷，首自“一身复现刹尘身，一一遍礼刹尘佛”至“所有众生身口意，见惑贪谤我法等”。页 5 行，正文行 15 字，见于《大正藏》卷 10 第 847 页，最后四行则为《大正藏》所无。写刻体，上下单边。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8×18.5 厘米，栏面 8×14.5 厘米。纸色淡黄灰，稍涩。厚 0.10×0.12 毫米，每厘米 7—8 道帘纹。12 世纪上半期的。[②]

俄 TK246《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③]：首版画，残。佛正面坐于莲花瓣上，手结印契于胸。涡旋形背光，四圈圆环，外一圈花纹环带，再外三圈圆边。头光为波浪形，发射处三圈圆边。佛周、莲座下尾祥云图案，云外亦外向射光。版画左下角为花朵；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次另行下沉一格小字书“唐于阗国三藏实义难陁译”，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尾，尾下黑底阴文双边三围界框内书“净信弟子李”；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页 5 行，正文行 10 字，宋体，上下单粗边，版心有“梵行二”字样。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第十六品的单印本。木刻本，经折装，3 纸，每纸 7 折面(第 1 纸缺第 1 折面)。折面 9×17.5 厘米，栏面 9×14.5 厘米。纸色浅褐，涩滞，厚 0.12—0.14 毫米，每厘米 7 道帘纹。

---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 240—241 页。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0 页。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 308—312 页。

版画第1纸第1—2折面(第1折面阙失),经文第1纸第3折面至第3纸第7折面。上封皮的硬纸板被保存下来,糊硬纸板的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刊本的书页,也有带西夏文书草书字的薄纸,其中一纸上有一方红印的左边,高6厘米,九叠文字体。此版本背面折缝处糊着西夏文刊本的小纸条(当时的裱褙)。12世纪中期的金版本。[①]

本文按: 本卷即八十华严,为实叉难陀应武则天之请译者。据卷面"净信弟子李"字样,知本卷为一个叫李净信的僧人所施刻行。孟列夫认为俄TK255卷也是这个刊本的一件印本。然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本已无此卷,故而依据孟列夫描述补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残片,12世纪中期的金刊本,磨损严重。[②]另外,孟列夫认为本卷版画同俄TK243卷的版画是同一位画师所画,不同之处仅在于头饰、头光和榜题。然考孟列夫对俄TK243卷描述,却无任何版画方面的内容。

俄TK256《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③]:残片,存"若戒是梵行者为增场是戒耶问□□□□耶教威仪是□□□□□□□□□耶和上□□□□□□□□□剃发"若干字。正文行11字,楷体,上下单边。字迹、排版来看,版本明显不同于俄TK185、俄TK246。本文按,本卷即八十华严,为实叉难陀应武则天之请译者。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残片,大概是经折装,金(?)刊本(12世纪中期的)。[④]

俄TK243《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⑤]:首《毗卢遮那佛》版画;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次下沉两格小字书"大唐罽宾国三藏般若奉 诏译",次另行顶格书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17—118页。

②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18页。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325页。

④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118页。

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296—305页。

正文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正文行 15 字，宋体，版画上下双边，文字上下单边。版画、字迹精美。版心中央似有"行口"字样，当为经名和页数数字的标志。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9.5×22.5 厘米，栏面 9.5×17.5 厘米。金刊本(12 世纪中期的)。[①]

以上 28 种各类《华严经》以及相关著述，是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现存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反映西夏华严信仰的经典大概。《华严经》之三种译本：东晋佛驮跋陀罗译的六十华严、唐实叉难陀译的八十华严、唐罽宾般若三藏译的四十华严均流传到了西夏，可谓全面。另有华严宗的祖师们的重要著述如俄 TK251 卷宗密的《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上二》、俄 TK186 澄观、宗密的《注清凉心要》、俄 TK241 卷和俄 TK242 卷杜顺、智藏、宗密的《注华严法界关门》等。其中以四十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最为流行，共存经典、著述类共二十种，占全部保存华严经的 71.4%。就西夏华严信仰风行的时间来看，最早者为西夏惠宗大安十年(1084)八月八日大延寿寺大德守瓊施舍刻行的俄 TK88《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十》和俄 TK258《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它们的出现较之最早者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四月八日由地方官梁某刻行的俄 TK149《金刚般若经钞第五》，说明了西夏华严信仰相比起西夏般若信仰，整整晚了 68 年的历史事实；其次，较早出现在西夏的同类经典为西夏仁宗天盛元年(1149)至八年(1156)的由窦庸所有的俄 TK261《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大略同时，有西夏仁宗天盛四年(1152)八月初一由法门释法随向邠州开元寺僧西安州归义刘德真劝缘而雕板印施于圣节日的俄 TK241、俄 TK241《注华严法界关门卷》。此外，西夏仁宗天盛十三年(1161)年刻施的俄 TK72、俄 TK73《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个施刻时间又比西夏惠宗大安十年(1084)晚了 77 年；其后西夏仁宗时期无疑是华严经典的迅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

① (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第 120 页。

西夏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由罗皇后可能为感谢自己荣升后位而施刻的俄TK61、俄TK63、俄TK64、俄TK65、俄TK71、俄TK161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此统计尚未含被孟列夫定为甲种本的俄TK160、俄TK66、俄TK67、俄TK68、俄TK62、俄TK320、俄TK69、被孟列夫定为乙种本的俄TK162等卷),还有西夏桓宗天庆二年(1195)年,由罗皇后为死去的仁宗皇帝祈福冥荐的俄TK98、俄TK99、俄TK100、俄TK146、俄TK258《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后者一次性散施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部,数珠一万六千八十八串。大法会烧结壇、大会斋、开读藏经、大部帙经并零经、度西番、番、汉僧员、散斋僧、放神幡、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帧、消演番、汉《大乘经》、《大乘懺悔》、尽捨皇太后宫下私人并作官人、散囚、设(赦)贫、放生羊、大赦一次等等善行。此后,有可能由皇族安亮刻施于西夏桓宗天庆四年(1197)的二月或三月的俄TK142《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另外,按照孟列夫的推测,俄TK185《大方广佛花严经梵行品》是西夏崇宗天佑民安二年(1091)的山西宋刊本;俄B62《大方广佛花严经》为12世纪初的宋写本;俄TK251《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上二》为西夏刊本;俄TK186《注清凉心要》为12世纪前25年的宋刊本;俄TK147《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为12世纪上半期的西夏刊本;俄TK246、俄TK256卷《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可能是12世纪中期的金刊本;俄TK243《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是12世纪中期的金刊本。按照以上线索或推测,则自西夏惠宗大安十年(1084)开始,至夏桓宗天庆四年(1197)的这100余年,是华严经在西夏的发展、繁盛、衰落和灭亡时期。这个阶段相对于经历自1世纪初至13世纪上半期的较为漫长的西夏般若信仰时期,是非常短暂和相对集中的。其时不仅是大量的西夏刊本的出现,也还不时有宋、金版本的流通。西夏华严经典的流传,多是前人经典译本,相对于般若信仰来说,西夏经师多华严经典的再创造力,显然较为薄弱或是保守。最为重要的是,西夏的华严经典,相对于般若经典,也更集中出现于皇室王公和僧侣信士,普通的民众出现者较少。这显然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提　要：本文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之《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佛经文献，对西夏流传的28种《般若波罗蜜多经》以及相关经典进行了清理，写为叙录。本叙录建立在俄国学者孟列夫叙录的基础上，但对孟列夫叙录中的不当、差异、遗失情况亦随文作了补充，并尝试总结了西夏流传的汉文《华严经》的大体状况，以期向读者提供关于西夏般若经典流传情况的较全面的知识。

关键词：《俄藏黑水城文献》 汉文佛经 《华严经》 叙录